中国大革命史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华岗

中国大革命史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华　　岗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25—1927

中国大革命史

华　岗

*

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1982年5月第一版·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3/8　字数：264,000
印数：27.200册　定价：1.40元
统一书号：11224·91



作　者　像

（一九三七年）



一九四六年，作者和周恩来同志等合摄于上海中共代表团驻地。前排左起：黄炎培、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华岗，后排右一：李维汉，右四：邵力子

作　者　简　历

华岗，一九〇三年六月九日出生在浙江省衢县，自幼勤奋好学，在小学和中学读书时各门成绩优秀。青年时代他献身革命，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南京地委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顺直（河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巡视员。一九二八年曾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华岗先后在《新华日报》任总编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在云南做统战工作，任中共出席旧政协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全国解放后，华岗到山东大学工作，先后担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长、党委书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哲学研究》编委、《文史哲》杂志社长等职。

华岗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生前编写了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辩证唯物论大纲等著作，撰写了大量政治和学术论文。

一九五五年以来，华岗受到错误地审查和处理，后又遭受林

彪、江青一伙的迫害，不幸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五日含冤病逝，终年六十九岁。一九八〇年三月，经党中央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重 版 前 言

廖 盖 隆

这本书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华岗同志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不久就写成，并在一九三一年七月由上海春耕书店第一次出版的。从那时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华岗同志的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

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篇幅的第四章《中国大革命的经过》；其次是分析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的第五、第六、第七三章。作者对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群众革命运动，作了详尽的叙述，只可惜对北伐战争的叙述太简略了。作者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歌颂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新民主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而痛斥使这次革命遭致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作者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读来使人感奋，使人神旺，使人充满民族的自豪心。华岗同志这部文笔流畅、锋利的历史著作，为在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几十万革命烈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当然，作者写作这本书时，是不免要受到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历史条件的局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们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是一个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还没有统一的了解的党。作为这个党的党员的华岗同志，也不可能例外。华岗同志当时把共产国际和

斯大林的话当作是不容置辩的绝对真理，而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他对于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也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例如，作者把湖南秋收起义看作是“完全的失败”；作者那时显然是以城市中心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再如，作者说蒋介石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也就是认为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说武汉国民党反共后，连小资产阶级也叛变了革命；说第三党是“反革命”的党，叶挺团同军阀的军队没有区别等等，这些就都反映了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那里来的为三次左倾路线所共同的左倾错误观点。作者认为从一九二六年“三·二〇”事变以来党中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他还为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过左的倾向辩护，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建议尊敬的读者同志们在读这本书时，最好是先读一读、或者是对照着读一读《毛泽东选集》和《周恩来选集》的有关著作，在研究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问题时，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多请教。

我这样说并没有苛责我们的史学界前辈的意思。我只是说，这本书的局限性也是反映当时的历史条件的。不幸的是，这本书由文史资料出版社重新出版时，我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史学界勤奋的开拓者之一的华岗同志也已经成了古人。请允许我在这里表示对本书作者的衷心的敬意和深切的悼念吧。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

自　　序

华　　岗

这部革命史的初稿是在前年冬季与去年春间写成的，当时因为我自己对于内容及编制上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同时因为服膺并执行"与其作文章来论革命的经验，不如实地做革命的经验更为有益"遗训的缘故，所以情愿让原稿给耗子们去啮食批评。至去年冬天我不幸病了，不能不暂时离开实际运动，病中纳闷，便拿出原稿来重读一过，虽然很想趁此机会加以补充和修改，但因物质生活条件的困难，不能办到，仅在不洽意处略加增删而已。

我最初起意编著这部中国大革命史，正是广州暴动失败不久的时候，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那时我便着手写了一个大纲，同时即开始搜集材料。后因事出国，此事便被搁置下来。及至一九二八年秋间回国，则过去苦心孤诣所搜集的材料已经完全丧失，于是一场心愿全归泡影。

然而企图完成这一任务的意思始终没有取消，所以便又重新着手搜集材料，经过半年多的时期，所搜得的材料还非常少；而

且因为实际工作关系，始终没有时间写。一直到前年秋间，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中国机会主义者结合成取消派，一致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他们——特别是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不但不愿正确的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因此，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便又鼓励了我编著这部革命史的勇气，因此便利用我仅有的一些材料和我自己参加实际运动的回忆，开始动笔；但是时间总不允许，往往随写随搁，有时简直一搁就是几十天。想不到积少成多，结果终竟勉强的把书完成了，这在我自己总算暂时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消说，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区区三十万字自然不能说得充分。同时在整理分析的路线上，也难免有错误之处。读者有所指正，是很欢迎的。至各种参考书籍杂志刊物等，则因生活流动的关系，大都东遗西散，所以引用参考时不能一一注明其出处。这是事实上的困难，并非有意剽窃，合并声明。

最后，我敬以至诚，将此书纪念大革命中及大革命失败后成千上万为革命牺牲的英勇的战士。

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于上海

研究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的意义与我编著这部革命史的用意，在本书的绪言与结论及上面这一短序中都会指明，现在我还可以在这里补充几句。我认为在中国革命现在这样严重的历史时机，本书的出版有更大的实际意义。因为现在党内所发生的政治错误，有些简直就是过去大革命中我们党所犯错误的重覆和补充。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显然就是六次大会前形成而

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的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立三路线根本否认一般的革命高涨基础之上世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因而也就否认中国革命胜利与巩固的可能；立三路线根本不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环境的特点，根本否认中国国内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也就取消中国革命发展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他不但不能正确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与现时阶段的任务，而且用托洛茨基否认中国革命之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阶段的观点，来代替列宁的革命转变的理论；立三路线不但对于党是革命的组织者的作用完全不了解，对于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和工农群众之间应当有的关系完全不了解；立三路线不但曲解而且实际上拒绝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暴动的理论，在理论上去替冒险盲动主义建立基础，并且实际上推动党走这条道路（立三曾在去年六月至八月间提议全国总暴动，而且说“工人只要暴动不要罢工斗争”）。除此之外，立三路线还有更危险的特色，这就是立三同志竟用了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用过而已经被打碎的理论，竟不惜师承过去大革命中断送中国革命的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的故智，居然说共产国际不懂得中国实际情形，共产国际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必然引导到这种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另一方面，躲在反立三主义旗帜之下的右派罗章龙等，客观上也正在进行他们反四中全会反党反革命的活动。对于他们，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竟完全是空过去的一样。

然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果真是空过去的吗？绝对不是的！立三路线与右派的面目暴露破产之后，党内真正革命的同志将一定继续并加深这种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执行

国际的路线，广大的工农群众将更加团结在布尔塞维克的周围，进行革命的斗争，将更加坚决的去认识并接受过去大革命的教训，领导中国革命到新的伟大的胜利。

一九三一年三月一日

目　次

第一章 绪 言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显然是有极大的世界历史的意义。这次大革命自从五卅怒潮勃发，有时伏流昂进，有时则简直象暴风疾雨似的，直到广州暴动失败，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退兵一战之后，才暂时降落下去。中国是马克思所谓“自古反动的冰山”，但是因为长期受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这种冲击迫着中国“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迅速解体，导引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急剧动摇，继后更因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猛烈侵略，圣经鸦片枪炮子弹交相输进，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战争，广大农民群众加速度的破产，工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各国帝国主义为分割中国抢夺中国统治权利的冲突亦复加紧，于是中国成了帝国主义一切矛盾集中而且最尖锐的地方。到了五卅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各种矛盾都在中国郁积待发，到处都预示出大风雨之逼近。五卅上海南京路惨案，正如投射一点火花于那充满了炸药的近代工业系统的矿洞中，必然引起多年预备下的大恐慌之爆发。因为矿洞的深阔和炸药的猛烈，所以恐慌居然延长至两年以上，这一大恐慌虽然没有一下就破坏中国这座“自古反动的冰山”，虽然没有能够立即继续斯拉夫人之后“带来各民族的温和之春”，但却开辟了未来胜利的大道。

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东方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中占第一等位置，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一九二〇年）上曾明白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绝大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会以后各种事实的发展，证明列宁的指示完全正确，列宁在第二次大会“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中所提出的倾向，后来完全成了事实，一方面，从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剥削所必需的对象看，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比以前更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常目标；他方面，许多主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无论在经济上和在整个社会结构上，都已经起了不少的变动，工业的成份已经加增的发展，无产阶级跟着长大，农业的危机也更加剧烈。再则国际情势亦已起了变动，各首要的帝国主义列强在大战时及在战争初停的数年，处境都非常困难，革命暴动前仆后继，在匈牙利、芬兰等国资产阶级都暂时丧失了政权，在俄罗斯则乾脆引导资产阶级沙皇攒进了坟墓，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推翻了地主沙皇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祖国，而且苏联解决民族问题又成为世界民族解放的模范。及至资产阶级得着改良主义者的扶持，暂时渡过国内直接革命恐慌，资本主义得着暂时和部分的稳定，于是英美法日等国的殖民地政策又加浓了强盗式的侵略性，这必然要惹起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众有力的反抗，加以大战后西欧无产阶级直接革命恐慌虽被暂时渡过，但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渐次增长，这些国家内无产阶级援助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革命斗争（例如“Hands Off China”即不许干涉中国的运动等）仍不断发展。这种种情形，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自然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促醒他们起来做救死求生

的斗争，引起他们的革命战争和暴动，而且这些革命战争和暴动，大多数都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内部阶级斗争形势扩大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生的。一九一九年三月高丽的叛乱，一九二〇年一月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五年四月摩洛哥的暴动，同时八月叙利亚的暴动，荷属印度的暴动，印度的革命酝酿，各国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行为，差不多都遇到大力的反抗。英国进攻阿富汗竟被击退，法国帝国主义的大兵竟困不倒叙利亚的抗斗，里夫民族的游击队与法国、西班牙具有最新式武器的常备军竟能相持两年之久，美国镇压尼加拉瓜民族之反抗亦达一年以上，数万万印度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浪潮，时刻威胁着要捣毁世界帝国主义的城堡——大不列颠的统治。一切这些情形，都证明一九二三年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虽获得部分与暂时的稳定，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虽暂时消沉下去，但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却如海裂山崩的起来，中国大革命更可说是这种含有极大世界意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代表。中国大革命实是世界革命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她不但对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有极大的启发推进作用，不但震动了全部的亚洲大陆，而且成为摇撼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主要原素之一。中国大革命中直接间接卷进了几千百万的群众，无产阶级第一次表现她在殖民地革命中具有独立的政治作用，她在斗争中的英勇毅力不但使得帝国主义者惊惶失措，而且使得民族资产阶级恐慌万状，亟亟由参加革命转入反革命营垒，五卅以来的事变，尤其是英勇的上海暴动与广州暴动，在世界革命历史上始终成为光荣的一页。中国革命在苏联直接影响帮助之下而开展，同时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本身也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斗争的

一部分，因此也就直接间接帮助了苏联的建设和它政治影响的扩大，所以“保护中国革命”与“保护苏联”一样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口号。

可是中国大革命也并不是完美无疵的，中国大革命固然有她不可磨灭的伟大意义，但是大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错误与弱点也非常严重，这样伟大的中国革命终竟遭到极惨痛的失败，失败后使中国广大工农及革命青年群众受到旷古未闻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中国大革命所以受到这样惨痛的失败，一方面固然由于许多客观的困难，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国大革命给予革命阶级与革命政党的教训也特别重要。现在正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时又是新的更深刻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的时候，我们更须仔细研究过去在大革命各种重要流变的过程，学习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这便是我在百忙中编著本书的主要用意。

第二章　中国大革命的性质与造因

第一节　中国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

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中国大革命的最主要特性也就是半殖民地革命。这种半殖民地革命的客观任务：第一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取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彻底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统一中国；第二就是要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根本摧毁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第三，这一革命如果彻底胜利，应该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胜利，建立工农民权独裁政权，以准备转变到将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这些任务在客观上都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阶段，因为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这两件事都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且客观上正是扫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更快更高的向前发展的条件。

帝国主义是中国政治经济的真实统治者，中国的豪绅军阀封建残余，又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显然含着很大的矛盾，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首先解放出资产阶级的中国，而事实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确实是赞助并且参加过革命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因为革命斗争发展深入，民族资产

阶级公开背叛革命，由参加革命转入到反革命营垒，这也只是表示革命斗争发展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革命的客观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与肃清封建势力却一点也没有完成，因此革命的性质并没有转变，所以在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上说，中国大革命所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性是显然没有疑义的，因为"一切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运动"（列宁）。

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内容，土地革命是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引证列宁的话来答覆："在马克思派，农民运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运动。它在俄国也如在其他各国一样，按照它的社会经济的内容，它必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伴行的卫星。它并不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它并不反对商业经济和资本。它所反对的乃是农奴制的残余，乡村中资本主义前期的关系，以及反对为一切农奴制的残余之主要砥柱的地主的垄断土地。所以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还不是废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相反的，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在客观上正是创造资本主义发展更广大的基础，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只能创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墙基，在这墙基下自然要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按照它的客观意义，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彻底消灭一切农奴制的残余，但却不是消灭资产阶级的经济，因此也不能消灭社会阶级。可是觉悟的工人阶级对于农民运动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应当赞助农民，以最大的努力帮助农民运动，领导农民彻底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但同时应向农民解释仅仅推翻豪绅地主还不够，推翻地主政权，应当同时准备消灭资本主义的统治，宣传社会主义"（见列宁论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于是可

知土地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而这些农民正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代表，所以在土地革命的意义上说，中国大革命更显然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的阶段。

至于革命所要求的工农独裁政权，固然是开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但就当时工农政权的阶级性上说，也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的性质。这不但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叛变革命以前的所谓国民革命时代是这种资产阶级性质，就是在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以后的工农苏维埃革命也还没有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阶段。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所创造的苏维埃政府以及其他各地农村苏维埃政权都显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质。因为：第一，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也可以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政权形式，而且在民权革命的阶段，苏维埃是保证民权革命彻底胜利使之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方法，但不因采用了苏维埃的政权形式，就改变了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本身性质。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以后，土地革命深入发展，中国革命进到更高的阶段，从工农与资产阶级结合的联合战线，进于工农反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线，这是革命阶段深入和革命动力的转变，而不是革命任务的转变，革命性质固然与革命动力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革命性质是要决定革命客观任务的。

再进一步说，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前面，中国政治经济也并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占中国最大多数的是农民、工人毫无疑问的只占少数，农民的本身是小私有财产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代表，但是农民群众是中国大

革命基本动力之一；就是工人阶级本身，固然在中国大革命中已经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表现出他那英勇奋斗的精神，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觉悟的指导者，那就未免过早，摆在中国大革命之前最急迫的而且可能做到的任务只是肃清封建势力完成土地革命与赶走帝国主义。固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入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而加重了中国革命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任务，而且一定要在坚决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点上才能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任务，但这些任务在客观经济内容上都是没有超过资本主义范围的。固然因为中国革命发展在特殊的环境中，除了中国是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之下半殖民地的地位这一个中国革命显著的特点以外，还有另一个特点，即中国革命是发生于世界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而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国际革命运动中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性质并不和十九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及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相同。中国革命不但有确定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而且中国革命一开始大爆发（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后）就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在内，主要的就是因为“在没有进到世界革命时期以前的民族解放运动，仅是整个的德谟克拉西运动之一部分，而到现在苏俄革命胜利以后，已经进到世界革命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但是构成中国大革命之客观的经济的内容和在一定阶段上所要直接与可能完成的任务如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肃清封建残余等，并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存在的范围，托洛茨基派不能了解客观的事实，硬说中国封建势力已经完全肃清，中国农村中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因此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超过资产阶级性民

权革命的阶段，已经进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这完全是站在他那“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显然是莫大的错误。第二节我们将进而探讨中国大革命之造因，研究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基础，即可从事实上得到更确切的答覆。

第二节　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

一、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

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经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原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形成世界的经济，渐渐撤毁一切“民族”的藩篱，使世界任何地方都被结合在一个世界经济纽带之下。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生产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恐慌——生产过剩，原料缺乏，工人失业等，逼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向外找寻市场和原料地，于是地球之上遂有所谓殖民地。中国是东方产业落后的国家，又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宰割了美非澳诸洲及亚洲西部和中部后，中国便成了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最肥壮的对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侵略其他殖民地一样，首先就是挟着商品来找市场，可是因为一开始就遇着中国闭关主义的挡箭牌，于是接着而来的便是武装炮舰的轰击，造成历次的侵略战争，如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等，结果强迫中国开放商埠，打破了中国封建的国有贸易，于是帝国主义商品如潮涌进，所谓“它（帝国主义）那价廉

物美的射击力，就是中华的城壁，也被他打破了”（《共产党宣言》）。于是收括原料，移殖资本，文化侵略相继而来，中国也就成了帝国主义的“国际的殖民地”。

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回溯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真有突飞猛晋的形势，而且侵略的方式也是一步厉害一步，鸦片战争（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是帝国主义先进国家——英国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幕。鸦片战争结果，缔结南京条约，英国取得了香港，满清政府还赔偿了它二千万元以上的军费，开辟宁波、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五口通商口岸，并于无意中断送了关税自主权。英国既然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局面，于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就随之俱来，此时各国都和英国一样，都还在工业资本主义的时代，他们主要的目的，就在取得销售他们剩余商品的市场，因此跟着南京条约而来的中美条约与中法条约，其最主要的精神，都是要挟中国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和他们通商。自此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得寸进尺。一八五七年英法两国便联合进攻中国，结果是中国战败，缔结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再战，又强迫订立北京条约，于是香港对岸之九龙半岛割让于英，英法两国各得赔款八百万两，增开九江、汉口、天津等十余处为商埠，且于天津、汉口及南京条约中之上海三处正式划为租界。此外又规定了凡外国输入中国之货物，除南京条约强定为值百抽五外，北京、天津两约，且更进一步规定，于进口税百分之五外，再增缴百分之二点五之子口税，即可在中国内地通行无阻，从此中国商品因负担税额过重，就再也不能和外货竞争了。在中英天津条约中，又明显规定英国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允许外国人只要有领事的护照，即可在中国内地自

由通行。北京条约更承认了法国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租买土地建造房屋之权，各国也就竞相援例，从此外国领事裁判权已通行于中国全境，再也没有限制了。

不仅如此，天津、北京两约缔结的时候，正是中国太平天国事件扩大的时候，英法美等列强乃乘满清政府自顾不暇的时机，积极攘夺权利，在上海居留地积极扩张行政范围与司法范围，使上海租界俨然变成外国领土，又乘太平天国军队退出上海的时候，英法美诸国即自派税务司管理海关税收入，从此关税管理权便完全落于外人之手。英国又以武力帮助满清政府打败太平天国，藉以订立芝罘条约，取得开辟芜湖、温州、宜昌、北海等处为通商口岸及在云南等地设立商埠之权，同时并设四川经济状况视察员和输送探险队于中国西部甘肃、青海、西藏一带，由满清政府担任保护。此约订立，英国在华势力，即由上海直达长江上游。同时缅甸、安南、暹罗亦于此时脱离中国，暹罗受了英法两国的指使，脱离中国自主，缅甸、安南则先后合并于英法。东北方面，俄罗斯沙皇帝国继续英法美诸国侵略之后，亦起而主张利益均沾，一八五八年跟着英法天津条约之后，缔结爱珲条约与天津条约，举凡英法在中国所取得的利益，俄国都援例取得之；一八六〇年，更订立中俄续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之地完全割让。西北方面，一八八一年订立伊犁条约，又断送了伊犁河以西之广大领土，陆路通商关税亦正式协定，内外蒙及新疆、甘肃各处都开放通商，从此沙皇俄国的势力，也便骎骎乎支配中国北部。

日本是新兴的国家，它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在欧美各国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及至它将次成熟的时候，全世界的市场，差不多已经宰割分配无余，只有中国这块肥大的禁脔，虽然已在英

法美俄德等帝国主义列强包围掠夺之中，但尚有容纳更广大的商品之余地，所以新兴日本帝国主义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中国，并且进攻的手段亦更加猛烈。中日甲午之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之最初表现，中国战败之结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诸岛，凡中国过去所与列强之最惠待遇，日本都同样享受，并增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从此日本亦是与其他列强互争中国利益之一员了。

中日战争以后，正是十九世纪的末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工业资本主义的极盛时期，对于殖民地的需要，已不仅是专为商品的销售，而更需要原料的供给。中国市场固然广大，物产固然丰富，但已经数十余年被欧美列强所掠夺，如今又新添加日本强盗，自然使列强中更增多一个角逐的分子；加以“垄断原料”比以前仅仅争夺市场的时候，必然引起更多的纠葛，因为争夺市场与割地占据还不十分密接相关，而垄断原料却至少要有势力范围，因此列强对于在中国利权之扩张，比以前更为迫切，他们侵略的方式也就更进为列强争相以武装力量与外交阴谋各自占据势力范围，实行公开的掠夺，如胶州湾、威海卫、旅顺、大连等地之租借军港，长江流域、东三省、云南、两广、福建、山东等处，英俄法日德努力割分，铁路矿山之分配于各国。中日战争失败，中国财政上已受到巨大赔款的打击，军事设备也一蹶不振，从此外债大批渗进，至庚子赔款更使中国财政完全破产。而且自从美国对日法美俄德奥意七国通牒主张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使在中国不曾享有势力范围之国家，都可得到经济和政治的利益。辛丑条约，就是各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利益的一个表现。而以关税收入来抵偿赔款，尤使中国永远屈服于列强政

治和经济的束缚之下，中国从此事实上已经被列强共管了。

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已进到更高的形式，已经由争夺市场、搜刮原料更进而向中国移殖资本。这种侵略的第一种形式，便是铁道投资。本来各国经营中国铁路事业很早就已开始，但是直到辛丑条约之后才始十分盛行，如俄国之于东清铁路，法国之于滇越铁路，德国之于胶济铁路；日俄战争后，日本之于南满、安奉铁路，都先后把修筑权抢去。铁路对于整个国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支配了中国的铁路，便以铁路为支配铁路沿线一带的政治经济之中心，譬如南满铁道会社表面上是一个营业性质的管理铁道机关，实际上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三省的代表。又如京汉、粤汉、川汉、京奉、津浦、沪宁铁路，表面上虽由中国政府自己管理，但这些铁路都是由外国资本家借款建筑的，结果也和外国自己建筑的铁路一样，投资者在铁路上占着种种便益，不仅由此扩张经济势力，而且也由此扶植政治势力，借款修筑的铁路与外人自建的铁路，根本是没有两样的了。

辛丑条约之后，列强对于中国进攻的第二个主要形式，可说是银行团的组织，组织银行团的动机乃是各国资本家都想做中国铁路的投资者，结果不免互相冲突，所以成立银行团想来避免这个冲突，同时以联合的金融势力，来束缚中国的财政，而且进一步监督中国财政。一八九八年美国公兴公司取得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和管理权，至一九〇五年中国备价赎回，并决定广东的部分由民办，湖南的部分由官民合办，湖北的部分由官办，其后两湖因没有资本，乃于一九〇九年六月，向英法德借款，于是三国银行团遂开始成立，后因美国抗议，于一九一〇年三月容许美国加

入，因是有四国银行团之成立，借款总额为六百万镑。不久，美国又发起币制借款，定额为一千万镑，并邀同英法德三国加入。此契约于一九一一年四月成立，结果仍是四国银行团操纵一切。至一九一二年三月日俄亦正式加入，于是由四国银行团扩大为六国银行团。当时中国正值袁世凯当国，为镇压革命，向六国银行团大借款，此时美国因企图取得独立操纵银行团的地位，未得成功，遂宣告退出，但其他之英德日俄法五国，仍旧成立五国银行团。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大借款成立，金额有二千五百万镑之多，利息五厘，名为中国政府一九一三年善后五厘金币借款，偿还期定为四十七年，以盐税为主要担保品，以海关税为增加担保品，以直隶、河南、江苏、山东四省分担之经费为临时担保品，银行团遂得公债优先权。这样一来，中国的一切财源，便都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袁世凯也就在这笔大借款之下，做了帝国主义者的宠儿。

辛丑条约后，列强对于中国进攻的第三个主要形式是协助和利用军阀，助长中国的内乱，而乘机攫取权利。在第一次大战之前，是各国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一致联合援助袁世凯来镇压中国革命，一九一四年大战发生之后，欧洲各国不暇东顾，于是日本单独来玩弄这个把戏，最初极力援助袁世凯称帝，而以订立二十一条约为交换条件，二十一条约中承认山东和满蒙为日本势力范围，断送了汉冶萍公司和南满、东满及山东的采矿权，延长了南满和安奉铁路和旅顺、大连租界期限，又断送了吉长铁道经营权和胶济铁路烟台、龙口支线的建筑权。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利用段祺瑞来做工具，一九一八年供给段氏二千万元之参战借款，后又继之以满蒙四路〔（一）开原海龙吉林间，（二）

长春洮南间，（三）洮南热河间，（四）由洮南热河间之地点达于海港间；共长一千余里，借款二千万元〕山东两路〔（一）济南顺德间，（二）高密徐州间；共长四百余里，借款二千万元〕借款四千万元及军械借款四千万元等。大战结束以后，欧洲列强侵略目标重新移向中国，于是各自操纵军阀，军阀战争延长扩大，中国遂更陷于糜烂不堪之地步。日本既以段祺瑞之安福系为傀儡以图垄断中国利益，英国也就援助直系军阀冯国璋、王士珍以为抵制，后来奉系张作霖得势，安福系失败，日本遂又利用张作霖作工具，英国也换以吴佩孚、曹锟为抵制，此仅就几个大军阀而言，其他各地小军阀混战，同样也都逃不了帝国主义的关系。其他各国怎样呢？当然他们决不顾中国利权归英日独占，于是遂有所谓巴黎和会与太平洋会议对华问题协议和新银行团之成立。太平洋会议与新银行团成立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口号之下，对华侵略的势力更有突飞的发展。

帝国主义对华企业投资虽然没有像政治借款这样容易投机取利，但自辛丑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在华经营产业也是非常积极，仅就上海一埠而论，帝国主义在华所经营之工厂，大半都是辛丑条约以后才开始设立。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既然这样突飞猛晋，于是便自然而然冲破了中国过去闭关社会的一切政治经济组织，帝国主义为便利自己的掠夺计，始而建筑铁路及发达其他的交通工业以运输商品，以后又移殖资本开办工厂以更便利剥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循至外国财政资本垄断经济的形式也渗入中国，所以中国不但铁路航行权矿山等在帝国主义垄断之下，而且中国金融势力也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操纵——汇丰、花旗等几个大银行完全支配了中国的金

融。

三、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出现

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根本政策在于使殖民地奴隶化，因为殖民地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有机的组成的一部分，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了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销售商品的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所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争相以瓜分与强占殖民地的形式去笼罩全世界，他们都极力去维持并加强殖民地的附属，以加深对殖民地的剥削，甚至他们帝国主义国家继续增高的内部矛盾的压力也都拚命加在殖民地身上去。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殖民地，毫无疑问的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肯对中国有经济上重大意义的让步，尤其不肯直接帮助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发展，本来不是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的。然而帝国主义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相当破毁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束缚，客观上不能不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因为帝国主义既要侵略中国，既要割据中国领土，搜刮中国原料，对于中国投资投货，就不能不破坏中国农村关系，造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劳动后备军，中国手工业受外国商品侵入的影响日益衰败，更加增加失业的劳动者，而且亦因外货的输入而使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当力阻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开采煤矿，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也就不得不引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然需要，且反因要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

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辛迪加”（Sgn-dicat）的雏形。外国帝国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销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上也就不得不发现“国货”，也就不得不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业华侨，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累”，能力更超过国内资产阶级，有时居然能够与外国争投资呢。

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

自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独立发展的，——这在帝国主义殖民地政策束缚之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乃是由外国帝国主义外烁侵入才开拓的，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首先就遇着下列困难：（1）对外贸易受协定关税之限制，（2）自己缺乏近代工业中所需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不得不受外国帝国主义垄断操纵，（3）财政权操于列强之手，一切金融信托事业全被挟持，（4）工业略有进展，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这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之下的必然现象！），原料食粮也受限制，（5）军阀混战不息，苛捐杂税繁兴，（6）农民手工业者破产者日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市场更受影响。因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小生产商品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大生产商品之间悬殊更甚，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根本谈不上自由的竞争，列强帝国主义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掠夺势力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很浓厚的政治意味，竭力用外国大银行——如英之汇丰美之花旗日之住友等以掌握全中国的金融，用新银行团等方法操纵中国的财政交通，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因此中国虽有自己民族资本

发展的形势，虽也造成了一些新式银行资本，但一则因大工业所需过多非其力所能及，二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厚，于是使着中国资本家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投资为营业，间接也就阻碍民族资本生产的发展。

然而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究竟促进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变化，开拓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因为帝国主义初侵入中国的时候，帝国主义带着西欧先进国的技术，使中国经济生活中也不得不发生一些“产业革命”式的进步，这时候帝国主义经济（开始的铁路工厂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确起了些进步的作用，事实上是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当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暴露——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时候，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外国商品输入减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着比较畅快的发展。从统计上看，在大战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入超数确实有些减少，例如一九一四年的入超数是二一二，〇一四，五五五海关两，而一九一五年的入超数减至三五，六一四，五五五海关两，一九一六年的入超数继续减少为三四，六〇九，六二九海关两，一九一九年的入超数更减少至一六，一八八，二六九海关两。如果更具体的看一看各种棉织物输出入的变动和原料品及机器输入的增加就更加容易明瞭。一九一三年各种棉织物品的输入为二一，〇九一，〇〇〇匹和二，六八五，〇〇〇担，输出为九八，一一五匹和四九，三三三担，而一九二二年的输入减为一三，四八三，〇〇〇匹和一，一九二，〇〇〇担，输出则增至四一五，六三九匹和一〇三，四二四担。其次，一九一三年的纺织机农业机及其他机械的输入统计为四，五〇五，〇〇〇两，而一九二二年的输入增加至二一，九七一，〇〇〇两，原料品的火柴材料和棉花的输入在一

九一三年为三，五一三，〇〇〇两，一九二二年则增至四四，八一三，〇〇〇两，这种机械及原料品输入的增加，也足以证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实际上中国民族工业在这个期间也确实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现在可以举出几个实际数目字来证明：

一九一五至一九二五年华商棉织工厂发展表

年　　份	纱厂数	锭子数	布机数
1915年	22	544,010	2,254
1919年	29	659,721	2,650
1921年	51	1,238,902	6,650
1923年	54	1,943,672	8,581
1925年	69	1,881,822	16,381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五年中地毯输出比较表

年　　份	条　　数	价　　值
1913年	12,396	99,863
1919年	51,205	460,550
1921年	90,459	975,322
1923年	——	4,691,005
1925年	——	6,362,633

自然中国民族工业这种发展比之于帝国主义的生产实在是非常可怜的，但是如果说中国还没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说中国还只有小资产阶级，并没有大资产阶级，都是不合事实的。

我们再引中国资产阶级自已做的一个简单统计（见上海总商会出版第八卷第五号的《商业月报》）来看看：

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商办工业发展比较表

工业种类	商办工业形成时期（1911—1914年）		商办工业焕发时期（1914—1919年）	
	平均每年所增加的工厂	平均每年的资本	平均每年所增加的工厂	平均每年的资本
生丝纺织	三分之一	50,000元	1.67	176,400元
棉纺织染	6	447,222元	5.67	1,018,000元
面　　粉	5.67	99,059元	5.67	188,000元
电　　业	4	138,583元	7.33	160,000元
柴　　火	4.33	30,538元	3	73,000元

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

中国既然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就要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发生冲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但在经济上要求解放，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而且因为帝国主义不只是伸手于中国经济生活中，它为适应于种种经济侵略起见，还造成了另外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要求关税自主，要求根本推翻帝国主义之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特权。（读者要注意：不可以把这里所说“民族资本主义”，完全看成“民族资产阶级”，事实上过去争取这种民族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之条件的，不只是民族资产阶级，而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事变及七月武汉反动之后，争取这种条件的简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创巨痛深，弄得欧洲经济糟不可言，他们为维持自己垂死的生命，必然要更凶猛地恢复其经济政治的威权于中国——当时唯一可能的市场，中国民族工业既在大战期间有些发展，而战后不久就遇到更强的经济侵略，于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更大的矛盾，所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求脱离帝国主义的箝制

和束缚，要求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争取自己自由发展的条件，实在是中国大革命之第一个经济基础。

（二）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

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关系

但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不仅在它自己的经济与武力上，并且它已经与中国的封建势力发生了联系。社会上时常有这样的矛盾，就是帝国主义经济侵入殖民地本是造成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破坏封建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维持封建关系以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为要维持它对殖民地经济政治的统治起见，不得不利用殖民地的封建势力，实际上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之封建残余，是外国帝国主义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中国地主豪绅及其他各种封建势力，封建势力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

二、买办阶级的出现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第一，帝国主义为要无限制剥削中国广大民众起见，不得不经过买办地主豪绅的封建势力以作它剥夺的中介。中国地主豪绅自己也企图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可以蜕化为资产阶级，因此也愿意做帝国主义的中介。于是办理“国立”的邮电、铁路、矿业、航业等事业，以及经手交付赔款借用外债等“国立”和私立银行的官僚士绅，便都变成帝国主义御用的经纪买办，他们的发财是靠那种“以官僚署为企业”的手段得来的，他们的地位是靠帝国主义扶持起来的，他们简直是帝国主义所雇用的洋奴。这些

做帝国主义的洋奴买办，大半都是旧时的贵族地主豪绅，即使有些官僚买办（军阀）是游民土匪出身，他们也必定变成官僚士绅，譬如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就和东三省、山东的封建地主豪绅结成密切的关系。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士绅，虽然在百年前已经没有很显著的“农奴主式”的优越地位和特权，仿佛可以由考试而取得官爵，由官爵而取得积累资本之可能，由取得资本而购买田地房产，然而各省各县的世家，大半是“世代科甲”，别成一“贵族”，何况百年来科甲已不值钱，“市侩庸伧”都可以由捐班出身而取得官爵。贵族士绅的身份门第之界限，早已渐渐变为贫富悬殊之地主佃户的阶级关系，所以士绅不一定是官僚，却必定是地主豪富。他们既然被帝国主义委托雇用，取得各种银行、矿务、铁路、航行等事业之管理权，便可分润一些帝国主义剥削中国民众膏血之所得，于是他们的田地财产日益增多，可是因为他们是在帝国主义支配影响之下，而帝国主义又要妨碍中国工业的发展，所以他们的资本积累，反而都投到土地高利贷方面去，而很少的投到工业方面来。其中虽然也有些买办阶级把他的积累资本投到工业中的，例如“南通王”张謇，山东的潘复，直隶的曹锟兄弟，其他交通系，研究系，政学系的人物中，也有投资到工业的，但是这种买办阶级投资工业，对于真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因为一则他们完全在帝国主义支配影响之下，二则他们的主业还是官僚机关田地重利盘剥以及政治投机（借款，战争，扣饷等），就是投资于工业也不过是他们的副业而已。而在积极方面，封建势力既在农村中做了帝国主义间接的媒介，于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在中国封建剥削阶级有力的帮助之下，一天一天深入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之

中，外国商品充满了中国全国大小的都市，甚至穷乡小邑中，中国旧有手工工业、家庭工业因无法抵抗而不能不渐次崩溃，所谓“火柴从外来，洋油及洋油所带来的各种洋灯，代替了中国工业的大部分”，一个小乡的农民，他若买布则大半是洋布。而且地主由农民那里所榨取出来的血汗，因为民族工业难以与帝国主义竞争，又很少拿来投入于民族工业中，这样自然要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很大的阻碍。

三、军阀战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第二，中国是所谓“国际的殖民地”，各国帝国主义为争夺世界的霸权，争夺中国的统治利益，必然要利用封建军阀实行互斗，“自从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以来，外国帝国主义绝未给中国以一小时的休息。英国资本资助吴佩孚统率的直系，日本资本资助张作霖及奉系军阀”。各派军阀为争权夺利，亦必然割据称雄，这样自然造成中国不断的军阀混战。这种不断的军阀混战毫无疑义的，首先就要造成割据局面，使中国不能统一；其次就是赋税的增加，军费的搜刮；再其次就是交通的破坏，市场的缩小，使中国幼稚的工业生产，更加不能与帝国主义商品竞争，中国自己的工厂常常被帝国主义并吞了去。所以封建势力割据中国之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并不受恶劣的影响，或者受得很少，即就各省的税收来说，军阀总是不会向帝国主义者征收的，但是封建军阀的混战割据却非常阻碍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四、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冲突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见中国的封建关系对于帝国主义不但没有多大的妨碍，而且还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一种依据，但是非常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封建势力与民族资本主义的

冲突，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生活中之第二个大矛盾，也就是中国大革命之第二个社会经济基础。（这种矛盾，虽然在相当的意义说，仍然是变象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冲突，但却有它另外各种不同的关系和形式）。何况在买办制度方面来说，当然是笼罩着全中国整个儿的铁网：从官僚式的最高买办，经过洋场上的巨商买办，经过官署军队下之政客胥吏，经过内地的批发商，甚至于小洋货铺的店东，直到农村中搜刮原料的富农小绅士——帝国主义伸着如此之长的"巨灵之腕"（买办制度）来剥削中国。但在买办阶级方面说，这一阶级却不包括二三等以下的小买办（如洋行小鬼，小洋货铺，富农，普通商人等），买办阶级只限于相当掌握着经济最高权的巨商、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日益发展，买办阶级之中亦逐渐发生阶级分化，一方面仍旧受帝国主义的操纵支配而日益互相并吞冲突，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买办阶级或者破产失业，或者因为积累资本日多，逐渐蜕化为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增加他自己一些"独立性"。再则当北洋军阀统治着大部分中国的时候，外国帝国主义都承认北洋军阀是个总的"政治买办"——中央政府，帝国主义一切大的借款都只经过这个总买办。南方的军阀地主实在吃醋不小，南方军阀羡慕着北洋军阀卖国的勾当，心中便存了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观念。所以当着中国民权运动初开始的时候，这一部分吃醋的军阀买办地主便也藏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旗帜之下"参加"了革命——他们不是来革命，乃是因吃醋而争风，想争取一个总政治买办的资格。并且因为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维持封建势力与发展资本主义混在一起，资产阶级为要争取自己发展的前途，也想利用这种南方军阀的力量去反抗北洋

军阀，所以当时跟着南方军阀一齐去“参加”革命的，其中有许多自然是当地之商业的小地主，同时还有许多民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谓“二次革命”，所谓“护法战争”，就已经是资产阶级利用豪绅地主军阀力量去反对北洋军阀的有力表现。因为在开始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还没有明显之“阶级分化”的时候，这些南方之民族资产阶级性比较浓厚的地主买办，自然容易与民族资产阶级混在一起，去反对北方封建性比较浓厚的大地主大买办。固然这种军阀地主为吃醋争风而“参加”革命，在他们主观上并不是为解放中国，并不是为推倒中国社会上之封建剥夺，但在客观上，这种资产阶级南方军阀地主对北洋军阀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号，客观上在一个相当情形之下是有利于革命之发展的。

（三）农民的贫困及其与封建地主的矛盾

一、中国农村经济的危机

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一方面受外国帝国主义之经济政治的进攻，大批的破产失业，发生极强度的贫穷化过程。另一方面受着封建地主之残酷的剥夺，农民对于地主的租额一般都非常之高，全国各处都没有少于百分之五十的，有的地方居然到了百分之七十，遇着灾荒往往全部收获还不够交租。加以军阀混战兵匪灾荒的连年侵扰，苛捐杂税的重压，使一部分还没有破产的小农亦急剧的趋于破产。农村中佃农增加自耕农减少的过程非常显著，同时荒地面积也日益增加。据日本东亚同文会出版之《中国年鉴》所载，中国全国荒地面积增加的趋势，有如下页表：

据下表，四年之间，中国荒地面积，竟增加到四万九千万亩

年　　次	亩　　数
1914年	358,235,867亩
1915年	404,369,948亩
1916年	390,361,021亩
1917年	924,583,899亩
1918年	948,935,748亩

之多，农村经济危机已可概见。我们再从海关统计上看看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五年之间粮食进出口的情形：

年　　次	进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出口总价之差	入超或出超	粮食入超占对外贸易总入超百分比
1912年	26,693,799	10,567,192	16,126,607	入超	15.8
1913年	33,252,347	11,487,248	21,765,099	入超	13.0
1914年	47,429,953	8,460,185	38,969,768	入超	13.7
1915年	32,747,988	9,675,494	23,072,494	入超	64.7
1916年	38,839,026	4,880,551	33,958,475	入超	68.1
1917年	35,743,881	8,762,329	26,981,552	入超	31.1
1918年	25,806,154	6,732,145	19,074,009	入超	1.2
1919年	12,119,358	39,323,518	27,204,160	出超	—
1920年	11,186,823	57,765,480	46,578,657	出超	—
1921年	50,894,440	33,194,893	17,699,547	入超	5.8
1922年	104,389,424	22,036,857	82,352,567	入超	28.3
1923年	140,388,750	21,368,581	119,020,169	入超	69.7
1924年	119,758,616	25,439,733	94,318,883	入超	34.2
1925年	85,487,192	29,873,738	55,613,454	入超	3.2

中国是所谓农业国家，但因兵匪连年侵扰，灾荒继续扩大，荒地日益增加，农业生产丝毫没有改良，军阀盘踞的地方，更要强迫农民栽种鸦片，以增加他们搜刮军费的来源，所以弄得粮食也要仰给于外国。依据上表看来，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五年这

十四年间的粮食进出口，只有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两年有些出超，其余十二年即完全入超，而且在一九二三年这一年粮食输进竟超过出口一万万一千九百零二万海关两之多，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衰落真是不堪形容了。

二、中国的土地关系

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田地，极大部分（根据一九二七年武汉国民政府调查为百分之六十二，根据《中国年鉴》统计则为百分之六十点三）尤其是肥沃的土地，都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农民自己所有可以耕种的土地非常之少，占土地所有者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贫农，中农）所有土地还不到五分之一（根据武汉国民政府调查及《中国年鉴》统计均约为百分之十九）。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着优势。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田亩，大半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又可分为：（A）完全没有土地的农民（佃农），（B）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地的（半佃农），（C）小农自己有些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之不足的（自耕农）。中国农民群众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都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土地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就是土地被集中在非农业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的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的束缚。所以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所有制度的问题。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方式。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立也就从此日益尖锐起来。

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的互斗的历史

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的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也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是：（一）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已经占着优势，土地大半可以买卖，这种优势日益发展，（二）实物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三）地主阶级之中，大地主比较少，中小地主占着优势（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比较少，然而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的过程非常之急剧），（四）各省地主的大小的关系是不平衡的。

中国大地主的发展並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的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小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的田地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地主阶级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更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也越苛刻。还有一点更须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农村中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固然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如湖南的应工，江苏的送工等），很多农民受地主的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地主方面，用超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民，那就更有许多方法，实行得非常广泛，例如在成立租佃关系时，佃农事实上並无自由决定之可能，一切决定之权，都操之于地主，有时在承揽约中，竟至规定佃户须永远服从地主支配，地主可以任意压迫驱逐佃户，可以自由审判处罚甚至屠杀农民，大部分佃农实际上是被地主强迫束缚于土地之上。各

地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无论是产物纳租或货币纳租，至少也要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租额以外，还有许多附加的剥削，如广东的田信鸡田信米，湖南的年鸡年肉等。在有些地方（如广东）虽然已经采取货币纳租形式，但其剥削方法与残酷程度，丝毫没有变更和减轻，………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结合着，互相混合着。因此逼使中国广大农民群众更加速贫困化（Pauperization），更使无地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剥削，使他们更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有广大劳动农民，连维持自己最低限度的生活都不可能，因之也就没有余力来改进生产技术，甚至不但没有能力来改进生产技术，就是连原有的技术水平，也都不能维持下去，因为他们多半不能恢复自己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就使他们不但不能实行扩大的再生产，而且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都无法进行，因为他们在残酷的剥削之下，已经没有重复生产的条件，因此，中国农村经济更加停滞衰落，使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很多因极度破产贫困而致活活的饿死！

何况中国广大农民群众，不但受着地主私有土地租佃制度的残酷剥削，而且还有所谓公田的地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各种寺院庙宇官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田的地租，表面上是所谓公共机关的收入，其实都是豪绅的收入，豪绅把持着公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也就等于地主。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后来则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成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

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保卫团或团防，由团防而割据地方；或者实行所谓“武装收租”，或者直接变为军阀，更厉害的剥削农民，掠夺农民的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在小农经济占优势並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一种的剥削，就是军阀的课税制度。这种课税制度在实际上还是封建式的军事赋税，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並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各地军阀强迫的拉夫拉差，抽丁当兵，强征牲口粮食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

三、中国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与土地关系

根据上面所述，我们已可看见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受着如此残酷的掠夺剥削，已经使几千百万农民群众破产贫困。岂知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所受封建地主豪绅的压榨还不止此。中国因为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到处都已经使用金钱交易，以前那种“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中大半都是这种自然经济）早已崩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成为统治的制度（农民生产品必须出卖一部分得了钱再能买其他日用品——洋油、火柴、布匹、食盐等），于是农民一天天的格外需要金钱，因此造成了高利货资本发展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借债，所以地主富商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例如东三省有些地方，要出六分年利，才可借到钱；安徽滁县一带，农民借钱十元，在三个月内除本金外，更须还稻或麦一石（按市价约为五元左右）作为利息，照这样计算，年利竟为百分之二百！江浙产丝区域，在蚕忙时借钱，要用加一的利息，即借银一元，限期四十

天归还，还时除本银外更须加利一元（这样，以一年计，利息竟高至百分之九百！）。南通地方，农民借银一元，在三个月内，须还棉籽一担，其代价约三四元，倘照年利计算，竟高至百分之一千四百！江宁各乡，农民借银一元，在一年内须还谷或麦一担，如当年不还，待下年即须多还二担。昆山上海一带，有所谓十元五斗者，即借钱十元一年之内加还息米五斗。武进一带，有借米一石，在一年之内，须还谷三担者。这些显著的事实，很明显的指示出，许多地方高利贷的年利，一般都在百分之百左右，甚至超出百分之百以上。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大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往往采取放债的形式，加上极重的利息。再者，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並且预先抑低原料的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压迫和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方法（出租田地）互相结合联系着——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上的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的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债务上的奴隶，像牛马似的对待他们。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的土地。中国很多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质，结果变成了佃农。丧失了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所租得的就是自己原有的田地。

中国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无法还清的农民，亦往往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商人官吏）

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中国社会中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並进的剥削农民。有钱的是在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括农民劳动生产品），甚至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当还债）。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片磨，榨取农民的土地和血汗。商业高利贷资本，既然加紧的没收农民土地，加紧的集中土地于金钱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深刻起来。中国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兼并农民的土地，同时又用公开的方法掠夺农民的土地。农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军阀官僚“强圈民地”“强占民地”“强买民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之事到处发生。中国数千百万受剥削受压榨的农民群众，不但他们辛勤困苦所生产的大部分都饱了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私囊，而且自己的一些土地也大多被地主豪绅所掠夺，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不但遇着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不免活活的饿死，就是在一般状态之下，亦大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四、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对于农民的影响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在前面已经比较详细分析过，现在只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对于农民的影响一方面，再扼要的说明几句。

帝国主义既然采取殖民地政策侵掠中国，势必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维持中国封建关系残余，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

据，並利用之作为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乃是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破产贫困的主要原因。它利用官僚买办的搜刮和军阀政府苛捐杂税的掠夺，利用他们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密切的勾结，以达到他们搜刮中国数千百万农民膏血的目的。

中国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一切赔款借款的负担，最大部分都压在中国农民身上，中国对外贸易每年几千万两的入超也大部分都是对于中国农民群众的压榨。因为商业高利贷资本得到帝国主义强有力的帮助，所以中国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才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经济代价，使中国整个的农村支出超过收入。外国教堂差不多都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中国农民。中国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使钱业的投机商人大大的掠夺农民。

中国的经济制度，完全是一种半殖民地的经济，民族工业不能畅快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却在一天天的增高货币经济的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它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作用一天天的大起来，而且因有帝国主义需要原料，使中国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种结果：（一）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植桑等，这种现象在中国还很少；（二）中国农业市场要受世界农业市场的支配，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他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中国农村经济的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

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促进中国农

村中宗法社会关系的崩溃及一切家庭工业的衰落，一方面逐渐消灭落后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另方面，促进新的资本主义的各种方式家庭工业发展，不过农业与家庭工业破产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的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出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的多，土匪流氓后备军一天天的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的低落，同时又是中国各地军阀雇佣军队的来源。加以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的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因为投资到工业中没有像投资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那样容易赚钱！），更加重的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所以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商业资本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与军阀豪绅的压迫，同时不彻底扫荡旧时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人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不能推翻帝国主义。

五、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

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维持着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因此也就使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的权利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之发展，雇佣劳动与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因此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是遗留的特殊状态，所以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有他自己特殊的性质，并不和别的国家相同。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尤其是在农业经济破产

停滞状态中，再则中国没有大农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中国一般经济破产状态之中。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之外，中国供给了帝国主义必需的原料，销售了帝国主义剩余的商品，而所得到的却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和屠杀。中国受着资本主义之最厉害的坏处（破产，失业，广大群众的贫困化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之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提高，虽然当帝国主义初侵入的时候，帝国主义带着西欧先进国的技术，帮助中国相当的提高生产力，但不久就反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困难的，是非常之畸形与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的共同的特点。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之中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大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在中国还是很少的。但是因为金钱与市场作用的增长，促进了农民阶级分化的过程，所以在中国农村经济生活中，也已经可以看见农村资本主义的成分。它的具体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中已经发现剥削雇用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别方面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加了城市中劳苦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于是剥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的主要的经济特

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这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旧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极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略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如此特殊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侵略田地，强掠财产，于此而变成富农。

而且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已经可以看得清楚：在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在别一个极端上则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在两极端之中还有许多过渡阶级，如中农、贫农等，在通常所谓贫农之中按阶级的分析还可以分为“小农”与“最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农村无产阶级就是农村工人，如长工短工日工等，此等农业工人被雇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经济有关系的工业（如油车，茶厂，糖厂等）中以维持其生存。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少量的土地可以自己耕种者（或者佃农或者自耕农），他们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且每年亏空，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是靠兼做雇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的收入。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有时要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都也大半带些亲友宗族“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

佣关系也渐渐进到资本主义的雇用方式。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私有土地者，不论他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都只是较小的土地，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得着些余钱剩米，年成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佣工。根据上面一些简单的分析，可以看见中国农村中大致的几种形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的形式。这种农民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发展的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亦不同。金钱和商业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也愈厉害，而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降低，而更促进农民中的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小农经济在中国占极大的优势，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是小耕作的经济（出租给很多小农耕种）。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种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少而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村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之向前发展，这是战胜封建阶级残余的一定的形式。可是这种小农经济正被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强力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中国工业发展很落后，生产的资本不足，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经济，别方面又有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之现象）。所以第二种可能，理论上可以是“大封建地主，争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非常

之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种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再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使农业生产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利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用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来改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先就要在农业里投大笔资本，中国的中小地主又没有这样的大资本。不但如此，即使中国中小地主有这许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也仍旧非常困难，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厉害，必须先将农民革命斗争都镇压下去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或至少中国内政制度要有极大的变革，否则军阀混战连绵不息，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能确定，土匪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强暴的剥削农民，将永远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非常之少的。固然在满蒙等处，已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如农业公司等，可是它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居多（仍旧采用出租制度）。而且这种满洲农业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还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用，仍旧限于殖民地的经济形式，同时因为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这些过渡式半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也非常之慢，它在中国农业之中的份量是很小很小的。

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发展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就是外国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些大的农业公司，如

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及其他的方式。这一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加强，但是中国的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够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持并且加重帝国主义对华统治，使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完全殖民地的道路。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方式中进行，那末，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非常之痛苦的，它将使中国农民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根本铲除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制度，没收所有地主阶级的土地，推翻封建军阀的政权，才能得到农村经济自由发展的条件。

六、中国农民争取土地斗争的意义

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的表现出来，中国农村中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着封建制度残余束缚着，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显然是几千百万完全被掠夺而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被吞并的农民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豪绅地主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这种斗争是表示农民要力争自己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土地，客观上是在力争农村经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条件。这种斗争主要的是反映农民经济与封建势力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中国大革命第三个社会经济基础。

（四）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一、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变化，帝国主义为便利自己的剥夺计．始而建筑铁路开辟航路及发达其他的

交通工业以运输商品，接着便用移植资本的方法直接在中国开办工厂，以更便利的来剥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于是西欧新式工业资本的势力，冲破了中国闭关社会之政治经济的范围，逐渐由中国破产的农村中吸收许多丧失土地的农民到工厂中去做工，于是照着新式的资本主义技术而组织的大小企业中便逐渐团聚着很多的失业失地农民，逐渐形成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再则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固然要极力阻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但究竟不免要刺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传布开新式工业的种子，形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因此从"工厂生活的锅炉里锻炼出来"的工人也就一天天增多，"现代工人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照同一的比例发展——工人必须找得着工作，才能够生活，而同时也只有他们的劳动力能够增多资本的时候，他们才能找得着工作"（共产党宣言）——这也就是说，工人推动资产阶级向前发展，工人阶级自己也就发展起来。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则更有许多特殊的状态，他们不但从自己"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厂生活锅炉"中锻炼出来，而且还直接从帝国主义在华的"工厂生活锅炉"中壮大发展起来。

中国无产阶级的形成，还只是最近几十年间的事情，而且因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困难，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也还很少。根据北京政府农商部自民国元年至九年调查统计（见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总计全国织染工厂（包括缫丝业，制棉业，纺织业，制线业，刺绣业，织物业，编物业，成衣业，染工及漂白业），化学工厂（包括窑瓷业，造纸业，制油制蜡业，漆器业，制火柴火药业，制药业，肥皂制造业，制皮制革业，制烛业，化妆品制造业，制染料颜料业，漆液制造业，杂业），机械及器具

工厂（包括机器制造业，船及车辆制造业，器具制造业，金属品制造业），饮食物工厂（包括酿造业，制糖业，制烟草业，制汽水及冰业，制茶业，糕点制造业，罐头食物业，碾米制粉业，畜产及水产制造业），杂工厂（包括印刷刻字业，纸制品业，制草帽及草帽辫业，皮革毛羽制品业），特别工厂（包括电气业，金属精炼业，自来水业）工人数量有如下表（根据《中国劳动年鉴》统计）：

年　　次	工　厂　数	职工人数
民国元年	20,749	661,784
民国二年	21,683	630,890
民国三年	20,351	624,524
民国四年	20,745	648,725
民国五年	17,088	575,854
民国六年	15,736	555,592
民国七年	14,374	488,605
民国八年	10,515	410,279
民国九年	6,524	413,040

这个统计自然非常不可靠，不但帝国主义在华工厂工人不曾统计进去，就是上列本国工厂的统计也是非常不完全。据农商部自称，有许多报告都不能代表全国，例如根据农商部同一处统计，在民国九年仅是矿工工人（探矿工人与采矿工人合计）一项就有五十九万零八百八十五人，而犹称报告未全，不足以代表全国，则上表所载必多与事实不符，盖可无疑。

另据《工人旬报》估计（日人西川喜一转载于《支那劳动者之现状》一书），则中国机械工厂劳动者及普通劳动者人数，各如下页表（见《中国劳动年鉴》）。

又据《工人旬报》估计（见《中国劳动年鉴》），全国交通工人总数有200,000人，其中铁路工人计有100,000人，海员及邮差各

（A）机械工厂劳动者人数表

业 别	劳动者人数
铁 工	200,000
电 工	100,000
洋灰工	25,000
面粉工	15,000
火 柴	90,000
运输工	500,000
印刷工	80,000
纺织工	160,000
烟制工	100,000
缫丝工	130,000
造船工	25,000
制革工	20,000
总 计	1,460,000

（B）普通劳动者人数表

业 别	劳动者人数
车 夫	200,000
盐 业	300,000
酿 造	100,000
理 发	200,000
磁 器	50,000
染 织	300,000
制 菜	100,000
竹木器	50,000
建 筑	600,000
制 纸	100,000
制 药	30,000
裁 缝	200,000
使 役	400,000
窑 业	200,000
毛 织	20,000
总 计	2,950,000

有60,000人。上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心，据一九二五年上海总工会统计，上海一埠有产业工人500,000人，合计江苏外县共有1,000,000人左右。上海之外，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就要算着东三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北京《顺天时报》，曾有大概统计。据说合计东三省共有产业工人四十五万左右，其次就要算着香港、武汉、天津、唐山、青岛、广州、九江、郑州等处。所以比较严格的估计，全国产业无产阶级大约总在四百万人左右。

二、中国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

帝国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开设工厂的原因，首先就是要利用中国贱价的劳动力，所以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工人的剥削，比对待他们本国工人格外残酷，他们（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把在殖民地

以最高剩余价值率剥削去的利润，拿出几万分之一去分润他们本国的劳动群众，去缓和他们本国工人群众的反抗，但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工人群众所受压榨就更残酷，在中国自然不能例外。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之下，处处不能与帝国主义竞争，更不能不加紧的剥削工人阶级，以达到他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目的。中国又当着农村破产危机的时候，中国工业的发展与农村破产的速度相差不知几远，农村剩余人口都不断的迁入到城市中来，造成城市中之广大的失业的劳动后备军。资本家便以这种大量的失业群众去恐吓在业工人，假使工人若有比较严重的经济斗争，则等刻便有失业的危险。因此，忍痛受苦，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之空前黑暗的劳动条件。

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国家，恐怕很少像中国这样延长的工作时间。西欧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大多数都是八小时、八小时半、九小时的工作。苏联工人则在中国大革命之前，即已开始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中国工人每日做十四小时工作，则简直司空见惯。各国在工作时间以内，都还有休息吃饭的时间，中国不独没有休息吃饭的时间，并且工人还应该早半点钟站到工厂门外去候班，使着机器一刻不停，工人连预备，走路，吃饭，候班等等，一共必要十五六小时的工作。在矿山中，西欧多是七小时、八小时的工作，因为矿山中的工作非常残酷，苏联为五小时半、六小时的工作，并且连休息的时间在内，中国则非常奇怪，譬如开滦、淄博煤矿中，名义上是三班轮流，每班八小时，实际上工人因工资过低不能维持生活的缘故，往往不能不做连班，于是净合工作十六小时。西欧各国，星期日照例休息，星期六减少两小时的工作，每周约合四十六至五十二小时，苏联每周约合三十八至四十二小

时，中国工人每周最低限度亦在七十小时以上，最通行的是八十四小时，间亦有一百零二小时者。西欧工人中，青工童工比较少，近年因为实行生活合理化结果才逐渐加多，但工作时间比成年工人常要减少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雇用青工童工作危险工作亦有相当限制，苏联青工童工则带学习性质，大半半日工作，半日读书，工作时间当成年工人的二分之一。中国青工童工则与成年工人受同等剥削，工作时间一般都在十二小时以上，甚至有因资本家及工头包头等加重苛待，而特别延长青工童工之工作时间，青工童工被雇作危险工作毫无限制，矿山中青工童工都很不少，甚至如开滦、萍乡、淄博等处矿山中，竟至雇用十五岁以下之童工，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和成年工人一样，常常在地狱不如的矿坑底下，连续作十六小时的工作。女工在外国当生产前后都有长假，工资照发，苏联女工不独有生产前后两个月的休息，并且预备女工生产的特殊关系，供给生产女工以许多优待。再则一年之中，西欧工人大多数都有两星期的长假，苏联有一个月的长假，但中国工人虽当炎暑的时候，还要群集于机器房里，锅炉旁边，做那连续不断的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因此常有热死情事。

除了工作时间以外，中国工人所得工资也是世界上最低的，纺织业、缫丝业及普通制造业等一般工人的工资不过三角左右，矿工不过二角至三角，其他机械及运输工人一般的工资亦在四角至六角之间，青工童工女工工资更少。米价物价连年飞涨，而工人工资极少增加，中国工人工资既少，有时尚须被厂主工头用各种名目罚去扣去，因此更不容易维持生活。至于劳动保险，失业保险，疾病救济，工人子弟教育，在中国更是一无所有。但是中国几百万工人阶级所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军阀压迫屠杀的严重，

却又是旷世无双的。他们不但受着资本家直接的剥削和压榨，而且还要直接受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各种野蛮残酷的压迫屠杀，一切政治自由甚至连组织工会的自由也被剥夺净尽，有名的二七流血，便是由反抗军阀剥夺工人组织工会自由而起。中国无产阶级的劳动条件生活状况实在是万分低下黑暗的。

三、中国无产阶级发展的特征

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是很短的，他们由“在自己的状态”(Class in Itsself)进于“为自己的状态”(Class for Itsself)，更只是欧战以后的事情。在一九二三年二七事变以前，中国社会固然已经开始有罢工运动，例如一九二二年二月上海《申报》馆出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五十年来中国大事表里“劳动潮流”一栏就有以下之记载：

一八七六年　江西磁工因争食白米，群众罢工。

一九一三年　汉阳兵工厂工人因所得工资均用纸币官票，纸币跌价，群起罢工。

一九一五年　湖北乾成煤矿工因延长工时不加工资，罢工。

一九一九年　上海工人罢工援助北京学生。

一九二〇年　开滦矿工一万余，因要求加薪，罢工。

一九二一年　粤汉铁路工人，因欠薪不发，罢工。

开平煤矿工人因与监督冲突，罢工。

粤汉铁路小工，因要求改良待遇，罢工。

陇海铁路机师因待遇不平，罢工。

上列记载中，一八七六年的江西磁工罢工，自然还说不上是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运动，一九一三年以后的罢工也还只是中国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微弱的自发斗争的开始，而群众的罢工还在俄国

十月革命以后，尤其是自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与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以后，才真正开始中国无产阶级的群众罢工运动，特别是二七罢工可以说是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的群众运动。香港海员罢工人数虽然多，但其意义没有二七那样大。二七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的群众运动，而且是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的政治斗争；上海工人一九一九年的六三运动和香港海员罢工，虽然也带政治性质，但一则处从属地位，一则主要系经济性质的要求，不如二七之明显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集会结社罢工要求。中国无产阶级自从二七以后，才明显从"在自己的状态"进到"为自己的状态"，才明显从自发的经济的罢工进到自觉的政治斗争，才积极参加中国革命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行伍，于是中国共产党迅速的发展，各业工人迅速的组织，工人罢工的浪潮逐渐汹涌起来，至五卅运动遂一跃为领导总的中国革命的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农民群众所组成的军队有同一样的弱点，中国军队中的农民，大半在没有当兵以前，先经过长期的"土匪学校"，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工人，也大半在没有当工人之前，先经过长期的"流氓学校"。中国经济生活中工业资本之发展既迟且缓，多所阻滞，而商业之发达却非常之迅速，广大农民失地失业，只能急剧贫困化而不能一时都无产阶级化，这是土匪流氓生活之普遍于中国社会的原因。譬如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属于青帮红帮等类的秘密组织的。工厂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说了，这种现象尤以长江一带为甚。加以中国无产阶级因工业发展之迟缓，其阶级年龄亦很幼稚，大部分工人都还没有脱离小农业或小商业的关系，——工人往往经过宗法社会制度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家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小工业和手工业的

工人，兄弟做工人，哥哥做佃农，叔叔开小铺子，是很平常的事。同时，帝国主义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在利用这种宗法社会的旧习惯旧关系及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如包工制度红利制度赏工制度等。这种利用落后的社会制度之情形，尤其是在于多量的雇用女工和童工。中国女工童工的总数，差不多要占无产阶级二分之一而强，据上海工部局调查，在一九二四年时，仅在上海一埠就有十六万八千多的童工。何况在数量上比较起来也还是很少的少数。根据前面的估计，中国有四百万左右的产业无产阶级，差不多只占中国全人口百分之一光景，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弱点是很多的。

既然这样，是否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也就很小呢？那却大谬不然！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时便已开始跃登历史的舞台，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间已经有很勇猛的斗争，香港海员罢工与二七事变之后，革命的职工运动便一天天发展起来，五卅怒潮爆发，中国无产阶级不但表现出是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的先锋，而且一跃成为领导总的中国革命的阶级。何以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能有这样大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有许多特殊的优点，足以盖过他那些弱点。

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弱点的反面：（一）中国的工业资本及一般资产阶级的成份里，有极庞大的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阶级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却完全是“民族的”，——中国境内的工厂主之中，有许多是外国资本家及其爪牙，而这些工厂里的工人，却都是中国工人，最革命的阶级。（二）中国无产阶级有极大极多的同盟军——农民群众，资产阶级自始就只能延宕农民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无产阶级却能彻底领导

国民革命去实行“耕地农有”，引导、联合並领导农民群众自己动手起来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行土地革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已经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将要利用他们的赞助，使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汇合，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力争而取得革命的领导权。

四、中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作用

中国无产阶级一开始斗争，便是积极的政治的斗争，便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开始的时候，便处在中国国内不断的革命斗争的环境中。中国无产阶级基于它自己所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军阀等残酷野蛮的压迫和束缚，它是非常有利于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残余的，它是非常有利于使民族资本主义更快而无阻碍地向前发展的，中国无产阶级也很有利于推倒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豪绅的反动统治以保障发展工人运动之德谟克拉西的条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伟大的历史任务，它当然更要起来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因此中国大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大革命中的主要动力却是无产阶级（自然同时还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是非常有限的，它固然也受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损失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但是它并不能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反抗而取偿，反而更加加重剥削中国工人以求取偿。如果要找一个简单的事实来证明，那末，五卅时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停止供给华商纱厂的电力，中国资本家立刻便向帝国主义磕头求饶，立刻露出它那残酷的面孔，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总工会，强迫停止对英对日的罢工，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受着外国资本的压迫，需要关税自主，所以它

当初颇想利用工农群众力量去吓吓帝国主义，它想借此和帝国主义磋商得些让步。帝国主义呢，表面的口头的让步是不妨做做的，但是它同时即以更大的威力压迫中国革命，威迫中国资产阶级替它镇压工农。工农群众革命力量的发展，也正在根本扫荡着中国封建式的剥削，动摇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于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打算着：它如果镇压了工农革命，一则可以自救，二则还可以在帝国主义之前邀赏，幻想着帝国主义为他们的"铲共"功高，"多少总可以实行一些让步吧？"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虽然是赞助并且参加过革命，但是革命斗争一经剧烈起来，中国革命中阶级分化的过程也就像迅雷闪电似的开展起来。五卅运动一开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实行它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及出卖无产阶级的策略，就发现戴季陶主义与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然而无产阶级却有它自己特殊的立场，"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宣言》）。中国无产阶级在过去大革命中虽然因为受着当时共产党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没有完全"挺起胸来"，却也已经自动的站起来，一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同时即与中国资本家作残酷的斗争，使得一般资产阶级及机会主义者高呼"工农运动过火"。而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它虽然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有很大的矛盾，但是一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被帝国主义所开拓出来的，二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大半由豪绅地主买办阶级蜕化而来，他们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都有很密切的联系，革命更加深入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更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所以无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

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无产阶级因为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所以中国大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余质，但是革命的主力军却是中国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和领导，中国革命是不能如此蓬勃发展的。

（五）各种社会基础的总结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发展，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间有极大的矛盾；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更发生根本的冲突，就在这些矛盾冲突之上建筑了中国大革命的经济基础。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些经济发展的冲突，是要推倒帝国主义的统治，肃清封建势力，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无产阶级基于它自己所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榨和束缚以及为争取它自己历史的伟大的前途——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都是非常有利于推倒帝国主义统治和肃清封建势力的。这样便造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勇猛革命的特征，“中国之所以发生纷乱（革命），特别因为那里创设了工厂的工业”，这决不是过分的估量。而且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发展的特殊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反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有一种斩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的作用，所以中国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不但不是对立而且还是相成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正在他不能了解这种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实际上中国革命只有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内部阶级斗争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扩大，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力争并取得革命领导权，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联合一切劳动者和被

剥削者，起来作革命的斗争。但是构成中国大革命之客观的经济的内容和在一定阶段上所要直接与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推翻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封建残余等，并还没有超过资本主义存在的范围，反之，在客观上它正是争得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条件。因此，中国大革命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第三章　中国大革命的预演

第一节　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暴动

帝国主义的侵略孕育了中国大革命的胚胎。革命的大爆发虽在五卅事变的时候，但是它的起源却远在中日战争以后。当时所谓"士大夫"（官僚与知识阶级）受战败之刺激，由反对李鸿章议和误国运动一变而为维新自强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就是翁同龢、文廷式、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等。当时政治思想分为两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一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拜旧的中国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道、轮船、电报、海军等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的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卒以翁派得清帝之助及时论同情，李遂失政权而入居北京。自康有为入北京上书变法救亡並设保国会，而翁派势力大张，翁康互相利用，结托清帝，遂造成戊戌变法的局面。同时所谓变法维新实际是由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而起，翁同龢、康有为这些人可以说是当时封建官僚当中比较进步的分子，所谓他们能够看到改革的需要，他们比前

此老维新派李鸿章等采用西洋的军事交通制度，更进一步主张采用西洋的行政教育制度，因此李鸿章等退为当时之守旧派。当时这种变法维新运动，在政治上及社会思想上都发生了相当变化——虽然当时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並没有能够跳出孔教范围，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法维新的人都还死死背着孔子招牌，但却传布了一些维新改革的种子。这种变法维新运动为什么会失败的呢？这是因为当时这种维新变法运动还没有社会群众基础，而且翁、康等人都是封建官僚，他们不过比袁世凯、慈禧太后进步一点，只能主张变法维新稍稍改良一下，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是要与他们本身利益冲突的，因此他们只能包围光绪，采用宫廷政变的方式，並不敢建筑在人民群众基础上来真正推行改革，结果自然只有一败涂地。

戊戌政变后，满清政府更加反动，同时外国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亦更厉害起来，自一八四二年至一九〇〇年即义和团起事之前夜，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所开的商埠已达五十一处之多。至一八六四年至一八九九年，帝国主义商品输入由五千一百万两增加到二万六千四百万余两，由出超二百万余两倒转来至入超六千九百万余两，于是中国现银几全为帝国主义所括去，以致中国的金融完全破产。在工业方面，当时帝国主义者亦已开始在中国设办，比如仅纺织一业，英国有怡和（设立于一八九五年）、老公茂（设立年同上），德国有瑞宝（即后来英之东方，一八九五年设立），日本有上海纺织有限公司第一厂（一八九六年设立）、第二厂和第三厂（均设立于一八九五年）。这些纺织工厂当时规模虽不甚宏大，然比起中国当时民族工业（如恒丰、三新等），始终是占优势。在矿业方面，帝国主义的势力也是非常大

的，许多重要矿山采办权都归他们掌握。在财政经济方面，那时帝国主义者完全是独霸形式，因为那时中国的旧钱号已渐破产，新式银行尚未有一家成立，而帝国主义银行则已有麦加利（一八五三年设立）、汇丰（一八六五年设立）、有利（一八七五年创办）、东方汇理（一八七五年设立）、荷兰(一八四二年设立)、横滨正金（一八八〇年设立）与台湾（一八九五年设立）等，对于国外的一切通商汇兑，固然完全由这些银行包办，即国内一切金融，尤其是商埠所在地，亦几完全受他们的操纵。他们还在中国发行钞票，又对满清政府实行政治借款，从中取得重利，我们只看从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四年之间，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对满清政府借款就有下列数目：

借款类别	起债期	债额	年利
汇丰银借款	一八九四年	1,635,000镑	七分
汇丰金借款	一八九五年	3,000,000镑	六分
麦加利借款	一八九五年	1,000,000镑	六分
瑞记借款	一八九五年	1,000,000镑	六分
俄法借款	一八九五年	15,820,000镑	四分
英德第一借款	一八九六年	16,000,000镑	五分
英德第二借款	一八九八年	16,000,000镑	四分五厘

以上借款合计起来，为四千九百四十五万五千镑，以每镑值华币十元计，则为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五万元，利息又从四分到七分，超过寻常利息二三倍。这种巨大借款与前面所说贸易入超及当时大批赔款，直接间接都要归中国农民手工业小商人负担，其中极大部分特别要落在农民身上。所以全国尤其是北方穷苦的农民及手工业者之生活困难与失业增加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成正比例发展。加以帝国主义又在中国取得许多政治特权，帝国主义更用领事裁判权等各种不平等条约加紧压迫蹂躏中国，帝国主义当

时对中国文化侵略更是可怕，传教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重要武器，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帝国主义者利用传教侵略中国的一点事实就可明白：

> 先是俾斯麦在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之间，对于加特力教徒尽剥夺其政治上之权力，凡不服从政府命令者，皆严重处分之，因此当时教徒多逃往他国。后来有加特力教安察尔和富治南特美士于一八七九年至山东传教，不久安察尔竟在山东南部取得牧师长，甚有势力。适其时值德国探险家维斯曼乌尔夫之徒，称扬传教事业，于取得殖民地大有作用，俾麦斯闻之，于是即回复加特力教徒之权力，适安察尔归柏林，他又接见安察尔，厚加礼貌，与之约束，并说德国今后对于传教事业，当加以热心保护。结果因安察尔，德国竟取得青岛胶州湾以及山东一切特权。（见《清朝全史》第四册）

其实不独德国为然，其他英法意等国帝国主义者无一不如此，我们现在另外引一个描写法国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国的记载来看看：

> 牺牲者的血是法国在中国侵略的种子（当时在中国的天主教，完全在法国帝国主义者卵翼之下，故单言法国），法国用教会和本地的教徒作挑拨的代理人，遭祸和牺牲是其政治上的收获。英国商业的优势之对于英国，犹之天主教徒的保护权对于法国一样，因此他们地位的影响，对于中国人差不多相等。但是法国从宗教的材料较英国从商业的材料所得利益更多十倍。在法国政府卵翼之下，天主教已经成为无上的威权。不顾本地的法律和

习惯宰制异教邻舍超越所在国的法权。无论如何，教徒与非教徒有争论，不管争论的是非如何，牧师就立刻为之袒护。牧师如果不能恐吓地方官，强迫给权利与教徒时，他即自己作当事人，控告于法国领事。如此无法无王，是非的真意完全颠倒。在列强方面，这样的干预自必跟着而来，天主教徒由此亦更加横蛮而腐败。当法国教会官厅可以压迫人民时，本地的教徒亦更变本加厉的恐吓(见英国牧师Hswith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中所引 A·R·Colpuhoun 所著《Overland to China》一书中批评天主教的一段）。

义和团事变以前，各帝国主义利用传教以剥夺中国之事特别盛行，当时自西江扬子江流域以至山东直隶东三省各地差不多无日不发生教案，同时，满清政府又正厉行反动政策，拚命媚外图结外人之欢心，以和缓其责难，保护外人及教堂之严令纷如雪片的颁布到各县各镇乡，因此遂逼成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事件一方面是满清政府黑暗反动趋于极端之结果，另一方面便是基于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引起中国的生活情形破坏中广大农民群众的愤懑而来。这种愤懑就是帝国主义的侦探——牧师Hswith 自己也觉得没有方法可以掩饰，他在对义和团暴动所著《China in Convulsion》一书中说：

许多‘文明’人逐渐地进攻中国内地，中国的无数受祸者自己不明白受灾害的原因，好像日本农民被地震所造成的海水或海岸沉落所起的潮水之淹没一样。可是有许多人很知道在外国商业未进来扰乱旧秩序以前，在普

的年岁里是够吃够穿的。现在各方面都缺乏，觉得前途一天一天地可怕，像这样的经验，在活动的方面，能怪中国人对新秩序（帝国主义侵略）感觉得深的不满意么？

火柴从外来，洋油及洋油所带来的各种洋灯，代替了中国大部分工业，对社会有极大的影响，此处不能详说，人们读了轮船公司的报告，棉纱货商业在中国怎样兴盛，此种商业从广东到牛庄，将来极可乐观。……但是没有一人能读到此种商业的发展，实大影响于中国生产棉花地面上之无数万人民。这些人民以前靠着纺织十五寸宽的布来谋极低度的生活，一尺布须费两天劳力，在市场上把布卖去，买进能够一家最低度的生活需要品，余则再买些棉花来继续纺织。但是现在呢？外国棉纱货有很好的'乐观'，可是土货则完全失掉了它的市场，从那时到现在都是如此。……费力的纺织工作没有利益了，又没有别的生产来代替它。

Hswith这样描写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之后使中国广大农民手工业群众穷困悲惨的情形，自然还是挂一漏万的，实际的情形必然比他所描写的还要可怕几十百倍，特别是北方数省广大农民及已失地失业的游民群众，他们眼看着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横行霸道，教堂教徒气焰熏天，英法联军入京火烧圆明园，中日战争割地赔款，洋货充斥，物价飞涨，政府因仿办洋枪洋炮等而增加租税，觉得自己的生活一天艰难一天，失业的一天天多起来，灾荒一天天厉害起来（义和团事变之前，北方数省有很严重的旱灾），而政府却无一点方法补救。所有这些情形，便是造成他们极深刻的愤懑的

来源，便是造成义和团暴动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的愤懑过于深刻，而且又是农民之原始暴动，所以事变情势非常严重，据说当山东直隶各处农民投入义和团及天津直隶邻近的义和团进北京之时，简直疯狂的一样，人数非常广大，据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派来镇压暴动之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他“拳乱笔记”中说：“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见《瓦德西拳乱笔记》）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义和团的起源及其结合的成分。义和团的祖先是白莲教，创造白莲教的韩林儿是一个仇视北胡（元鞑子）的民族主义者，所以白莲教的根源就是反抗外族压迫的民族结合，他们假教为名，不过希冀借以逃避当时之法网而已。自朱元璋恢复汉族统治，于是白莲教之目的已达，因而自然消灭，所以白莲教在明代三百年中，寂然无闻。自满族入主中夏，汉族统治权又落于外人之手，于是明朝遗老与当时一般不甘屈服于满族统治下之志士，群起结合，复借白莲教之名，以图实行恢复汉族统治权之实。在乾隆末年和嘉庆十八年，两次大举，皆以恢复明祚为口号，因力量不及均为满清政府所扑灭。从此白莲教更被严禁，其教遂分为“天理教”与“八卦教”二派，义和团实为八卦教之一分派，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义和团的来源，在它历史上就带有反抗外族压迫之特性。

但是义和团为什么抛弃它那“反清复明”的本来目的，一变而为“扶清灭洋”的运动呢？为什么本来反对满清的义和团反而与满清政府结合起来呢？这是因为中国到了义和团运动时代，已经变了一个局面，最高统治者已经不是满清政府，而是国际帝国主义。义和团看见那时剥削中国压迫中国民众的主要敌人还不是

满族，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当时，农民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反抗那带痛苦给他们的“洋人”。所以义和团的组成分子虽然和过去白莲教差不多，最大多数是农民群众，其次是手工业者、失业游民和少数知识分子，但是义和团组成分子的性质已经和白莲教时代不同，这些义和团的群众已经深深体验到洋鬼子（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滋味，在他们眼中心中，只有“可恨的洋鬼子”、“该杀的洋鬼子”，所以只要有人说“杀洋鬼子”，“我们可以有方法杀洋鬼子”，“我们可以堵住洋鬼子的枪不能开放”，他们听了，直狂跳起来，什么都不管了，只一心一意“杀洋人去”！那里还管得什么反清复明和受人利用呢？这就是义和团变反清复明运动为扶清灭洋运动的根本原因。

同时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宰割之下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一天天变本加厉，满清政府已经没有方法可以抵抗他们。中日战争失败以后，满清政府一切对外国帝国主义都节节让步屈服了，可是外国帝国主义仍对他们要挟备至，满清政府固然害怕义和团，但是也恨外国人，而且他们觉得如果能够利用他们去反对洋人，便可转移他们那反清复明的意志。政府中虽然有很多人（如直隶总督荣禄等）反对这种“危险的政策”，但是端庄、毓贤、刚毅、慈禧辈竟利用了义和团。义和团得到满清政府的同情与援助，声势更加大起来，以后居然进京围攻公使馆，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与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

这样严重的事变，使帝国主义列强更有所借口以进攻中国，并且组织了八国联军，调动大兵到北京、天津来剿灭他们认为“破坏文明”的所谓“拳匪”，占领中国的都城，施行绝无人道的

残杀，实行明显的共同劫掠，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封建官僚军阀更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镇压义和团，于是中国农民群众这次反帝国主义的原始暴动便很残酷的被镇压下去。当时帝国主义虽然联合进兵中国，但是列强之间因为争夺权力的关系仍不免发生冲突，而且"拳匪"已经被他们扑灭，所以就在一九〇一年订立"辛丑条约"，从此，北方的国防，如大沽炮台等完全撤废，京城附近，自北京至天津，沿路驻扎帝国主义的驻防军，北京使馆界变成了外国领土，东交民巷变成了中国太上政府的堡垒。英国取得海关监督权，中国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即所谓庚子赔款。

悲壮热烈的义和团暴动，结果是被葬送于血海中了！这一次事件，决不是什么少数无知拳匪的暴动，而是旧中国衰败的结果，是以后中国革命的先兆，虽然它被满清政府利用了，可是它还是表示旧中国崩坏的一个伏流的波浪。后来一般中国社会，附和帝国主义"二毛子"、"三毛子"的反宣传，把义和团事件看成是"野蛮的排外"，自然是很大的错误。其实真正"野蛮"的倒不是义和团，而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世界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事件发生时，曾在《火星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中国之战争"，充分暴露了沙皇及其他帝国主义的阴谋。他说：

我们试想中国人为什么反抗欧洲人？英人、法人、俄人、日人要肃清中国的叛乱究竟从何产生？主战者（帝国主义者）倡言黄种人仇恨白种人，中国人嫉视欧洲文化。诚然不错，中国人是嫉恶欧洲人，可是究竟为什么要嫉恶欧洲人，中国人所嫉恶的又是那一种欧洲人呢？中国人並不仇恨欧洲人民，他们彼此之间並没有什

么冲突，中国人所仇恨的乃是欧洲的资本家和代表欧洲资本家的政府，他们矜夸西方的"文明"，到中国肆意诳骗和窃盗虐待，此等贪欲无厌的欧洲人在中国，岂有不使中国人嫉恶的吗!?他们对中国开战乃为掠夺权力，为要自由贩卖鸦片权借以昏迷中国人民，利用基督教的假面具借以达到盗窃政策之实，这样岂有不使中国人嫉恶的吗？此种盗窃政策在欧洲资产阶级政府固早已实行于中国，而今又有俄皇专制政府参加其中。……他们不过没有公开瓜分，而像暗中的偷儿一样，他们抢掠中国好像偷儿窃尸体，但是如果这个假尸起来抗拒的时候，则就立刻如对待野兽般的攻击。把树林也烧了，屠杀没有武装的人民，同时却大声疾呼去制服野蛮的中国人。

列宁的论断完全符合事实，当时各国帝国主义派来剿灭拳乱的八国联军，简直在北京天津大肆抢掠，这种抢掠的情形，就是联军统帅瓦德西自己也不否认，他在他的"拳乱笔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载：

从大沽至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芜破碎，据我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之地方，已无华人足迹，从此地到北京之一段，我的参谋长Schwazhoff少将，曾两次经过其地，据他报告，凡军队行经之地，但见其一片凄凉荒废而已。即北京自身，亦因烧抢之劫而大受破坏，失所流离之民，据估计约有三十万人，但实际上似或多于此数，散居于该路旁边，大半均在露天之下，在现刻天气良好之际（瓦德西写这个报

告的时候是九月二十九日）或者可苟延几时，至于饥荒疫病之必先后继至，实已毫无疑义。我相信此种无居无食之灾民，必将使附近居户，咸陷恐遭抢掠之不安状态，或者此项灾民竟自投身拳党，我因此之故，遂以为如此行军则只能多多制造拳党，且其制造之数，当远较战时剿杀之数为多也"（见《瓦德西拳乱笔记》）。

帝国主义强盗自己"制造拳党"，同时又当他匪徒剿杀，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口中的"文明"，同时也就是义和团事件的真相。有人说，假使这些匪徒不这样胡闹，八国联军也不会来，辛丑条约也不会订了。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义和团是少数无知愚民做的事，外国人不应该将这种责任和罪名归到全中国人身上，使全国人负担这样巨大的赔款。这种意见完全是受了帝国主义宣传而且是不顾事实的谬论，——他们简直连帝国主义刽子手瓦德西都不如，因为连瓦德西都不敢否认"拳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结果。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货的输入，原料的吸收，使中国旧时的经济急剧破坏，连带着政治组织及一切社会生活也都起急剧的变化，使手工业及农民经济急剧的破产，结果失业游民一天一天的多起来。这些失业破产的农民群众，迫于生活上经济上的困苦，自然要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实际上不但是庚子之役，就是那一时期种种平英团（广东）等类的组织，历次的所谓教案，无一不是这种反抗运动的表现。所以义和团事件，实际上就是当时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这种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是非常之可敬的。自然义和团运动本身包含着很多的错误和缺点：他们没有进步阶级做领导，于是就不可免的被封建社会的迷信神权所支配。他们拒绝一切"洋货"，拒绝并且反对一

切科学文化，他们主张“国粹”，相信五行符咒，他们迷信拳术符咒可以抵抗枪炮，他们盲目服从所谓“大师兄”、“二师兄”，他们被狭义的民族主义及国家主义思想所蒙蔽，结果竟被封建贵族所利用。然而无论如何，义和团运动究竟是一种“群众的运动”，“凡属群众的运动，起初必然是混沌的，因为总摇摆于许多矛盾之间，群众思想往往是缺乏明显性和凝结性的”（恩格斯）。义和团运动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而且是失业群众的暴动，在义和团运动中，还没有一个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领导，因此不能不归于失败。义和团这一原始的农民暴动，虽然有它本身的弱点，虽然它被满清政府所利用，打着“扶清灭洋”的尊皇口号，不免有保护旧制度的反动意味，虽然被国际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等军阀血葬了，可是仍不失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悲壮的序幕。

第二节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自义和团事件至辛亥革命十二年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厉害一天，满清政府的昏庸暴虐和其贪官污吏的暴敛横征也日甚一日。不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破产，成为参加辛亥革命中坚力量之一新军会党的来源，而且一般华侨及国内新兴资产阶级亦因此而要求改革，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立宪与革命之辩论，纷起于侨居日本及上海知识分子之中；同时，内地土著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收回权利”运动亦轰然突起，最著者，有对俄之东三省“主权收回运动”，对美之粤汉铁路收回运动，对英之山西、河南煤矿收回运动，安徽铜官山矿废约运动，沪杭甬铁路之

拒绝借款运动，苏直津浦铁路废约运动，对法之滇矿收回运动，拒绝沪绍航权运动，对比之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运动，吉林、河南、四川都组织了保路会，成了比较广大的群众运动。后来有一个曾经参加过当时四川保路运动的文学家，追写那时群众运动实际情况的一幕，很足动人：

>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这听说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是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要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不消说是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在他在位的时候实现的。这个策略在当时的指导者中可以说是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如像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的光绪皇帝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的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的两个口号。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好像有点滑稽，然而他在当时的效力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贴在自己的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的礼拜。……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集了起来。……铁路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在成都所拟定的运动步骤，便照样的传到各乡各县，于是

俄顷之间而运动便普遍于全省。……赵尔丰早是有准备的了。他在总督署的门口及附近的要隘处已经派兵把守着的了，手无寸铁的市民刚好走到督署的东辕门，门口的卫兵便一排枪打过来，可怜为头的便打死了好几个。附近要隘处把守着的卫兵听见督署的卫兵在开枪，他们也就开起枪来，打那如潮水一样崩溃下来的群众。这样，群众便陷在枪弹的重围中了，大家只好向两街两侧的铺面里逃避。枪声只开了几次便停止了。街上一街都是光绪的牌位，一街都是线香，一街都是踏脱了的鞋子。打死了的人，打伤了的人，究竟有多少，当时没有人作过详细的调查，我现在连大概的数目都忘记了。我所能记忆的，只是那死者里面有十二三岁的小儿，也有五六十岁的老妈，街上的圣位台也同时由军警拆毁了。这样一来，简直是赵尔丰造反，成都全市从那天起便开始罢市。对于成都附近的县份，消息是很容易转达的，各地的同志会便都暴动化了。对于远方的县份，当时的宣传方法是利用的“水电报”。“水电报”这个名词乃至这个方法是四川人特造出来的。方法是在一个木板上写着成都的消息，叫各地的同志会起义，速来救援，上面涂以桐油，就把这种信板投在川河中，四川的河差不多是四通八达的，它便被传达到各处下游的地方去了。这个方法最初是学生会发明的，一应用起来便一个传十，十个传百了；一处的人接到了一通“水电报”，同时又仿造出无数的信板流下河去。在这时尽管当局者在怎样的戒严，要检查邮电，检查出版物，然这遍地遍河的

“水电报”，它怎么也没有方法来扣留了。暴动的中心是在新津，这儿是首先发难的地方。这儿的同志会把城池攻陷了，杀了县官，占领了县城，各地的武装势力便都络续的投到这儿来。赵尔丰先派凤凰山的新军去攻打，但是派去的新军不惟无战意，而且有的竟倒向了民军。旧式的营防军更全无战斗的能力。新津一县既不能弹压下来，各县的同志军又闻风兴起，赵尔丰弄到无兵可派，无兵可战的地步，他不能不屡电满清的朝廷请援，甚至于请撤回铁路国有的命令以缓和民意了。四川一局部的乱机已经使中国的全局骚动。各省的谘议局都起来力争。有的省份（像是浙江）更请朝廷速斩赵尔丰以谢天下。

除了这种收回矿权与铁路商办运动以外，各处乡民反抗官吏苛敛运动，在庚戌年亦几遍全国，无虑数千百次，参加每一次运动的乡民人数从一千到十余万不等，如广西归顺数县数百余村乡民反对抽捐运动，河南叶县万人反对加税运动，三月间湖南长沙饥民暴动，五月间山东莱阳海阳两县人民反对苛税亦起暴动等。这些运动显然都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与满清政府高压反动之反抗。

本来，铁路国有政策的本身原是一种进步的政策，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铁路国有，要求铁路商办的运动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所谓铁路国有国办，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所有所办。第一，外国资本家对铁路投资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这些利润的主要来路就是中国政府实收借款数恒较名义借款额为少——通常如借一万元，实收仅有九千元，利息不按九千元计算，却按

一万元计算；并且每年利息还有担保。同时建筑铁路的外国资本团又可取得代购建筑铁路一切材料权，这样一来，则借款的外国银行，不仅获得利益，并且又在代购材料中赚钱不少。我们知道银行与外国工厂订购材料时，在名义上虽然材料的价格须取得中国监督官之同意，但是照例外国银行家只要稍为贿赂一下中国官吏，于是材料价格便可大大超过实价以上了。第二，铁路实际上是落在外人手里，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委任督办职员，但实际管理权都属于外国工程师，而不在中国职员手里，而且实际上一般的重要职员如会计及管理工程师等全属于外人，甚至技术上人员亦多数属于外人。最后，更特别的就是假若中国政府付不出利息时，铁路就归外人所有了。当时满洲政府邮传部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主要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力争铁道商办，实际上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辛亥革命的主要基础原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的开始，就表现出他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并没有提出资产阶级的鲜明革命的政纲，并且根本没有认清革命的主要对象，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只有简单的“排满”，不但不敢反抗那站在满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而满口尊重外人在华条约权利，力避排外的恶名，革命军行所至，皆以冒犯外人为大戒，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华民国武昌军政府于辛亥起义（武昌辛亥起义在八月十九日）后数日对外发布的一通照会，一字不动的附录于此，以资证明：

为照会事：军政府自广东团体溃散后，乃转西向，遂得志四川；昔着各国未认我为与国者，以惟有人民主

权而无土地耳；今既得四川属之土地，国家之三要素备矣。军政府复祖国之情切，愤满奴之无状；复命本都督起兵武昌，共图讨满，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所有军政府对外之行动，特行知照，免致误会：一、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一、各国人民财产，居留于军政府占领地域内者，一律承认保护。一、各国之既得权力，亦一律承认保护。一、赔款外债照旧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一、各国如有暗助清政府战事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一、各国与清政府所结之种种条约，成立于此次照会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一、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与军政府为敌者，则仇视之。——以上七条，特行知照。俾知师以义动，无排外之性质参杂其间也。相应照会贵领事，转呈贵国政府查照，须至照会者。黄帝四六〇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清帝退位，而政权依旧移入另一个反革命势力——封建军阀袁世凯手里。不但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的辛亥革命不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而反示好于帝国主义，而且当时的革命首领亦完全与袁世凯妥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虽然"造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华共和国，虽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仍不失为英勇的先烈，但是一则"所有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剥削中国的状态完全没有变更；二则根本没有影响到人民的大部分，首先没有影响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封建势力乃是辛亥革命的客观任务，可是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直到中国一九

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也都还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

第三节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单独排满的辛亥革命，失了中国国民革命的真面目。国民革命的对象——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因而虐焰愈炽！在此虐焰之下忍受了八年（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中国青年，受了欧战后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遂发生五四运动。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举行群众示威运动，火烧曹汝霖宅，痛殴章宗祥；同月十九日北京各学校学生宣告罢课：首言外交紧急，次言国贼未除，末言日本逮捕中国学生，政府毫无办法，故罢课表示反抗；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七日北京被捕学生释放，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章、陆，上海始开市复工上课。

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是很大的。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里的革命潮流，因袁世凯的反动而低落下去。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几乎一般社会都认革命是作乱，民党是乱党。而民党自己呢，则一些主要领导人在二次革命前力主妥协缓进，使袁世凯得以借帝国主义之资助巩固反动势力；在二次革命后，就已有许多民党投降军阀，受其收买；再则，这些右派于宋案发生之后还迷恋

于所谓法律手续，和平解决，同时各地绅商阶级为保存自己的优越地位起见，竭力去结托革命后初兴的军事势力以镇压所谓“土匪”——贫民的暴动，造成新的军阀，并且巩固军阀的地方政权。这样，所谓革命党便不啻与广大民众脱离关系，袁世凯等军阀和士绅阶级自然容易拿着和平秩序的假面具欺骗一般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结果，反动势力便完全战胜了革命党。

直到五四运动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终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要求自己的前途，所谓提倡国货；俄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远远的可以听得到西欧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民族联合革命以反抗列强的呼声，所以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当时的运动：第一，是积极的群众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这运动里，我们切不可只看见学生，学生不过是运动的先锋，当时上海、天津等处的商人都以实力參加，这的确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里各阶级努力以行动干预政治，而且带着群众运动的第一次。第二，五四运动时所发生的种种群众的组织，如检查日货，抵制日货等行动机关，往往真能直接以革命手段行使平民的政权。上海罢市的几天内，革命的学生商人竟直接行使警权，尤其是工人的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行会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第三，这种民族革命的潮流，居然开始冲动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从此发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工会的组织。这种情形，显而易见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二次的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直到五四运动，中国的革命运动往往只是军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运动，或者是限于士绅阶级的排外的爱国运动，没有群众的反抗，直接要求废除对外条约，收回外国掠夺的领土

的。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革命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护外人，尊重生命财产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变更了。换过说，便是把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固然，五四运动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正受着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欺骗，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的全部形态，甚至误信美国帝国主义者能够帮助中国争什么人道正义。所以五四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发生专门排日的错误。可是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进于实际运动，开辟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

第四节　香港海员罢工与二七流血

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跃登历史舞台，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两次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封建军阀惊心动魄的运动——香港海员罢工与二七事件。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中华海员联合会因要求加薪不遂，全体罢工，前后加入罢工之海员二万余人，全市搬运工人煤炭苦力公私佣工等同情罢工者数万人，相持至八星期之久，

以达到加薪要求而解决。在这次罢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情援助者由全香港工人以至中国北方的铁路工人之阶级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香港公私所雇华人全体罢工时之民族的觉悟，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帝国主义者运输停止之恐慌及运输工人之威力，我们可以看出英政府保护资本家（船公司）严厉的压迫罢工之一致——香港政府封禁海员工会，勒令各行船馆缴销牌照，以武力禁止海员及一切人民自由出境，上海英官则代船公司招工，并拘捕同情于香港罢工之工人数名。

香港海员罢工可以算得中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第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它不但得到香港和广州全体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经济援助，而且影响到北方工人。京汉、京奉、陇海、正太、京绥等路工人，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曾举行大会多次，并发出许多通电和文告，一面向铁路工人宣传阶级休戚相关之义，一面充分援助海员罢工。正当海员罢工的紧急关头，“援助香港海员”的旗帜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陇海、京汉、京奉、正太、京绥等路工人汇寄海员工会之捐款至二千元，这就可以表示北方工人运动怎样受香港海员罢工的影响了！

关于这次香港海员罢工的意义，我们更可引 Elinor Burns 在《British Imperialism in China》一书中的一段话来证明：

> 中国工人之大罢工，虽始于一九一九年夏季汉冶萍公司钢厂；然首先当推广东为工人活动之中心。一九一九年罢工结果，工人得如其要求，增加工资。同年，广州所成立之工会，凡二十六，其运动势力，及于香港。一九二二年，第一次之总工会成立于广州，相因而生之罢工事件，发生于各工业区域。在各罢工事件中，香港

海员罢工，最为重要。此次事件，相持至八星期之久。香港既为英国所属，且为英国对华贸易中心，遂采用猛烈之处置以镇压罢工，而维持其贸易。

一九二二年香港殖民地报告有云：

海员罢工起自一月十三日迄于三月八日，其进行也，包括大多数之贸易在内，其影响于殖民地之商业甚巨。

香港政府禁止此六万罢工工人离港，而大部分之罢工工人，必欲离港，英兵遂开枪射击。然罢工工人坚不屈服，其结果工资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三十，而当罢工时，香港政府所撤销之香港海员工会之特权，亦得恢复。

自此次罢工以后，海员之组织，将中国旧式之行会制，根本推翻，而成为一斗争之团体。影响所及，遂使中国之工人，成为最有力量奋斗之分子。

自海员罢工胜利以后，全国各地的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有如雨后春笋。当时工会组织得最完善的，有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等；罢工运动最主要的有五月间的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七月间的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八月间的京汉工人罢工和九月间的安源矿工罢工等。而且这些罢工都得着相当胜利，不消说得，罢工胜利的结果，自然使工人得到许多教训。工人的团结力亦因之而增厚，工会的组织更易扩大到各地各业工人了。

工会发展的过程中间，遇着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便是集会结社的自由问题，工会发生之初和罢工运动中，没有一处地方未曾遭过强权压迫与武力恫吓，如上海纺织工会、汉阳钢铁工会之被封禁，京汉及各地罢工中以及安源矿工中，都遇着严重的武力的

恫吓。因此一九二二年八月曾发动全国工人的劳动立法运动，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案。这个劳动立法案共十九条，第一条即是要求承认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条要求承认工人同盟罢工自由，第三条要求承认工人团体的契约缔结权，同时又要求取消束缚工人的治安警察法和罢工刑律。工人们从自己痛苦中了解自由之可贵，要求自由之迫切，于那次布满全国的劳动立法运动中完全表现出来。自然直系军阀豢养之国会，丝毫不能给工人以自由权，不过那次运动是工人群众争取自由之必须的初步办法，也是工人群众进行政治运动之发端。十一月间唐山五矿三万余矿工发生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和要求加薪的罢工运动，罢工支持至二十余日，竟横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杨以德的武力压迫。唐山五矿工会，京奉路唐山工会及洋灰工会都被封禁，矿工受伤五十余人，京奉路唐山工会书记彭礼和君被捕入狱。那次矿工罢工之受摧残和工会之被封禁，北方铁路工人异常愤激，愈觉得非争得工人集会结社和罢工的自由不可。

正当唐山矿工罢工失败之际，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聚集北京，议决各铁路一致罢工，要求恢复唐山铁路工会、矿工工会和洋灰工会，并承认矿工罢工条件。虽然因为时机已过，各路罢工运动没有实际举行，亦足见那时工人所感受的切肤之痛，便是压迫工会的事件。那次会议最终决议有两点：①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次第统一各路的组织；②如某路遇到压迫时，各路工会一致行动，以图全体互相保障工会之存在。从此两决议案看来，那末，我们便知道，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被禁止，因而引起大罢工，实非偶然。再则当时国际帝国主义已暂时镇压住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怒潮，重复向世界工人阶级及东方

被压迫民族进攻，何况新兴直系军阀正抱着武力统一的雄心，恰好和新兴的工人阶级统一全国铁路工会的运动相抵触，冤家狭路，分外眼明，复加以汉口帝国主义者之教唆，沿京汉路各埠商人对于罢工工人的非难，于是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之流血惨剧乃起。

民国十年以来，京汉工人相继组织“工人俱乐部”，至十一年春，全路皆组织就绪，得十一个单位。四月九日在长辛店召集全路代表，筹备组织总工会，以统一全路的组织。八月十日后召集全路代表于郑州开第二次会议，制定总工会章程，举定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总工会地址设在郑州。紧接着第二次会议以后，即同月二十四日，复由北段工人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结果工人胜利，路局不得已承认工人九条要求，每人每月加薪三元。胜利自然又给与新的兴奋，京汉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到权威了。总工会筹备了四个多月，十二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复在郑州开会，尔时传习所之百余工人，亦悉数加入总工会。于是总工会的势力亦较前更大，遂定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既已定期举行，于是由筹备委员会登报宣告成立总工会的宗旨，并邀请各工团各界到郑州参与盛典。不料一月二十五日京汉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云忽致电吴佩孚，要求他禁止开会。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严禁开会，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至一月二十八日，黄殿辰即到工会声明禁止开会，工会与之相持三日，终无结果。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凌楚

藩等五人即日赴洛与吴交涉。三十一日见吴，吴一味敷衍恐吓，仍声明禁止开会，交涉遂无结果，代表即于当日晚回郑。是时京汉十六个分会，到郑代表已六十五人，应召而到郑之各工团亦有三十余，计代表二百三十余人。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到者亦有三十余人。不但成立大会已准备好，并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知各分会全体工友，于是日举行庆祝大会。成立大会自然不能因吴之禁止而遂中止。

代表由洛回郑后，即召集全体代表会议，报告与吴交涉情形，当时全体代表一致愤激，咸谓集会结社乃人民应享之自由，吴佩孚何得而干涉！然犹再三计议，委屈求全，共同议决成立大会或可延迟一二日举行，但各工团所送之牌匾，则必须于二月一日迎送总工会会所。当以此意详告黄殿辰，亦足见工人让步求全之苦心。不料二月一日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各代表及郑州全体工友整队护送牌匾向工会进发时，中途竟被军警包围，举枪威吓，阻止前进。于是全体大愤，群以人民自由既遭武力干涉，誓非开会以雪此耻不可。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代表与军警长官再三理论，终无结果。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强权压迫之无理和野蛮，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群众亦遂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强迫解散，但群众仍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是日下午，代表所住各旅馆，即有重兵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酒馆所定酒饭，亦不许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

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亦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及郑州分会会所均为军警占据，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物品，尽被捣毁。责问他们何以如此强暴？兵士都说，是奉元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各处代表目击此种情势，知毫无挽救之余地和退缩之可能。即郑重致函京汉总工会，其大要云："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京汉总工会必能为争自由而取得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

各团体代表于当日晚车及次日早车分别离开郑州，各回原地准备实力奋斗，临行时无不慷慨激昂，大有破釜沉舟之慨。京汉全路各分会代表于十分忍无可忍之中，当即秘密会议，本着拥护总工会之天职，真实代表全体工友的愤恨心理，为紧急之决议，其大意是："我们为力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日午刻宣布京汉路全体工人总同盟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而战，争人权而战，决无退后的"。这个决议案，便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价值的决议案之一，如火如荼的二七大罢工，便根据这个决议而爆发了。

到了四日上午十二时，果然全路一律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工人罢工后，即向旅客散发传单，说明罢工之原因。罢工工人之组织尚称严密，因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都是工会会员，各会员均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均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维持秩序，则有纠察队；刺探消息，则有罢工期内临时组织的调查队。但在组织上仍有缺点。第一，罢工后，车辆一概停止行动，总工会与各分会的信息来往，亦遂断绝，可

是敌人——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赵继贤等，却能往返电商，调动军队，屠杀工人；罢工工友反不能互通消息，以致敌人杀来，犹在梦中。这种缺点，一则因为铁路上的电报生未加入工会，二则因为电报局工人没有组织，并与铁路工人没有连络。第二，北段各站员司及站长等，居然私自开车，运输军队，屠杀工人，而北段工人亦未曾阻止，这种缺点也就是二七斗争中很可宝贵的教训。

四日罢工时，京汉路总工会即发表宣言，提出五条件，其原文如下：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乐队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新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会所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日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放年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后来成为工贼）、宋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至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强逼开车。江岸二千余工友闻讯，即全体冲破

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张之阴谋归于失败。于是一变其阴谋破坏之手段，而为威吓强横之暴行。首先捕去纠察队工友三人，并连工会派往要求释放被捕三工友之代表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亦一并拘禁，百方威吓，谓须枪毙斩首，他们毫不为动，而二千余工友又与军警对垒相持，张氏无法，只得将项、罗等七人释放。

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受历次压迫情形，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奋斗。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长杨德甫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次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词，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只是争工资争时间，而且是为争自由争人权。………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渲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最末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巡捕岗警无敢阻拦，声容之壮，实为仅见。那知同时即有督军代表与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议，准备施行大屠杀呢！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萧耀南因屡次诱骗威吓不遂，乃变更方法。至七日下午二时，果有一警官来工会说："刻奉萧督军司令，特来请求贵总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同意，张参谋长即可来贵会晤谈，并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均可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可疑，始终未以真姓名相见，来人乃约当日下午五时，参谋长准亲自来工会谈判，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半途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机已到，工人领袖定皆在所，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武装军队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环击，计放枪在五排以上，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等候消息，一时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抗，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惨杀之后，军警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工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顷，军队又大肆抢劫，计福建街一夜连洗三次，工人家中所有细小都被一扫精光，当时情态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为之呜咽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残害时，尚有工友六十余人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亦在内，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令复工，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开工。今既如此，头可断，工不可上！"如此问答者凡三次，张厚生即呼喝下令斩首。同日长辛店亦有大惨杀的事情发生，长辛店于四日上午十一点钟罢工，六日军队开到，即把工会包围，至工人家内按户搜索，捕去工友与工会学校教员史文

彬、陈励茂、吴雨铭等十一人，痛加拷打，捆缚地上，预备送往保定，此时工人愤极，哀号痛哭之声，漫彻天地！七日晨工人集合者三千余，手持小旗，到军队驻屋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友，军队见群众声势浩大，即下令冲锋，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马队践踏，工人中弹受伤者纷纷倒地，结果死四人，重伤者三十二人，越日死去者又不少，被捕三十多人，轻伤及逃亡者无数，事后兵队强拉工人入厂工作，否则就地正法，因此丧命的竟至不可胜数。郑州则于五日军队将工会职员三人捕去，加上铐镣，视同盗贼，强迫三人下令上工，三人不为动，六日又捕去工友二人，均上铐镣，此五人被押至车站，意在威吓工人，工人愈加愤激；九日有少数工贼被路局收买，破坏罢工，强拉一百多较落后的工人上工，其余工人得汉口七日惨杀的消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忍气吞声的上工，以释放被捕工友为条件。此次郑州虽未死亡工人，但因罢工失业者前后凡三百余人，所有工会职员无一能在郑州立足，大半亡命各处。其他各小站分会如保定、高碑店、正定、彰德、信阳、新乡、偃城亦备遭蹂躏。京汉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以热忱赞助工人之故，亦于二月十五日被害。这就是京汉工人二七大罢工及流血的经过。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各路及各地同情援助的情形。

先说正太路。二月四日京汉路罢工后，是日下午一时，正太工会即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援助办法，结果决定：①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②准备实力援助，七号实行罢工。③派纠察队往京汉正定分会石家庄部分，夜间帮同守望。④下午六时，召集全体大会。晚间全体工人大会开会，工友异常愤慨，委员会议案一律在大会通过。七日正午，该路即一致罢工，直至九日晚得到京汉

工会通知，谓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此通知证实后，正太方面才于十日一律忍痛复工。他们复工后，虽经武力恫吓，但工人团结坚固，故未受害，工会虽被封闭，然路局开除工会委员时，工人复一致反抗，路局遂不得不允许他们复工。道清路工人数量不过千人，然于二七奋斗时亦甚勇猛，该路工人与京汉路同日同时举行罢工，支持九日之久，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被捕入狱，黄业兴、李培学、谷雩领、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工会亦遭封闭。津浦路工会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全路一致罢工，但南段浦镇方面已先行发动。于十日上午实行罢工，嗣因京汉工友已遭武力压迫上工之消息传到，该路南段工人遂不能不即时恢复工作，而全路罢工之计划，亦只好中止。粤汉路自八日起罢工，随后该路工人即被军警用麻绳捆绑上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禁。其余如京奉路工会、京绥路工会均一致议决于八九日实行罢工，一切罢工手续，均已准备完善，不幸京汉大惨剧发生，罢工风潮亦渐平息，他们同情罢工的举动也只好相机停止了。彼时即尚无组织之胶济路工人，亦准备于津浦路罢工之后，立刻参加此次光荣之奋斗。武汉各工团热烈援助情形前面已提到一点，七日江岸惨变发生，同时武汉即宣布特别戒严，湖北工团联合会及各重要工团均被封闭，然八日起执行湖北工团联合会之议决案而实际举行罢工者尚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等；其余如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事先即被重兵看守，故未能实行践约。其他各处，亦有同样之准备和行动，如上海总同盟罢工之酝酿，香港海员工人之大愤激等。此外如湖南、广州、北京等处，亦都有同情援助之表示，发表宣言，举行示威，集款援助，不一而足。

“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于奋斗中特别能够表现出来。不但得到全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同情，而且震动全世界的耳目，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都专为此事发表宣言，海参崴工团总会和日本、朝鲜无产者同盟，均有恳挚之电报，遥寄其阶级之同情。

综观上述二七大罢工及流血之经过，可以想见当日工人之奋斗精神，实不愧为反抗军阀争自由之先锋。在这次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牺牲的精神，当郑州会议被压迫解散，京汉路工会的总同盟罢工命令下时，各部工人几如斯响应，虽各地军阀走狗百般威迫利诱，然而全路工人始终服从总工会命令。至二七失败，各路各地更是激昂慷慨，愤起而与军阀抗争。江岸工友处枪林弹雨之下，倒毙者已三十余人，犹死守工会，相持至数十分钟，得工会退后之令始渐次退散。虽然在二七斗争中也有不少的缺点，例如进行工会运动中往往偏重于上层的号召，忽略了下层群众的组织与训练，而且在流血前不曾看清帝国主义、军阀凶杀的面具，有些工人甚至指导工人运动的领袖对于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没有认识清楚，总以为吴佩孚不至如此凶暴枪杀工人，因此也就没有准备更残酷的斗争，致使敌人高压屠杀一来，工人措手不及。但是二七斗争毕竟是中国工人阶级由日常斗争到政治斗争的空前伟大的运动，二七流血之后，工人阶级很深刻的认识“工人阶级的自由须由工人阶级自己的血去换来”这个教训的意义了。

中国的职工运动在二七以前，只是初期的发生，二七流血证明了工人阶级奋斗的力量和决心，工会的需要从此普遍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群众里去。英美帝国主义者走狗吴佩孚等施行二七屠

杀，大欲恐吓工人群众，扑灭他们的革命运动。可是实际上，正是二七之后，广东、上海、山东、河南、湖北、湖南以至全中国的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纱厂工人等运动大大的发展起来，他们只能在极短的期间镇压住这个运动，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即二七流血的一周年纪念节，全国铁路总工会毕竟从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产生出来。二七之后不久，各地工人响应二七的斗争积极发展起来，他们都是继续二七的精神，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的口号和要求，这种发展的结果——上海、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运动，才爆发而成伟大的五卅运动。

二七以前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开始了很久，可是自五四以来，这一运动的极大部分还只在学生群众中，一直到二七以前唐山京汉等的大罢工，尤其是二七流血之后，才深深的渗入工人群众，这一残杀的创痛惊醒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使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二七之前中国工人运动始终还是束缚在很小的范围，但是二七流血，就使中国工人阶级加入国际工人阶级的战线了。所以共产国际为二七事件告中国工人书中说："确实说，你们的行动已经进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伍了！"二七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是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前锋，二七斗争实在是开辟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先声。

第五节　国民党改组与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后，早已崩溃瓦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国民党，在革命"成功"之后，大部分腐化，投降袁世

凯，投降种种军阀，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动力之一，华侨式商业资产阶级已经买办化。他们当时在国民党中是右派的代表，他们当初还寄希望袁世凯总统之下的责任内阁；随后，简直完全变成猪仔议员军阀走狗，如吴景濂等。就是老国民党之中的左派等，也只是想凭藉小军阀的武力，去打倒北洋军阀，他们不能和群众发生关系。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根本上的社会内容是农民的土地革命，但是只有改良主义式的平均地权的空政纲，而且当时还藏在口袋里不敢拿出来；民权主义，并不是代表民众去争政权，——中国国会制度迅速破产之后，也是没有出路，只有“护法”的口号。至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任务，那时也除“富国强兵”，争些“国际平等地位”之外，丝毫不敢有什么主张，反而在未得政权之前，先就百口应承的对帝国主义列强发出许多“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预约券。他那时已经是懦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国民党的复生，导源于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党领袖中一部分的“左倾”；然而国民党真正改组，始终等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赞助方才见于事实。这一过程，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发动起来，一般平民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运动（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除了五四运动以外，还有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长沙市民学生罢工罢市罢学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兵舰登陆枪杀中国民众事件，也很有历史的意义）的进展，而结成中国国民联合革命战线之新的国民党——一九二四年改组的国民党。“自孙文与越飞会晤（一九二三年一月间）后，国民党以容纳共产党员之条件与苏俄携手，两方已有默契，至去冬（即一九二三年冬）鲍罗廷来广东，乃决定改组方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遂开国民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面目精神，俱为之大变”。（见《中国六十年大事记》）

新国民党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表现，是事实上联合战线的反映。这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在改组之前，国民党根本没有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但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确实接受了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之中，原来只有“平均地权”，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才加进一条“节制资本”，同时也就决定了联合苏联的政策。经过这次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的确表现了它相当的革命作用，成为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国民党夺得政权的区域，如在广东，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也开始得着相当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冯玉祥政变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孙中山赤化”和“冯玉祥赤化”的名声，也在这一时期喧腾于帝国主义者之口。当时革命战线之中，民族资产阶级是赞助并且参加的。然而因为国民党之中，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并且有买办阶级及华侨商业资产阶级买办化的成分，所以一开始改组，国民党内便有右派冯自由等反共的老前辈起来反对。改组之后，国民党之中仍旧包含着不少买办军阀豪绅的分子，他们根本反对国民党改组。他们不但不需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他们自己就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所以改组之后，国民党老党员张继、谢持、邹鲁等马上出来“护党”，他们曾公开宣言：“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者，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一方面则注重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

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张继等护党宣言及当时他们所办《护党特刊》《民权旬刊》等出版物上的言论）。他们看见国民党改组之后，居然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口号，自然要妨碍他们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勾当，他们看见国民党改组之后，渗入了许多C.P、C.Y,及一般左派革命分子，渐渐帮助并发展工农群众运动，自然觉得必日益和自己利益相冲突，因此他们也就一天天更加反动起来。他们共同的政策就是反对苏联，勾结帝国主义，压迫工农运动。不但在口头上言论上处处表现出他们此种反动主张，而且在实际运动中充分表现出他们此种反动的行为。客观形势一天紧张一天，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一天天尖锐起来，在当时这种斗争之最剧烈的一幕，便是镇压商团反革命事件。

广东商团乡团，乃是一种买办豪绅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等的反革命组织，久有和工人农民对抗的形势及冲突。国民党改组之后，因为革命斗争逐渐发展，他们反革命面目也就日益鲜明起来。恰在那时，沙面英法租界新定入界苛例，无理压迫中国民众，工人群众举行罢工抗议（一九二四年七月），广州市工人群起援助，香港海员亦表示同情，着实使英帝国主义受了一些打击。加以当时广州政府虽然在它主观上还不能算得有力量有决心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但是因为国民党改组之后，广州政府之下左派势力很能帮助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与广州政府本身接近苏俄的事实，都大足以使帝国主义恐慌。于是英国方面便分两路进行：一路勾结右派、调和派，加紧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路趁商团运械暗中与以赞助，教唆并勾结买办商团起而推翻广州政府。所以沙面罢工将了未了的时候，商团运械被扣事件也就爆发了。

商团运械被扣之后，商团即以罢市相恫吓，广州罢市之前，佛山方面有陈恭受的领导，已经先行罢市，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当地豪绅所组织之民团都有武装，威胁小商人，使不敢开门；此时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即积极主张严厉对付，要在政府方面，趁商团阴谋布置未周，后援者无确定担保时，先予解决。政府方面不但有军官学校四处，共二千人，而且有工人农民之赞助——当时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工人代表会都起而斥责妥协派为反革命所利用，要求解除买办商团之武装而武装工农，其中市郊农民的农团军原有三千枝枪，工人则可以扣留下来的军械立刻武装起来。革命派已经看清商团是帝国主义的武装——当时商团自己也说后面有英人援助，而且北通曹吴，东连陈炯明，都说扣械事件发生后，商团必然求助帝国主义和军阀，当时虽然罢市谣传很盛，而始终迟迟六七日不发，便是有意等援兵，假使犹豫坐待东江与英国方面从容动作，广州政府就只有束手待毙了！因此应当先发制人，坚决用革命的手段镇压他们。就有人提议派人到佛山（当时广东商团联防总部在广州被禁止，即于八月二十一日迁往佛山）组织市民大会，工人农民都愿意拚死奋斗，若商团方面敢于压迫示威运动者，便可以立即强迫商团缴械而武装工农。

可是实际上佛山虽然开了市民大会，而国民党及政府的态度都非常动摇，右派军人在示威运动时名为保护工人市民，事实上却举枪干涉工人行动，反而保护商团军。革命派所提议的宣言及武装工农的主张都不曾采用。

到八月二十五日，广东全省因商团军械被扣而罢市者已有一百多埠，广州亦继各埠而起。当时商团等反革命派的策略，一方面便是放出“共产即在目前”的谣言，以罢市要挟交还扣械，同

时即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的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命令他们驱逐县长，宣布独立。罢市之后商团更用法西斯蒂的暴力政策对付革命民众，因此许多小商人自己虽然不愿意赞助商团，也只得被迫罢市。另一方面英国领事又通知政府说，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命令，若政府对商团开火，驻扎广州的英国海军便将立即攻打政府。这种景象显然是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伙同颠覆广州政府的反革命行为。然而当时国民党及其政府却只能畏畏缩缩的托名于“和平调停”，实际上是和勾结帝国主义买办商团军订城下之盟，并不敢用革命的手段镇压他们。当时革命派的主张则完全两样，革命派主张反革命商团枪械完全没收，分发真正之政府军队及广州之工人农民自卫军，买办阶级之武装不准存在，另编平民警备军以劳动平民为基础。此外更主张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统一财政，使作乱及反革命的军人无所凭藉，又可减少贫民的负担。工农及一般市民，自然都非常愤慨，坚决赞助政府，坚决主张解除商团武装，主张决然以革命的手段镇压反革命，并且各举代表会集于省长公署，组织平粜委员会，预备收管食粮以及比较重要的公共消费品，使商团不能以罢市相要挟，尤其使他们不能以饿死平民的手段胁迫政府。当时工人代表会与农民自卫军都积极准备着与商团反革命决战。然而国民党及其政府游移妥协的根性终究叛卖了革命利益，结果完全对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妥协和屈服。为使我们更能了解当时的实情起见，可以引一段当时（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香港《循环日报》对于商团事件的记载于次：

……扣械罢市风潮，自二十八日（八月）滇军范石生、廖行超二人出任调停，形势已有转机，……二十九日范氏进谒孙文，对于此事力主调解，并赞助容纳商团

之请求，以冀早日和平了结。孙氏不允。范石生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竭力保护市内治安，无论何方部队，如有骚扰商场，我当派队迎头痛击，断不令毁此璀璨五羊。供一二人意气之争而牺牲也云。孙氏闻言，颜色立变。但见范氏词语决绝，且以范之力量而论，又尽可办到，复后廖行超为之协助，湘军亦一致主张和平，仅藉樊钟秀之豫军千余人，必无济于事，乃毅然答应范氏。遂与商团代表于二十九日下午订立条件，双方签字，三十日商店复业，以条件而论，商团可谓完全达到目的，军械照原数目发还，联防又准予成立，陈廉伯、陈恭受亦取消通缉，不过以五十万元为代价耳！……二十八日白鹅潭外舰共有九艘，其炮位似已向永丰舰监视，大有战时行动情形，此亦未尝不足以促风潮之解决也。

这一事件真可算得极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伙同宰制当时革命政府之奇观：组织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者，领导这次叛乱的是陈廉伯、陈恭受诸买办，公开的袒护这次叛乱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武装调停”廉价拍卖革命政府的是范石生、廖行超诸军阀，而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军阀官僚商团之间的是当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国民党右派一面勾结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一面勾结军阀官僚以把持广州军政市政财政诸权利，这是自从设立广州政府以来公开的事实。这次事变的罪魁陈廉伯不仅是汇丰银行的买办，而且是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职员，这次主张罢市反抗孙中山最力的陈恭受等，无一不是当时国

民党右派党员，至于范石生、廖行超、李福林辈之属于右派党员更不待说。所以这次事件，一面是帝国主义打击中国革命运动，一面就是当时国民党右派反革命之具体表现。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是革命派剿灭反革命派，便是反革命派剿灭革命派。国民党领袖对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之妥协屈服，并不能使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等对革命派退让一点，反而使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等反革命势力取得优势更有力的进攻革命，双十节果然又大大地爆发了！

因为当时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及一般工农群众对于国民党领袖和帝国主义买办商团的妥协政策非常不满，因此就决定把那时即日到来的双十庆祝节改为双十警告节，号召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示威群众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会场中群众情绪都很激昂，特别是青年与一般工农群众对于国民党领袖与商团妥协的事件表示非常愤激。到三点钟的时候，会开完了，各团体即结队游行。本来在这参加游行的群众里，并没有那一个有武器，号称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与黄埔军校的学生也都徒手没有带武装，他们不过各人手中拿着各种标语的旗帜以表示警告的意义罢了。可是帝国主义买办商团既已取得初步胜利，就决不肯对革命势力让一点步。因此群众自第一公园示威游行至太平南路的时候，即与全副武装，布满长堤、西濠口、太平路、直连西门的商团军迎面相撞。某店楼上预先埋伏的商团军号枪一鸣，街上商团军立即向示威群众施放排枪，连放五次，前列示威队伍纷纷倒地，余众大乱奔走逃命，商团军随后追击，福军亦加入逐追，击毙徒手群众在二十人以上，油业工人黄驹中枪击毙命后，复被剖胸割势，死得最惨！此外，重伤的、落水的、踪迹不明的、被捕而遭商团军与

福军架锁毒打的不下数百人。在这一场惨毒屠杀中，我们可以看到买办商团对于工农群众革命势力的凶毒，他们靠着英国帝国主义的威权与军阀官僚（如李福林、范石生、廖行超、李朗如等）的屏障，对于革命势力真是毫不容情！

商团对徒手群众大肆屠杀之后，即全体动员出发，在街市上横冲直撞，他们的步哨由西关一直到东山，都布满了！他们一面在西关一带的街衢中张贴请孙文下野的布告，一面即以武装威吓商市重新罢市，并且明目张胆的请陈炯明回来主持政事。

在商团叛乱，危在旦夕的广州，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事实上已经更加显明，不是扑灭商团，就是政府覆没，其间绝对再没有妥协的余地。在此形势紧张局面之下，革命派乃对孙中山作严重警告。当时孙中山一面因为政府危在旦夕，另一方面因为受到革命群众的影响，才决定以武力平服商团。于是先将北伐各军调回广州肃清内乱，再行北伐，并组革命委员会指挥战事。同时东莞告警，陈炯明军已进攻虎门，而滇军福军等恐为陈所乘而散失地盘（当时因利害关系上不能与陈妥协），故又不能不暂时改变态度与政府合作，这也是当时所以能够平定商团的一种客观的条件。令下之时，商团即紧急集合，以西关为大本营，双方严阵以待，至晚七时商团方面即先行放枪挑战，满城枪声，相续不绝。夜十时警卫军即占领商团总部。至次晨四时各军下总攻击令，双方相持至五小时之久，商团因在屋顶居高临下，地势较优，故政府方面军队为所击毙及伤害者达四百余人。工团军死伤数十，商团军方面死伤不及百人。至十时商团不支，即向西北逃窜，政府军始占领西关，至此凶焰万丈的商团军始被击散。

此次镇压商团反革命之战争，虽然在它本身还包含着军阀抢

夺权利的作用，例如李福林军阀等加入作战，完完全全是想趁火打劫，并不是真正要反对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而且并未彻底扑灭商团，纵然商团一时溃散了，但四乡与商团同性质的民团仍在；纵然二陈及商团代表一时逃走了，但买办阶级势力依然存在。可是无论如何，在客观上，总是革命势力击败买办阶级商团阴谋反动之悲壮的一幕。而且在革命营垒这一边的主力军乃是工农群众及当时一般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尤其是工农群众最为勇敢，孙中山最后所以能决然用武力剿灭商团反革命，最主要的动力也是因为受了革命群众的影响。所以这次镇压商团军的战争，在客观上乃是工农群众及一般国民党中之革命派反对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商团及右派分子等反革命势力之革命行动，它是当时中国特别是国民党改组之后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斗争之缩影。在当时这种斗争本很普遍，例如当时（一九二四年九月）上海南洋烟厂八千工人罢工中，国民党右派叶楚伧、邝光耀、李援怂恿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事件，广州印刷工人因要求加薪不得已而罢工，而当时国民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胡汉民等帮助资本家压制罢工事件，及上海双十节国民大会中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璋、徐畏三等利用流氓打死黄仁等事件，更是不一而足，不过在当时这种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之最剧烈的一幕却是镇压商团事件，所以我们可以说镇压商团事件在当时乃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斗争之缩影，因此在客观上，镇压商团事件实在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六节　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三年黎元洪出

走，北京政变时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主张的宣言中提出来的。宣言中指出“逐黎不过是历来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患，造成中国危局之一个必然的结果。而非时局危机之因，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是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又指出“‘拥护黎元洪’‘拥护段祺瑞’‘国会南迁及制宪’‘团结西南及联省自治’‘藉助列强’这些办法都不能解决时局”。因此主张：“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直系溃败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只有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并希望国民党努力使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主张：“各阶级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预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当时共产党并向临时国民政府及国民会议提出下列最低限度要求：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

（二）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因为这是人民对内的政治解放之唯一关键。

（三）全国非应时的常备军，均以旅长为最高级军职，废除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总司令检阅使护军使镇守使军长师长等军职；因为这是杜绝军阀势力集中盗国乱

政之重要关键。

（四）军阀之祸，罪在最少数高级军官，失业入伍的兵士们所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军饷公开；应改良现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须给以土地及农具或其他种确实可靠之生活。

（五）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谋农产品和其他种生活必需的工业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之规定，废除包工制，工厂卫生改良，工人补习教育之设施，工人死伤保险法之规定，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设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损失及救济北方水灾。

（九）各城市乡镇之厘金牙税及其他正杂捐税，在国库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则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废止。

（十）废止盐税米税，以裕平民生计。

（十一）增加海关进口税，整理国有企业之收入，征收遗产税，征收城市土地税。此等大宗税收，不但足

以补偿废止旧税——厘金牙税盐税米税田赋附加税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税——之损失，并可用为补助退伍兵士失业贫农及推广教育之经济。

（十二）为保障知识阶级之失业及青年失学计，国家预算中，不得将教育经济移作别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庚子赔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费优待小学教员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同时孙中山离粤北上，过沪时因为受到上海广大群众的革命影响，同时又多受了一次帝国主义切实的教训（上海帝国主义者反对孙中山登岸），因此比较确定了反帝国主义的决心，当即宣言号召国民会议，孙中山并说他自己准备“到京后，在国民会议中第一须提出者，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当时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曾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不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之表示。国民会议的实际运动从此开始。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处都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各地的民众团体都纷纷通电宣言，拥护国民会议的主张。

但同时执政府段祺瑞一面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保护外人条约与特权；一面因为想堵住广大群众的革命要求，于是也提出召集善后会议来和共产党、国民党的国民会议运动相对抗。根据他的善后会议条例，列席善后会议的资格是：（一）有大勋劳于国家者，（二）讨伐贿选，制止内乱各军最高

首领，（三）各省区及蒙藏青海军民长官代表，（四）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由执政府聘任或特派，不逾三十人。完全是第二个军阀官僚政客名流的筹安会，与共产党所主张由下层民众涌现出来的国民会议完全不能相容。所以只有善于妥协的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不敢作露骨的反对”，但是全国工农学生革命群众却竭力反对，竭力坚持由民众团体所选举产生的国民会议。因此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会议，而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亦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召集，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

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会，前后一月有余，到会代表二百余人，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结果，但在反对善后会议，引进群众参加政治活动的立场上，确实有相当的影响。

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工农苏维埃已经成为唯一代表革命的旗帜的时候，仍旧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自然是极大的错误，而且是反革命的表现（至于最近所决定同时又得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所赞助将在五月间召集的国民会议，那更是赤裸裸的豪绅地主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分赃会议，它的主要作用是借此与工农苏维埃革命运动相对抗，乃是极端反革命的举动——一九三一年二月编者自注），然而当一九二四年与二五年时，这种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却无疑的有它很重要的革命意义。

以上所述，乃是中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二三十年间中国革命历史上几个重要的环子。这个短短的革命过程，包含着原始的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反抗君主贵族的辛亥革

命，学生平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五四运动，血淋淋的工人阶级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工农平民群众反抗买办阶级的镇压商团事件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在这许多革命运动中，自然包含着许多错误和弱点，特别是政纲的不明显以及妥协软化的倾向，但都有它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们都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预演，从此之后，排山倒海的群众，滚入革命的急流之中，于是中国大革命爆发了！

第四章　中国大革命的经过

第一节　五卅运动开辟了中国大革命高潮

（一）五卅前夜的罢工浪潮

A　上海小沙渡日本纱厂大罢工

日本资本在中国棉纱业里的势力，大家都知道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移资中国，就近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动，实是最可怕的手段。一则中国工人生活程度低；二则中国破产失业的人多，劳动供过于求；三则中国工业在发达初期，工人都是初从乡下进城的失业农民，缺乏职工运动——组织工会，指挥罢工，积聚罢工基金等经验；四则中国残酷的军阀政治，绝对禁止民众的集会及一切政治自由，而且租界内更纯然是外国政府，对待中国“下等人”可以用对待牛马的法子；所以中国工人工资既低，工作时间又长，待遇又可以随心所欲——这都是日本资本家在他们本国求之不得的。因此，日本、英国等的资本家，搜刮了中国的原料，便在中国建筑起工厂来。这样一来，外国资本家不但可以消纳他们自己国内的余剩资本，缓和他自己国内的社会革命运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里，尽先占领中国市场，永世不让中国实业发展，尽量剥削“驯服”的中国劳动者，取得异乎寻常的多量利润。

五四以来的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展——实业发展的要求所表现出来的运动。从那时起，“提倡国货，以杜漏卮”差不多成了一种口号。其实外货的输入，还是次一等的问题，——日本资本家在中国境内这样发展纺织业，将来一切实业都照这样下去，中国人虽欲排货而有不得的日子。中国人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不但排货运动没有用，便是宣言提倡国货也是没有用——当时中国人自己办的纱厂，已有许多被日本人并吞了去。要抵制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必定要劳动平民觉醒起来，必定要那“驯服的”劳动平民奋起斗争，争得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权利及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独立！然而要这一斗争能得到胜利，最先的必要条件，便是中国劳动者的自由，中国劳动者一般的生活改善——中国劳动者的政治的经济的权利。

中国劳动者已经不再驯服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小沙渡的日本纱厂里二万多的中国男女工人罢工了。中国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从此就扩大起来了。

小沙渡的这些纱厂，属于一个名叫“内外棉”的日本公司，这公司资本很雄厚，它在日本、青岛、上海共有十五个厂，在上海小沙渡的共十一厂。平时这些厂里对于工人非常苛待，工人稍不听话，非打即骂，惨无人道。工作时间是日夜轮班，每班十二小时——夜工并不加钱；工资也很少——最少的只二百余文一天；而且每月在工资里要扣除所谓“储蓄金”，工人死伤疾病的时候却并不发还，只有每月另发很少的“储蓄赏”；然而差不多个个工人每次领工资时都要被厂里借故克扣，结果所谓“储蓄赏”也仍旧扣去。再则，其中童工女工很多，所受欺压更甚；成年男工总要比较强硬些，因此，厂里更有一种极奸狡的阴谋——另

外专养一批男女幼童，叫做“养成工”，平日便施以奴隶教育；等到长成之后，便想一批一批的将他们调换成年男工，把那些“不安分”的分子开除出来，——想使全厂都是些女人小孩子，可以随便虐待剥削而不受反抗。这次罢工，便是因为有一厂开除一批男工，将“养成工”去替代，并且拘捕工人代表。这种待遇和工作条件之下，中国工人简直是日本资本家的牛马，——他们住的房子，是三四家合居一间小屋，吃的是喂猪的食料。此等痛苦，难道是宣言抵制日货的人所能感觉得到的？！所幸这种工人已经团结，已经组织工会，二万多人的群众已经开始斗争了！

这一次罢工的酝酿，是发生于二月二日，是日内外棉第八工厂的初纺部全体工人，无故被厂方开除。四日，被开除工人到厂中领取工资，不料厂方不但不给工资，反将工人拘捕。工友们以厂方这样残狠，实在忍无可忍，遂一致罢工，提出不准打人，增加工资二成，被开除工人恢复工作，罢工期内工资照发，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等要求。当初领导罢工的是沪西工友俱乐部，但不久内外棉厂工会就成立了。条件提出后，厂方完全拒绝，于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二万余人的大罢工开始。同时曹家渡的各纱厂，都一致策应，杨树浦方面的纱厂也起来响应。当时加入同盟罢工的计有日华纱厂、丰田纱厂、同兴纱厂、大康纱厂、丰裕纱厂等，参加罢工工人共计七万余人（根据唐海所著《中国劳动问题》统计）。七万余人的共同要求是：

①不准打人。

②照章发给工资不得延期，不得无故克扣。

③发还储蓄金。

④加工资十分之一。

⑤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⑥不得无故辞退工人。

⑦释放被捕工人。

后经外界调解，至三月一日始告结束。这次罢工虽暂时结束，但因这次大罢工，是上海向来所没有的，工人在斗争中得到许多经验，从此战斗力比较强大了，工会也组织起来了。因此而顾正红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便如火燎原一般的，五卅怒潮也就从此爆发了！

B 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

青岛日本纱厂工人和上海纱厂工人一样痛苦。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给了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以一大刺激。适因青岛日本资本家以野蛮手段制止工人组织工会，于是青岛大康纱厂工人遂于四月十九日起，宣布罢工。他们所提出的条件，都是当前最迫切的要求，如：日工每人每天一律加大洋一毛，包工按原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夜工饭钱一律加倍，取消押薪制度，因工受伤者工资照发（医药在外），一律免收房费，延长吃饭时间至一小时，此后日人不得打骂华工，应规定保证女工每月给生理假日二日工资照发，减少童工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八小时，如工人违犯厂规得由工会同意方可处分之，公司所罚工人之款应提交工会，作教育工人经费，此后公司待遇工人须一律平等等。

大康工人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即日夜调动中国警察保安队，欲向工人示威。延至四月二十三日下午，始由警察厅长提出调停条件，对于工人要求各条虽有少许承认，但均系不关重要的几条。工友等因深知自己组织能力尚薄弱及所受之种种环境，当即将自己所提出之条件加以最大之让步，仅就警厅之条件略加修改，更

备函送至警厅表示接受警厅调停之诚意。此公函送去后延至二十四小时尚未见答复，乃资本家更变本加厉，复于宿舍断绝工人饮食。工人等愤激异常，除一面派代表见厂长交涉发放已届期之工资外，一面又派代表通知警厅，说明资本家之恶劣手段，轻视警厅调停及欺负工人等情。并声明倘日本资本家不悟，工人收回昨日之修改条件，其责任不在工人。在大康附近之内外棉及隆兴两厂（同在四方）工人，因久受同样之压迫，听到大康工人罢工，即已跃跃欲试。特别是吃不饱、穿不暖、挨打挨骂最厉害之童工，竟轰轰嘶叫，不安于工作。最初本希望俟大康得胜后，彼等可乘便获得同样要求，故另推出三四十代表议定发一宣言表示愿作大康之后援，不料大康工人所要求之条件，久未得厂方之答复，该厂厂主因见工人不安，更调遣海军陆战队包围工厂示威。压迫愈甚，反抗亦愈烈，急待扩大之罢工风潮，遂一溃而不易收拾矣！内外棉于二十三日下午实行罢工，隆兴亦于二十四日中午停工，铃木丝厂亦于二十五日早晨一致罢工，并闻沧口日本纱厂工人亦将追随四方各厂之后，闻风而起。至四月二十九日参加罢工人数，已达一万八千余人。

自大康罢工之后，各工厂均相继成立工会，又特别组织罢工委员会，委员会之下有纠察队、调查队、宣传队，有团有组，队有队长，组有组长，团有团长，以指挥工作，全体工友都很服从罢工委员会命令，秩序很是严整。隆兴自罢工后，日本厂主，即雇用二百多保安队压迫工人，不准工人开会和自由出入宿舍等。另一方面，青岛工潮扩大后，上海各日本纱厂工会即派代表前往援助，全国铁路总工会亦发布宣言，号召各路工友实力帮助，胶济路工友尤为出力，青岛学生界亦组织后援会表示援助。而且工人的

团结力亦逐渐坚固起来，弄得资本家无法可施，支持了二十三天，结果竟被工人战胜了。五月九日双方签字，由工会宣布十号晚复工。十日下午三点开纪念罢工胜利大会，到会的人数，约万人左右，每人手中都执小旗一面，上书罢工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工会……种种旗帜，另有极大的红色旗帜二面，上写罢工胜利字样，开会时演说的人很多，每一人演说后，即大呼工会万岁！工人团结万岁！工人胜利万岁！工人自由万岁！等口号。散会后，结队游行并举行工会悬牌额典礼，工人簇拥三块工会的牌子为前队，次为军乐队，次为会员，队伍衔接长逾数里，两旁均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工人高唱胜利纪念歌，一时爆声震天，欢声雷动。三个纱厂工会的牌子，高悬于他们的会所门口了。

（二）铁路代表会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铁路总工会是二七的产儿，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已形成的唯一的产业的战斗组织。在二七以前，铁路工友的全国组织虽有计划但无成就。二七以后的第一周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产生，十余路工人领袖开始作全国的秘密的集会。虽遭曹吴军阀数次的明显压迫，逮捕工人领袖至数十人之多，可是一年内的艰苦工作，毕竟完成了全国组织的雏形，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纪念日召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会开会前后计共四日，到十二路代表，共四十五人，议决要案十余件。其议题可概括为三部分：（甲）总会报告与各路分会报告；（乙）政治报告，战略报告及"太平洋"、"汉堡"、"莫斯科"三次国际会议之报告；（丙）会务——如组织、宣传、救济、消费合作等问题。这次代表会可以表示出中国工人阶

级团结力之进步与阶级力量之发展。大会前后四日中，各路代表精神十分振作，每日开会多至十二小时以上，但秩序严整从容，充分表现二七的遗留精神。

在“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议题中，大会指明中国工人阶级目前的责任及其未来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之发展是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的。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工会的组织是由资本制度社会中蜕化而出的工人阶级之武器；所以大会规定工会的责任，着重于统一的阶级性的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当时实担负了两重的工作：一方面是本会的基础组织之建立与群众化，另一方面则是开始担负引导本国各种产业工人阶级的劳动运动。

在简短的历史之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实况中，本身的工作尤为重要，因此，大会有下列的进行方针之决议：（一）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二）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三）力谋工会之统一；（四）救济失业；（五）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六）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七）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八）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这次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很大的意义，两年前的二七是工人斗争失败而退守的纪念日，两年后的二七便是中国工人斗争复兴而再进攻的纪念日了。

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意义比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更加重要，因为它是中国大革命之前夜中国工人阶级团聚准备剧烈斗争之表现，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紧接着便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因此它更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四个工会，即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和广东工人代表会议召集的。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国际无产阶级的示威日在广州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二百八十一人，代表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四万有余。正式开会的日期先后共计六天，工人阶级愤激的心理和再不愿承受现存社会制度的热情，没有一次不在每个代表的演说中痛快淋漓的表现出来。

大会的议决案共计三十多个，其中最主要的为：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工会联合，铲除工贼，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与经济斗争等。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议案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表示：中国工人阶级不仅已有全国工人阶级大团结的觉悟，同时已有国际团结的觉悟。在这个议案中，还很鲜明的反对阿姆斯特丹黄色职工国际破坏国际职工运动之统一。说到通过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更是这次大会积极的结果，当总工会的章程通过和执行委员会选出时，“全国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谋全国统一组织的热忱。

在经济斗争的议案中，指明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具体要求。在政治斗争的议决案中，说明每个经济斗争同时就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工人阶级不根本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即不能完全解放自己。又说明为什么工人阶级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和为什么须为这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力量，最后还指明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等具体目标。

大会开幕的一天，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全体参加广州空前盛

举十万人以上的纪念"五一"之大示威游行；示威之后并与农民代表、青年军人代表举行了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工农兵联合的决议案，更可以说是大风雨逼近之一种显著的预兆。

（三）五卅准备时期中国农民运动发展的形势

五卅准备时期，中国农民运动亦已开始发展。不过这一时期，农民参加革命实在是不平衡的，农民的作用当时还没有很大的发展。大多数只是不自觉的无组织的参加，或者是大刀会小刀会，或者是红枪会式土匪式的反抗，或者是当兵——当孙中山的兵，如此各种各式的直接参加革命。只有广东则有比较大的比较有组织的发展。

当时在广东政府范围以内，已经有了农民协会组织者计有番禹、南海、顺德、香山、东莞、宝安、增城、惠阳、海丰、陆丰、惠来、鹤山、广宁、清远、高要、新会、花县、曲江、普宁、潮安等二十县。其中已经成立县协会者，有广宁、花县、海丰、陆丰四县。其他各县均已有区农民协会成立。农协会员人数已达十六万人。

农民的斗争亦已剧烈发展，反抗苛捐杂税及反抗土豪劣绅、地主官僚摧残农协的冲突，时有所闻。农民自卫军曾积极帮助广州政府镇压商团叛乱。一九二四年双十节的惨杀，李福林同范石生的军队都帮助商团，围攻工团军及农民自卫军，李福林军曾捉去农民军八十余人。当时革命军讨伐陈炯明在东江的胜利，农民群众的帮助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海丰农会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间被陈炯明解散，捕去会员二十人，监禁半年；一九二四年三月，农会领袖们被释出狱后，又开复活大会，到会群众万余人。地主豪绅和陈炯明大惊，旋遭第二次武力解散。陈炯明败后乃又重新复

活。不仅南方如此，当时北方河南、陕西农民斗争亦很多。例如河南卢氏县农民群众因反对驻军勒索苛税，反对拉夫派款，曾发生三次围城暴动，参加群众动辄数万。又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新闻报亦载有陕西农民暴动情形："陕西东部渭南、华阴、华县各地，驻军十师及镇嵩军，年来想尽方法，敲剥百姓，去年岁尾，该县人民，被迫无奈，相继携锄持犁，赴县交农器罢工，大起风潮。该军与县官，不惟不设法消弭，且恃兵力强迫弹压，结果枪杀乡民数十人，风潮始息"。亦可见当时农民斗争之一斑。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与中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到会代表一百二十余人，广东省农民协会亦于是成立。

（四）五卅屠杀前福州青岛之惨杀事件

民国八年日本帝国主义曾因福州学生抵制日货残杀中国民众，造成一次"福州事件"。不料六年之后——一九二五年，酝酿几个月之福州英华书院学潮（福州学生反对基督教会学校，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华教育侵略的运动），一转而为美国驻闽领事拘捕学生张秋仁事件，再转而竟又发生四月八日学生被杀七人、受重伤数十人之大流血事件。当日福州学生联合会曾有急电报告残杀真相，兹将原电照录如下：

> 福州男女学生数千余人本日向省长请愿露宿公署，萨镇冰命陆战队、警察队并其他军队开枪轰击，枪柄乱打，枪刀乱刺，死七人，重伤数十人，血流遍地，哀声震天。现全城罢市，请一致援助！

这个惨杀，直接是福建省长萨镇冰指挥军队开枪，而间接操

纵指使的，实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这一次“福州惨杀”，有人比之于俄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林那残杀”。因为这次“福州惨杀”是中国五四运动消沉六年后革命学生运动复活之开始，犹之乎“林那残杀”是俄国工人运动受高压消沉七年之后开始复活一样。“福州惨杀”之后，又发生北京学生“五七”反帝国主义围攻安福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事件，则简直是五卅运动的号声了！

青岛惨杀就比福州惨杀更加严重！前面曾说青岛工潮在五月九日双方签字十日复工。因为这次工潮工人方面得到相当胜利，所以日本资本家极不甘心。工人恢复工作后，厂方即故意三番四覆地不履行条件，向工人挑衅，借此造作口实向中国官厅报告，说：“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须解散工会”。中国官厅对着这个太上政府，自然只有唯命是从，故得令后即召集工人代表，申言：“工会应该取消，因为日本人望着骇怕”。并拿出委任状及金钱收买工人代表。不知工人经过二十余日忍饥耐饿的奋斗，所得成果就是工会，差不多就是工人的生命一样，哪肯取消！延迟至五月二十五日，资本家见工会仍活跃存在，更胁迫中国官厅，非解散工会不可。当地官厅因收买工人代表不成，即派大批武装警察保安队至四方欲实行以武力封闭工会，卒经工人群众坚决反抗未果。日本帝国主义者见此情形，仇恨工人更甚，至二十八日夜深人静时，中国官厅突调大批海军陆战队协同原有武装警察保安队和陆军秘密驰赴工厂附近驻扎，至夜半三时许，即以武力驱逐工人出厂，工人奋起肉搏，中外军警一齐开枪，工人当场受伤毙命者八人，受重伤者十余人，被捕者七十余人。

这次大惨杀，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事前准备计划，中国军阀官厅张宗昌、温树德即如法泡制。青岛帝国主义军阀这种残暴

行为，与上海五卅流血中所表现的完全如出一辙。其手段之残酷，唯有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俄皇屠杀彼得堡工人之行为，差堪比拟。此亦正如彼得堡流血星期日之尝与工人阶级以政治的客观教训，而终于引起全俄无产阶级，走上革命之大道。青岛五月二十九日之惨杀，乃唤起千百万中国劳动群众之觉悟，而此民族所潜蓄之强有力的革命势力，亦遂挥去其睡魔而起以行动。

（五）五月三十日南京路开始大屠杀及上海民众之反抗运动

到处都预示出大风雨之逼近，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的接战在五卅之前即已陆续开始，五卅之前各地罢工及各种革命运动的发展，早已促起了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强盗的杀机；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势力之形成，更加使得帝国主义列强万分的恐惧，更加使它感觉自己统治的不安，而更穷凶极恶的采用铁血镇压的政策。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安福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阶级被压迫民众发难反抗，举行一次七万多人的大罢工，接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工人阶级这种反抗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多人，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学生为救济死伤工人出发募捐被巡捕房捕去施文定、谢玉树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被捕去赵振寰、朱义权、江锦维等四人。被捕学生定于三十日在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开审，这是上海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但同时，帝国主义当时还有一

种压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层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这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且能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五月三十日到了，上海各校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事件，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学生已被捕房捕去十余人，旋即释出；但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聚愈众，听众亦愈多，巡捕复开始捕人。至午后三时许，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留一百余学生在内。当时未被捕的学生及听讲的市民，见此情形异常愤激，适值有一队学生经过此处，听见此事，遂参加要求立即释出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三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枪，接着印捕即奉命平放一排枪，华捕亦向空放一排枪，群众登时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十三人，重伤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学生继续至各马路散传单，讲演。捕房复拘捕学生。老闸捕房宣布戒严。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市。自上午七时起，南京路上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讲演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五十分钟，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更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这一戒备区域内除电车外，其余车辆及行人概不能经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

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被厂方协同西捕枪杀四人，都沉尸苏州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雇打手打伤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示威群众，公堂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至下午六时，遂又发生机关枪攻打新世界之事。原因据次日各报所载，系有一批“某国人”假装中国学生（能假装中国学生的某国人，自然是日本人无疑了！），在新世界门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骑，于是如狼似虎的帝国主义军队遂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向新世界射击，炮如连珠，历时约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数目，无法调查。但被捕确在三百人以上，且有二三十人立即下狱。在新闸桥，又有西印捕携机关枪向群众示威，并开始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各舰亦陆续到来，或中途被召回沪。新世界下午被商团占据去了。这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迎头便打。计三日一天之内，杨树浦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是日并有一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开来上海日见增多，计至四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已经登岸的有五百五十人，尚有二千名正准备登岸。杨树浦西捕开排枪轰击罢工工人，幸未伤命。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也有数人闯入华界。尤其难堪的，即四日上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没收一切文书，驱逐学生出校，强迫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到五日后，复施行于

大夏、同德、南方等校。还有沧洲、东亚、大东三旅社亦被检查。

三十日大屠杀后之第二日，全上海即已开始罢工罢课罢市。截至六月四日为止，公共租界完全罢市。特别是四日那一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全上海各学校之罢课自无待言了。上海民众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其仇恨帝国主义自不必说，尤以下层阶级为甚。所以屠杀之后，全埠鼎沸，反帝国主义之潮流普遍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因为此次屠杀发生的主因是为援助被杀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牺牲生命务必达到各业罢工而后已。四日为止，罢工总数已有二十万人。三十一日，各民众团体在上海总商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激昂慷慨，请求商人罢市，并且当场提出日商纱厂工人要求之七条件：

①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

②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

③禁止殴打工人。

④改良工厂卫生。

⑤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

⑥禁用外国巡捕。

⑦反对印刷附律。

六月一日即已有数业工人实行罢工。自二日起大部分电车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罢工各厂，如同兴日华内外棉第三、第四等厂都开始罢工，杨树浦祥泰木行等厂工人及大阪码头工人亦相率罢工反抗。三日起电车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电话电灯工人亦罢工三分之二以上，只剩少数人因被压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二厂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则罢工已达二十四厂，其中有四厂属于华商，余均为日本资本家所开；杨树浦自当日惨

案发生后，东方、怡和、德大、豫丰各纱厂工人遂全体罢工，其余亦自动的停止工作。自六月三日起，不但各工厂工人罢工，即在西人机关或住宅服役之西崽，亦开始罢工表同情于被惨杀的同胞。四日罢工风潮尤为突进。计四日罢工者有康益、汉士两洋行华人职员，日商绢丝厂工人，苏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干公司，柯达公司等华人职员，英美烟公司及日华纱厂工人，同茂公司，立兴洋行，挪威商办中国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银行华人职员，日商伊藤烟公司，公大纱厂工人，美丰银行，大英银行，华比银行华人职员，伊文思书局工人，上海总会侍者等。恒丰公司工人亦罢工。工部局铁工厂工人，电汽处职员亦因工部局之残暴，举行罢工反对。其他各洋行西崽亦多数罢工，码头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务、中华二大印刷厂已罢工外，其他亦多罢工，尤其是西报排字工人之罢工，使帝国主义机关难施其巧。西报工人并曾开会游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西报出版异常可怜，甚至文汇报用油印出版者，可见外报之苦况了！四日上午，上海总工会曾召集各厂代表在少年宣讲团开会，共到五十二个工会，二百余代表，各代表报告各该厂罢工情形与人数。代表报告时无不慷慨激昂，誓愿坚持到底。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自然是热烈参加的。首先起来援助工人的是学生，甚至于积极表示不怕牺牲反对“四案”的也是学生出头。当时上海的学校，没有一个不参加运动，便是向来不做社会活动的圣约翰大学此次也激起义愤，与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此次亦积极参加。在三十日和六月一日的被害者当中，有不少小商人和店伙。三十日屠杀之后，各

马路商界联合会纷纷投函总联合会，愤激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总联合会亦屡次派人和学生会接洽。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商会开会时候，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工不可，并且各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即已纷纷闭门停止营业。

上海的大商人阶级此次亦被迫得参加运动。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首先答应工人和学生的罢市要求，但总商会则须工人和学生及小商人的三催四迫才勉强签字答应罢市。五月三十一日午后各马路商店多已闭门，到六月一日早晨七时南京路大商店还有开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门。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则不从总商会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旧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勉强罢市。总商会虽然答应罢市，但同时即与帝国主义妥协，公然出来以调人自居了！

不过无论如何，革命群众与帝国主义强盗的血战却在不断扩大。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凶暴压迫依然不稍减轻。上海大学被封后，接着南方大学附中、大夏大学、同德医学也走同样的命运。各国海军陆战队继续登岸，大炮机关枪把守各要区，南京路的戒备日益加严。开枪威吓群众之事日必数十起，死伤时有所闻，租界内的人民日夜生活于恐怖世界之中。六月五日晚十一时，万国商团突然下令同时在南京路接连山东路、福建路、湖北路一带检查行人，所有过路的中国人千余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登时失其自由，在手枪、刺刀威迫之下，列成队伍尽被驱入老闸捕房严行搜索，一千余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一二小时，结果西捕查无所得，始释放而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因行路稍缓，被

商团刺伤奄奄一息。八日搜查惠中旅舍无所获，同日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梁溪旅馆被捕。六月五日为止，英美日法意等国兵舰已增加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各国军队已增至五千至六千名，自三日起各国陆战队商团及西捕，越界肇祸者日必数起。五日西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并开枪击伤中国保卫团。同日南洋大学学生在华界讲演，又被便衣西捕捕去。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启贤学校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二辆，英美水兵一二百人几与保卫团接战。其他外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者极多，不可胜纪。截至六月十八日为止，公共租界的戒备仍十分严密，恐怖空气并未减轻。

另一方面，群众的反抗亦继续高涨。除公共租界外，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南市亦加入罢市。罢工工人更日有增加。截至六月十八日止，罢工工人已增至二十几万人。新加入罢工的最重要的是海员工人，据十六日统计，已罢工之船共四十八只，罢工之海员共有二千七百五十余人。公共租界华捕罢岗亦过半数，这更可证明帝国主义之横暴，甚至激起其所雇用之巡捕的反抗了！

积极指导上海民众做反抗运动而为其代表者是工商学联合会。风潮发生不久，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组织起来，其所包含的团体是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政府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及交涉员许沅到上海后，工商学联合会特于六月十一日召集群众大会，邀请蔡、曾、许到会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学校学生及各马路商人，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俱坚邀不到。会场中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革命情绪热烈异

常。六月七日，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已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现在分别转录如下：

A 先决条件：

①宣布取消戒严令。

②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③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④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B 正式条件：

①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②赔偿。因此次惨杀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明酌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③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向我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④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⑤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⑥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⑦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⑧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声明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⑨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⑩收回会审公廨。

（甲）民事案

（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

（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

（乙）刑事案

（子）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

（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

（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照（丑）项论，且原告名义，则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

（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

（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

（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

（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⑪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

（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

（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⑫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⑬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这些条件本来都已经是很迁就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但在军阀官僚买办及资产阶级看来却还是非常“过激”的，所以政府特派员和交涉员都不敢接受，加以当时反抗运动中已经起了鲜明的阶级分化，所以上海总商会就把这些最低限度的条件擅自修改了。当时总商会所提出的条件如下：

第一条　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　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　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第四条　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　道歉。

第六条　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原状：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

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　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　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　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　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　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　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二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一)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优待工人”的一条，换言之，即总商会不许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二）总商会独不提出“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条；（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廨一条，总商会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因会审公廨制度不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简直是不顾条约无理霸占)，而不想根本收回。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这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总商会妥协的倾

向，在对外只要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对内则限制此次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工商学联合会十七条件是代表革命势力为一般人民谋少许自由，总商会十三条件则代表少数上层阶级利益。上海五卅运动开始时期这种十七条件与十三条件之冲突，正是后来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联合战线破裂之先声。不过这在五卅运动的初期还没有发生怎样大的影响，所以运动还是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

（六）紧接五卅上海事变后之各地屠杀及反抗运动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消两三个星期，上海南京路枪声已震动了全国各重要城市，直至最偏僻的村镇。帝国主义的铁蹄不但践踏了上海，而且遍及全中国。全国各地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运动，帝国主义只有报之以屠杀。同时，帝国主义的凶暴压迫亦只有引起革命群众更热烈的反抗。由远处的回声打转到上海来，我们看见各大城市的民众都已崛起卷入这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现在我们可以依次叙述一下紧接五卅上海事变后之各地屠杀及其反抗运动。

北京　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横暴亦目所共睹。六月三日北京学生五万余人大示威，队伍行至东交民巷时，竟被阻止不许通过。当时日兵及安南兵都严阵以待，使馆界口预备水龙向群众射击以及二美兵骑马向队伍乱冲并擎枪示威恐吓群众。三日以后，公使馆屡次无事自扰，使馆戒备日益加严。至十四日，复在使馆界口布设刺铁线网。这就可见帝国主义在华的总代办怎样看待中国人民了！群众反抗运动亦继长增高，六月十日又召集国民大会，到会群众竟达二十几万人，议决援助沪案对付英日议案二十条。并在大风雨中作示威游行（根据六月十五日上海《申报》记载）。北京学

生联合会、商会都发表宣言，正式宣布与英日经济绝交，并定六月二十五日为全国大示威运动，请各地一律罢工罢市罢课半日，实行全国总抗议。

镇江　镇江英国帝国主义开枪示威，先继上海屠杀而起。六月五日，镇江各工厂工人及黄包车夫俱罢工参加三万余人之示威游行运动。当队伍经过银山门时，突有英人汽车一辆驰来，撞倒墙壁，压伤游行女生八人。当日租界工部局不知如何忽然起火，巡捕遂开枪数响，并上刺刀预备冲锋驱散群众，虽未杀人，但帝国主义处处以武力为对待徒手群众之手段已昭然若揭了。

汉口　五卅消息，六月一日传到武汉，学生方面于二日即多数罢课，三日即总罢课，其后大游行了两次。平日半生不死的学生联合会，至此亦生气勃勃，实际上成为学生运动的指导机关。他们组织的四五十个演讲队，不分早晚的在街上讲演，传单画报，到处散发。工人方面，亦已开始活动，决定于六月十三日举行大示威运动，十四日开始罢工，不幸十一日的惨剧发生，大罢工的事实，竟未实现；中间虽有三五处举行罢工，然而都被军阀官厅随即压迫上工了。汉口商界，代表大商人阶级的汉口商会，代表买办阶级的华商总会，对于五卅沪案，都漠不关心，工学界的代表去和他们接洽，前后总不下一二十次，然而没有一次不是以闭门羹相饷的；这还不算，当武汉学生要求武昌商界罢市，和汉口工人预备游行示威的时候，汉口总商会会长竟连夜跑到萧耀南那里去，说这次运动完全是过激派在内煽动，请督办及早解散。武昌商会和汉口各团体联合会，比较起来是代表中小商人的，所以他们对这次的运动，还能表示相当同情，並且有时候还参加，如武昌商会，在萧耀南铁蹄之下，居然也组织了一个五六

千人的游行。其后因为总商会的告密，官厅捕拿他们的首领，于是中小商人的反帝运动，亦遂一蹶不振了。

萧耀南当运动初起的时候，即具了压迫的决心，所以在二三两日的时候，就不许学生在街上张贴画报，更不许学生过江讲演，武装军警，星罗棋布，对待学生，有如盗匪。同时即以过激党的名义，看管工人的首领，绝对禁止工人集会；未几，而汉口惨案发生。六月一日因太古公司毒打码头工人，一般表同情于码头工人的车夫棉花厂及各种工人市民，集合到太古码头，后因被逼向大智门方面逃避，其时英领已召水兵登陆，一面下戒严令，将租界要塞，概行把守，断绝交通。大智门本是工人区，当时见太古码头群众的被逐狼狈情形，愤激异常，丛集大街者，约四五千人，万头攒动，渐近租界，而租界以内的市民车夫等，亦聚集千余人，英捕即用水龙冲射，群众遂向华界奔逃，将铁栅冲破，英水兵复提枪追击，华界工人见此惨状，热血沸腾，急上前营救，英水兵见群众势盛，便开机关枪射击，一时弹如雨下，血肉横飞，当场击毙数十人，重伤三十余人，轻伤者不计。肇祸后英兵乃从容将电灯灭息，将死者尸首用汽车移往他处，将重伤者送往医院。重伤者相继死十二人。惨杀之后，工人学生群众与帝国主义争斗的态度更决绝，定十三日开国民大会，以谋反抗。可是军阀萧耀南为效忠帝国主义，乃大施压迫，立即捕杀革命战士萧英等四人，拘六人，解散学生联合会，封闭扬子江通讯社，禁止工人偶语，捕小商人首领郑慧吾，指学生代表为过激派，严行逮捕，通缉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援协沪案运动者八十余人。解散汉口中学，并出布告说，以后如有群众示威运动，决就地正法，十三日的国民大会亦就因此流产了。

九江　九江也有机关枪声。六月十三日，日本浪人故意在九江台湾银行废址之内放火，藉以嫁祸"暴动的"中国人。军警用救火车驰至时，日本浪人复制止救火，英日战舰陆战队二大队即登岸排设机关枪，并向空连放二响。事后各埠日文报纸都以头号字登载九江"暴民"焚毁台湾银行之消息，日本公使且以此事向北京政府抗议。然而帝国主义这种阴谋并不能阻止群众的反抗；而且帝国主义所以采用这种阴谋，适足以表明江西民众反抗帝国主义之激烈，因为帝国主义施行这种阴谋的时候，正是九江民众援协上海五卅被杀民众，群集于英日领事馆前讲演，因群情愤怒难遏，致与外国巡捕冲突，发生捣毁领事馆窗户事件的时候。

湖南　"六一"（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日舰水兵登陆枪杀中国民众，激起罢工罢学罢市反日运动的纪念日）之夜，长沙民众对日纪念的大示威后之夜，上海五卅惨剧之哀音已传进长沙，六月二日上午已有学生讲演队的旗帜在街上往来，大公报的号外亦飞满街衢。傍晚六时，轰轰烈烈的两万人以上的市民大会在省教育坪召集了。这一大会的分子，当然是工人与学生占最多数。大会呼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英日经济绝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会审公廨"，"没收英日在华所办工厂"，"撤退外人在华驻军"，"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又通过即日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散会后立即整队游行，情绪十分激昂。六月三日和四日，工人和学生的宣传队遍布城乡内外，各校学生会纷纷开会讨论援助办法。五日举行空前的大示威运动，参加群众约十万人以上，须经过四小时始能通过一地。指挥这运动的是以工人学生为中坚的雪耻会，虽然雪耻会的分子不止是工人学生。雪耻会在这

一天并通电全省各县一致发起同样的组织和同样的运动。这一运动大有立即扩大的形势，但是政府的压迫来了。因为六月二日晚激烈的群众运动，三日赵恒惕即满城张贴告示，说什么湘西战事未清，深恐土匪潜来省城，如有乱党乘机煽动，定予就地正法。但这一告示并没有能吓退革命群众，所以工人学生之奔走呼号如故。六月五日虽然赵恒惕满城戒备，如临大敌，而游行示威运动依然如期举行。六日晚间因为新河英人打伤华仆及上海新世界杨树浦之惨杀迭起不已，工人及男女学生又沿街呼号，并劝军警一致对外，军警多感泣不已。不过军阀官厅之压迫亦随之加重，六月七日长沙全市白昼戒严，各学校门口派兵站守，不许学生出门，教育会四围重兵禁止出入，重要街道五步一双岗，便衣侦探全数出发，群众领袖之住宅都被派兵搜索，"宣传过激者斩，煽惑军心者斩……"一类的告示，遍街小巷无处不贴，同时责令各校当局勒令学生上课，间有学生冒险上街讲演者，旗帜都被撕毁，几乎发生武装冲突。

当时长沙的运动大概如此，现在再来看看水口山的一幕。水口山是省有锑矿，工人三千余人，一九二二年成立工人俱乐部。一九二三年被政府收买工贼宾步程武装解散，枪杀工人二名。工人俱乐部解散之后。虐待工人更甚，工资积欠半年不发，平日以土匪看待工人，监视极严。五卅惨案发生，该处工人激于义愤，特派代表到衡州学生联合会探问情形，适有由省回衡之学生彭平之君见工人如此热心，欣然愿往，到山后工人开露天大会，请彭君讲演，并议决停工示威，旋被军警解散。六月十七日早晨停工示威，当工人正在集会之际，局长邓寿荃下令军警开枪轰击，结果工人伤者十余人，工人代表被捕者二十余人，彭君亦在内。

邓并诬指工人反帝为土匪劫枪劫饷，请示赵恒惕，赵立覆电就地正法，幸被捕工人及彭君对于土匪二字虽严刑拷打，亦不承招，省方雪耻会又急电警告并派人交涉，邓始杀心稍戢，然而中国军阀官僚之效忠帝国主义，于此亦就暴露无遗了！

广东　广东在当时乃一革命策源地，对于援助沪案反帝国主义运动，自然更不让人后，所以五卅消息传到，广州学生联合会立即联合各团体在广东大学操场开群众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并全场通过组织一个援助沪案的工农兵大同盟，进行一切工作。适其时英国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等军阀实行叛乱，时局严重，各界咸注全力于扑灭杨刘事件，对于援助上海五卅运动，不得不暂行停顿。然而对于外间的运动进行仍未稍懈，尤其注重在香港的活动，学生联合会和新学生社都派代表到香港发动罢工罢课。中华全国总工会更专派代表到港切实指导罢工。本来香港工人对于八十年来的奴隶待遇已经受够，即使没有上海五卅事件，香港沙面奴隶们也会有起来对不住英国皇家的一天。既有五卅屠杀，奴隶们便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呼喊，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的离开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六月十九日。这次罢工最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就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于是各种工人相继踵起，机器船坞工人殿其后，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而罢工局势遂以造成。罢工后，工人从火车轮船前往江门、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并起。

香港工人既于六月十九日开始罢工，乃即发布宣言，说明罢工之原因，宣言之后，附以要求，分为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

由，法律平等，普及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项。香港政府对于罢工非常气愤，因此宣布欧战时所无的戒严令，及禁止粮食出口令与禁止金银块底纸币出口令，一面以铁血政策镇压香港，一面又欲以封锁政策饥饿广东。然而工人激于民族义愤，万死不辞，蜂拥离港，沛然莫御。素以凶残著称之军官总督史塔士虽捕领袖数十，亦卒无济于事。于是“东山崩裂，洛钟响应”，沙面英领事捷米逊遂于六月二十三日对沙基游行民众施行大屠杀了。此时广州时局已稍平定，乃定六月二十三日举行援助沪案第二次示威大游行，是日到者不下六七万人，行至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地方，被英兵发排枪及机关枪扫射，英法葡舰并开巨炮，轰击达二十分钟之久，当时击毙中国民众五十二人，受伤者一百七十余人，是即轰动世界之沙基惨案。沙基屠杀之后，广东民众莫不悲愤填胸，厉行经济绝交，封锁海口，工人方面更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以主其事。

天津 自五卅惨杀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工人学生即异常活动，六月五日起，学生一致罢课，在南开大学操场集合，议决援助办法，并出发游行，沿途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外人在华一切特权”等口号。此后他们便努力于群众的宣传组织以及募款接济上海工人等。不久，海员罢工了，天津总工会成立了，帝国主义者吓得屁滚尿流，于是便指使他们的走狗奉系军阀李景林出来干涉，封闭各界联合会与海员工会。有日资关系之纱厂工人奋起罢工，李景林压迫工人，更不遗余力。六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者更命军阀包围罢工工人，当场枪毙无数，并捕去学生联合会职员多人，拷问会长辛璞田，逼令供出煽动罢工等“阴谋”的实情，辛璞田竟至昏晕三次，然而群众反帝

国主义运动依然不断发展。

南京　南京民众素来比较消沉，但是五卅大潮突起，也就把消沉的南京民众惊醒了。于是有六月三日和四日两天很热烈的游行示威，六月三日在城内，六月四日在下关。到下关的唯一目的，在唤醒英厂和记洋行成千工友起来共同做反帝运动，因为在南京地方，只有他们才可杀进英国帝国主义势力的营寨。大队到和记蛋厂的时间，刚刚是正午十二点钟放工——这是预定的计划。大队围着和记工厂差不多成了一个半圆形，大喊："工人团结起来"，"罢工援助上海被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学生在烈日之下这样愤激，工人就受了很深的感动。晚上又有热烈的学生运动——东大附中的特别多——跑到下关去接洽罢工的事情。果然，六月五日的一大早，和记工厂第一次大罢工居然实现了。罢工后，第二天即进城游行。游行至东南大学体育馆集合时，口号呼声震天动地，掷帽的，掷旗的，跑的，跳的，简直成了疯狂状态。罢工之后工人即自动组织工会，同时学生演讲募捐之事亦积极进行。罢工支持一月有余，至七月十七日始以厂方承认十二条件复工。条件内容，工资自十六千小钱加至九元一月，其余对于待遇上亦略加改善。复工后工头不像从前那样凶暴，英监工也比从前客气得多。工人方庆此次罢工为有相当代价。不料资本家阴谋狠毒，七月三十一日和记宣布暑期停厂，竟不照约发给工资，工人代表交涉无效。厂方乃调英"杜班舰"陆战队四十余名，荷枪实弹包围工人，工人见势不佳，争相躲避，秩序大乱，英兵竟开枪轰击，遂有南京惨案发生。是役当场死工人一人，轻伤二十六人，重伤一人，左腿竟成残废。惨案发生后，南京各界遂有下关惨案后援会之设，以指挥工作。

青岛 青岛第一次的惨杀，发生于五卅前一日，事出之后，因压迫严重，消息不能外露，所以工人于伤亡失业之余，一部分遂忍辱上了工，其余则由资本家在乡间招募新工补充。青岛惨案发生之后，次日上海即发生五卅巨变，接着掀起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可怜山东方面，受了官厅的压迫，只许单提上海，而不许提青岛二字！在这时候，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机厂分会的工人，忍不住再缄默了；所以就乘着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挺身而起，出来领导群众去反抗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经过四方机厂数千工友几次冒万难的游行演讲之后，工学两界的群众组织才成立；四方机厂又自己单独组织一“青沪惨案后援会”，每日分派讲演队到各处讲演募捐，有的沿胶济线路出发到七八百里之遥的济南去。在四方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时，胶济路工人即在实际竭尽助力和声援，此次又独力领导起群众向帝国主义进攻，自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他们比纱厂的工人还要可恶。纱厂工人第一次（五月二十九日）被屠杀之后，不但在第一次罢工时所得到利益完全推翻，并且更加虐待，有一个童工被打得头破血流，工人理论不能得直，所以七月二十三日仍旧由大康纱厂发动，与内外棉隆兴三厂又罢了工。

工人罢工后都被保安队警察严密监视，行动不得自由。罢工的第二日，恰好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第一次屠杀青岛工人的刽子手张宗昌巡行到青岛，日本资本家看见他们的保镖来了。于是向工人进攻得更加凶猛。日本资本家和领事，自然捏造事实，拿“赤化”，“过激”，“损失”，“治安”等怂恿张宗昌；而一般商家，因为向来做的日本生意，自惨案发生以后，就高唱“对英不对日”不肯实行经济绝交，久为工学两界所唾骂，青岛公民报主

笔胡信之君，更是责骂得厉害。所以商会会长隋石卿，久有将胡暗杀之企图。这次张宗昌到青，商家欢迎极铺张，甚至每商家均摊洋三千余元，更受胡君严厉斥责；因此就由商会正副会长，在张宗昌面前告发，说纱厂工潮都是胡信之一人煽行起来的。狗头将军张宗昌于盛筵之下。又得两方三十万元的报效，即派大批军队，将胶济铁路“青沪惨案后援会”封闭，捉去工人十三人及四方小学教员李某一人；同时在沧口有几处日本纱厂，也被厂主告发，被张宗昌捕去工人十余人及青岛学生七八人。——自接二连三雷厉风行的大捕捉以后，青岛马上变成了恐怖世界。至七月二十九日晚间，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和四方小学教员李某，没有宣布罪状就执行枪毙了！其余的工人学生等也都陆续带往济南烟台枪毙了！报馆大半都被封闭，其余通缉者更不计其数，于此青岛反帝运动暂时又被张宗昌血葬了！

除以上各大城市外，其他如开封、福州、厦门、济南、杭州、宁波等处，都有积极行动，而且普遍到穷乡僻壤。陕西、山西、广西、云南、贵州等处都有响应。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五千余人竟乘车至北京参与游行。河南广东数乡农民亦开农民大会，对五卅流血有所表示。此外，各地发起捐款救济罢工工人尤指不胜屈。而且大大地引起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之同情与援助。首先是苏联，自得屠杀消息后，莫斯科即有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各帝国主义作严重之抗议，纷纷募捐救济上海、香港等处罢工工人。共产国际、少共国际、赤色职工国际都特地发表宣言，援助中国各地被难战士，并且训令各国共产党积极攻击各该国政府，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都有严重之表示，于是五卅事变成为国际的事件了！

（七）五卅事变的历史意义

在继续叙述五卅运动以后各种详细经过及探讨五卅运动所开辟的中国大革命的各种重要流变之前，我要在此先把五卅事变的历史意义给它一个确定的位置。

五卅事变的起源自然包含在第二章论列中国大革命社会经济基础的范围之内。特别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已弄到民穷财尽，像一个作了连夜苦工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一样，他们都要急于恢复他们的健康，即是说，要重新振兴已经衰败了的工业，补充已经洗空了的金库，……。但是他们本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是没有很多的油水可以榨取了；他们自然一方面要千方百计的进攻苏联，以便企图霸占俄国的原料和市场；另一方面便带更浓厚的强盗性来抢劫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富饶著称的中国自然更逃不脱他们的虎牙鹰爪。他们拚命地从中国收买廉价的原料去制造货物，再运到中国来高价出售；拚命地移殖资本到中国来开办工厂，利用中国贱价的工资和原料，同时又可以转而操纵中国的市场；拚命地指使并利用中国军阀互相厮杀，以攫夺许多非分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拚命进攻侵略的结果，所以一九二四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发生总的恐慌。促使中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前进。大战终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更给中国革命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和帮助，加以二七血战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一九二五年开始，职工运动复兴发展，全国铁路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相继成立，广东沙面罢工，上海纱厂的大罢工，青岛纱厂汉口烟厂等处罢工的发展；小资产阶级不断的左倾，学生参加革

命运动的奋发（北京学生之五七示威，太原学生之抵税暴动，福州学生反日运动之流血等），国民党改组与镇压商团事件的胜利，促成国民会议运动普遍全国。一切这些事件，都表明五卅事变之前，各地民众都已开始活跃，革命的火线已经在各地爆发。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枪声响了，于是潜伏在社会中许多革命的小潮至此汇聚一处，成一股大潮。帝国主义最初只以对待义和团的眼光和方法来对待五卅流血所引起的反抗，不知一九二五年已经不是义和团的时代了，帝国主义野蛮的屠杀竟如火上加油，结果反而促成中国革命更剧烈的发展，这是后话，我在下面再说。如今只说五卅事变，这是第一次使中国革命群众化的历史关键——它展开了中国革命一个新的时期。从五卅事变起，中国革命才连肉带骨的现形于世，才成为实在的力量。五卅事变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当时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就曾指明了五卅事变的历史意义，我觉得他当时估量得很中肯，现在可以引起他主要的一段如下：

这运动开始于很平常的经济要求——中国的工人要求幼年工人每天做八小时的工作；成年工人每天做十小时的工作；星期日休息；这种要求是半世纪以前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早已提出要求过的。

这运动本没有什么非常的意义，结果竟变成了重大的政治事件，取得了世界的意义。

从八小时工作的要求到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的要求，这中间有个长距离；而这距离，中国工人只在几天之内就跳过了。一九〇五年一月俄国的工人群众经过长时间准备以后，也曾用很快的步骤走过了同样的路。英日帝

国主义者的军队现在所给于中国工人的教训正像那被工人鲜血所喷溅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王朝反动军队所给与俄国工人群众的教训一样。

那时候俄国工人从痛苦的流血的经验中悟得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俄国工人的争斗一点一点的变成了政治的争斗，而人民的喊声："推倒专制"也愈喊愈响了。中国工人现在也从痛苦的和流血的经验中开始不仅悟得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而且也悟得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嗜血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

英日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打死了几十个中国工人和帮助工人的学生。英国的警察监禁了上海电气厂和自来水厂的工人。上海这些部分的工人是在手枪的压迫底下做工，然而罢工却在开展着成为总同盟罢工，而运动的范围却继续不断的扩大了。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一天一天的响起来，有力量起来；上海的工人一天一天的上前坚决的在这个大运动里面做中国广大群众的领袖。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正打急电给他们的军舰，喊他们到这个"活动的场面上来"。我们不必是一个预言家就可以知道，几亿中国人民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强盗的愤恨一定因此而更深，他们的要求："不许侵略中国"一定因此而更响。

五卅运动不仅是上海无产阶级的发动，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动。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反帝国主义斗争，工人阶级并自己起来实行革命的独裁——上海总工会领导极广大群众，这些群众自动没收日货，省港罢工纠察队用群众力量来制裁

卖国贼。在这种革命的独裁之前，张学良、梁启超等起初都不能不代表统治阶级让步。在五卅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客观上已经在争取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的行动指明应用直接行动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五卅事变后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外国厂家的压迫要反对，中国厂家的压迫也一样要反对。国民革命的发展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上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拿阶级斗争去领导国民革命，没有这种领导，中国革命运动是不能如此蓬勃发展的。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路线客观上是要发动农民群众，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都是五卅事变的直接产物。但上海有一缺点即附近农民尚未有影响，广东则以这种力量建立了第一次的国民政府。“他自己国家里面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加上殖民地和半独立国家的民众的反抗”——这个，列宁同志高叫说，是“世界革命的要点”。五卅事变起后，这个公式便有鲜红的血和肉附着上去了。

第二节　由五卅事变到北京惨杀

（一）五卅事变后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新形势

空前的五卅大屠杀，乃是帝国主义列强镇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之必然的现象，同时又是中国民族形成广大的革命联合战线，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自上海南京路英帝国主义者施行排枪扫射，无数革命健儿以鲜血染红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以后，不转瞬间怒潮般的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巨流即普遍激荡于全国。南京路屠杀之后，首先激起上海二十余万工人的大

罢工，五万余学生的大罢课以及全沪极大部分商人的罢市。上海数十万民众合组之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解决惨案的十七条件，成为全国民众之共同一致的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队等口号成为全国民众一致奋斗的政治目标。全国各城市，各市镇之被压迫民众都一致崛起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北京、武汉、广州、天津、南京、九江、芜湖、重庆、郑州、开封、宁波等处之应援上海民众，罢工罢课罢市的直接行动，无地无之。接着又迭有英日帝国主义者在汉口、广州、南京、九江、青岛等处之不断的屠杀，更促进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热情而斗争愈烈。不但各重要城市为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种种反抗行动所笼罩，即在很小的县镇以至于穷乡僻壤，亦随处都能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在此种遍及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怒涛中，给予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的是上海、广州、香港、天津、青岛各地工人的罢工和各地民众努力进行的排斥仇货运动。五卅运动实际上是开始中国从古未有的群众革命运动，而且处处都是工人阶级当先锋，以最勇敢牺牲的革命精神，以实际的群众团结的力量，去争平民的权利，争自己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解放。各地工人在斗争中都很努力团结集中自己的力量，五卅事变起来不久，河南、北京、天津等地，都和上海一样，有总工会的成立。再则，当时广州革命政府，亦于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以断然的手段驱逐杨、刘，扑灭广东内部的反革命势力，进而以政府的力量援助香港工人之抗英的罢工运动。全国学生总会并于六月下旬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于上海，在这次大会中，对于学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有一种比较急进的决议。各地学生群众因此

次大会之成功，对于民族革命运动的参加更为热烈。全国各重要城市都有工商学联合会、各界雪耻会或者沪案后援会等类的组织，以指挥一切宣传煽动、示威游行、募集捐款等工作。这时因为民众革命势力的暴涨，形成了国民革命比较巩固的联合战线，因此使得帝国主义之间不能一致对中国进攻。段祺瑞的军阀政府，亦恰在这个时候（六月二十四日），正式以外交公文要求列强“修改”不平等条约，以表示表示自己的“爱国”；张学良到上海来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也不得不先捐给学生联合会两千块“买路钱”，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此外，在五卅运动发生后之两个月中，各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机关教会学校，也为革命的巨涛所冲荡而受了很大的损失。自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因反对当局的压迫而全体退学，各地教会学校因反对当局干涉反帝国主义运动所起的退学风潮先后崛起，使教会学校受到很大的打击。当时中国大多数的民众都燃烧着誓死反抗帝国主义的烈火，一切妥协的倾向与反动的主张，一拿出来就遭群众之鄙弃与唾骂。上海总商会之抹杀工人利益，擅自修改十七条件，引起民众多方面之反感。一般高等华人、学者名流如梁启超、胡适之、丁文江等所提出之“缩小范围”，“单独对英”，“双方友谊的协商”等主张，在遭受群众之严峻的攻击。上海申、新两报因登载工部局的“诚言”的广告，曾受到革命群众之严厉的惩罚。可见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当局者一点点的迟钝行为，都要激起群众的愤怒，同时亦只有在革命势力暴涨的时候，才能迫得敌人或多或少的让步。

（二）帝国主义新式的进攻与群众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者在五卅施行大屠杀的根本用意，是在镇压中国民

众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他们因为有了镇压义和团暴动的经验，以为一场屠杀便可以使中国人低头伏气，承认帝国主义者有理。不料结果适得其反，二十六年以后的中国和义和团时代大大两样了。五卅事变之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不但不因帝国主义强盗在沪、汉、粤、宁各地之再三再四的屠杀而消沉退守，反因此而激起更猛烈更广大的革命浪潮。于此帝国主义列强固然还不肯抛弃武力的压迫，然而也就不得不使它发生一种新感觉：单纯的枪弹炮火的政策已经没有十分大效果，而且对于自己，倒一天天的变成危险的把戏了！

他们既然感觉到这一点，便不得不想法保存自己对于中国的统治，不过另外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新的形式，使表面上那种强横残暴的侵略不大显露，而实际上能够仍旧继续以前的状态。于是他们提出了"司法调查"与"关税会议"。所谓"司法调查"，便是帝国主义想用这种法律的手段来延宕交涉，仿佛五卅屠杀中开枪的究竟是巡捕是学生，杀人凶犯究竟是英国还是中国，还没有知道，所以应该用司法来调查一下，而且经过六国委员的一度调查还不算，还要再来一个沪案重查。其实五卅屠杀事件不但在中国民众方面早已瞭如指掌——五卅屠杀中，英、日是主犯，美、法、意等等帝国主义者是帮凶；早就看清了这是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压迫中国的必然结果，并且早就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工厂和企业。而且五卅之后一星期内，连帝国主义者自己的法庭也就判决群众无罪了。因此所谓司法调查与沪案重查等花样，只是帝国主义所想用"法律"的手段判决五卅所杀的人是该杀，以后还可照样狠狠的屠杀，和各帝国主义之

间，要想妥商出一个一致的态度，来压迫宰割中国罢了。美国帝国主义则更加狡猾，它甚至于说，可以讨论关税自主问题——帝国主义者忽然把忘记了三年的华会决议重新记忆起来，这正可见他们觉得中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一日千里，如果不早些让点步，以收买鼓励中国军阀、资产阶级出来帮助他们快点镇压革命，将来恐怕要嫌太迟了。

帝国主义一面不得不运用六国调查团司法重查、关税会议等延宕欺骗的政策以和缓中国的反帝斗争，同时即勾结唆使中国军阀与买办资产阶级来破坏并压迫群众的斗争。帝国主义一面用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诡计诱惑中国资产阶级，一面在七月四日即用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的毒计（上海租界的电气处本是垄断上海电气业的），以威胁中国资产阶级帮同压迫工人阶级。于是军阀和资产阶级都奋勇起来了，上海总商会第一步修改十七条件（六月十三日），第二步先行开市（六月二十五日），第三步压迫日厂工人上工（八月十二日），第四步与十一国上海外侨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使之封闭上海总工会。并且奉系军阀也是同样的政策，他们在七月间已经封闭工商学联合会，不准启封，以示恩威于资产阶级，同时极端戒严，压迫工人。自七月下旬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民众团体先后被奉军封闭后，天津、青岛、济南一带工人学生的群众组织，无一不受奉系军阀之摧残。一方面戴季陶、梁启超等高等华人竭力宣传“缩小范围”、“单独对英”等反动主张；另一方面工会、学生会不断遭军阀之封闭，工人学生的领袖不断遭军阀之逮捕与枪毙。在广州则有帝国主义收买失意军阀与官僚买办先谋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与反革命派暗杀廖仲恺事件之发生。上海数十万工人的罢工苦

斗，支持至两月以上，救济金日益缺乏。上海总工会始则被工贼捣毁，旋又于九月底遭奉系军阀之封闭。全国小资产阶级因受军阀、资产阶级的暗示与压迫，一方面倾向于妥协，别方面畏怯革命的斗争，于是部分的退出革命战线，不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在总工会封闭之后，自行取消工商学联合会；即各地学生群众也多畏缩消极。于是乎帝国主义列强，便又乘机加紧进攻，沪案重查便公然发生。第一次六国委员的调查，还说得比较冠冕些，这次沪案重查之后，英美日三国便一致判决五卅以来所杀的中国人都是该杀的了！五卅重查的提议（使团领袖的照会）还远在十月一日，即离上海英厂工人上工不过一星期，离总工会的被封不过两星期而已。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里的领袖地位，是何等的明显呀！同时，上海总商会在总工会被封后的第三天（九月二十三日），便开始募集所谓爱国募金，名为接济英厂工人，实则五卅以来总商会所经手发的罢工维持费，最大部分是各地捐来的，小部分是总商会办事人垫出的，爱国募金的作用，不过是为这些办事人弥补自己的"损失"罢了；况且到九月二十七日，上海的英厂工人，已经因总工会的被封，失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指导机关和自己的组织，因为总商会克扣募金，不发维持费，又被压迫，"调停"而上工了！资产阶级的妥协当然再明显也没有，外交部与总商会口头上尽管抗议沪案的司法重查，实际上他们每一步的行动都是成就帝国主义的沪案重查的；而小资产阶级的犹豫退缩懦怯，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策略的实行中所必要的助力——因为他们可以减杀革命派方面的势力。蓬蓬勃勃的五卅运动受着帝国主义、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多方面的摧残，便暂时受着一个顿挫。

在这里我们可以插进去说一说五卅事变后的九七屠杀事件。

九七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有示威运动的表示。当时正当五卅以来各地屠杀之后，这一个日子尤其是使中国的民众深切的感觉到列强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所以上海的民众在这一天，虽然经学联会等临时变更日期，然而始终“不期而会”的还有二十多万人，——上海的无产阶级表现他们的力量和团结，实在足以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慄慄危惧。于是帝国主义者竟又用残暴狡狠的手段来摧残革命运动了。

当九七纪念筹备的时候，据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学联会的通电和公函，明明集会和游行都已经得了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允许，并且司令部还附加了三个条件：一，演讲只许在会场内；二，传单先呈戒严司令部核准；三，开会日期地址及游行路线呈报司令部。不但如此，法国使馆的消息也说：“事前上海之中国当局曾请法总领事，谓将在中国街举行大会，并监视该会，不使有轨外行动，要求法领允许居住闸北之群众，于散会后，得由法界经过等情，法国工部局准如所请……”。从这两方面消息看来，显而易见上海的中国官厅的确事前知道九七纪念日的游行和集会，虽然与以种种的束缚条件，可是始终不敢禁止。然而群众游行之后，经过法租界爱多亚路到公共租界的时候，法国巡捕竟阻碍工人的游行，又开枪打伤了多人。于是中国的军阀官僚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唆使，借着外国老爷的威焰更进一步的压迫民众的要求，上海许交涉员不但不提出抗议，反而到领袖领事那里去，声明“出于意外”，“防范未周”，卑躬屈膝的道歉。同时，警察厅布告禁止罢工，戒严司令部重申禁止一切集会的命令，——当时上海对于廖仲恺先生的追悼大会亦在禁止之列。这明明是中国军阀官僚于事前不敢自己压迫民众，却在允许游行集会之后，中国人民又被屠杀过

一次之后，借着外国帝国主义抗议的威势，向人民开始总压迫。

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杀，是工部局巡捕开枪杀人；九月七日爱多亚路的屠杀亦是如此。帝国主义者看见五卅以后中国民众的觉悟和运动，赶紧的对中国“让步”，答应开关税会议。这一点帝国主义者桌上所抛下来的骨头，便可以使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软化，一切爱国的口头禅立刻忘掉。五卅以后的中国革命运动使帝国主义者着实受了些打击。在经济上，英日受中国排货的影响，增加英日两国的失业工人，英国在中国贸易之衰落，其每月人口商品仅及平常百分之二十。英国一百年来所经营的最繁华的香港，受广东香港罢工绝交的影响，商业萧条，几成荒岛。使伦敦邮报发出叹声，谓“一九二五年英国尊严之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甚至不得不在中国革命势力之前表示低头，公开申言：“既然不能以兵力征服中国，便只有先让些步”。而这种让步的意义就是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是为软化胁迫中国的军阀买办和资产阶级。等到中国统治剥削阶级帮助它镇压了革命，帝国主义便又强硬起来施行屠杀；同时中国统治阶级也就靠着帝国主义的威势来压迫革命。九七屠杀之后立刻开始大反动，军阀官厅禁止一切集会，禁止罢工，解散工会，……竟使蓬蓬勃勃的五卅运动受着暂时的顿挫。

然而这种暂时的挫折却并不能真正压服革命，民众方面的革命潮流并不因反动军阀摧残压迫与资产阶级之妥协出卖而消减退后。五卅运动的过程里，无产阶级的势力在政治觉悟上在组织上都是非常之膨涨的时候，国内军阀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只有使无产阶级得到更深切的觉悟：“外国帝国主义自己开枪杀人，而且雇用中国军阀来帮着屠杀；压迫禁止我们自由结社，克扣我们的

工资，保持租界制度……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而且还有中国的资产阶级！”况且中国劳动平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动机，本在于要求解除压迫剥削，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所以五卅以后，中国华商工厂里的罢工，突然由对外示威的性质，变成切实要求经济政治地位改善的罢工。——八月中旬，上海邮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罢工，便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迫之答复。随后全国电报局的罢工，天津、河南、山东的中国纱厂罢工，都是同样的性质。各地学生亦因反对学校当局之干涉反帝运动而不断发生学潮。十一月十一日，湖南学生且有反对赵恒惕、争自由的全省总罢课事件。抵制英日仇货的运动，在上海受着买办资产阶级的怠工破坏，内地如太原、福州、宁波等处，则反因此而引起学生会、国货商和洋行商的武装斗争。十月十七日，湖南还有收回大金码头的运动。同时，广州政府因廖案之发生而决心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讨伐杨、刘，肃清东江，继续又扣留熊克武，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工农的势力因此得着相当发展，省港罢工得以坚持，而且中国革命运动自从五卅屠杀之后，冲破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万里长城，深深的渗入到工人群众、农民、学生之中去。所以上海日厂罢工结束，各地的罢工运动仍不断爆发。如八月中，北京英使馆的罢工，南京工人的流血，唐山罢工的爆发等。

再则，五卅事变时期的世界史上虽然要以“中国革命”占第一等重要的位置，可是同时还有印度纱厂的罢工（九月十六日），非洲坦及尔因的罢市（七月三日），摩洛哥战争（六月二十七日），叙利亚革命（八月六日），波斯政变等，——殖民地革命已经开始世界的发展，虽然他们和中国五卅运动还不能直接联合，

还是各干各的，但在客观形势上显然已经有互相呼应的作用。

（三）反奉战争与北京政治示威运动

奉系军阀自从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之后，一直便是北方反动势力的大本营。他们极力反对国民会议，步步进逼，扩充他们在关内的地盘，排斥国民军，占据天津、保定、山东以至于江苏、上海。尤其是在五卅事变之后，奉系军阀从奉天、天津一直到上海，到处帮着帝国主义者压迫摧残革命运动，屠杀工人领袖，封闭民众团体，剥夺人民的自由，横征暴敛的搜刮，非法的抽捐筹饷，当全国民众在上海二十几万工人的先锋队之后，陆续继起的反抗帝国主义，罢工、罢课、抵货的运动弥漫全国的时候，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威权，已经开始动摇，大部分是靠奉系军阀来维持住的。全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锋——上海总工会，是被奉系军阀以武力解散的。五卅后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完全为奉系军阀的高压政策所压迫。所以在当时，奉系军阀确实是帝国主义者最有力的武器，最驯良的走狗，因此一般民众反奉的心理非常高涨。同时，因为帝国主义为要缓和中国革命运动，适有关税会议的召集，直系军阀等，为防止关会后之必有的大借款为奉系军阀所独吞起见，遂于关税会议开幕之始，由孙传芳起兵发动了反奉战争。此次战争的主要内容，自然仍旧是军阀间的循环报复战争，和以前的直皖、直奉战争相类似。直系军阀这次发动反奉战争的目的，第一是抢夺帝国主义抛下的骨头（关税会议借款），第二是报复一九二三年战败的旧恨。事实上，直系和奉系，同样都是反动的军阀，同样是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二七时吴佩孚萧耀南之暴行与五卅时奉系军阀的暴行，毫无二致。孙传

芳讨奉通电中反对奉军压迫爱国运动，不过只是利用人民反奉的心理，达到他自己乘机取利的目的而已。所以当奉系军阀退出上海之时，戒严令已经取消，而孙军驻沪后重复宣布戒严，禁止集会，不准启封上海总工会；他们一面讨伐屡次假借肃清赤化名义摧残民众的奉系，一面却赶紧对帝国主义者声明防止赤化，严拿共产党，以献媚外国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者面前争宠。所以，这次反奉战争的主要内容，仍旧是军阀战争，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它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青年团两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所发反奉战争宣言中曾经说过："此次反奉战争虽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在客观上却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估量，事实上当时反奉战争的主要内容仍是军阀战争，并不只是"搀和了一些军阀势力"，我们站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应该批评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观点）。自然这次反奉战争的性质要比较复杂些。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交战者只是直系与奉系两派军阀，可是这次反奉战争的反奉营垒方面并不止直系，还有国民军、国民党，但是作战的主力依然是两派军阀，并没有实行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革命战争，甚至连这个口号在当时都还没有积极提出来，所以这次反奉战争显然还说不上是"民族解放的战争"。不过因为在反奉战争中统治阶级非常动摇，革命运动又得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所以战争刚起于上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数万群众的集会，反对关税会议，反对沪案重查，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启封工会及各种民众团体，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权，其他各地亦都有示威运动。此种民众势力之兴起，更加促成奉系军阀内部之分崩瓦解，于是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一

九二五年十一月下旬）。在当时，这种军阀统治动摇、分裂，五卅后革命斗争积极发展的时候，如果在革命势力方面，能够得到正确的领导，对于反奉的军阀不存幻想，在策略上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而能更积极的发展革命斗争，积极武装工农群众，实行变军阀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革命战争；同时更严厉的督促国民党、国民军，并批评他们的动摇妥协，一定还要造成更广大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战争运动，使国民革命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罢？但是当时没有这样做，工农贫民群众还没有武装的积极行动，国民党、国民军犹豫妥协的倾向则非常厉害。所以反奉战争得着胜利之时，并没有能够使国民会议实现，反而酿成军阀势力重新结合、军阀专政重新巩固的局面。

不过无论如何，当时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与要求，毕竟是扩大的形势，因之接着就有十一月二十八和二十九日北京革命示威运动和上海、武汉、长沙、开封等处相继而起的倒段示威运动。自从关税会议开幕时（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民众示威，在新华门与段政府卫队冲突后，一般人民便十分愤慨。至十一月十日，遂由全国学生总会（正值大会开过之后）与广州外交代表团等数团体，发起一个“关税自主示威运动筹备会”，即于是日举行一次示威运动。北京总工会亦于是日举行升旗礼。自是之后，“筹备会”屡次集议，决定以后进行方针，议决发出通电，主张全国革命民众要致哀的美敦书于段政府，令其即日下野出京。但加入此筹备会之国民党右派团体，见革命空气太浓、于己不利，遂开始阴谋破坏，结果终于联合少数团体退出筹备会。退出之后不久，政局突生变化，郭松龄倒戈及曾毓隽，（段执政之亲信）被捕，表示段张势力已如日西落了，右派团体

见有利可图，复又加入筹备会。大众当时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召集群众大会，举行示威运动。二十八日下午一时，所有群众即齐集于神武门前。到者以学生工人为最多。北京总工会领导多数工人臂缠红布参加此会，主席宣布开会后，群众即喊着“打倒段政府”、“打倒奉系军阀”、“组织委员制的国民政府”等口号，并整齐队伍向段政府行进。当时执政府已停止办公，群众遂转赴段氏私宅。至时，有国民军把守不能入内，群众不得已转奔章士钊宅大打，李思浩、梁鸿志、曾毓隽等宅，各光顾一次而散（但各宅早知风远飏、空无一物）。

二十八日的运动，民众原定计划并未能达到。其原因乃系当时国民党右派之破坏与国民军之妥协反动。国民军对于段氏保护周至，出于群众意料之外。二十八日的大势既去，二十九日的示威运动亦无补于事，结果只打毁一家反动的晨报馆。这次示威失败所得的教训，就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依据在广大民众之基础上，军事投机与阴谋政变是不能解决革命任务的。

北京示威之后，接着其他的都市如上海、南京、开封、长沙、汉口等处，皆有广大群众的示威运动，喊出同样的口号。上海当时除十月十二日举行过一次反对沪案重查的群众大会，十一月二十九日有五卅流血半周年纪念会，十二月六日又有倒段反奉市民大会。

（四）日本出兵与北京三·一八惨案

北京政治示威虽然没有积极的成功，但是因为各地群众起来反段、反奉的结果，使得数月以来在遭遇奉张军阀阻遏摧残之民族革命的巨流，又重新活跃起来。帝国主义看见中国民众革命势

力的发展，自然非常恐惧。郭松龄的倒戈反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又很不利——郭松龄倒戈反奉，客观上受了些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及中国民族革命潮流动荡的影响，很有些反日的色彩。自郭松龄出关以后，几乎攻无不利，战无不克。锦州下后，张作霖已准备孤注一掷；迨十一月二十一日占领新民府后，郭军乘胜追击，越巨流河，抵大名屯，捣破奉系军阀的老巢已是指顾间事。于是一向做日本帝国主义工具的奉张及安福政府，不得不公然跪在日本政府面前求援了；一向替奉张安福系保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就公然出兵援助张作霖抵抗郭军了！当时公开出发的日军已有二千五百人，而且继续进兵，同时在奉天的日军已占领省城兵工厂及子药库；日本政府且公然宣称："据朴资茅斯条约，日本有权在南满驻兵一万五千"。日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次郭张战争中，一方面供给张作霖军械子弹，为张作霖运筹帷幄，公然以日本兵乔装助战。郭兵到白旗堡时，日本关东军司令乃下令以八十余乘飞机，向郭军抛掷一百磅重之炸弹，使白旗堡周围三十里，毁为焦土。一面又以"南满附属地不得干犯"为理由，阻止郭军前进，同时即从郭军左侧面，以日本所乔扮之大军压之，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郭军即已失利，二十三日遂一败涂地而不可收拾，二十四日郭松龄遂以被杀闻。郭败之日，亦即李景林在天津溃走之时，李则由天津日领以巡洋舰送往青岛，安抵济南。两相对照，更可看出日本帝国主义之阴谋。

日本进兵满洲，扑灭郭松龄势力之后，复进而号召张作霖、吴佩孚的联合，假手于张作霖，助吴佩孚以巨款，并且供给张宗昌、李景林军械子弹、军事人材，以图根本消灭当时所谓赤化之国民军。在此时期，革命民众仍然毫不退后的向帝国主义者施行一

致抗御与反攻，反对日本进兵满洲与反对奉直联合，打倒张作霖、吴佩孚的呼声与示威行动普遍全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运动，亦相继从事于恢复与整顿。督促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解决反动军阀的呼声，不断从各地人民团体中发出。而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勾结，一致进攻革命的势力却更大。吴佩孚自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出结束反奉战争的世电之后，即积极进兵河南，于是国民二军失败，国民一军频于危境。再则当时英、日、张、吴联合战线的后顾之忧，便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所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九日驻京英使通告北京政府，谓广州政府煽动香港罢工，中国政府（即指北京政府）如无制止能力，英国决定自由行动，以武力纠正。并谓，已预备每日以百五十万元充军饷，将来由关余扣偿。二月二十一日，广州税务司又借口罢工委员会纠察队截取未验货物，停止验放船只，封锁粤海关，以控制广州国民政府。在北方，帝国主义更唆使直鲁联军、榆关奉军、山西阎军，及靳云鹗的军队，四面八方压迫国民一军。当国民一军连胜直鲁联军转危为安时，斜刺里忽然伸出日本舰队，为张宗昌、李景林之应援，勾引奉舰袭取天津，不成则用公使团的哀的美敦书以为威吓。于是国民军完全失败。于是时局急转直下，而有北京三·一八的惨案发生。

自从国民军失败之后，反动的空气笼罩全国，帝国主义军阀及其他一切反动势力均急起利用此机会，全体动员与革命民众宣战。当时国民军在事实上并不是真正革命的武装，冯玉祥及整个国民军在当时也并没有真正革命的认识和要求，不过因为他们当时的地位站在反动军阀张、吴的敌面，同时又因为民众革命潮流的高涨，革命势力的扩大，逼着他们不得不接受一些革命的口号，去抵抗张、吴军阀，然而这种条件在客观上又确实可以帮助

革命的发展。所以当时人民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言论集会尚可不受干涉，工农运动比较可以自由发展，以如当时在天津、唐山、郑州的工人运动及河南、直隶某些区域的农民运动都很有些发展。仅在河南一省，就有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协会会员和六万多的农民自卫军；而且当时国民军将领邓宝珊、李仲三等，曾两次通电主张推倒祸国殃民的段政府，赞成召集国民会议。这种表现虽然在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是为解放中国，而在客观上则很可帮助革命势力的发展。而且国民军当时比较接近苏联，至少在当时，国民军还没有帮助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反对苏联。因为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当时帝国主义和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如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等，都说国民军赤化，甚至把冯玉祥当作"赤化将军"看待。所以当时国民军的失败，确实可以助长反动的气焰。当时在北方，既有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阎锡山、靳云鹗对国民一军联合进攻，又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辛丑条约团之最后通牒。在南方，英帝国主义既借税务司利用中国海关封锁广州海口，香港增加警备队，沙面又增加军舰，加紧进攻国民政府。在上海方面，帝国主义既于十二月十七日指使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帝国主义既在关税会议之后，再用法权会议等把戏收买中国买办和资产阶级；一方面，上海工部局又在三月十八日（三·一八惨案的一天）宴请高等华人，以笼络中国买办和资产阶级以谋消灭革命。在那一次宴会中间，上海工部局总督费信惇，曾大大教训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训导他要和帝国主义者"合作"消灭革命，扑灭赤化。此时，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不但是有计划的进攻，而且采用非常露骨的政策。关于这，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字林西报》

（英国帝国主义的喉舌）所发表的一段伦敦通讯（这一段通讯应该编入历史的文献，因为它是我们研究历史唯物论时一种很有兴味的材料），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概念：

英国进攻中国之计划

干涉中国，扑灭中国民族运动的战争计划，已经过详细的考虑，其范围尚未为外间所完全了解。外交界有两种意见的争执，一派相信'协商'，即会议许诺延宕，可以恢复英国在华的宰治，而另一派则唯信赖武力。依专家的计算，征服中国只须用十万军队，半可由印度（该处有八万英兵）调遣。香港的警备亦已增强。此战争的计划，进攻中国，分南北二部，多数军队将配置于天津、上海之间。第一部分军队将在天津上岸，将力求早与冯玉祥决战，且已获得张作霖之默许。在汉口，只需数兵舰，即可征服。此外，英兵一团从沙面上岸，辅以数月来从各地调集之军舰巡洋舰，即可向广州进攻。

依财政专家之计算，战争目的达到，战争停止以后，英国可以攫取中国的铁路，英国人民的纳税可以减轻。假定此战争需时二年（亦即从前干涉俄国所需的时期）以克服中国，军费每日十五万镑，此数可由将来全国铁路抵押给英国时补偿，但必须再投资五十万镑，加造铁路，自今之七千英里，增加至一万二千英里。届时中国既已完全战败屈服，租界割让均有增加，则各银行得英国国家银行之帮助必乐于投资。况今汇丰银行行长，亦为英国国家银行董事之一。

因为邮电可施检查可以控制，大部分战争行动，可

以在英国工人及别的激烈团体知道消息以前，迅速有效的实行。

目下英国国家银行已寄款六十万镑，交汇丰银行，以为在东方开始广大宣传，战胜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维埃宣传的费用。

英国帝国主义用十万大军进攻中国的计划虽然不曾实现，然而它那六十万镑的宣传费，在中国却真发生了效力，所以当时反赤运动和反赤团体盛极一时，他们此项组织，计有两种：一是国际的，一是中国的，国际的组织据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译载上海《字林西报》的新闻说："本埠各国人士，组织一护宪会，以抵制过激主义。十二日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钟，在夏令配克影戏院开第一次英语大会，演说者有霍守华、琼斯裴德等。同时并在日本俱乐部开日语大会，在法国总会开法语大会。按护宪会系一国际团体，其总部设在上海，于中国各大都会均设立分会。四月间在上海开全中国大会，香港、广州、汕头、天津、汉口等处，均将派代表出席，其目的在使公众咸知过激主义之危险，计加入此会者已有十五国，上海总委员会之组织，系每国各推代表二人，内分十股云。"

中国的组织，就是所谓反赤大联盟，领袖人物是章太炎、尤烈、徐绍桢、魏邦平、冯自由、居正等国民党前辈。此外还有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国民制赤会，人权保障会，中和党及对俄外交协会等，都是专作反赤运动的机关；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更成立在反赤大联盟之前，在中国可算是反赤团体之前辈。当时反赤机关报除《醒狮》之外，还有《中国报》、《独立报》、《正论周报》等。当时他们反赤的对象就是苏联及中国共产党、国民

党、国民军等。他们竟在日本出兵满洲时，忽然反对莫须有的俄国出兵。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要维持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只可伏伏贴贴做奴隶，不许争斗起来要求解放。

现在我们应该说到北京三·一八惨案这一严重的事变了。

上面所述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便是造成北京三·一八惨杀的政治背景。没有日本出兵满洲，帮助奉张击败郭松龄；没有英国以大批军械帮助吴佩孚攻打河南，日本以大批军械帮助李景林、张宗昌攻打直隶；没有帝国主义号召组织反赤运动，英国封锁广州，日本炮击大沽炮台，即不会造成三·一八时英、日、段、张、吴联合屠杀中国民众的时局。

段祺瑞对民众的大屠杀，早已下有决心。据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上海商报电讯："此次惨剧，政府早有决心，据知内幕者云，贾阁上台，正与列强进行大借款，约有五千万，须以防止赤化为条件，卫兵开枪，可藉以表示反赤"。加以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群众，过去一年来为纪念"五七"纪念，为反对关税会议，为实行首都革命，有三四次与军警冲突流血，段祺瑞的统治因此日在动摇之中，使他更加恨入骨髓。所以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工人、学生、市民数千人，为反抗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游行示威，向国务院请愿驳覆通牒，段祺瑞就野蛮狠毒的下令卫队开枪，轰击十余分钟之久，惨死者五十余人，伤者一百余人。段祺瑞的凶横狠毒竟超越五卅屠杀与二七屠杀的刽子手而上之了！

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各地民众虽也震动起来，开会，通电，游行，示威，表现群众"同仇敌忾"之心。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进攻的总计划已得着部分的实现，特别是收买高等华

人，组织反赤运动的影响。所以五卅惨案发生，举国民众差不多一致的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均次第实行，给帝国主义一有力打击，赢得帝国主义某种程度的让步；而在这一次，惨案发生的第二天，舆论便大不相同，高等华人及一般舆论界不但不反抗帝国主义者假手段祺瑞的凶暴惨杀，反而攻击示威群众的领袖。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宣言，竟说"鼓吹赤化"的共产党亦是北京惨案的负责者之一，竟敢轻轻替帝国主义与军阀脱罪！上海民众反抗北京屠杀的时候，上海总商会公开宣布"暂停办公，绝不参加"。这一切种种的阻挠破坏，便使各地民众对于北京屠杀除追悼抗议之外，不能更前进一步去奋斗——这是五卅运动以来一个重要的阶段。从五卅屠杀到北京屠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经过了极辛苦的过程。最初在五卅发生二月之内，是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勇猛进攻，帝国主义退守；以后是帝国主义反攻，得到部分的胜利。自反奉战争爆发，直至郭松龄失败，是中国民众向帝国主义第二次进攻，尤其威胁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存。以后日本进兵满洲，英、日、吴、张联合，又是帝国主义二次反攻，这次反攻竟得到不少的胜利。北京惨杀，便是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对革命民众反攻之最露骨的表现。

第三节　三月二十号事变与广东北伐

（一）东江胜利后之广东

前面一直都忙着去探究五卅运动的重要流变，对于广东的情形很少说及，广东在当时乃是革命的柱石，现在我应该抽点笔墨

来叙述一下广东的情形。

在讨伐杨、刘以前，广州政府完全建筑在西南小军阀及买办阶级的势力之上，因此苛税杂捐拉夫开赌，闹得一塌糊涂，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叙述商团事变时那种形象。广州国民政府之正式成立（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实际上是五卅怒潮涌现出来的。杨、刘败后，国民政府虽告成立，但反革命派尚麇集广东，日谋危害政府，所以又有廖案之发生。但在这一时期，因为工农革命势力已有相当发展，所以能够帮助政府剿灭反动势力，而且督促政府废除了苛捐杂税拉夫开赌等秕政，谋得军政财政之统一；对外则工农群众与国民政府一致与香港政府斗争，省港罢工成为五卅运动中最坚强持久的战斗力量。

肃清东江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很有它相当的地位，在这次战争中，敌人对待革命政府的计划非常周到。香港政府公开的送三百万子弹到汕头，港商资助陈炯明百万多现金（内中有一部分也是英人拿出来的）；段政府帮助陈军三十万元，又派遣海筹、永绩两舰助战。粤军二三师驻防石龙、增城、东莞，即与陈军联合一致。如党军出征，则可让其过路，而截断其归路，川军则从北江顺流而下，以攻省城；南路同时进攻江门；用北洋兵舰从虎门或横门，进扰黄埔及广州。同时勾结土匪，扰乱中山、顺德、南海、佛山、九江及其他多匪地段。国民党内部反动分子谢持、石青阳、许崇智等，更多方勾结广州反动军队，候在党军出征东江时，起来叛变。因此逼使革命政府不得不首先肃清内部，然后再以全力对付东江。东江作战计划，是想剪除敌人，不使逃窜，故取包围形势。同时以二三两军解决川军，乘川军丧失主帅，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袭击。至于中山、顺德等处扰乱，政府置之不

理，只用李福林军队以为应付。虎门则布置安放水雷；横门则用废舰及黄石堵塞。革命政府此种计划，完全实现。东江方面共缴步枪八千余枝，机关枪五十余挺，大炮五十门，陈军二千亦为福建民军缴械。其他各路敌军亦次第剿灭（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初旬）。广东内部统一之后，整顿财政亦很有成效，因此广东政府地位逐渐提高起来。而且自从东江、南路收复以后，罢工纠察的海口封锁线也扩张了：从前纠察队封锁海口，仅限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圳，西迄前山。现在则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了。香港政府至此态度为之一变。报纸都骂陈军"抢了就跑"，并盛称"国民政府的人是受过教育的"。香港政府知道用陈军来解决罢工的政策（和上海帝国主义者利用奉军压迫罢工一样）已失败，势非与广东国民政府直接交涉不可了。

（二）国民党第二次大会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陈炯明等更乘机向广州政府反攻。段祺瑞亦收买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组织国民党俱乐部，实行破坏国民党。帝国主义、军阀见此"老头子"晚年倾向"过激"，咸祝其早死，以为他死了以后，国民革命运动就可因此瓦解。但是事实驳斥了反动派的幻想。孙中山逝世后，中国革命潮流不但没有降落，反日益高涨。五卅怒潮就是孙中山死了以后才泛滥起来的，广州国民政府也是孙中山去世之后才出现的（孙中山的广州政府，当初并不叫国民政府，而是大元帅府）。

国民党自第一次至第二次大会，内部经过激烈的斗争，经过数度的分化。在前面第三章第五节中，我曾经说过，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早已崩溃瓦解，直到一九二四

年改组，共产党加入之后，才勉强有成为国民革命政党之趋势。也直到中国共产党替它定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政纲之后，才在三民主义之中充实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于是党内斗争和分化也就跟着激烈起来。中山死后，国民党极右派便正式分化出去，而且他们自己另立组织：北京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上海的辛亥同志俱乐部。自五卅运动的高潮，表现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豪绅资产阶级急急危惧起来，于是又有西山会议及孙文主义学会之出现（一九二五年底）。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开幕。共到海内外代表二百五十八人，通过实行中山遗嘱，诚意联俄，联络被压迫民族，抗议日本出兵及处罚西山会议派等议案。这是中国国民党最后一次革命的大会。从此以后，左右派的斗争更加激烈起来，形势便急转直下而有三月二十号事变发生，中国资产阶级便开始反动了。

（三）三月二十号事变

刚巧在三月十八北京屠杀的时候，广州三月二十号事变也同时爆发出来。三月二十号事变的事实经过，据蒋介石自己当时对军事委员会的呈文，是：

> ……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

速之处置，一面令派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暂行权理舰队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

另据上海新闻报通信，则云：

蒋介石……乃往见汪精卫，告以共产党之计划与举动，决用严厉手段处分共派，汪甚惊讶，颇主郑重。蒋不允，汪喟然。蒋曰，今日下午二时在造币厂开会，今时已至，请公偕往。汪本抱恙，至是不能不同去，少倾，谭组安、朱培德、吴铁城、古湘芹等均到，蒋即报告共派异动事实，及处分共派办法，谓征求各位同意。各人面面相觑，不敢发言。良久，谭组安始期期言曰，政府及公待共派已仁至义尽，而共派竟有此项异动，介公如此对待，诚不为过。但亲俄政策为先总理所决定，恐如此对待，有碍中俄邦交，故某以为宜分两层办理，最好不要牵涉俄人。蒋大声曰，此次若不如此处分，恐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各军，广东地盘，已非国民党所能有矣。众见蒋主持坚决，亦遂不持异议，故此会议结果，完全照蒋提议通过，蒋回后即发命令严密进行。

事变起后，蒋介石黄埔军队即于短时间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东山俄人住宅，宣布紧急戒严，断绝省内外交通，逮捕李之龙及各军党代表等五十余人。及共产党表示一再让步之后，事变才告结束。这一事变绝不是由于共产党阴谋倒蒋而起，——共产党在当时不但没有倒蒋的“阴谋”，而且当时共产党的中央正做着资产阶级的尾巴，拚命盲目的拥护蒋介石，就是李之龙调动中山舰的事，后来事实证明也是由于欧阳格、欧阳忠的陷害。当时

上海申报通信中曾说："此次之事件，系为民党中之右派反赤运动。"时事新报通信也说："据可靠消息，政变系孙文主义学会主动，拘捕党代表，包围罢工会，皆该会军人所为。"所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邹鲁、谢持、沈玄庐等，在上海大开他们的"二次大会"。听到广州事变一起，便欣欣然决定"移粤开会"，可见都是有计划的举动。因此这一事变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当时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合于它一个阶级的利益。

本来，从五卅到三月二十号事变这一过程，资产阶级曾利用工农力量打击豪绅地主。显明的事实是西山会议问题，西山会议是代表地主豪绅的。资产阶级对西山会议是用戴季陶的路线。戴季陶起初是西山会议发起人，但当他走进会场时，觉得当时就公开出卖革命还太早，对于国民党很有损失，所以又退出来。蒋介石在当时已经反共反汪，但他为夺取领导权，又不得不联共以反胡、反西山会议，暂时利用省港罢工。一方面自己积极布置而表面上仍叫"世界革命万岁"，就是上海总商会虽然已经勾结奉鲁军压迫工人，但在表面上仍要启封工商学联合会，结束英厂罢工，继续与工人发生关系，——一面卖工人，一面骗工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资产阶级开始与无产阶级斗争，但是资产阶级还不能公然反对无产阶级，甚至还要利用无产阶级去反对豪绅地主。这一时期发展到最高点，是国民党第二次大会，在会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对付资产阶级，反对一切反革命势力时期，二次大会后即以三月二十号事变结束。

三月二十号事变时，最可注意的是：（A）三月二十号以前，无产阶级力量已有很大发展，农民力量也发展起来，无产阶

级斗争已开始在经济上反对中国资产阶级。五卅后罢工不断发展，工会的组织也不断发展，在国民党二次大会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包含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这种事实在前面几节中已说得很多。（B）同时农民运动已由开始组织进到武装斗争的时期，当时广东一省农民协会已经有六十万会员，在这一时期已经提到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最早是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东江战争时提起过，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五月国民党中央会议中汪精卫所提的草案；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之后，广东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执行得更坚决，——土地问题已由私人的外交问题变为群众的斗争的问题。（C）资产阶级已经要得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去反对地主豪绅，同时反对无产阶级。例如当时黄埔发生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黄埔军校已经由第二次大会前左派空气笼罩的情况，而转到资产阶级思想及组织上找得了基础，孙文主义学会就表明资产阶级怎样抓住军权。这种形势就表明工农的力量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也正在准备进攻武器。——在第二次大会前，资产阶级还是不敢反动的，并且还要借左倾的空话去打击旁的军事力量。当时国民革命军力量还只是自己发展，够不上与无产阶级斗争，所以国民党二次大会还能够通过左倾的宣言及决议。但是形势既然一天天紧张起来，事变就很容易爆发。到了三月二十号，上海大罢工已经终了，郭松龄已死，国民军已退至包头，帝国主义新式进攻的计划已经部分实现，因此紧接北京三·一八屠杀之后，就发生广州三月二十号事变了。

（四）反革命战线的破裂与罢工及一般革命运动的发展

前面各篇曾经说明帝国主义军阀的联合战线，利用买办资产阶级的自私与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妥协，积极进攻并拆散破坏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帝国主义这种精明的策略，实行起来又逐步的有些得手。北京屠杀之后，中国——尤其是北部的民众运动，自然要受着一时的压迫，而不能立刻有广大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这着得意棋子，却并不能根本扑灭革命运动。北京屠杀之后，我们首先看见帝国主义、军阀反革命战线的开始破裂。

北京屠杀之后，奉系军阀带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威势，迅速地攫取中央政权。可是李景林暗联吴佩孚的倾向，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张李内讧阻挡奉系军阀的前进。同时，吴佩孚的势力努力前进，河南寇英杰、靳云鹗的冲突，虽然暗斗，也很烈，但是靳军不久便到保定，并且已经遣派代表到北京和国民军议和。张吴之间的冲突重新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国民军与直系妥协成功，北京便发生政变。国民军将执政府武装解除，驱逐段祺瑞，同时并将幽囚北京之曹锟释放，欢迎吴佩孚入京。这种张吴军阀之间的决裂，同时便是表现英、日帝国主义间之裂痕。再则，帝国主义——军阀与中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因战胜民众而重新暴露。李景林等一到天津，便强迫行使军用票，弄得商人罢市，他们更用飞机抛掷炸弹，想焚毁北京，弄得市民团体群起抗议。河南方面，吴佩孚军队一到便勒索军饷，山东更是久处于张宗昌铁蹄之下。反革命战线不能不开始破裂。

在革命势力方面，在北京屠杀及广州事变时期，固然受着很

大的打击，但并不是表明革命潮流已经低落，而只是挫折之后的伏流昂进，又向高潮走。上海罢工最足以表明革命潮流的方向，一九二五年十月以后，罢工虽然暂时停顿，但到次年一月以后，上海罢工又逐渐发展了。据《响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一期统计，上海自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一日罢工统计如下：

产　　业	次　数	参加人数	罢工期时间
纱　　业	14	12,800	557,250
邮　　务	—	600	—
金 银 业	1	400	24,000
印　　刷	1	400	400
麻　　袋	1	1,500	4,500
袜　　业	1	700	—
共　　计	18	16,400	586,150

五月英国总同盟罢工，特别是五卅周年纪念示威之后，上海罢工更不断发展。五卅周年纪念示威时，上海就有七万余人的罢工。五卅周年纪念后，上海罢工潮流非常汹涌，五卅周年纪念后之一月内，上海竟发生一百多次的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不下七万人。根据第一百六十一期《响导》周报，一九二六年六月中上海罢工统计（原注：这是最可靠的统计）如下：

㈠　总　统　计　表

同盟与单独罢工之罢工次数	35
罢工中参加之企业总数	107
参加罢工之工人总数	69,556
罢工时间统计（以钟点计算）	3,364,622
罢工所提条件	117
胜利条件次数	49

㈡ 罢工企业与厂数

纱业	19	其他	11
丝业	62	总计	107
手工业	9		
印刷业	2		
邮电	1		
金银业	1		
烟业	2		

㈢ 罢工时间

不到半天的	25次
一天以上的	18次
三天以上的	56次
一周以上的	8次
总计	107次

㈣ 罢工条件分析

政治的	1
经济的	56
待遇的	58
工会的	2
总计	117

㈤ 罢工胜利条件

政治的	1
经济的	23
待遇的	24
工会的	1
总计	49

㈥ 罢 工 失 败 条 件

政治的	0
经济的	33
待遇的	34
工会的	1
总计	68

为什么五卅周年纪念之后，上海会有这样高涨的罢工潮呢？这些罢工的总原因乃是：㈠米价高涨（当时上海米价已涨至十九元一石），别种日用品亦日见腾贵，直接使工人的生活入於更困难之境，所以各企业工人之罢工要求，以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为最多。㈡资本家向工人的反攻，更是使工潮直接爆发的原因，当时日商内外棉纱厂已经组织法西斯蒂谋打工人领袖，各手工业主趁端节时开除工人，又如印刷业主竟因工人纪念五卅停工而罚工人的工资至二元之多，烟厂藉口出货不销而减少工作时间，少付工资。㈢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影响，亦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在资本家方面固然忌恨工人的势力（见后），忌恨工人在五卅周年纪念中所表现的伟大力量；而在工人方面却正由于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影响，深信自己的团结力量，又适逢帝国主义者与一般资本家之反攻，所以发生这样蓬勃的罢工潮。㈣工人组织上的力量与团结运动，亦是促进罢工发展的重要原因。"有了组织，便要罢工"，正是中国工人的特性。当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方谋更坚固的团结，无组织的手工业工人，亦纷纷起而作团结运动。但同时，帝国主义、资本家、巡捕房及中国的军阀官厅，都深深忌恨工人的团结而加压迫，所以工人之斗争愈加猛烈了。当时团结在上海总工会之下的有组织的工会可见下表（根据第一百六十一期

《响导》周报统计）：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内外棉三厂	1,400	崇德厂	3,450
内外棉四厂	2,100	振太厂	1,991
内外棉东五厂	1,829	丰田一厂	3,000
内外棉西五厂	1,950	丰田二厂	3,500
内外棉七厂	1,100	绢丝二厂	2,300
内外棉八厂	800	老怡和厂	5,000
内外棉九厂	3,000	新怡和厂	3,000
内外棉十二厂	600	东方厂	2,500
内外棉十三厂	1,300	公大厂	1,000
内外棉十四厂	1,300	恒丰厂	3,500
内外棉十五厂	1,500	厚生厂	2,200
日华三、四厂	3,900	上海一厂	1,800
同兴厂	2,200	上海二厂	2,000
溥益一、二厂	2,000	上海三厂	4,000
大丰厂	1,000	同兴二厂	3,000
统益厂	3,000	裕丰二厂	2,800
鸿裕厂	2,500	申新五厂	1,100
鸿章厂	1,000	永安厂	3,000
申新一厂	3,000	日华二厂	4,325
申新二厂	2,000	码头工会	50,000
喜和一厂	2,000	商务印刷工会	3,000
喜和二厂	1,000	彩印工会	2,000
公益厂	2,000	墨色石印工会	1,000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厂名或工会名	人数
上海印刷工联会	300	黄包车修理工会	100
华商铅印工会	2,000	乌木业工会	500
中华书局工会	700	菜业友谊会	3,700
商务职工会	450	洋布职工会	114
工部局电气工会	1,000	海员工会	5,000
虹口电气工会	1,000	金银业工会	1,500
英界公共汽车工会	500	邮务工会	1,550
华商电车工会	1,000	丝厂工会	20,000
茶箱工会	145	香烟厂工会	11,000
信封工人联合会	1,300	铁厂工会	2,000
固本肥皂工会	200	木行工会	1,000
洋务业工会	4,500	总计	211,204

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工人，自然形成一种伟大的力量，自然要造成蓬勃的罢工运动。甚至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都未能积极参加的闸北三十五家丝厂女工，在这时也发生同盟罢工。于此可见工会组织推进斗争作用之伟大，当时直接组织并领导这样蓬勃的罢工运动的总机关便是上海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在当时的威力实在不小，即中国资产阶级北京社会调查部所出版之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中也叹为“一时声势煊赫，为我国工界从来所未有”（见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二编第一章之第九页）。所以，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都把上海总工会看成眼中钉，因此当时上海警察厅长严春阳奉帝国主义者与中国“提倡实业者”之命，就以“煽动罢工”四字的罪名，把上海总工会封闭了。然而罢工运动还是继续发展，而且罢工工人在各种的要求之外，都特别提

出“启封上海总工会”与“拥护上海总工会”的口号。

上海之外，广东省港罢工还在继续。英国帝国主义者虽然多方设法破坏，但是罢工委员会屹立不动，省港罢工不但使英帝国主义每日损失一百八十万元，使香港变成荒岛，而且是支持并巩固国民政府的主要柱石。关于这，我们以后当有更详细的分析。此时武汉桥口英国香烟厂女工也发生大罢工（五月十六日），动因为反对添设装烟机器以裁除工人。经过多次的全体大会和群众示威运动的奋斗，摇动汉口英国新旧两烟厂男女工人三千余人和社会上一般革命民众，且还用了他们斗争的队伍，参加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直至六月三日因取得相当胜利，罢工才始结束。同时同地（桥口）日商太安纱厂工人二千四百余人因感受生活压迫与苛虐待遇，久欲反抗。六月二日新来日本工头以请酒为名，招致该厂女工头吃酒，恣情戏谑待若娼妓，致动全厂工人公愤，六月三日全厂工人相约出厂，举行罢工表示反抗。所提要求条件是一律增加工资二成，星期日作工要双工钱，不得打骂及戏谑女工，因工受伤或疾病须照发工资并给医药费及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七项条件。罢工相持一星期，始因厂方勾结中国官厅压迫及工头出卖工人利益而了结。

其次，当时革命运动发展中的又一重大事件，便是五月一日在广州开幕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劳动大会不只是个例会，而且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自五卅以来一次长期大战斗后的会议，因此这次劳动大会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大会到会代表共五百零二人，代表有组织的可统计的一百二十四万一千余工人，共四百余工会；其中会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者有两个工会，在一百以下者两个工会，在一千至三千者九十四工会，在五千至一万者

三十七工会，在一万至五万者十六工会。代表职业为运输业最多，次为食品、纺纱、织造、建筑、煤矿、印刷、手工业等。在组织上，这次大会与第一二两次大会比较起来（第一次大会有组织工人二十万，第二次大会有组织工人是五十四万），是进步而有成功的。即以罢工运动而论，一年中上海与省港两大罢工运动，固然十分伟烈，充分表现中国工人阶级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力量，他如青岛、天津、郑州、济南、焦作、汉口诸地，均有浩大的罢工运动，总次数在二百次以上，由南而北，参加罢工者过八十余万工人。

大会通过下列重要决议案：①职工运动之总策略。②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③经济斗争之最近目标及其步骤。④罢工的战术。⑤工农关系。⑥宣传教育问题。⑦女工童工问题。⑧劳动法大纲（附工会条例）。⑨失业问题。⑩合作社问题。作这些决议案的材料，指示中国工人阶级以政治经济社会与职工运动的观念和策略，有下列各种报告：①一年来职工运动之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②全国政治与社会状况。③国民政府现状。④世界革命状况。⑤世界职工运动。⑥苏俄状况。⑦全国总工会报告。⑧上海总工会报告。⑨省港罢工报告。⑩各地各代表团的报告。⑪工农兵大联合的报告。⑫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经过报告。大会对于各项报告俱有讨论与决议。决议案中最重要的要算总策略的规定，组织的方法，经济斗争的目标及罢工战术诸项。在经济斗争问题中，提出最低限度工资与最高限度工时，劳动保护，改良待遇，优待女工童工等目标与进行步骤及斗争的指导和经济的交换。罢工战术在本届大会中是一个新的问题，引起到会代表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决议案中分析罢工的性质，决定的条件，准备的步骤，敌人的破坏之估计与对策等。这些决议案性质之重

要，乃是从经验与实际中产生出来。

正当大会开幕之前一日，增加全国工人代表一个世界的新教训，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厄运再度表现，大英帝国主义国家内之总罢工爆发了。大会闻此消息后，立刻拍电表示深厚的同情与援助。在战斗中的英国无产阶级，接着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同情援助之声，一定愈加奋发！广东与香港的工人，又联合大会诸代表举行援助英国罢工周，实行号召物质的援助。尤其是粤港的工人，他们将近一年来站在英国帝国主义之对垒里，困苦艰难，自然格外的感觉欣幸。大会又特别致电英国工人，请援助省港罢工，督促英国政府承认罢工条件。这种事实，不仅证明国际工人之联合，而更证明中国工人确是世界无产阶级行伍中一支有力的军队。在英国矿工罢工以后，各国无产阶级都纷纷起而援助，但在此罢工前，远东一支有力的军队，已经八九月长期在战线上冲锋陷阵，应当为世界无产阶级所赞许且敬重的。

再则，在这里，我们还应当特别说一说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大概情形，因为这也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这次上海的五卅周年纪念的运动，差不多在两三个月以前，帝国主义者即已开始防备。前面曾经提起过的三月十八日北京屠杀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及全体董事设宴款待上海绅商领袖虞洽卿等三四十人，算是帝国主义者公开地宣布防备的第一次。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中，工部局总董费信惇有一篇很长的演说。他开始即申述关于五卅事件，华人归咎于工部局之误会（所以沪案重查判决书上，便公开判决五卅南京路上被杀的中国民众都是该杀的），工部局尚特别谦让，“为与中国人士和协起见，决定接受总巡与最有关系之总长辞职，并正式表示丧失人命之歉

意，由领袖领事转交中国当局七万五千元支票，抚恤死伤者家族，作同情之表示”；继即表示还特别开恩将要给些好处与华人，如工部局加入华董，归还会审公廨，工厂内中国劳工问题，码头捐及印刷附律问题，越界筑路问题都可从长商量等；最后并且最实际的结论就是：

“但鄙人今晚欲与诸君言者，尚非过去之事，而以后来之事为尤要。鄙人今晚欲与诸君一言者，本局之意，本埠前途尚非光明，政治上工业上皆有不良征象，或且发生不良情形，若任其自趋，则必至此。以政治言，五卅事件不解决，有人则不能知其故，有人则不愿知其故，此乃一重要之事。以工业言，情形之不稳定，未有如今日者；今后二月间之日期，亦甚为有关，五月一日为全世界劳工日，五月四日为民八学生罢课纪念日，五九为国耻日，五卅亦自具一种意义。目下已有拟议，欲使以上数日之一，作为一种时会。有数种团体自是不轻放过机会，团体之背后，必有人留意于此。今已接有消息，知近来纱厂罢工，尚属后来大规模举动之初步，我人（工部局）为应付起见，自相筹拟相对办法。鄙意诸君今晚到此者，为一班有勇气能代表他人之有势力人士，此一班人向公众声明，以正道常识公平为主张，能为公众之所信用，能为有责任之中外舆论所拥护，最要者，当不论如何，必设法以阻事势走于极端，致与公家权力复冲突之不能避免。惟有如此办法，以鄙人观之，方能防备以后数月内潜伏之危险，此外无他方法，其防范之力能如此有效。鄙人今向诸君以此为请，

此心认真，与向来谈公事时之认真，一般无二。”（费信惇演说词的全文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上海《申报》）。

从这篇重大的演说中，我们很明白地看出这个宴会完全是为防备五卅周年纪念运动的。帝国主义者自己也知道：“五卅事件不解决，……此乃一重要之事”，中国民众到五卅周年纪念时必定有激昂的表示。（他拿“高等华人”的高帽子给虞洽卿等套上，并以口头的恩惠引诱他们，与他们建立反革命的联合战线。）他教导虞洽卿等：为消灭五卅周年纪念的运动，应该及早动手，免得临时仓卒来不及应付——五卅以前之五一、五四、五九等运动就应开始一个一个地压伏下去，“近来纱厂罢工，即是后来大规模举动之初步，急应筹拟对付方法；诸君都是有声望有势力之人”，不但不应当同情于民众运动，并且应当“以口舌笔墨和缓民众之愤慨”，纵到帝国主义者再以残暴手段对付工潮及民众反抗运动时，你们“高等华人”，都应该竭力赞助。

帝国主义者自做了这个防范以后，还接着做了不少的工作：公家（工部局）私家（如联华总会）、孙传芳、严春阳及绅商学阀等，做了不少筵席的酬酢及公文上的往还，——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官厅及绅商学阀各界人士这样表示亲热是从来未有的。帝国主义者这样防范的结果，于是：

（一）军阀官厅方面，三令五申，严防赤化，加紧防务，禁止集会及散发传单，“诚恐有宵小之徒乘机滋扰，妨害治安”。

（二）上海总商会于三月十八日宴会之次日即发出一电致北京外交部，请其关于五卅案“速与使团妥商了结，伸久郁之民气，即以弭未来之隐患”。这个很明白，就是要北京外交部与使

团在五卅周年纪念以前再弄点交涉的把戏，以缓和民气。及至五卅周年将届时，总商会会长及其会董虞洽卿等，即“逃之夭夭”跑到日本，讲“共存共荣”去了。

（三）学阀方面如郭任远、朱经农等要算最卖气力，据说帝国主义者除在三月十八日宴会中普遍地向“高等华人”表示一些口头的恩惠之外，还暗地里许可这班学阀们一点特殊利益，即将来英国庚子赔款退还时，他们可以先分点赃。所以他们开始即联合上海政治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南洋大学、商科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大同大学等十余校教职员，组织各大学同志会及各大学学生同志会，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压迫学生的革命运动。他们对付学生的手段，真是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商科大学教授为学生停课援助北京三·一八惨案，以罢教要挟学生填具志愿书；同济大学校长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终至于借助军警威迫学生离校；复旦大学所附设之实验中学也为干涉学生运动，竟不惜将全校完全解散。

在这样阴霾的空气之下，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所代表的商民虽欲对五卅周年纪念有所表示，但总不敢与革命民众接近。照这情形看来，上海五卅周年纪念运动一定要被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官厅协同压迫，高等华人的破坏及中小商民的畏惧，弄得岑寂无声了！不料结果竟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不顾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刀枪，不受“高等华人”的破坏与欺骗，五月二十九日上海大部分学校即举行罢课，学生组织讲演队到华界及各工人区域讲演。下午二时，工商学各界一千余团体代表计五千余人，在闸北方家木桥烈士墓地举行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极尽悲壮激昂之概。礼成

后游行，工人、学生、市民参加者甚众，队伍延长至两里许，遍经闸北各街市，高呼口号并唱国民革命歌，全市精神为之一振。三十日，学生继续罢课，工人一致罢工者有七万余人，商店亦大半罢市，门口均贴有“卧薪尝胆，永矢勿忘”之白纸条。同日上午六时，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因欲避免与工人学生接近，单独在宁波旅沪同乡会举行五卅追悼会，到代表二百余人。同日上午十时，工人、学生及一般平民等，乃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五万余人，以工人为最多，并有日本、台湾、高丽等革命团体之代表参加。

民众方面对此五卅惨案之重大纪念，当不以仅在华界开市民大会、游行、演讲、散传单为满足，必须闯入久经封锁的“神圣”租界中，直接向帝国主义者做一次大示威。故事前各团体即商定一面开市民大会，一面即组织演讲队，分途潜至租界，到一定时间，做大规模之演讲。因此，至上午十一时许，公共租界南京路、浙江路、河南路、北京路、福建路一带，就有偃旗息鼓之演讲队陆续聚处于沿马路两旁。到下午一时许，差不多所有演讲队都布置齐了。计是日到租界有组织之演讲队，工人、学生、妇女约共五百余队，人数约三四千人。在一时半以前，因罢市及戒严的关系，清亮的马路中，行人甚少，只西人的若干汽车及半空的电车往来巡梭，而沿马路之两旁驻扎演讲队宛如两道大黑线，实是别有一番森严的气象。英捕见人愈聚愈多，虽欲表示解散，但仍强顾相笑，不敢干涉。至一时四十五分钟时，突有邮务工会自行车十余辆往来飞跑于清亮的马路两次，皆手持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义义！”两旁群众陡然应声而起，掌声如雷，于是一般市民也蜂拥而至。约至二时，各马路演讲队，一齐展开旗帜，放声演讲，并

大放传单，观者如堵，各马路几为之塞。原来很冷静的马路，至是沸腾起来了！同时由西门公共体育场出发游行之群众，亦开始冲入租界示威。青年女工为先锋，极为勇敢，与巡捕小有冲突，即已撞进。二时十分，群众已满布于南京路、汉口路、东新桥一带。此时去年今日流血之南京路、浙江路交界处，已聚集有二万以上之群众。电车、公共汽车、马车及人力车均停驶，群众即将车箱两旁糊上“继续五卅运动精神”等标语；一片呼声及击掌声如雷响一般，自群众中发出。更从数商店之楼头飞下雪片似的传单，全地面均笼罩在紧张的革命空气之中。一种悲愤之情绪袭人欲狂！最先，无数西捕及印捕向群众和平劝阻，迫令散去，后来此等西捕被卷于人海之中，自己亦不能自主。二时三十分，突有铁网囚车数辆从西面飞驰而来，车上架有机关枪，并有中捕、印捕各十数人；各巡捕下车后，即由西捕指挥，向群众作射击状。示威群众则更加愤激，在街巷中用砖头、瓦块、木棍等与巡捕搏战，屡退屡进，直至帝国主义者放枪，放水冲射，都不肯退却，直至晚六时许，群众才逐渐散去。在新世界门前，在东新桥等处，群众与巡捕均有冲突。当日下午在租界被捕者工人学生及市民先后共十余人，华人受伤者十三人，外人受伤者十九人，但均极轻微。租界电车玻璃窗被击毁者计六十九辆。二时以后，公共租界电车及公共汽车均停驶。

这次五卅纪念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中是有重大的意义的。五卅运动初起时，全国民众都风起云涌，本已使帝国主义者脚忙手乱，其后经帝国主义者多方举行反攻。一方面积极勾结奉直军阀，在政治上造成反动局面；一方面号召并组织反赤运动，[8]诱惑收买资产阶级，使之帮助帝国主义者压迫民众运动。然

而五卅事变发难地的上海，仍然发动了如此壮烈的纪念运动，而且与敌人开始了巷战，虽然帝国主义与军阀的防备那样周至，而革命民众毕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在示威中民众反抗能力比之五卅运动时有增无减。这样鲜明的示威行动，足够使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胆战心惊。

在广州，卅日正午，东校场所举行之五卅周年纪念大会，参加群众竟达二十万人，西关民众且于五月三十日上午先开一纪念会，参加者五千余人，会毕巡行，齐赴东校场参加纪念。西关此种大运动，为五十年来所未有。其他如南京、杭州、宁波、厦门、安庆、芜湖、九江、苏州、嘉兴、北京、汉口、开封、郑州等处，虽不若上海、广州之热烈，但也都有各种纪念运动。

一切这些事件之外，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还有如下事实的表现：比如三月九日湖南的驱赵(恒惕)运动，在运动中曾经召集过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一致通过政治主张二十一条，并组织人民临时委员会为督促实现的机关。政治主张中最重要的是：打倒赵恒惕，反对联治及废除省宪解散省议会；讨伐吴佩孚，拥护国民政府北伐；速开国民会议，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启封一切工农团体；财政统一，废除苛捐杂税等。再则，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前后，各地反对北京政府借款卖国，反对卷烟税，反对宅地税，反对增设烟酒厘卡，反对增加米捐，反对房捐带征保卫团经费等，都充满了怨愤不平的呼声。五月一日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开幕的，还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至于反对中外官厅护庇烟土，反对增加房租，要求抑平米价，更成了一般平民普遍的运动。四月间，浦东塘桥乡，竟因巡警强迫征收门牌费，惹起了数千人的暴动。

（五）国民党五月中央全会与广东北伐

此时，工农革命势力仍旧向前发展，而另一方面，三月二十号事变之后，资产阶级更积极向无产阶级进攻；因此，又有五月十五国民党中央全会之召集。开会之初，广州城内即满城风雨，蒋介石等一面四处散布“共产”谣言，广州中央银行也发生挤兑，多方威吓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一面即在会议中提出所谓“党务整理案”，其中重要之点即是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占委员三分之一以上，共产党员不得当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他党加入国民党者须将其原存党籍报告，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及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之训令，须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等。总之，无一不是对共产党威吓挑战，共产党与左派在事前毫无准备，甚至亦未估量到此。所以结果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等主张完全胜利，因而军权、财权、党权，全被蒋介石攫夺以去。于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遂一手握着军、政、党的大权而举行北伐了。

讲到北伐，我们须得稍稍说明它的历史根源，原来中国近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是由南而北，由海滨而陆地。在古代的中国经济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并且其发展趋势是由北而南（指唐宋以前），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完全建筑在自给的农村经济上。及西方帝国主义将它们的商品源源输入以后，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商业发展便一日千里，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并且逐渐开始了近代产业的产生，使旧时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受了很大的打击而流于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

如华侨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兵匪以及少数工人，便成了革命的种子了。而在北方，虽然沿海、沿铁路的地方，如山东、直隶、奉天等地，商业亦颇发展，并有不少的近代产业，可是比起长江和珠江流域究竟幼稚得多，尤其在整个的经济制度上，无论如何，北方比南方总要落后一些，北方的封建势力比南方总要浓厚一些。在政治上，中国历代封建势力（自满清政府至北洋军阀）的根据地又都在北方。这样便造成一种“北伐”的根源。所以“北伐”这个口号并不是新的花样，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好几次。太平天国之北伐，姑且不提，单就辛亥革命以来，便已经有了三次：（一）辛亥革命军的北伐，（二）民六南方护宪政府之北伐，（三）民国十三年江浙战争时孙中山之声言北伐（彼时在北伐的本身力量上虽然有点滑稽，但孙中山确曾发表过北伐宣言，并进兵韶关，后因商团事变发生，乃将出发韶关之北伐军调回）。此外如民四西南讨袁称帝之役，虽然没有北伐的口号，也可以说带有北伐的性质。这些北伐显然是南方军阀、买办及资产阶级，利用豪绅地主军阀力量去反对北洋军阀的有力表现。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广东北伐（一九二六年）自然也有这种历史根源，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革命到了五卅之后，已经开始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乃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的主要社会基础。表明工农群众已经要在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扩大自己的组织力与战斗力，使中国革命勇猛前进，向着与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决一死战的时机方面去。加以当时英日张吴为缓和及弥缝自己反革命联合战线之

破裂，乃决定分讨南北赤化势力，支配直鲁联军向南口进发及吴佩孚进兵湖南，吴之进攻湖南，不用说其目的地乃在广州。广州国民政府为防御“南伐”，亦不得不举行北伐。但是这次广东北伐的根本意义，乃是继续五卅运动，并且是五卅运动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四节　自广东北伐到汉口九江租界之夺取

（一）北伐军占领长沙武汉

北伐开始以前，资产阶级惟恐革命超越了它的阶级利益，企图首先夺取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发展在它自己的控制之下，还举行了三月二十号事变及五月十五日的国民党中央全会。共产党以继续退让来应付这种严重的事变，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遂一手握着军政党的大权（六月五日广州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下之海陆航空各军，悉归其统辖；他如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厂等机关，均直属于总司令部。且自北伐动员令下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以外如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军人部，俱以蒋介石为主席为部长。）而举行北伐了。但是因为当时北伐的主要内容乃是继续五卅运动，并且是五卅运动更向前发展的革命战争，全国民众正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奉直军阀反赤战争的铁蹄践踏与蹂躏，所以对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都表示十分的渴望。所以广州国民政府自七月初旬出师北伐，两星期之内就已攻克长沙。

占领长沙之后，首先便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给了吴佩孚一个严重的打击，压低了吴佩孚的气焰，摇动了吴佩孚的军心，于是北伐军长驱直人，八月二十二日即继续攻下岳阳。到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纪念节，北伐军便完全占领了武汉，于是几年来偈促一隅之广州国民政府的势力便伸张到了长江，到了中国的中心区域。这在革命势力的发展上，自然有它很重大的意义。因为一则武汉据中国地理之中心，扼长江和京汉粤汉两路之枢纽，在经济上除上海外，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区域；在军事上，北可以沿京汉路直趋河南而取北京，东可以顺长江直扑皖赣以临江浙，西扼四川而南障湖南，并且有全国产量最大之兵工厂；在政治上，坐守武汉可以镇压西南而与北京对峙。二则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难地，当时革命义旗自武汉一张而全国响应，竟成辛亥革命军拥有长江以南之局面，可是自民二黎元洪投降袁世凯之后，武汉便从此落于北洋封建军阀之手，北洋军阀据此得以镇压南方革命势力；北伐军占据武汉，实际上是捣毁了吴佩孚的巢穴，结果了英帝国主义一个最凶恶的工具。

北伐军的进展所以能够这样迅速，一方面因为北洋军阀的势力之分裂崩溃，使北洋军阀不能成一整个的势力来对付北伐军；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的冲突，如孙传芳与张作霖、张宗昌的冲突，吴佩孚与张作霖与孙传芳的冲突，互相防备，互相牵制，不能大举援鄂。而且吴佩孚的内部亦号令不一，故北伐军得利用孙传芳的暂时中立与吴佩孚军队的弱点，一鼓而下岳汉。另一方面，又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互相竞争，削弱了国际帝国主义的阵势；帝国主义本国劳动运动之发展，特别是英国在当时经过了一次空前的五百万工人的大罢工，与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发展，

且因中国革命进展的影响而更剧烈，及苏联无产阶级政权之存在和发展，它在地理上又与中国很接近，——这些条件都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重大原因。最后还有一个重大原因，而且是最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全国革命民众的斗争力量。前面我已经说过，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的革命战争事实上乃是五卅运动之直接继续，从群众的反抗示威，抵货罢工，进一步而至于更高的斗争形式——武装的革命战争。事实上，当时北伐战争过程中，工农学生群众的力量确实是北伐军取胜的主要动力。此地我们不妨追溯当时几件重要的事实。

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一切夫役都由民众充当，而省港罢工工人还组织得有几千人的运输队。一入湖南，广大工农学生群众不但积极欢迎，而且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作战，株萍铁路工人且在北伐军攻克醴陵之前，即自动将敌军驱走。平江之役亦然，农民大部分都实际参加作战。故当时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也说：“此次北伐胜利夺得平江，其力量全在农民”。当时此种消息，曾连篇累牍登载于报纸，不是说：“农民大举帮助……冒弹冲锋，勇敢登山，敌兵大乱”；即是说：“农民因猛攻太甚，阵亡者不计其数”。不是说：“北乡、西乡、涪口、梓江一带农民亦纷纷杀敌”；即是说：“此次敌军被民众杀死者不下二百余人”。其“参战之猛烈，勇敢之精神，牺牲之重大，已可概见”了。再看岳州之战，“八月二十日晚，有岳平一带农民协会土著农民，侦知岳州方面之敌军，惶急万分，军心涣散，特向李军长告密，请神速攻岳，并自愿领导，由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黄芽山而扑岳州。敌军不知有此小道，故未设防御工作，比较容易得手。李军长从之，遂于二十一日黎明，

即取小道由农民领导，抄攻岳州。沿途路虽难行，幸未设防，二十一晚十时，李军长部队即抄至距岳城十里之某地，出其不意，猛力进攻。敌军惊为天降，纷向云溪路口铺、五里牌、羊楼司一带溃退。叶逆开鑫（后来也是国民党忠实同志）所部不愿与北军同退，反戈投城者二千余人。余逆阴森全部，则被截断，全行缴械。中路之李何两部闻耗，亦猛向岳州前进，上下夹攻，二十二日早，即收复岳州。”（同上）。又“据最近长沙方面调查，粤汉铁路之工友，对于敌军，曾作种种妨害其军事行动之工作，如破坏路线，截断电信等。且于长沙未攻下以前，曾提议总罢工，虽因经费问题未能实现，然其拥护革命之热诚，已足以代表民众一般之意志了”。（亦见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三日通信）。

汀泗桥一役，“北伐军连下冲锋十二次，均为叶部之机关枪队扫回。彼此只隔一桥，声问相通，卒无法越雷池一步。桥下积尸，不可胜计。直至接战之第三日，已得咸宁之右翼军李品仙师，会同七军一部，借农民为间道，竟能从咸宁取道牌州司，越岭以击叶军之背。初时叶部尚未知南军已袭其后，以为吴佩孚援兵开到，不及防。迨李品仙大队驰至，逐渐迫近，殆如飞将军从天而下，于是腹背受敌，大惊失色。此时前后夹攻，叶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叶氏几于成擒。”（见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香港《华侨日报》）同样，两汉民众也是对北伐军尽量援助的。“当北伐军于未克复汉阳之前，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为制吴佩孚之死命以援助北伐军起见，竟先行于前月一日起，全厂工人举行总罢工。及至现在北伐军克复汉阳，始实行全体复工……为革命军制造枪炮。”（广州《民国日报》九月二十与二十一两日通信）。

这些事实，虽然残缺不全，但已足以证明工农群众的斗争力量实是北伐胜利的主要原因。自然，当时北伐军兵士的勇敢作战，亦是北伐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一则五卅运动以后革命潮流的激荡，促使了大批革命青年投身革命军队，经过不断的政治工作；二则当时北伐军队的组织部分，大半都是受过一些革命影响的失业工农及青年战士，在当时他们和北洋军阀纯粹的雇佣军队自然有些不同，同时又取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因此能够杀敌致果。固然，后来资产阶级和整个的国民党，都利用了此种广大工农群众及北伐兵士鲜血所换来的胜利，造成他们妥协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地位，转而屠杀工农及一切革命战士，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便在工农鲜血之中建筑了他们反革命的宫殿。然而这并不是当时北伐战争的错误，乃是中国共产党离开共产国际的领导，忽视当时当前最迫切的资产阶级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以破坏革命，叛变革命的危险；放弃战胜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这一根本任务的结果。在北伐战争本身，恰恰相反，它是继续五卅运动并且是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革命战争。北伐战争猛烈的发展乃是表明工农群众要在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更加扩大自己的组织与战斗力，使中国革命更加勇猛前进。所以当时北伐战争的发展，事实上是做广大群众革命火药库的导火线，更帮助了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所以北伐军到达武汉不到两月，已经有三十万工人群众组织在武汉总工会之下，两湖的广大农民群众都蓬蓬勃勃的起来斗争。这些我都留待下面再说，如今且先叙述一下北伐进展中省港罢工的结束与上海罢工浪潮的发展情形及此时发生的一件严重的事变——万县惨案，

（二）省港罢工的结束与上海罢工运动的继续发展

省港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民众，在中国革命运动进程中有名的政治罢工，是五卅以后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全中国之坚持最久、使帝国主义受绝大打击的罢工。省港罢工在积极方面统一了广东，建设了广州国民政府，引起英国国内的总同盟罢工；在消极方面，毁坏了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使香港政府受了极大实际经济的损失，根据海关贸易册：一九二五年香港对华输入比一九二四年输入减少了六千五百余万两（一九二五年输入是一七二，七八九，〇〇〇两，一九二四年输入却有二三八，三五五，〇〇〇两），一九二五年的入超竟比一九二四年减少了七百余万两（一九二五年的入超是五八，〇七四，〇〇〇两，一九二四年的入超则为六五，一九二，〇〇〇两）。所以省港罢工开始不到两个月工夫，香港英国帝国主义者便说省港罢工“实公然与英国作敌，且立意破坏中英条约”。

省港罢工尽了许多任务，建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早已到了结束的时期了。勇敢而觉悟的省港罢工工友们，也早已明瞭到省港罢工是政治罢工，政治罢工与经济罢工的性质不同，故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间已愿意牺牲一部分条件取得相当胜利便可解决罢工。但是，香港政府却宁可忍受经济上的绝大损失——每天一百八十万元（这是香港政府自已说的，其实还不只此数），而千方百计想恢复大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已堕之威信；宁可帮助陈炯明和培植国民党右派的政治势力以推翻国民政府；企图用武力强迫复工，而不愿意和国民政府交涉，更不愿意与省港罢工代表直接谈判解决罢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三月二十号事变之

前，当时的政府，尚知道省港罢工是为中国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故一面极力帮助省港罢工，一面想与香港政府磋商有利的解决罢工。农工商学各界尤一致拥护罢工胜利，一九二六年二月初间曾热烈的举行过一次援助罢工周；即香港的中小商人，也知道香港政府的无理，愿意私人凑足三百万补助罢工工人，解决罢工。香港政府因慑于民众拥护罢工之热烈，不得不派人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也不禁止香港商人之凑资补助罢工工人，这是当时解决罢工最有利的时期。

然而香港政府始终无诚意解决罢工，始终想维持大英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威信，始终想扶起陈炯明、邓本殷、林虎等小军阀和当时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取得广东政权以破坏罢工。在省港罢工刚开始发动时期，香港政府即唆使杨希闵、刘震寰等与陈炯明结合，谋叛国民政府；继而运动许崇智部下梁鸿楷、莫雄、张国桢等，想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继而又以金钱枪械资助陈炯明、林虎等第二次占据东江，邓本殷、魏邦平等在南路起事，熊克武等在北江响应，从东江、北江、南路联合包围广州。幸而香港政府这种种计划都失败了，而省港罢工得以勉强维持。可是，以前各种的危机虽然渡过，而三月二十日事变又突然爆发。

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自然广东全个政局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右派乘机向革命势力进攻，香港政府又得了一个破坏罢工的最好机会。于是香港政府立刻撤退派遣前往广州谈判解决罢工的代表，禁止香港中小商人筹资补助罢工工人的行动，同时决以一千万元贿赂及一万万元借款收买国民党右派且帮助他们攘夺广东政权。依然采用从前破坏罢工的手段，而且更加厉害，更加猛进。这是从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中间的过程，这是省港罢工最

危险的时期。

五月十五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之后，国民政府另委陈友仁代理外交部长，派出政府代表三人直接向香港政府要求派出同样的政府全权代表谈判解决罢工，这已是一个让步。香港政府虽始终没有解决罢工的诚意，而表面上亦派出代表三人：一是香港政务司，一是华民政务司，一是驻广州沙面的英国领事。双方正式代表于七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了。香港政府想利用国民政府正在出师北伐，需款甚急，可以金钱收买或商量借款，所以极力离开罢工问题而单独提出交涉排斥英货问题，态度非常强硬，国民政府当时在罢工工人监视之下，虽然没有接受香港政府的收买，但亦没有坚决拥护罢工工人的利益，因此谈判又归于停顿。

七月中英谈判停顿以后，广东革命民众拥护罢工仍旧非常热烈，在八月底还举行了几十万人的拥护罢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这样自然更加引起香港帝国主义的仇恨。同时北伐军攻下岳州，革命势力向北发展，香港政府急欲乘机一面予广州以打击，为吴佩孚奥援，一面又拟制造一杀人机会，好压迫罢工。于是迭派兵舰驶入省河西堤，向工人纠察队蛮横挑战，因为工人纠察队不与冲突，所以尚未发生严重惨剧，不过排货运动不免受些打击。如此一直支持到十月的时候，一方面北伐军占领武汉，广州维持罢工的力量逐渐薄弱。另一方面，省港罢工和抵制已经延长了十六个月，武装的工人纠察队能够断绝香港与广州的联络，但是不能阻止香港帝国主义的强盗从别的地方招致新的工人。对罢工抵制的同情广大地普遍到整个东方以至于世界，但是过去没有现在也还没有强固的工人组织在南洋群众中，能够阻止无业群众向香港投来。罢工能够破坏香港的工业和商业，同时也就缩减

了资本家对于劳动力的需要。他们所必需的三四万工人，是可以从外边找到的。所以当一九二六年六月广州和香港中间的谈判开始时，谈到罢工问题，香港政府即宣言：罢工问题已成过去，香港已无庸过问了。因此为了要施展罢工工人一切革命的经验及毅力到香港新的工人群众中去，为了要在香港内部建立起像在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那样的革命堡垒，亦不得不终止罢工，于是省港罢工抵制便在十月中宣告终止了。

这次省港罢工抵制延长了十六个月。世界工人运动一直到现在还未曾有过这样持久这样广大的政治罢工。中国工人从此将有长时间去研究他们在这斗争中得来的伟大经验。省港罢工的根本特点，便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两种斗争形式——无产阶级之罢工与民族抵制之结合。这一罢工是直接联系于一九二五年五六月上海沙面青岛屠杀后之中国民族革命斗争高潮的。香港十三万工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工会指导之下，丢弃了工厂、手工场和码头的工作，并离开香港而移住于广州及广东各地。罢工工人建立起罢工委员会。这个罢工委员会在十六个月中间指导罢工工人的英勇斗争，它自身也就成了广东全省革命的坚强堡垒。罢工变成了抵制，罢工工人的前进分子武装起来并组成特殊形式的“工人赤卫队”——罢工委员会的武装队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在广东全省海岸布置了一条很长的战线，严密地封锁广州和香港中间的一切交通，不放进贩私货的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侦探到广东来。香港这个英帝国主义在东方强有力的支柱，随着有组织的工人意志而衰落了，中断了其与广州的联络——这种联络是香港在中国南部商业上占优势的原因。十六个月的长期罢工，工人竟以自己的毅力和耐性消蚀了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威权。罢工虽然终止了，但是英

帝国主义强盗将永远不会忘记了他们从省港十几万工人群众所得到的痛苦的教训。

正当省港罢工谈判和终止的时候，上海自五卅周年纪念运动开始的罢工运动却在如火如荼的向前发展。一月至六月中的罢工情形在前面已经有过详细的分析。七月份的罢工运动比起六月份来，范围更广，人数更多，情形也更复杂。在这里我们应该继续做一番扼要的叙述。

七月十一日上海总工会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当时上海工人之总要求十一条，并发布宣言，说明当时上海罢工的现象和原因，指出（一）打骂工人。（二）开除工人。（三）滥罚工资。（四）侮辱女工。（五）虐待童工。（六）大小便不自由。（七）工厂设备疏忽。——乃一般的工人所受痛苦；还有集会结社言论之不自由，工会之受摧残，工人领袖之遭逮捕甚至枪杀，更是使罢工爆发的直接原因。最后，上海总工会代表全上海工人，提出十一条最低的总要求：

㈠工资至少每月不得低于十五元。

㈡工资当按照物价至少每年必须增加一次。

㈢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

㈣星期日休息，工资照给。

㈤不准打骂工人，滥罚工资。

㈥不准任意开除工人。

㈦规定因工作而死伤之工人的抚恤金。

㈧工人在疾病时厂主须负责医治，并须给发半数以上之工资。

㈨改良女工和童工之待遇，女工在生产前后应有一月之休

息，工资照发。

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㈩工厂改良设备，如增设门窗天窗厕所等。

以上这十一条真可谓最低限度的要求了。但是中外资本家却连半条也不肯实行。他们不但根本拒绝工人米贴的要求，不理会改良待遇的呼吁，而且向工人作种种反攻，如开除歇业等。可是自上海总工会发表“上海工人的总要求”以后，在数十万的工人群众中却起了剧烈的作用，差不多个个工人都愿为此十一条要求而奋斗，一般贫民对此要求也表示充分的同情。因此罢工浪潮更不断汹涌起来。兹举七月份上海罢工统计（根据第一百六十七期《响导》周报施英同志的统计）如下：

㈠ 总 统 计 表

同盟与单独罢工之罢工次数	54
参加罢工之企业总数	3业又 105厂
参加罢工之人数	70,494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算）	6,612,197
罢工所提之条件	180
胜利的条件	60

㈡ 罢 工 企 业 类 别 与 总 数

手工业	3业又35厂	邮 务	1
印刷业	37厂	船 业	1厂
纱 厂	18厂	铁 厂	2厂
丝 厂	3厂	总 计	3业又105厂
码 头	4		
烟 厂	3厂		
染 织	1厂		

㊂ 罢工原因分析

工资的	19	经济与时间的	2
待遇的	4	经济与待遇的	9
工会的	5	经济与援助的	2
时间的	5	反对厂方用人	1
援助的	7	总计	54

㊃ 罢工胜利条件

工资的	34
待遇的	17
时间的	8
反对用人	1
总计	60

㊄ 罢工条件分析

工资的	62
时间的	18
待遇的	45
工会的	45
反对用人	7
援助的	2
求开厂的	1
总计	180

㊅ 罢工时间分析

一月以上	3
七天以上	13
三天以上	9
一天以上	14
一天以下	11
一小时怠工	4
总计	54

上列六表表明七月份上海罢工之情况，这六个表格里我们看出重要的现象是：

①七月份上海罢工总人数又超过七万。

②七月份上海罢工企业仍为百余厂，但手工业的罢工，较六月份加多。

③罢工的原因，属于广义的经济意义的（即包括工资，时间，待遇诸条件）占百分之八十。

④罢工时间较长了，在一月以上者已有三个罢工，在一周以上者有十三个罢工，而三日以上，一日以上的罢工，亦有多数。

⑤一百八十个罢工条件中，工人结果得胜利者仅六十。六十二个工资要求条件中，工人结果仅得三十四。

以上所述都是经济罢工，这种经济罢工正在继续发展和扩大，到了八月下半月，上海的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因为日本资本家对于工人之积极进攻，同时又发生陈阿棠被杀案，从八月二十日起，上海小沙渡日本内外棉纱厂工人遂又爆发了反日同盟罢工。二十日上午六时，上海纱厂总工会发布第一次罢工命令，原文如下：

> 内外棉东西五，七，八，十二各厂工友们！东洋人横暴无理，在万里丸船上，竟秘密杀我同胞陈阿棠；在日华厂中，又敢用电网害死我工友郝霍卿，三厂四厂九厂的全体工友，又备受日人无理停厂之压迫，饱尝拘捕毒打开除之苦；最近九厂工友石万才，又被毒打，生死不明。日人之种种罪恶，擢发难数！我工人为争国权，为争工人生命安全与利益，决以最后手段对付。联合各界，一致抗争。我东西五，七，八，十二厂全体工友，着先于即日起，实行同盟罢工，听候工会命令！勿怠勿

忽！切切此命。

上海纱厂总工会　八月二十日

此次首先实行罢工者，即命令中所述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十二共五厂，计一万余人。日本内外棉厂在上海者共有十一厂，上述五厂先发动，乃该五厂工会自动向纱厂总工会所要求；但在发动后数日内，其余六厂亦经纱厂总工会继续发布命令，先后加入同盟罢工。各厂发动时，多以陈案及各厂情形为准，如十三、十四两厂，于二十五日见报载陈案消息，日本总领事对陈案抵赖，及证人发表之口供，愤慨不已，即时宣布罢工。在罢工后，全上海各日厂（纱厂及纱厂以外各厂各业）工会，复举行代表会议，决议为陈案及反抗资本压迫谋自身利益起见，请求上海总工会发布全上海对日总罢工令。会议后，各处即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最初内外棉厂发动时，仅提出下列五个简单的条件：

①解决陈阿棠案，引渡凶手交中国法庭办理，抚恤被难家属，保证以后不得再有此等事件之发生，日本领事向中国道歉。

②改良工人待遇，不得雇用武装巡捕流氓入厂殴打工人及滥罚工资与蔑视工人人格（如打脚模手印等事）等。

③增加工资十分之二。

④释放各厂被捕工人，恢复被开除工友工作，以后不得任意开除工人。

⑤赔偿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三、四、九厂关厂期内工人之损失及此次罢工期内之工资，须一律照发。

可见在民族政治性的罢工中，其主要原素仍包含有经济的斗争。工人阶级之政治自由完全没有，工厂的待遇又万分苛虐，工会组织之百折不回的奋斗乃罢工的原素之一。二十日开始发动以

后，罢工即日渐扩大，直至九月十八日始被迫上工，计共支持二十八天，参加人数共二万二千六百余人，所占日厂共十二家。

以上是上海日厂工人反日同盟罢工之情形。其实在总的形势上，上海罢工浪潮在八九两月中之激荡，并不亚于六七两月。现在根据第一百七十二期《响导》周报施英同志所作六月份上海罢工之总结，简单说明八月份上海罢工之情势。先引其所作“八月份上海罢工的统计表”于次：

工厂名称	产业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	参加人数	要求条件					胜利	失败	未决
				政治	经济	待遇	工会	共计			
日华一二纱厂	纱业	648	4325		1	4		5		5	
老怡和纱厂	纱业	744	4000		3	3		6			6
恒丰永地毯厂	手工业	60	120		4	2		6	3	3	
大北地毯厂	手工业	60	150		4	2		6	3	3	
北方地毯厂	手工业	60	111		4	2		6	3	3	
公义成地毯厂	手工业	60	40		4	2		6	3	3	
义恒丰地毯厂	手工业	60	130		4	2		6	3	3	
永和成地毯厂	手工业	60	15		4	2		6	3	3	
海京地毯厂	手工业	216	240		4	2		6	1	5	
辛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11		4	2		6	3	3	
德盛永地毯厂	手工业	60	40		4	2		6	3	3	
义仁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13		4	2		6	3	3	
永大地毯厂	手工业	60	9		4	2		6	3	3	
恒记地毯厂	手工业	60	10		4	2		6	3	3	
华昌祥地毯厂	手工业	60	75		4	2		6	3	3	
同义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75		4	2		6	3	3	
同义昌地毯厂	手工业	60	15		4	2		6	3	3	
同义和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陈福祥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张德兴地毯厂	手工业	60	50		4	2		6	3	3	
文记丝厂	丝业	9	280		2	1		3	3		
花旗烟厂	烟业	72	750		3	3		6	1	5	
上海日报馆	印刷	12	5		1	1		2	2		
新怡和纱厂	纱业	10	1500		1	1		2		2	

工厂名称	产业	罢工之时间（以钟点计）	参加人数	要求条件					胜利	失败	未决
				政治	经济	待遇	工会	共计			
中华书局装订部	印　刷	276	700		4	4	1	9	2	7	
义兴印刷局	印　刷	24	45		4	2		6	6		
美华书局	印　刷	168	150		7	3		10	3	7	
中华书局总店	印　刷	3	109		4	4	1	9		9	
祥生铁厂	铁　厂	60	300		1	1		2	2		
勤华布厂	布　厂	36	210		2	2		4	3		
商务书馆铁工部	铁　厂	24			1	1		2	2		
内外棉九厂	纱　业	156	3000		1	1		2		2	
内外棉东五厂	纱　业	288	1829	1	2	2		5			5
内外棉西五厂	纱　业	288	1950	1	2	2		5			5
内外棉七厂	纱　业	288	1700	1	2	2		5			5
内外棉八厂	纱　业	288	8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二厂	纱　业	288	6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五厂	纱　业	288	15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三厂	纱　业	144	1300	1	2	2		5			5
内外棉十四厂	纱　业	144	1300	1	2	2		5			5
内外棉三厂	纱　业	120	1400	1	2	2		5			5
内外棉四厂	纱　业	120	2100	1	2	2		5			5
同兴纱厂	纱　业	96	2200	1	2	2		5			5
南北市装订业	手工业	48	2200		3	3		6			6
金银业十四家	手工业	48	1000								
华商电车	市　政	24	450		3			3			3
总计		5,950	36,907	11	135	92	2	240	76	93	70

（原注）

① 罢工之总数计有六十企业，共二十三次（以单独罢工与同盟罢工合算）。

② 罢工时间以八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计算。

③ 罢工工人总数，以可靠者列入，其未确实者暂不列入。

④ 要求条件之总数，凡同盟罢工有条件相同者只能合计（例如各日厂同盟罢工的政治条件共为一条）。

施英同志在他的罢工统计之后并详细说明统计之内容，总括有下列之结论：①产业的罢工已为含有政治性的，其表现为长期性的；②手工业的罢工特别加多，这证明在产业罢工已起之后，

手工业工人因生活压迫，亦表现其组织的新力量，增加经济的斗争生活（地毯工人在本月中之兴起，犹如六月中丝厂工人之兴起）；③罢工的条件，属于工资与待遇的占百分之八十强，与六七月相同；④失败的条件占最多数，亦与六七月相同；⑤八月份参加罢工人数，因手工业占企业多数单位，将近四万人，比六七两月减半，但其中将近两万人于月底罢工犹未结束；⑥月底华商电车之罢工，证明经济斗争推广到市政交通工人。这是八月份上海罢工情形之概略。但按照统计内容以说明，那仅是一个结论，仅能知道一般的现象。至于罢工事件的本身——其经过情形与其教训，却不是从统计可得而知的。在事实上，这些情形惟有工人自己才知道得最清楚；其次，罢工的对方被反抗者（即资本家）仅知道片面；至于官厅则蠢若豕豚而淫威十足。所以当时淞沪警察厅出了一张肉麻不通的禁止罢工布告，其口气大有“格杀勿论”之概，而其内容则处处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张布告曾被日厂工人的《罢工日刊》反驳个痛快。例如布告说工人罢工了便没有饭吃，殊不知工人正因饭不够吃才罢工；又如布告公然说五卅惨案中工人罢工乃受人利用之轻举妄动，这样的话与五卅时英帝国主义的谣言“诚言”是一样论调。其余荒谬言词甚多，而日本纱厂恰好利用此布告翻印数万份，以二百元雇数十人到处散发。这个布告对于罢工工人表示着充分的敌意，和后来国民党压迫工人斗争的伎俩如出一辙。

其次，施英同志在其总结八月份罢工的论文中，还有许多悲壮事迹的记录。这些事迹之最显著者，如：①各日厂同盟罢工工人的屡次集议；②日华纱厂罢工一月后佯许复工，向厂主取得一元工资后又继续罢工；③总计一月中前后被厂主雇流氓打伤之纠察

队、童子团达二百余人；④因散传单或演讲或秘密集会被警署及捕房拘捕者数十人，或判罚金或充苦力或判囚数月；⑤“九七”辛丑条约纪念日在民国路与孙传芳军队格斗，在南京路与英捕、印捕冲突，是日罢工工人之讲演，是在租界中预为帝国主义唱挽歌，马路两旁充满了悲壮激昂的呼声，使巡捕侦探等张皇失措。

以上所述乃是上海自七月以来罢工运动的概略，这一风起云涌的长期罢工浪潮直至九月十六日纱厂同盟罢工失败复工之后，才告一段落。

（三）万县惨案与反英运动

北伐战争的胜利，吴佩孚的败窜，直接影响到英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发生动摇。所以自北伐战争以至于取得武汉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由恐慌、咒咀变到了最后的发狂，便不分地域的运用铁甲战舰向中国民众施行武装的暴行。在九月四日既有英舰驶入珠江，武装威挟革命政府的严重事件，其后远道的警耗传来，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舰在四川万县又演炮轰万县民众的空前惨酷的大烧杀。

根据当时万县代表刘宗沛君之报告及国闻社与上海各报之重庆通信调查结果，万县惨案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

英轮因有内河航行之不平等特权，又恃该本国政府之后盾，故在川江航行并不遵守航行公约，每于开抵各码头时任意疾驶，以致迭次撞沉民船。如滇光轮船，于六月十三日在万县箱子坝地方撞沉木船一只，淹毙中国人民何兴泰、刘吉五、张翥、王素云、傅云生等十余人；又万流轮船于七月八日在酆都立石镇地方，撞沉划子一只，淹毙川军第六师营长田雨亭及勤务兵、商务人员张

复初、田云等二十三人；又嘉禾轮于八月二日在涪滩地方撞沉木船数只，淹毙公差人民张海淑、覃邦良、崔英伟、崔英瑞、秦大志等数十人，并沉没公款六千八百余元。川政府曾向英领事提出抗议，均置不理不复。讵知英轮"万流"于八月二十九日复在云阳地方，故意肇祸，特开快轮，以致撞沉木船十数只，溺死人民数十人（姓名确数俱无从考）及官兵五六十人，枪枝五十六枝，子弹五千余发，复沉公款八万五千余元。此次损失较前数次尤巨，而且损害到四川军阀杨森身上。于是他不能不派兵将该肇祸英轮扣留，以便办理交涉；但是蛮横的帝国主义者那有理可讲，遂由兵舰派兵多名到该轮，将杨部扣船兵枪子弹强行一并提去，并伤亡军士数人，威迫将万流轮放行，并同时架置巨炮，直向万城南津街等处，势欲轰击作对敌行动。居民惶骇，莫知所措。八月三十日，适英轮"万通"、"万渝"两轮过万，杨军遂将两轮扣留，以待交涉。于是空前大惨案遂以此开演。

当杨军扣留"万通"、"万渝"两轮的时候，重庆英领事即疾驶来万，极力恐吓杨森。同时英国兵舰苛克捷夫号（Cockchafer）即卸衣实弹，架置12CM：（十二生的）之大炮数尊，对准万城威迫两轮，作对敌行为；又立即由渝开来"威警"（Widgen）英舰，胁同示威，意同作战。九月五日午后五时半，又由宜昌开来装甲英轮"嘉禾"，架置巨炮数尊，机关枪百余杆，硫磺弹无数，满载英兵，甫抵万城，哨声未绝，即逼近被扣之轮船。于五点四十五分，英兵突然冲过"万渝"轮上，用机关枪及大炮轰击扣轮军士，无一幸免。同时威迫两轮之英舰苛克捷夫号，于五点四十八分，一面开快枪，向"万通"轮射击，一面用大炮向万县城两岸乱轰；而威警英兵舰亦于五点五十分开排枪，向两轮及反抗之民众进攻，

并用巨炮对准万县城两岸及南津街商场万县中学等地扫射。同时"嘉禾"装来之巨炮，亦向上列各地乱轰。据法舰之统计，三英舰共发大炮三百余响，而"嘉禾"轮上更滥用国际禁用之硫磺炸弹，对准南津街商场地方，放射百余发，以致万城繁华兴盛之商场，崇伟广大之民房，遂成烽火冲天，鬼哭神号，愁云惨雾弥漫全市之灾区！事后调查，计被硫磺炸毁之商店，确有二百余家之多；而民房之被焚于火者至少亦以数百计；中国民众兵士被杀五千人，财产损失则在数千万以上。

英国帝国主义这次在万县既利用不平等条约，任意航行内河，不按航规，横冲直撞，致撞沉民船数次，沉毙人民数十。地方官提出抗议，一味横蛮不理，反而用十二生的之大炮野战炮硫磺弹尽量施行轰击，伤毙中国人民至五千之众，焚毁房屋至数千间，损失财产数千万，整个的万县城差不多成了腥血涂染的断瓦残垣。这不仅比五卅时的屠杀情形更凶恶惨酷十倍，简直是近百年来世界史上罕有之惨案奇闻（除向敌人正式宣战外，没有如此用大炮肆行轰击者！）。这种野蛮毒辣的行为，在帝国主义对于非洲南洋之野人尚不敢遽施，今英国帝国主义竟一再施之于中国，它简直视中国为屠场，视中国人为非人类，不过是它任意屠杀的对象罢了！

这次屠杀的起因，表面看是由英轮撞沉中国官船，与杨森冲突的结果；其实英国帝国主义早就在准备一个大屠杀，故屡次挑衅乘机待发。据当时（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所载：由日人方面的调查，截至八月十五日止，英国兵舰在天津、罘罘、青岛、上海、福州、汕头、广州、香港、汉口、长沙等处淀泊的已达四十八艘之多。当北伐战争兴师之初，英兵便在

梧州上岸捕人，这是挑衅的第一次；当北伐军到武汉，英舰公然援助吴军，炮击北伐军，这是第二次；九月四日的广州英舰派兵上岸，占领码头，逮捕工人纠察队，截获民船，强行驾驶货船进口，这是第三次；在万县屠杀便是第四次。因为英国帝国主义在五卅时虽然屠杀了数百个中国民众，却引起了全中国民众空前的反帝运动，英帝国主义在各方面都受了严重的打击；尤其在广东，昔日繁盛逼人的香港几成了荒岛，如今北伐军又攻下武汉，英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势力将发生动摇。因此，它便不顾一切，横行无忌尽量地使用它的炮舰政策来施行大屠杀了。

中国所有的军阀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万县惨案的直接原因发生于英轮撞沉官船，直接损害到杨森身上，然而杨森及北京政府并不敢坚决与英帝国主义抗争。起初虽然也提些抗议，但是过不了几天，也就和段祺瑞政府对于五卅惨案的交涉一样。真正能够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始终只有被压迫的民众。万县屠杀开始的时候，英国帝国主义者很有一种想头，它以为英国与中国军阀的冲突，不易于引起民众的反感；因为中国民众敌视吴佩孚及其同系的军阀（如杨森等），是英国人所熟知的。冲突的地点离开大都会及工人中心很远，这也足以隐蔽事实，使万县事件不易于被几个“鼓动家”利用去做反英的宣传，如上海五卅屠杀一样。英国炮击万县，焚毁全城，一下子便击毙了五六千以上的无辜人民，这样便是给予中国民众以绝大的恐吓，使之战慄于英国帝国主义炮舰政策之前，拜伏于地不敢动弹。英国资产阶级对殖民地政策及其在殖民地劫掠，积贮了三百年的经验，其手腕自是巧妙不过；这次万县惨杀的动作，更可说是十二分巧妙的。然而五卅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众已经不是傻孩子了。在万县事件中，

中国民众都懂得，这并非是英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之间的根本冲突问题，而是英国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民众的狡猾政策，在事件中死伤的都是无辜的中国民众。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只能吓退高等华人和士绅阶级，却不能吓退工农革命群众。英国人不能始终隐蔽万县事件之真相。广大民众的反英运动，终于像洪涛一样普遍于全国。万县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帝国主义的喉舌——京津《太晤士报》曾经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民众厌恶本国军事权力，比厌恶英国军舰还要厉害。四川的外侨绝不怕民众对他们有何敌视。"可是，不过数日之后，侨居四川的一切英国人，都迫得离开四川的重要城市，以避免中国民众对他们之日加一日的敌视了。

事变的发展竟出于英国资产阶级意料之外。这番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万县之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引起了全国被压迫民众轰轰烈烈的反抗。事变起后，万县英美烟草公司工人立刻罢工反抗，万县商人亦宣言不买英货。重庆首先听见屠杀消息，马上即有热烈的反抗运动，学生到处演讲发传单；数日后复有三万余人之示威大游行，"解除英国军舰武装"，"废除不平等条约"，"拥护北伐"的呼声震动天地，并派代表刘宗沛到长江下游各地报告真相。长江上游领港工人因此屠杀亦对英轮罢工反抗，汉口、上海、厦门等地都有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一时反英宣言通电遍载报章。不仅中国民众，即各国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亦都表同情于万县惨死民众，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共产国际听见万县惨杀消息，即刻发表宣言，号召全世界劳苦群众，切实动员起来，反抗英国之暴行。伦敦、柏林等地均有热烈之示威运动。

（四）北伐战争与两湖工农运动的发展

自北伐军攻下武汉以后，继而又取得江西与福建。在同时，武汉发生了当地从来未有的猛烈的罢工运动。这一事件震动于全国，影响于世界；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世界一样。这一事件，在帝国主义的英国议院里引起了讨论；在帝国主义的日本政府机关报里，提出了对于国民政府的警告；在中国北部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营寨里，激起了生产协会的组织；在中国的中部及长江下游，资产阶级大商人奔走相告，斥责国民政府不当援助工人，高呼国民政府赤化；在中国的南部之广东，国民政府甫迁未定，省政府的领袖已开始准备压迫广东的民众运动，传言要封闭广州工人代表会。

当时武汉罢工运动所以如此蓬勃的发展，一方面固然是受了北伐战争胜利的推动，但同时更重要的原因乃是武汉工人的生活太苦——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待遇过于恶劣。在北伐军尚未占领武汉以前，武汉工人的罢工斗争虽然没有像上海罢工这样发展，但在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汉口烟草及纱厂工人即已开始为改善生活的经济罢工。至十月间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自然更加帮助推动武汉罢工运动的发展。北伐军到达武汉不到两月，组织在武汉总工会之下的工会会员已扩大至三十万人，工会扩大至二百左右；九月以后，罢工浪潮便一天汹涌一天。计在一九二六年冬季及一九二七年春初，武汉自邮务、印刷、纱厂、香烟厂、银行职员直至店员手工业工人，无不卷入罢工浪潮，详细分析和统计，因材料丧失，只得暂付缺如。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止，湖南工会组织亦由五县增至四十县，工会会员由六万增至 十 五 万

人。

同时，农民运动亦迅速发展。据一八一期《响导》周报长沙通信，在十一月底止，湖南一省有五十四县已有农民协会组织，农协会员共计有一百零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人。其中有十万人以上的组织计四县，有五万人以上的组织计六县，有一万人以上的组织计十二县，有五千人以上的组织计十二县，有一千人以上的组织计十八县，不满一千人的计二县。当时组织比较好的地方是浏阳、衡阳、湘澧、平江、耒阳、湘乡、长沙、宜章、宁乡等县。北伐中湖南农民参战最勇敢，北伐取得初步胜利，农民斗争也跟着扩大起来。此时农民最普遍的要求是：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要求武装，打倒土豪劣绅等。这种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是衡阳、安化、湘阴、浏阳、醴陵、宜章等处；十月间衡阳减租减税斗争参加农民群众已达七万以上。至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组织已扩大至二百万人，农村斗争更加急风暴雨般的发展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并且已经开始自己动手没收地主土地。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止，湖北亦已有二十余县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全省农民协会会员亦已达二十万人左右，农村斗争虽不若湖南之激烈，但亦开始扫荡农村封建势力了。跟着这种工农运动的发展，于是“工农运动过火”的呼声也就起来了。

（五）一三惨案与汉口九江租界之夺取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高涨，一日胜似一日，工人农民的广大群众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而争斗，在许多大城市中罢工运动如潮而起。许多省的农民也起来成立他们的争斗组织，和反动势力的地主豪绅争斗。这些革命势力之兴起，无人能止

之。工人群众渐渐组织到战斗的工会之内，冲动了以前地方的行业的界限，成功了强有力的统一力量，以领导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争斗。由于工人农民奋勇斗争，由于北伐战争之胜利，并且由于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之加紧进攻，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及手工业工人都一天天革命化了。这些现象都使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动势力见之发抖！

于是帝国主义一方面"看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乃用和平方法，在中国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它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那些迄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仇视革命的某部分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帝国主义主谋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并进而破坏革命。"（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议决案）英帝国主义为执行这种新政策，且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闭幕两星期后）发表其"对华新提案"——这个新提案据英国帝国主义自己说是"本政府通盘局势慎加熟计后的产物"，标明："本政府（英国政府）无不恒持避免与交战各党派对峙各政府之间，加以何种"干涉"之态度。且虽见国内战争所发生之纷乱，加以中外洪大商务所受之巨大损失，乃仍未尝与任何党派携手，及以何法干涉民间之諠讧。……且深信此种态度，为现应操持及将来应行继续操持唯一正当之态度也"（新提案第四项）。

可是同时，帝国主义并不能因此就放弃它们一贯“干涉”中国的态度，这就是说，帝国主义一方面要用“和平方法”来破坏中国革命，但同时仍旧不能放弃它们一贯的炮舰政策，接着万县惨案之后，而且仅仅离开英帝国主义宣布它的“新提案”的两星期工夫，就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英国帝国主义驻华军队，便在汉口野蛮“干涉”中国演讲队，刺杀中国和平民众了。

关于这次汉口一三惨案，帝国主义说是“中国暴民侵犯外人生命财产”，中国一般高等华人及机会主义者也说是“群众胡干”，现在我们可以借用素来反对革命的上海《时事新报》当时对于一三惨案的一段通信，看看当时事变的真相究竟怎样。该报一月十一日有一篇“汉口事件之原原本本”的汉口通信，很详细的记载一三事件，现在我节录它一段“肇祸之真相”如下：

> 十六年（即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二日三日，为武汉各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之期，党部及中央政治学校宣传员，为使各界明瞭庆祝意义，特组织演讲队到各重要地方演讲。前日（三日）下午三时，有宣传员数人在一码头江汉关前面中英交界之空场演讲，听众颇多，宣传队派有专人照顾，秩序井然，不料英租界当局认此为挑衅机会，急调大批武装水兵登岸，挖掘战壕，架机关枪十余架，俨然向赤手空拳之听讲民众，取作战之形势。听讲民众，训练有素，不为所动，英兵乃蜂拥上前，实行驱逐。群众知其有意挑衅，乃向华界退却，英兵复大队冲入华界，将刺刀向人丛中乱戳，当将海员工会会员某腹部洞穿，立即毙命；又有码头工会会员李大生腹部被刺，大肠随刀拖出，血流遍地，命在旦

夕；市民方汉山，腰部刺入甚深，亦有性命危险；其余商工各界听众被刺刀枪托杀伤打伤手足及面部者，总计在三十人以上。群众睹此惨状，异常愤激，无不愿以赤手空拳与英水兵决一死战，其时幸经国民政府代表徐谦、蒋作宾，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李国暄、宛希俨，汉口市公安局长张笃伦等赶到，向民众宣示对付办法，力劝民众暂忍一时之气，免受重大牺牲，群众深为谅解，渐次散去，一幕惨剧，始告终局云。

惨案发生之后，武汉各界民众，悲愤异常，当晚即各分途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同时即于四日午十一时举行民众团体紧急代表大会，一致决议：

㈠要求政府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限英领事于七十二小时以内答覆下列条件：①英政府须负责赔偿此次同胞死伤之损失，②英政府须立将肇祸凶手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③英政府须立即撤退驻汉英舰及英界之沙包电网等作战物，④英政府须向国民政府道歉，⑤英租界内华人须有集会结社游行演讲之绝对自由，⑥英租界巡捕及义勇队须一律解除武装，⑦英租界须由中国政府派军警管理。

㈡同时要求政府自动办理下列各项：①立即收回英租界，②立即收回海关，③立即取消英轮在中国之内地航行权，④立即撤消英人在华领事裁判权。

㈢如英领事对于国民政府所提之条件不能接受时，民众决自动封锁英租界，实行对英总罢工。

㈣实行对英经济绝交，由总商会通告，严禁买卖英

货。

㊄五日下午二时在济生三马路，召集市民示威大会，追悼死难同胞，讨论对英办法。

㊅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惨案真相。

㊆组织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当推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汉口总商会，武昌总商会，省农民协会，省学联会，省妇女协会，汉商协会，汉阳商会联合会，律师公会，新闻界联合会，农工商学联合会等十五团体代表为委员；并即推此十五团体代表，立刻将联席会所提出之条件，口头向政府陈述，以备采纳。

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自然还是革命的政府，所以对于民众提出之条件全部接受，立刻即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广大工农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气焰继续高涨，五日示威大会之后，武汉革命群众便用自己的铁拳把英租界夺回来了。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民众以自己群众力量夺取租界的第一次！向来残暴蛮横到底的英国帝国主义到此虽然仍不脱它的蛮横气概，大呼"外人生命财产岌岌可危"，调遣大批兵舰来华，而且在汉口一三惨案发生之后，接着一月六日又在九江杀人。然而在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之下，蛮横残暴的英帝国主义究竟亦不能不表示相当让步了；甚至"收回租界"的哀的美敦书亦不能不表示接受了。于是汉口事件之后，接着九江英租界亦被中国革命民众夺回（可恨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反动，重新又把这两地民众夺回的租界送还英国帝国主义！）。

自汉口事件发生之后，英国帝国主义一方面因为在中国群众

革命的火焰之下，不能不表示相当让步；另一方面鼓动列强协同出兵进攻中国想和义和团时代八国联军剿灭中国一样的目的又不能达到。于是它同时便用阴谋挑拨和恐吓欺骗的政策来对付武汉国民政府，以图实现它从中国革命营垒中找寻同盟者和分裂中国革命阵线的计划。我们试读当时代表英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态度的一篇重要论文（一九二七年一月七日上海《字林西报》社论）：

虽吾人不愿在未得详细报告之前有所评论，然目前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之政治色彩亦不可不加注意。暴动或许是偶发的不能前知的，一粒火星可使群众发狂，然而此等暴动能创造历史，并且常常是建立一个新政府的机会。国民党有温和派（他们主张维持秩序）与极端派（他们主张扰乱秩序），是公开的事。极端派甚恨温和派掌握政府大权。他们对于英国公使与国民政府间谅解之可能，极为怨恨。他们深怕他们的活动将因蓝浦生与陈友仁间之谈判而缩短，他们尤其恐怕的，是英国对华的友谊的提案（即指新提案）已博得华人之好感，因而使他们的反英宣传失败。极端派因此将利用一切机会再煽起反英的火焰；此非因彼等深恨英国，实彼等以此为政治活动之手段。国民党中究将何派占胜利，关系于外人对于国民政府之态度，实在不小。

今汉口事件实为试验国民政府有没有能力，配不配的一个非常的机会。一个政府而能保护生命财产商业，则为正当之政府。现在国民政府担任保护汉口英租界生命财产之责任，直到事态能使英国自行负责之时为止。中国之将来命运，全视今日国民政府之能否保护秩序，

保护外人商业与生命，以为决定；因在华及在本国之愿与国民政府为好友之英人，皆乐观国民政府之能维持秩序与法律，而引以为荣，若国民政府不克负此责任，则吾人甚觉惭愧（意谓看错了人，故自惭。），即反对国民政府者，见了国民政府之能维持秩序与法律，亦将得而与国民政府为友，非然者，彼等反对国民政府之意见将愈坚决。承认国民政府问题之最后决定将于此后数日内国民政府处理汉口事件之态度而觇见之。如果群众是压静了，如果没有罢工与抵制，如果货物能应市场之需要而自由进出，如果外人无生命之忧，则国民政府是证明了有权力。非然者，国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观。

今全世界咸注目于汉口事件。大英是能忍耐的，华人至终将认识究竟谁是他们的朋友。大英能静待公平之解决。但若群众汹汹不休，而国民政府袖手旁观，则英人的忍耐将至终点。似乎国民政府已担任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了，吾人将观其究竟办到如何样的圆满。当一群极端的暴徒发狂的时候，政府办事是极棘手的，可是亦惟有此等事件方能试验政府是否有价值。中国今日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维持秩序，负责任，有决断等等。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应该能够做出来给全世界看，证明他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是有权力的，有决断的，如此则他们的许多国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换言之，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则保护生命财产与商业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现在是无可躲闪的时机，不论是英人方面或国民政府方面。

《字林西报》这一篇社论，可以算得是一篇最巧妙而且最阴险的煽动文,这是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态度,值得中国每个革命者来研究研究。这篇社论表明出当时英国帝国主义的愿望是：指出当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有温和派和极端派；温和派是主张维持帝国主义的秩序的，极端派是反对帝国主义到底而且是要破坏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英国不能与极端派合作,汉口的以至全中国的反英运动都是极端派作出来的。英国帝国主义当时唯一的愿望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能以武力制止反英运动,“压静”群众,“担任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保持英国“货物能应市场之需要而自由进出”，并且以此当作承认国民政府的条件。英国帝国主义高声唤醒并警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说：“现在是无可躲闪的时机，不论是英人方面或国民政府方面”，你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现在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用武力维持秩序”，自然，“当一群极端的暴徒发狂时候，政府办事是极棘手的”，可是只要你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有决断和负责任”（自然是负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与维持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责任！），则我们大英帝国一定极力帮助你们，如果你们自己没有办法，只要得到我们大英帝国的帮助，“则保护生命财产与商业的方法一定可以找得”。如今只要你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能够做出来给全世界看，切实“用武力维持秩序”，“证明”你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有权力的有决断的，如此则你们的许多国际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英国帝国主义的愿望不会落空,当时《字林西报》的社论还只说“似乎国民政府已担任了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责任了”，汉口事件发生之后不过几个月工夫，整个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便都回到他们的老家，实实在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了。

第五节　上海三次暴动与蒋介石叛变

（一）　第一次暴动

自北伐军克复武汉，进攻江西，与孙传芳军队正式开战后，上海的局势即入于摇动状态中。在这摇动的局势之下，就产生一种自治运动。此种自治运动，首先发生于上海市，远在齐卢战争以后，由上海市自治运动，扩大到环太湖区域。闸北自治运动和孙传芳争持最烈，其初发动于闸北自治公所几个董事，渐渐扩大到环上海市所有大小城镇的绅商团体；然而这种和平式的而又多少带着一些反军阀精神的自治运动，终于被孙传芳用租界帝国主义的援助和丁文江"大上海"的欺骗政策压服下去，上海市终于被孙传芳统治了。这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生活中做军阀反对派的投机的初次样本！其后因孙传芳在江西军事失利之消息频频传来，又因浙江夏超之宣布独立，上海自治运动又重新起来，且因此而有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第一次暴动之发生。

这所谓上海第一次暴动，虽然名之为"暴动"，可是若在暴动的实质的真正意义上来看，是不能称作暴动的，实际只能算是一种军事投机。因为武装暴动乃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特别形式——最剧烈最坚决的斗争形式。"要武装暴动取得胜利，第一，应该不凭借一小群党徒，不凭借党，而凭借先进的阶级；第二，应该凭借民众革命潮流之高涨；第三，暴动必须凭借革命进行之历史的紧急关头，即当民众先锋队伍的积极性最大时，即当敌人的营垒中和软弱的不彻底的不坚决的同情革命的队伍中发生动摇最剧

时”（列宁）。但十月二十三日前的上海暴动的计划是受这样的情形决定的：一方面孙传芳在江西的战事屡次失利，主力军已丧失大半。至十月十日左右孙传芳的军事情势更加险恶，南昌受困，已在岌岌乎不可终日之中。湖北方面十月十日武昌陷落后，吴佩孚失去了最后的壁垒，北伐军又逼近武穴。福建方面，周荫人又节节失利，陈调元、周凤岐都有不战而退的趋势；最后更有浙江夏超之宣布独立——据此情形，孙传芳的势力实已在分崩离析，濒于危急之时。另一方面受了北伐胜利的激荡，上海工人群众在孙传芳的高压之下，久困思逞；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民众苦于战争的延长，非常愤激；资产阶级更想乘机催促孙传芳势力的崩溃，夺取上海的政权。

但是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开始准备暴动，并且组织了一百多个的武装工人及比较多些的没有武装的战斗队，事实上也参加了这次“暴动”，但是可惜竟完全失却了自己无产阶级独立的地位。不但依赖资产阶级而且做了国民党钮永建等的尾巴，甚至暴动的日期也归钮永建指定。钮永建不但团结资产阶级的代表（虞洽卿等）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在自己的周围，而且抓住了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

十月十六日夏超在浙江宣布独立，正式宣布投诚国民政府，而且派兵进攻上海（十七日）。这时候孙传芳的军队尚未调集，上海的防守很是空虚，恰是上海暴动最有利的时机，可是暴动的准备还非常差，不能举行。到十月二十日武装工人与钮永建的队伍多多少少地准备着暴动时，但是，这时夏超的情形已经很坏了；反之，孙传芳却比较从容的从南京调集许多军队。到十月二十三日，钮永建得到一个不确实的消息，说孙传芳的军队已被夏超打败了。于是他便发出于二十四日早晨五时实行暴动的命令，

其实事实上乃是夏超已被孙传芳击败了。因为共产党当时根本没有准备暴动的群众基础，根本没有计划并组织上海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另一方面，钮永建的实在力量比当时共产党的估量要少几十倍，而且根本没有统一暴动的计划，也没有统一暴动的指挥人。所以结果暴动没有方法实现，仅仅只有少数人与警察发生冲突。所以不但没有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而且仅在军事投机上说，也只不过架了一个势子，何况又失了时机，自然很容易的就被孙传芳扑灭了。

（二）第二次暴动

这一次暴动也与前次一样，还是在援助北伐军的口号之下进行准备的。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事件的失败，并没有使暴动的进行中止。因为敌人的统治并未巩固，民众的势力也未遭到大损失。所以十一月五号九江陷落的消息传来，而上海自治运动又复高涨。不过这次运动的内容和上次已有多少的改变。第一，上次参加这个运动的只有三种力量：工人，国民党左派及一部分资产阶级虞洽卿、王晓籁等；中间因夏超失败的影响，最后行动的只有工人阶级及国民党左派，而资产阶级则已远避畏缩。此次参加这个运动的分子就更加复杂，除上次三种没有变动外，连孙传芳所御用的研究系张君励、黄炎培、沈恩孚与褚辅成等政客，都参加了运动。甚至奉天军阀杨宇霆、张学良的代表也参加活动。孙传芳本来是反对自治运动的，但他已知道他的力量不能拒绝北伐军东下，因此就唆使研究系参加运动，企图利用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在他控制之下以阻止北伐军之前进。资产阶级则又恢复到以前的踊跃状

态。故十一月五日九江陷落，孙传芳溃退到南京，上海总商会即发宣言，主张拒绝奉鲁军南下，划上海为特别市，市政还诸市民，永不驻兵。第二，运动的范围已比前次扩大，已由上海自治运动，扩大到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在上海产生了一个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的分子很复杂，其中包含着许多反动投机分子。他们本来是想利用这个三省联合会，以自治的名义拒绝北伐军入境，实际上是为孙传芳保全三省的地盘，以便他们得以参加政权；嗣因会中激进分子反对，加以十一月十七日孙传芳北遁，鲁军张宗昌实行动员南下，三省联合会乃被迫表示其脱离孙传芳拒绝奉鲁军南下之主张，加以张宗昌准备带军用票一千万元南下，苏浙皖商民闻之失色相告，于是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不能不表现出它的相当革命性了。第三，上次运动的方式完全是少数人的阴谋投机，这一次便已经有了群众的行动，共产党已经不仅注意上层的勾结与武装的训练，而且注意政治的宣传与煽动及罢工、罢课的准备。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已经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毒素，例如共产党江浙区委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所通过的"上海自治运动计划"中竟说："工人以自己的组织和战斗力还不强，又加以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无产阶级只该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但是群众运动确已比前发展。十一月下旬，每天都有大批宣传队出发，一星期之中，散去传单竟达八十余万张。十一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十二日，上海曾召集两次广大的群众大会，反对孙传芳、反对奉鲁军的空气非常高涨。

到一九二七年二月初旬，北伐军经过相当休息，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二月十七日北伐军占领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军

且已进占嘉兴，孙传芳受了更严重的失败。此时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国，正增派驻华军队，外国驻华军队在上海各马路列队游行示威，如入无人之境；孙传芳因在浙江兵败，犹拟在上海勾结英国作困兽之斗，摧残工会，大捕工人，压迫舆论，滥捕新闻记者与市民，因此民众更加切齿愤怒。于是从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开始了更伟大的斗争，掀起了广大群众革命的怒潮，爆发出自二月十九日起的总同盟罢工。十九日之前夕，全上海工人群众之领导者——上海总工会，经代表大会议决之后，发布出下列的命令：

总同盟罢工令：——

全上海工友们！民众革命势力日强，北伐军战争胜利，军阀孙传芳抵抗失败，惟有由民众起而行动，以推翻军阀势力。本总工会特宣告全上海总同盟罢工，以完全消灭军阀残余，表现革命民众权力。令到之时，即刻行动，全体工友总罢工。罢工之后，须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切切此令！

罢工响应北伐军！

罢工打倒孙传芳！

民众政权万岁！

工人自由万岁！

工人团结万岁！

上海总工会　二日十九日

总同盟罢工开始了，它是一个极大的革命浪涛。十九日晨六时起，奉到总工会命令而罢工者：在杨树浦方面，有瑞镕锦镕铁

厂，黄浦码头及制盒厂，东方、老怡和、纬通、恒丰等纱厂，及电车公司车务、机务两部，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引翔港方面，有电汽新厂，兰格木厂，及申新、振华、永安、厚生等纱厂全体工人。南市有华商电车，求新、远大铁厂等全体工人。小沙渡方面，有同兴、内外棉东五、西五、七、八、九、十二厂及福新内外厂，日华、喜和等十四厂。浦东方面，有日华，祥生，南洋烟草公司等全体工人。英界各邮政局，公共租界电车及南京路四大公司全体工人。法界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全体工人。以各产业计，罢工者纱厂全体工人。市政工人有邮电工人全体。店员方面有商务职工会及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丽华公司等。手工业方面有金银业，茶箱，洋服，蓬业，香业，制茶，线毯，猪鬃等全体工人。金属业与机器工人，罢工者有十余家。各轮船方面，有太古公司之广西、山西、顺天、甘州、宁波五只；日清公司卢山丸、太吉丸、尚阳丸四只；宁绍公司宁兴一只；舟山公司舟山一只。印刷工人方面有商务，彩印，美华，华商，墨色，石印等全体工人。以上总计罢工人数，约在十五万人以上。

罢工之第二日——二十日——罢工人数激增至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其中多因受资本家之压制，或因未奉到罢工命令者，计如，闸北丝厂六万人；水木作四万人；南货业，酱园，米业，估衣业，药业，洋布业共计十万余人。公共汽车工人全体五百余人。小沙渡纱厂增至二十五家，共增一万五千余人。黄浦及十六铺等码头合计一万人。

罢工之第三日——二十一日——罢工人数复增加至三十五万，其增加者，计如：㈠码头工人，招商局中栈，北栈，日本邮船会社，黄浦码头，大阪码头，太古码头，汇山码头，均已罢

工，共计有三万余人。㈡水木作工人增加一万五千余人。㈢徐家汇百代公司全体。㈣印刷工人有中华书局全体工人。㈤手工业方面、各小厂业都加入，增加六七千人。㈥纱厂方面原来参加者不计外，又增加二十六厂。㈦金属业工人增加二千人。㈧杨树浦又增加天章纸厂，中华宝兴锡箔厂，亨司达及英美烟厂，共三千余人。㈨海员新北京船一百人。

罢工之第四日——二十二日——罢工人数复增万余人，其中计：㈠江西路自来水工人全体。㈡虹口铁厂工人增加一千六百二十人。㈢张罗铁厂一百五十人。㈣机器铁厂公所所属工人全体参加。㈤手工业各工会增加一万二千人。㈥店员增加一千人。㈦菜馆工会增加六百，公共汽车一部分继续罢工。

总计以上罢工人数，足足在三十六万以上，不仅是上海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亦是全国历来未有的大罢工。上海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之进步，与组织发展的迅速，从这一次的行动里表现出来。然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的报纸（如《大陆报》，《字林西报》，《太晤士报》等）偏偏记载说：上海罢工第一日六万五千人，第二日五万五千人，他们很大胆的将实际数目缩小到六倍以上。帝国主义强盗这种计算的伎俩，与他们报告开到中国的外国水兵数目，是同样的伎俩，故意以多报少。罢工之第二日，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即宣传工人已复工，而实际上罢工人数反增加起来；第三日确有一部分被迫复工之行动，例如电车开车工人被捕者七人，由巡捕武装威迫，开车七辆，专门驶行南京路一段，以示骗工人复工，但第四日仍有增加者。第五日总工会既下复工令，帝国主义者的报纸，亦却不得不一致记载说："因为总工会正式颁布复工命令，果然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了。"

这次总同盟罢工的发动主要的原因是为援助北伐军的政治行动，当时北伐军前线已进至嘉兴，原定在北伐军继续前进时，上海即举行武装暴动，帮助北伐军，驱逐奉鲁军阀，在上海建立市民政府。但到二十日传出消息，谓北伐军为等待后援，暂时停止进攻上海。孙传芳计算到这一着，便开始对于罢工工人采取残酷的恐怖手段。孙传芳的走狗——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便立刻联合租界帝国主义的工部局，开始施行白色的恐怖。另一方面，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华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必然使统治阶级由恐慌而愤怒起来，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受屠杀之第一线的战士，即散发传单的工人学生，与表同情于工人持传单阅读于道旁的平民。第一日第一次牺牲者，乃南市金属业机器工人蔡建勋、史阿荣，因发传单而被捕立遭斩决。罢工第二日，电车卖票十九号工人，因发传单被枪毙于西门，学生在曹家渡讲演被捕，立遭斩决者三人。老西门有市民持传单阅读，被大刀队斩决，悬首于电杆者一人，暴尸于地者二人。上海大学留校学生五十余人全体被捕。其他各区被捕被杀不可胜计，总计此次死伤遭捕者至少在二百人以上。当罢工之第一日，李宝章即公然布告"格杀勿论"。华界租界，军警密布，任意搜查行人，尤以华界为更甚，随处均可见整排军队，背负大刀，手捧大令，沿街梭巡，全市顿呈恐怖气象，南市闸北及法租界之一部，均因之而停市。李宝章军队开始抢劫，任意挑怒市民，立捕而杀。南市与浦东居民，过军队前，不敢正目而视，浦东小贩口呼"卖大饼"，

而军队诬之为呼“打败兵”，即执而痛殴，以刺刀乱刺，行人不敢侧目。入夜七时华界即断绝交通；此时外国兵已可布防于租界之外，中国兵可自由入租界，逮捕革命群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军阀的反动势力，完全合作，以实现此白色的恐怖。

白色恐怖的屠杀，越更激动起上海革命工人学生与市民，因此而发生二十一、二十二等日群众夺取武装的战争。二十一日晚起，各工人区域即开始与军警的局部战斗。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时乃共产党决定爆发暴动的时间，到时各区域大队工人群众向军警防线与步哨袭击，亦曾夺得少量枪械，且回击警察巡长致死；海军兵士因反对军阀屠杀表同情于工人，自动开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使敌人纷向租界逃避。直至二十三日晚，闸北南市犹有数处发生巷战。但是暴动的时机尚未成熟，革命的军事势力相距尚远；此时上海总同盟罢工形势已经大大地变劣了，在帝国主义与孙传芳极野蛮的压迫恐怖之下，很多罢工工人已被迫复工，因此暴动时未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行动，暴动爆发了，但是卒被孙传芳势力镇压下去。

当罢工之第四日，共产党与国民党及广大工人市民群众共同组织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此时正是暴动将要开始的时候。暴动既然没有成功，市民政府也就不能实现。

到二十四日暴动已显然失败，上海总工会乃以“非因退让而复工，乃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的理由，发布宣言号召罢工工人全体复工。

（三）第三次暴动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指导之下，虽然在以前的两次暴动

中已受了残酷的压迫，虽然受军阀之空前的白色恐怖，但仍然是继续着勇敢的有系统的准备新暴动。党在职工会中，在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党在事前组织了各阶级民众之代表会议，这一点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党在铁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还在暴动前十天，铁路工人已经开始罢工，这使张宗昌运兵帮助孙传芳之举，发生非常的困难。党同样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组织工人纠察队（计五千人），他们是上海无产阶级之武装力量。最后党又坚决的决定了这一次暴动中之指导力量应当完全属于自己。因为她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党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

共产党决定当着杭州方面的北伐军到了松江，南京方面的北伐军到了常州的时候，便号召上海无产阶级起来实行总同盟罢工与武装暴动。三月二十夕，国民革命军占领逼近上海之龙华。但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令避免与上海租界帝国主义武装之冲突。占领龙华后革命军的策略，尚欲纳降拥有雄厚兵力的毕庶澄率领下之直鲁联军。但毕庶澄欲保有上海而降，降而求为革命军军长之一。属于军阀之一的毕庶澄，降与不降皆民众之敌。国民革命军预奉有令不攻上海，但上海的工人则预有准备，夺取军阀的武装而推翻其在上海的统治。

自孙传芳失败于九江，狼狈逃归金陵，上海工人即有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一次的暴动，暴动未起而失败，上海工人阶级的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为李宝章所杀。自革命军占领上海邻省的浙江，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起，上海工人三十六万人总同盟罢工，二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二次的暴动，暴动亦未成，工人被屠杀者数十人，引起海军兵士的革命同情，自动开炮

袭击兵工厂，嗣以为扩大斗争而复工，为继续暴动而准备。自此以后，上海工人阶级斗争的情绪日益高涨，既决然为夺取武装以斗争，复决然为民众之政权而战。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由上海总工会颁布，依令而罢工者，达八十万人，空前的大革命运动如潮涌起。同日，同时，上海工人胜利的第三次暴动开始。

三月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全上海各工厂、各作坊、各机关、各大小商店、各手工业场及车站、轮埠、码头等全体工人罢工，拥到街市的中心来，纷纷向预定的集合处集合，少数的武装纠察队，立刻按照目的地，对各警署、各兵营、各军队驻在所开始行动。所有租界中的工人群众，一小时内齐到华界。武装纠察队在前，广大群众在后。巷战开始了。陆续不断的枪炮声，与群众口号的呼喊声，立刻震动于遍城市中各地。铁路截断了，电话局被占领，电灯线断，自来水断，肃静的空气笼罩了全城市，只有断绝不已的枪声与群众的革命呼声。徒手无武装的群众，逐渐夺得武装到手中来，革命的武装力量增加了。敌人在包围中，或在逃散中。从敌人的队伍蛇动蠕行中发现以竹竿系手中的白旗，这是敌人投降了！素习凶恶压迫人民的警察，自剥其黑色的制服而逃散。大小警署的门前，推出了枪械，并悬白旗，这是警察投降了！在顽强抵抗的敌人营垒之四围街市中，住户市民，借出木板、砖头、布袋，建筑起障碍物。小饭店与大饼店的店伙紧急工作起来，赶做馒首食物等，由袖带红巾的输送队，往来输送于前线的战士充饥作战。袖带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战线后方；死者与伤者，扛抬过市巷。历时不久，各取得指挥的中心地，各区域自己的作战指挥集中起来。至此状况，城市暴动巷战

的局势，完全成立。

但因为敌人所在地的势力，强弱不尽同。广大的淞沪区域，有帝国主义的租界横贯于中央。暴动突起时的作战划分，于下列七个区域：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与闸北。七个区域中的行动，前后开始于一小时以内。惟解决与成功之迟速不同；尤以闸北一区，自二十一日正午起，至翌日午后六时止，前后两日一夜始行解决，统计激战至三十小时。

南市是包括上海县城的沪南区域。暴动未发前，南市全城的群众，法租界及公共租界中区的群众，陆续齐集于街市。一时半武装动作开始时，先进攻警察厅，二时许即完全占领警厅。同时占领电话局。警察的一署三所，及一署三所第一分所，次第占领。从警厅与各分署中，徒手的群众夺得了枪械。沿途的游巡队，在最短时间中，经群众缴械降伏。大队由警厅进攻兵工厂，无激战而降伏，四时完全占领兵工厂。南火车站是时已无敌踪，被群众占领；铁路工人夺得火车头往来运输。五时到华商电车公司集合。广大的南市区域，在四小时内便全部解决。

虹口在租界区域夹间之中，三面接壤于租界，一面近市郊，无驻兵，只有警署。在时间上说，虹口是首先被占领的。虹口电汽厂与丝厂及金属业的工人群众，当暴动开始时，最先发难，占领警署，夺得枪械。逃散的警察，唆使流氓与工人为敌，时来袭击工会，袭击已被工人占领之警署。因此而工人纠察队既战胜警察，复抵抗流氓之扰乱，以武装镇压，工人纠察队乃完全占领虹口区域。

浦东在黄浦江东岸。黄浦江西岸之暴动起，浦东所有各厂的工人群众，均起而响应：全体工人罢工，先扑攻烂泥渡第三区警

察署，围降警察百五十人，全体缴械。素来压迫民众，残害工人的第三区警察署，首先被群众占领。群众夺得武装后，即进而扫除孙传芳时代所设置的游巡队，沿途缴械。群众复继续占领三区一分所及三区二分所。当时有由前线溃退的鲁军，包围保卫团，被群众围攻而缴械。保卫团对工人纠察队树白旗，纠察队长遂召集纠察队与全体保卫团，暨参加战斗之数万群众，合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保安局，武装布防。自此以后，工人纠察队与商人保卫团，合同管理浦东全区。浦东区各业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暴动前后经四小时，而区民政权成立；国民党右派与其他反动派之投机分子，携带武装，伪造旗帜、徽章、委任状来接收公共机关者，尽被纠察队拒绝、扑灭。

吴淞是炮台防守地。原有驻军，自前线溃败后，毕庶澄的军队之一部，复乘车逃吴淞，欲经水路，夺得轮船，逃离淞沪。但吴淞的工人，与上海的工人已在同一时间内，起而罢工暴动。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与纱厂工人，立时围攻驻军，夺取其枪械。一部分的兵士，急乘车欲回上海，往沪宁线逃脱，至闸北江湾路附近，铁轨已断，遂据守天通庵车站作战。吴淞工人胜利后，保卫团亦出而与工人合作。经过群众大会后，吴淞的区民代表会立时成立。吴淞各工会联合会领导近十万的工人群众，实际管理临时区政权。

沪东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罢工开始后，群众即围攻虹镇警察署，缴警察枪械而占领之。一时许，杨树浦与引翔港两地工人群众，分头在韬朋路底之马玉山路，召集群众大会，各处到会者逾五万人，会后整队出租界，齐赴闸北。武装纠察队至胡家木桥及虹镇两处，打碎警察岗亭，占领五区三分所警

局，完全解除警察武装，夺得枪械甚多。香烟桥警署纵火向群众围攻，群众奋勇扑灭火势而解决之。总计前后，击毙警官一人，警察三人，余则仅解除其武装。大队群众与武装工人纠察队向江湾路进发，欲至闸北，达天通庵车站附近时，适由吴淞开来兵车一列，群众折断路轨，兵车出轨倒地，以排枪及机关枪向群众扫射，死伤甚众。纠察队猛勇抵抗，群众高呼革命口号助威。自此以后，即与闸北纠察队夹击倒车之溃兵，直至翌日始解决。

沪西亦是包括租界与华界的广大工人区域。华界即浜北，连接于闸北。群众罢工行动后，先围攻曹家渡第六区警署，缴警署械，并占领之。武装纠察队护卫群众渡河往闸北，并与小沙渡纠察队会合，围攻四区警署，经激战后而占领。率领纠察队冲锋之总指挥死难，警察亦有伤亡。同时，两处纠察队分队围攻警署第二分所及游巡队署，俱获占领。各警署占领后，随即查封。武装纠察队乃集合围攻北火车站，直至翌日。

以上各区域的行动，都比较的顺利。最后的激战，乃集中于闸北境域内。工人武装会聚于闸北者，乃沪东、沪西两部及闸北境内之一部，其余以租界隔绝，均不能来援。各区域均在二十一日次第解决，而闸北独相持激战至两日一夜。当各处行动开始后，总工会代表乘汽车至龙华请兵，当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亦即上海三次暴动两星期后“四一二”事变开刀屠杀工人的刽子手白崇禧迟疑不肯，又接国民党驻沪军事特务委员钮永建报告，请缓一日进兵，以待毕庶澄投降。总工会代表涕泣力请终不肯，最后第一师师长薛岳始率全师进攻。

二十二日下午六时薛师至麦根路，适值北站鲁军溃败而退，暴动势力已完全占领华界。在上海工人夺取了城市数小时之后，

四月十二号事变的英雄白崇禧才带领国民党的军队进到上海。前后两日一夜中，闸北境内激战经过如下：

在闸北境内除警岗不计外，敌人盘踞的势力，多至二十余处。行动以后，群众的主要目标在下列六处：（一）北火车站。（二）湖州会馆。（三）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四）警察五区总署。（五）广东街分署。（六）中华新路警署分所。嗣后自吴淞开回兵车，在天通庵车站虽被沪东群众袭击，但因敌方人数甚多，武装极强，于是六个主要目标之外，又增加一处劲敌。闸北的巷战，遂遍于全境。自二十一日正午十二时起，罢工工人群众到街市中者，逾十余万。枪声突然四起。北站鲁军的大炮，对向市镇轰击。鲁军中白俄兵，且以铁甲车开炮射击；在炮声密集中，北浙江路口，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乘机开炮射击，帮助鲁军对民众作战。至下午四时，群众已夺得各警署与湖州会馆。全境内各处警岗，悉被驱散。居民纷纷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当时还是革命旗帜)，不及备者，或以手巾被单作白旗悬挂。自此以后，工人群众的武装，除布防保护居民，免溃兵抢劫外，进攻目标，乃集中于：(一)北火车站。(二)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三)天通庵火车站。三处俱在一直线上。工人纠察队夹于三处之间：对北火车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进攻势。

巷战逐渐激烈了！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所驻敌军虽系少数，但拥有多量机关枪与多量炸弹，不断的向群众轰击，十分顽强。二十一日午后四时，纠察队以纸作书，口呼停战，投书入劝降，并负责保护其生命。鲁军亦就纸之背面回书，请求停止攻击，但不肯降。嗣后纠察队即取包围战略，防守终宵。天通庵车站敌军，因铁路轨断车倒而惊惶不已，伏两旁沟中，亦防守终宵，以

军械力弱，纠察队进攻未得手。北站方面，敌人于晚间纵火围攻，火势渐炽，烧民房数百间。难民纷纷向工人纠察队防线中逃来，纠察队分队护送往青云路空地。火势盛时，纠察队乃弃防线而救火，以水龙皮管，开自来水管猛勇扑救，卒至扑灭火势。附近居民，义愤填膺，对工人纠察队感激至于流涕，居民壮丁，以义愤所激，自愿加入暴动。老者少者，自屋中取出木板、砖石、布袋，为工人纠察队布置防线，建筑障碍物。火势熄后，敌人不敢进攻，惟时以排枪射击；白俄人的铁甲车，则时以大炮轰击；英国帝国主义的铁甲汽车，亦时时偷袭向工人射击。此时的工人纠察队，为保护居民，对鲁军作战，亦对帝国主义者防线作战。

通宵的激战轰动于淞沪全境，各处皆知闸北的战事，尤赞叹工人纠察队的丰功伟绩。翌日（二十二日）天明以后，敌人已觉困乏，纠察队仍从各方面猛勇进攻。当时居民咸传说革命军已至，实则革命军尚未自龙华起程。至正午，天通庵车站敌军解决称降，俘虏三百余人，余人逃散至广东街者，被纠察队缴械；至北四川路者则被日本水兵缴械。下午四时半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中敌军，易便衣欲逃，被生擒，余人愿降，苦战一昼夜之地最后解决。纠察队总指挥处遂由五区总署移至俱乐部中。自此以后，全部武装集中攻北站。但自上午起，北站敌人复用第二次火攻，延烧房屋无数；是时自来水管已断，无从施救。纠察队防线退至五次，但敌人亦不敢前进。最后各方队伍集中后，猛攻一小时余，白俄兵逃入租界，北站鲁军亦溃退，六时许北站遂得克复占领。因避免与租界帝国主义武装冲突之故，纠察队乃退至车站之后布防。溃兵大队逃散时，适国民革命军第一师薛岳亲率军队赶到，完全将溃兵俘虏。是时车站地雷爆发，但已无敌踪。最后薛

师进驻北站。铁路工会下命令修复淞沪与沪宁铁路，铁路工人首先复工，依工会令组织交通队三百人修路，恢复交通。宝山路、宝通路、中兴路一带，居民燃鞭炮庆祝。暴动之功，至是完成。

上海工人阶级此次英勇的胜利的斗争，真可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模范。三月二十一日从此成了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史上一个极有价值的纪念日。领导上海三次暴动的主要领袖赵世炎（即施英）、罗亦农等，四·一二惨变后，先后都被蒋介石所捕杀。上海本来是全中国产业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本来是全中国工人阶级中，数量最多奋斗历史最长久的一部分。轰动全世界的五卅运动，就是由上海工人首先发难的。自从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工人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阶级之先驱，因此更为全国革命运动之先驱。此次上海八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举行总同盟罢工，并暴动起来反对直鲁军阀的统治。经过二日一夜的巷战，工人终于解除直鲁军阀的武装并自己武装起来了。正因工人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始不经战斗安全占领上海。暴动胜利之后，上海市民政府即由上海市民大会中选举产生。

无论站在暴动之政治的与组织的预备观点上，时间的选择的观点上，或者站在暴动之指挥以及进行暴动之技术工作的观点上，在中国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盟之特别条件之下，这一次暴动总算是最好的例子。（见陈诏玉译：武暴装动）

这一次暴动指导之正确，在于它正确选择了开始总同盟罢工及武装暴动的时机；在于它正确的把上海附近的军事行动与上海城内之暴动相联合：一方面是当着上海劳动群众革命情绪之空前高涨的时候，另一方面又当

着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逼近城下，而使着敌人的力量极端紊乱的时候；最后，它又能利用军事行动的方法解除警察、山东军阀及孙传芳之军队的武装。

马克思的‘暴动是艺术’的提纲，在上海暴动中也如同在一九一七年之圣彼得堡、莫斯科的暴动中一样很正确的适当的在为夺取政权的实际斗争中极天才的应用了。

但是，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来评断上海第三次暴动时，一定不仅仅指明第三次暴动是上海工人群众的英勇伟大的创作；并且应当指明第三次暴动的主要错误和缺点，然后才能正确的去了解所谓“第四次暴动”的特质与我们怎样去胜利的准备第四次暴动。这次上海第三次暴动，客观上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斗争达到最高峰的表现。但因为革命主观力量赶不上客观事变发展的进展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所以使上海三次暴动在实践上表现出下列的缺点和错误：（一）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二）只打倒了旧直鲁军阀统治，没有准备继续打倒一切反动统治的工作。（三）只占领上海的中国地界，极力避免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发生直接冲突。（四）工人暴动胜利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市民政府。（五）上海市民政府在它存在的两个星期中，对于上海广大劳苦群众的许多紧急实际问题（工资、工时、改良待遇、住宅、税捐、政治自由等）一个也没有解决。所以当蒋介石公开叛变，大行屠杀胜利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的上海无产阶级群众时，大部分上海无产阶级和劳动贫民不曾应上海市民政府之号召而给反革命

以坚决的反抗。在此我便要紧接着说到四·一二惨变了。

（四） 上海四·一二与广东四·一五惨变

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事变到上海暴动这一时期，是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最剧烈的时期，而上海三次暴动结束了这一时期。

资产阶级懂得革命的发展对于自己的危险，上海暴动更使资产阶级不能忍耐了。上海二次暴动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即已开始叛变，故东方社当时（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汉口电讯，即云："蒋介石及其干部已取缔过激运动"。实际上，蒋介石已经陆续在南昌、九江、安庆、芜湖一带摧残工人，甚至已经开始屠杀工人，二月间南昌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就是第一个被蒋介石开刀的。然而上海三次暴动中，不但八十万罢工工人的革命势力不可轻侮，而且一般城市贫民及小资产阶级都很左倾，甚至蒋介石自己统辖的第一军（薛岳、严重等），当时也都徘徊于市民会议政权与蒋介石之间，兵士开始和工人纠察队联欢。因此，虽然资产阶级已经决然公开反动，而蒋介石初到上海的时候，也不免有些踌躇。我们记得，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举行升旗典礼的时候（三月底），蒋介石还像煞有介事的亲赠"共同奋斗"的匾额，实际上此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奋斗"已经显然不存在了。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投降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了。蒋介石亦就因为受着帝国主义的利诱，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的帮助，才决然反动。蒋介石取得沪、宁的财政与地盘，使豪绅资产阶级性的军阀白崇禧等得有暂时团聚的中心，最后还有当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机关对于争夺

革命领导权的犹豫，没有看清资产阶级必然的叛变，没有准备征服资产阶级反动的争斗，都使资产阶级的决心公开叛变有恃无恐，于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杀出演了。

共产党步步退让，资产阶级便步步进攻，蒋介石到上海后，仗着帝国主义的权威，暗示帝国主义者极力向中国人民恐吓示威，“此时上海已到外兵二万余人，尚陆续开来；租界继续关闭，铁网各口仅留一二口以通华界，并发布更严厉之戒严令，夜间十时后，不准平民在路上行走”（见《中国六十年大事记》P.594）。造成紧张空气，以便他更好向工人进攻。帝国主义者见到上海工人表现伟大的革命势力并夺取武装在手，也自然视为唯一死敌，故用尽种种威吓利诱的方法督促蒋介石对工人下毒手。武装的上海，是对于反革命阴谋的严重障碍，所以上海工人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何况资产阶级的反动早已预定，更何况无产阶级政党无耻退让，四月十二日的惨变简直是无可避免的了！当时蒋介石特别见着市民会议对于自身的危险，所以第一步便下令禁止市民会议开会，限制市民会议要立刻解散，“北伐军来，自然有国民党的党政府，为什么又要什么市民会议的政府？这一定是共产党的阴谋。”——蒋介石借着老狗吴稚晖的嘴说出此种“奥妙”。他又知道上海工人的战斗力与组织力都十分雄伟，一定不是单纯的武力压迫所能扑灭，因此便唆使他自己青红帮的伙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流氓头目，组织所谓中华共进会及上海工界联合会，以捣乱工人的组织。——蒋介石这一切法西斯蒂的组织自然都在帝国主义协助之下，共进会等法西斯蒂进攻工人的武装，大半都由帝国主义者供给。

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流氓合作之下，蒋介石在各方面布置相

当得手之后，于是四月十二日的屠杀出演了！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即下令上海驻军调集军队，准备大规模屠杀，惨变的开始先由流氓队做先锋（蓝色短装，袖缠“工”字符号），于十一日晚十二时后即开始袭击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加以防御抵抗，于是蒋介石、白崇禧即藉口工人内讧，便极尽野蛮残暴的手段，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当日（十二日）全沪工人闻耗大愤，纷纷奔集闸北开群众大会，并整队往司令部请愿。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杀密令，且事前早有布置，请愿群众正前进至宝山路时，大队军队即迎面开枪。后因群众愈聚愈多，更用机关枪向徒手群众扫射。一时尸横满街，堆积如山，适大雨如注，满街道竟成血河，死伤数目无从统计。据目击者言，事后尸首系用搬场汽车搬出葬埋，所装竟有七八车之多，蒋介石、白崇禧等刽子手手段之残暴，可谓无以伦比了！蒋介石、白崇禧等将工人纠察队缴械并将工人屠杀后，即用原有法西斯蒂组织“上海工界联合会”之流氓，盘踞上海总工会会所，改名“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并到处协同帝国主义者破坏总工会所属之各工会，拘捕工人领袖，摧残一切革命组织。

四·一二惨变起后，上海屠杀还正在继续，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等处惨剧接连发生；四月十五日广东亦发生同样惨变。所不同者，只有上海屠杀的刽子手是蒋介石、白崇禧等，而广东乃是李济深、钱大钧等，至于屠杀的残酷，则简直很难有高下可分了！

第六节　土地革命与武汉反动时期

（一）蒋介石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前后的武汉

因为工人革命运动的高涨，引起民族资产阶级的惊恐；同时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压制和利诱，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决然退出革命战线，因此而有上海四·一二与广东四·一五惨变发生。

蒋介石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部分的失败，但同时却推进革命发展到较高的阶段，而且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由广东迁到武汉。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战争胜利占领武汉，国民党左派在广东开中央委员与各省代表之联席会议，通过全国人民团体联合会纲领等要案，这个会议就表示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已告一段落。北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就是极力抓住军权，联合豪绅地主来反对工农及左派，蒋介石所到的地方，都直接委派县长，抓住财政权。工农群众也要自己起来抓住政权，工农及左派的群众团体都想抓住政权影响军事势力，使军队中的兵士及下级军官与民众发生联系，在民众组织强固的地方则直接起来实现群众的独裁。虽然没有拿到中央政府，但两湖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童子团都起来逮捕土豪劣绅，强迫减租，取消债务，分配土地。农民都说："现在的世界是我们的，今年减租不成问题，连田地都应归我们插标号。"从手工业至大

工业的工人群众都组织起来，总工会之纠察队即成为当时极大的势力。武汉国民政府所不能解决的事，总工会都可以解决。工人群众在很痛苦的生活条件之下，剧烈的起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等不断地提出，而在政治上且有夺回英租界之事发生，差不多一切下层群众都动员起来了。武汉政府要反对北京北洋政府，同时反对蒋介石，也正要依靠这种群众势力，以增加他们的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实现，这便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感到寝馈难安了！

不过在武汉初期，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也很有它们自己的弱点，就是：（一）内部不能一致，唐生智、蒋介石、李宗仁之间都有冲突。（二）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蒋介石虽能保存军事势力，但他已不能领导军事去“革命”，他最后一滴的革命性也不能不与工农发生关系方能表现。一九二六年九、十月间，他的军队将要解体，不能不请共产党重去工作。（三）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反对土豪劣绅的口号从广东带起出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的口号，民族资产阶级还可利用，而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则是下层群众的直接行动，如何行得？！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把持极大部分的军队力量，仍使在它的阶级利益控制之下，它在当时虽还不能公开说不要打倒土豪劣绅，但它可以用国民党的“党权”，来统一“军权”；用“国民革命”的帽子来禁止阶级斗争，这便可以说明阶级冲突日渐激烈。最可注意的是蒋介石到南昌，主张迁都南昌（一月一日去电武汉要求），与上海资产阶级接近。这就表明工农小资产阶级已经有一个中心——武汉。武汉在当时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革命空气非常高涨；因此蒋介石为要巩固自己军事力量，便想在南昌另造一中心。当时在广大革命群众“压

迫”之下终于定都武汉，并且三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还通过剥夺蒋介石军权政权的议案，在群众中则有工农审判店东土豪劣绅之事：这都表明地方的群众的民权独裁更进而建立中央的民权独裁。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帝国主义的商业亦因农民暴动关系而衰落停滞。沪、宁反动之后，湘、鄂、赣三省群众革命运动仍旧继续高涨。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武汉还是中国革命运动之中心。

（二）土地革命与武汉政府

蒋介石与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使中国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但同时中国亦即进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时期——土地革命的时期。

事实上，自一九二七年开始以来，湘、鄂、赣农村革命即日益激进，农民协会组织的发展一日千里，农村中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粮的斗争如火如荼的起来。当时有个做农民运动的同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得了，打头不得他们醒来，不料一醒来就再不肯睡觉！”很可以表明当时农民斗争之剧烈发展。这种广大农民之觉醒已经自觉的进到争取土地，减租早已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很多地方的农民协会已经成了第二政权。

土地革命的进展使一切革命政党和领袖都遇到了试金石。“农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急剧的进行，有些地方自己动手分了土地，有些地方‘插标’预备分配田地。没收地主田地的斗争，到处自发的实行。农民对豪绅的罚款等等也是普遍各处。农民自动的禁烟禁酒，禁止粮食出口，禁止盐运，——都是要整顿物价。以前买办经过豪绅剥削农民的搜刮原料方法，再

也行不通了（国民党便说，因此经济停滞，商业金融大受影响）。武汉政府的经济是在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封锁怠工之下，没有强有力的民众独裁政府是不能有办法的。所以最迫切的问题，是民权的问题了。小资产阶级左派曾经用党权与蒋介石的军权相斗。革命发展的结果，这党权在地方上许多下级党部实际上都到了共产党之手。因为真正的国民党左派是这些共产党员（后来大半背叛共产党的党员）。国民党的地方党部，便'遵照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之湖南省民会议及国共联席会议决定之精神'，认真实行起来了。'你们当真吗？'，'当真'！'果然吗？''果然'！'唉！你们这些小子，真正拿着鸡毛当令箭，——我们是说说玩的，你们怎么当真起来，该杀该杀！这类事说说玩是可以的，对我们有好处时，也许是必须的。但这类事是当真做得的吗？你们这些昏蛋！'——武汉国民党中央就这样教训下级党部，为共产党所霸占的党部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许多民众团体，当时是将国民党的'党权'实行起来；而这种党权一实行，当然要变成民众政权——民权。湖南许多县党部参加并'领导'工农团体实行'公团联席会议'的政权；一般的，各级党部，只要真是与民众团体一致革命的，都实行起地方'党政府'的权力。这使动摇畏缩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不能再容忍，他们要想用'党权'来和共产党争领导了（以前是拿来与蒋介石争的，拿来在武汉政府初期抑制军人的）。国民党中央的党权，要来控制地方党权，因为地方党权在共产党手里变成民权了。军权与党权之争，换一形式，变成党权与民权之争。如果军权与党权之争的社会内容，是对于帝国主义与豪绅资产阶级式的南方军阀妥协与否之争；那末，党权与民权之争的社会内容，便是对于土地革命问

题与真正民权问题彻底与否之争。”（见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实际上一九二七年四月间，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公布土地委员会关于土地制度改良的决议草案，当然更说不上实行了。

农民运动——土地革命似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最主要的原素。武汉政府与土地革命日益背道而驰，于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的湖南马夜事变接着上海四·一二惨变之后而出演。

（三）马夜事变与国共分家

自从资产阶级蒋介石背叛中国革命，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解散工人纠察队，实行公开屠杀工农后，继之以四月十五日李济深在广州大搜索，大屠杀，长江上游的长沙乃有五月二十一日的马夜事变，最后又有武汉汪、唐的分共会议。这是中国国民党背叛革命出卖革命的整个事实。这四件事都是有“连环性”的，马夜事变不过是这些有“连环性”的事实中的一环，而且有关紧要的一环，差不多是决定国民党武汉政府政治生命的一环。

马夜事变实是当时武汉政府反对土地革命、背叛革命的必然结果。湖南是农民土地革命最剧烈发展的一省，因此惨变乃在长沙出演。土地革命的进展使武汉国民党中央日益恐惧，尤其撼动了一切国民党代表封建势力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人，因此首先便有五月十七日夏斗寅的叛乱，接着就有五月二十一日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工农之惨变。先是临湘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团防局长詹仙侠所杀，凌迟处死，割心剖腹，备极残酷。五月二十日晚益阳农协委员长廖贯一来省报告，而何键部下已于前一日将益阳县工

会农协占踞，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均被缴械。于是空气更紧张更险恶，许克祥乃于五月二十日夜十时许正式围攻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大加屠杀数小时之久，死伤不可胜计。事变之后，群众愤激万分，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湖南十万工农军猛攻长沙之壮举，不幸当时共产党指导机关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居然无耻帮助国民党协同制止，而完全失败。不过无论如何，这次湖南广大农民群众的英勇斗争，总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的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的反动起来。武汉中央的动摇，日益暴露，“工农运动过火”的呼声高唱入云，尤其到长沙许克祥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的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是公开的向工农民众宣战，反动的恶浪陆续继起，六月中，湖南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上约略统计，农民被豪绅军队所杀者已经有四千七百余人。湖南许克祥政变后，全省被豪绅军队所杀的不下两万。江西朱培德‘欢送’共产党出境，工农团体被摧残的也非常之多。”（见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得着共产国际之指示，也就在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令其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于是汪精卫等从“共产党的走狗”变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于是而有七月十五日汪、唐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反对共产党，武汉乃由革命的中心变成反革命的中心。

（四）宁汉妥协——武汉政府反动之结果

四·一二惨变后武汉与沪、宁之争，本来客观上是革命平民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与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然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领袖和军官，大多数始终甘心代表豪绅资

产阶级，只想利用民众的赞助，以取得自己的的权力和禄位，所以等到民众真正起来要求三民主义和平民权利，特别是土地革命的实现，他们便立刻把工农群众及一般平民的利益抛弃，便立刻接受蒋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蒋介石等的反革命政策是什么？就是：①勾结并投降帝国主义以求巩固他们自己反动的统治；②和北洋军阀一样的把持并抢夺地盘；③屠杀民众，摧残人民的自由；④利用工贼和黄色工会以摧残工人，利用土豪劣绅以摧残农民；⑤帮助买办大资产阶级，剥削一般民众和兵士；⑥实行清党运动以屠杀共产党员。自从何键、夏斗寅、许克祥背叛革命以后，武汉的所谓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便步步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尤其是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之后，汪精卫、唐生智等事实上已和蒋介石一样走入反革命营垒。武汉方面既然自己实行这些反革命政策，那么他们当时所谓东征所谓讨蒋，自然不过是地盘、权力的抢夺，已经没有革命的意义。

虽然当时汪精卫、顾孟余等还有脸尽说自己“和蒋介石等沪、宁叛徒不同”，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七月三十日汪精卫等在汉口已经公开的屠杀车夫，激起武汉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的抗议。他们接着便是大施逮捕与杀戮，且有“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之豪语。蒋介石、白崇禧等收受东南特别是上海买办资产阶级一千五百万元贿赂而屠杀上海工人，汪精卫、陈公博等也就会同汉口的买办奸商解散店员工会。蒋介石等在东南大抽苛捐杂税，汪精卫等便在武汉滥发国库券。他们借口集中现金筹备兑现之政策，实际上将汉口四五百万现金任令各新军阀唐生智等分肥。其结果，上海对武汉的封锁，固然使长江上下游的经济都起极大的恐慌，而军阀的朋分现金，更使一般民众——工人、兵士

及贫苦的小商人困苦到万分。小商人大半是破产到不堪，简直没有生意做，十家有九家关门，米、盐、油等日用品都没有了。工人每月得几十元国库券，实际只得一两元钱，连饭都吃不饱。农民拿一担米只换几张没有用处的废纸。兵士更欠饷到三四个月，衣履不周，天天挨饿。钱到什么地方去了？原来军阀和贪官污吏、买办奸商，正趁着钞票低折时候，大做买卖从中操纵呢！而唐生智说："国库券让它倒好了，张敬尧在湖南发过几千万纸币，倒了亦没有死人！"哼！这些军阀滥发国库券，等于抢劫现金、盐米，八月间又发四千万中央银行钞票，岂不是更陷人民于万死之地？！这些一切事实，都证明武汉七月反动，汪精卫等已和蒋介石一样走入反革命营垒。于是不久，武汉的国民政府之"东征"便变成了"宁汉妥协"。汪精卫等第一步的主张是"联共反蒋"第二步是"反共反蒋"，第三步是"只反共不反蒋"。所以八月半蒋介石下野，武汉方面还大叫其"蒋倒是党权之胜利"，但汪精卫一到南京，即马上改口说蒋是"先知先觉"，自劾"对于共产党徒防制过迟"，并宣布"听候处分"了（九月十三日）！。"宁汉妥协"之后，武汉已完全同化于南京，虽然他们相互间还时有争权夺利的冲突，还有许多纷争混战，然而反对革命压迫工农却已是他们共同的要求了。

第七节　八一南昌革命与秋收农民暴动

（一）叶贺南征与八一南昌暴动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反动之后，中国大革命又受着一次重大

失败。但它在另一方面，却使广大农民群众与城市贫民更密切地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相当基础。首先，武汉反动之后，武汉工人就曾以总同盟罢工反抗汪精卫的反动政府改组工会及民众团体，七月三十一日武汉政府军警枪杀汉口车夫，八月三日宣布总罢工，表示革命反抗。同时便有叶、贺革命军之南征，此时还有一部分国民党左派群众表示愿意继续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仍旧以革命的政纲号召左派国民党群众起来共同奋斗。

正当武汉工人罢工反抗政府压迫的时候，叶挺、贺龙革命军即在江西南昌实行暴动。八月一日叶贺革命军便完全占领南昌，成立革命委员会。因为敌人力量的强大与指导的错误，南昌暴动卒归失败。叶贺革命军退出南昌之后，即向广东进发，且于九月二十三日攻入潮汕，旋亦失败。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大革命的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时期。

南昌暴动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这一军事行动在当时是有必要的。南昌暴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指导上的错误，乃是：①没有明显的革命政纲；②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③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系起来，没有武装农民；④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的政权；⑤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指导南昌暴动及南征革命军之主要错误，便是它很久很久，一直到最后几天，总不能决然的开展彻底的土地革命。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一开始就不宣布彻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定出只没收二百亩田以上的地主土地的政纲，这是极大的错误。所以革命军到潮汕之间，工农群众说："这是蒋介石第三

的军队”，这还是要“耕者无其田”。为什么？因为一则军队中指导机关指出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土地的口号，二则革命军南征时并没有和当地农民运动发生联系，并没有勇敢镇压铲除豪绅地主工贼的势力。固然，最后一时期已经抛弃没收二百亩以上的模糊政纲，而换了比较革命的口号，然而已经太晚了！再则，叶贺革命军南征之中，政策的客观倾向是在继承国民党的革命方法：（一）纯粹想靠组织好的军队力量去取得地盘和政权；（二）以“王者之师”来解放民众，实际上是以仁君易暴君的办法，所以对于“安宁秩序”只是保护豪绅地主统治的旧秩序；（三）是偏重于用联络杂色军队——某种军权或武力，勾结敌军的军官倒戈（并非鼓动兵士）之投机办法；总之是不发动群众不信任群众。军事上的错误是非常之多，然而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亦是不彻底革命的态度之反映。这些错误也就是南昌暴动失败的主观上的原因。

（二）各省秋收农民暴动

武汉政府的反动，主要乃是中国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之反映。此时保障中国革命之主要的方法，就是发展深入土地革命。事实上四月沪、粤反动之后，中国土地革命就已开始深入，如果不被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机会主义所断送，土地革命之深入发展乃是显然的事实。正当南昌暴动之时，中国共产党得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乃于八月七日召集紧急会议，坚决纠正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具体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之计划。现在把当时各省秋收农民暴动的情形大概分述于次：

先说湖南。湖南是中国当时农民斗争最剧烈的省份，马夜事

变即在湖南长沙出演。湖南秋收农民暴动的情形大概如下："由九月八日至十二日——暴动的开始几天——我们是得着胜利。我们军队（农军）的枪数增加一倍以上，萍乡的有七百到一千二三百枝，安源的有二千一百枝；刀矛梭镖武器的农民成千的加入队伍，占据了湘东所有重要的县份——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州。株州是到南方的铁路主要地方，在进攻长沙上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只被有六十枝枪的农民所占据。在株州城内有一营兵都逃走了。十三日长沙起恐慌。"（见一九二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六期湖南报告）。当时，湖南是直接在马变以后，农民协会的政权时期，还活跃于群众的回忆之中。唐生智军队大半在皖、鄂，豪绅自马变以来时时在受农协袭击的危险之中。但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中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始终不肯坚决发动农民群众，没有领导长沙的工人斗争，在暴动中则又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根本忽略发动广大群众的行动。甚至在醴陵、株州等处暴动起来，反又取消长沙的九月十六日暴动。因此湖南秋收农民暴动完全失败。

其次说到湖北。湖北农民运动虽然没有像湖南那样发展，但据一九二七年五六两月的报告，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亦有二百八十四万二千余人。七月武汉反动，接着武汉工人罢工抗议之后，湖北秋收农民暴动亦即开始。同时湖北经济政治情形亦正在动摇之中。所以八月中鄂南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崇阳等地即有农民武装之骚动。自此农民游击战争继续发展，直到截断武长路半月之久，通山等处且有短时期被暴动农民占领。鄂北却成了问题。鄂北有共产党员张兆丰的军队将到，但是当地党部没有去认真发动群众，不去领导当地群众反对捐税及樊钟秀

的统治，仿佛认为农民还未抗租并无土地之争，即不能动，一面又有拟令张兆丰去联络樊钟秀反对方振武的军事投机的计划。湖北因机会主义之影响，秋收暴动亦归失败。

其次再说到广东。广东是中国农民运动开始最早的省份，特别是东江海陆丰等地有比较长的农民斗争的历史。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是自四月十五之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戮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的日常斗争。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竟使暴动急剧的爆发。农民暴动开始于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农军即占领海丰，接着陆丰碣石、捷城亦入农民之手。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即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焚烧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

此外广东琼崖也有农民斗争发生，江西鄱阳、星子等处随着也有农民斗争的爆发。这一秋收农民暴动的浪潮传播到十月中直隶的玉田暴动，以至山东的阳谷暴动，大半都是群众自发性质。十一月初，江苏的宜兴、无锡、江阴，以至崇明的农民斗争和暴动，十一月一日宜兴的农民暴动，且曾占领县城两天。河南四方山等处也有农民的暴动。这些暴动大半是共产党参加领导，也有许多零星的自发的。

秋收暴动大半都遭到失败，但在许多地方也相当扩大了共产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到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去。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的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暴动的影响。但是当时秋收暴动政策之

机械的应用，亦就有地方发生玩弄暴动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第八节　广州暴动

（一）广州暴动前之中国一般状况及广东情势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陆续背叛革命之后（沪粤的四月反动，武汉的七月反动），中国革命受着严重的挫折。但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尚未完全消失。背叛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军阀与国民党，自从和工农民众破裂之后，绝对没有能力去建立它们自己经济政治的稳定，国内各种经济——工业、商业、农业、财政、国际贸易，都起了很大的恐慌，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反革命，事实上证明它并没有能力实现它内部的统一，更不用说实现中国之资本主义的集权了。当十一月间广东汪精卫所领导的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前，国民党领域之内已经爆发了许多军阀战争和抢劫。这种战争和过去旧式军阀战争一样没有丝毫的革命意义，完全是为着抢地盘争权位，各省之间有抢夺，各县之间也有抢夺，——这都是资产阶级军阀和各派各系互相竞争的现象，同时也就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利益的冲突。资产阶级愈反动，对于被剥削阶级的恐怖政策也愈加厉害，他们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前也愈加无耻，他们内部愈加不能统一而日益分裂纷争。当时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合并完全是一出滑稽戏；这一幕滑稽戏之后，立刻准备了两个军阀战争——南京政府和唐生智的战争及广东派军阀和广西派军阀的战争。汪精卫、张发奎、黄琪翔反对李济深、黄绍竑的战争，不过是反动统治内部的纷争和军阀混战的

总局面中的一幕。当时全国之中，有两个根本的阶级结合过程：一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迅速的与封建地主势力及帝国主义结成反革命联盟，别一方面，无产阶级和农民及一般城市贫民在极艰难的条件之下，忍受着无数的牺牲，共同进于革命之更高的阶段——从与民族资产阶级结合之总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进于工农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及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在前一时期，革命的旗帜是国民党，至此革命新时期的旗帜却是苏维埃的工农革命，这革命要完全由共产党来领导。这种工农革命力量，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叛变后武汉、上海、广州的罢工潮，湖南、湖北、广东、江苏的农民暴动，以及河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的农民骚动，南昌八一暴动及叶贺革命军的占领潮汕。这一过渡时期中，革命方面最大的弱点，便是革命正在进于更高的阶段，而中国共产党很幼稚，经验很不充足，又受着极严厉的压迫和摧残，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革命运动的能力太薄弱，而其中又有人对于国民党左派还存着种种幻想，由此而发生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在土地问题及军事问题上。此外还有更主要的缺憾，就是三种革命力量之间没有亲密的坚固的联络，——这三种伟大革命力量，便是工人群众的斗争，农民暴动和兵士群众的兵变。南昌革命军队的起来，没有能用自己的革命政策去发动工人和农民；同时暴动的农民又没有得着城市工人的赞助（如湖南秋收暴动时长沙简直没有工人运动）；城市工人也没有吸引兵士群众到自己方面来，所有这些缺点，便发生叶贺南征时期的历次的失败。可是无论如何，工农革命总还在生长之中，共产党机会主义的错误，经过八七紧急会议与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亦已得着比较正确的纠正。特别在当时广东情势之下，又正使工农群

众为保障革命胜利之斗争，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但必要，而且可能。

李济深的广东境内的国民革命军早已葬送了，广州的反动只在蒋介石公开反革命行动四·一二惨变后的三天。叶贺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的时候（十月初），张发奎和汪精卫及一部广东省内的资产阶级，便准备推翻李济深、黄绍竑及代表南京政府一派的豪绅资产阶级。十一月十七日，这一政变居然成功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军阀起来抢着广东政权，自称“护党运动”，想欺骗并号召一般民众来赞助他们，而达到他们反动的目的；同时这一派人也非常之残酷的压迫工农和共产党，比李济深的统治是有过之无不及。汪精卫等所谓左派领导之下的张、黄政权，第一步的政策，便是取消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迫逐罢工工人出公共宿舍，封闭罢工委员会及其公共食堂等等，逮捕大批革命工人群众，对于徒手的示威群众则下令开枪轰击，命令军警和反革命的“改组委员”占领工会会所，特别发布杀尽共产党的标语。张发奎、黄琪翔等对于帝国主义是特别的表示亲密和所谓“和平友好”，他们甚至于对于资产阶级的团体也严禁抵制英日货，他们那时便命令军警强占苏联领事馆的一部分房屋，对于苏联领事的抗议，完全置之不理。广东全省完全陷于这两派军阀的混战之中，广州的市民遭着空前掠夺，在所谓正税之外，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想尽方法的搜刮民脂民膏，甚至于公开的盗用库藏。如此之战争，财政恐慌，钞票跌价，物价高涨，都使经济生活的崩溃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再加上屠杀搜捕的种种淫暴政策，到十二月初的时候，已经岌岌乎陷于破产的状态。汪精卫、张发奎等欺骗劳动民众的政策，完全失败。工人群众之中，充满

了不满意于各派资产阶级军阀的情绪，这种革命情绪的高涨，很快的变成公开的愤激。共产党的威信，大大增高，虽然政府对于共产党的搜捕、压迫非常之野蛮厉害，共产党存在于极严重的秘密状态之中，可是群众对于共产党的信仰却大大的增加。

另一方面，广东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背叛革命出卖工农之后，立刻便和各种反革命势力团结联合战线，它和封建的地主，香港的买办，反动的财政资本家，旧时的官僚，一般投机的军阀，以及以前孙中山的死敌"纸老虎"的商团等等，还有英、美、法、日的外交官侦探之帝国主义者，结成联合战线。所谓广东派的军阀，他们勾结李福林，又因为李福林能领导广东的地主武装的民团，所以他们又和民团联络。不论是广东派或者广西派军阀，对于工农革命，都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但是他们这两派并不因此而能实行统一，并且互相冲突以至于公开战争。广东派与广西派的公开破裂，反映着英、日帝国主义互相冲突，广东的资本家有亲日的倾向（广东的张发奎因此想用攀附广东资产阶级的手段，仰承蒋介石的鼻息——蒋介石在当时是亲日的）；广西派军阀与上海的资产阶级——英国买办却是亲英的。广州十一月十一日黄琪翔政变之后，广东全省都被军阀战事威吓着。虽然剧烈的大战还没有起来，而只有双方的调兵遣将和小的冲突，可是战争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因此双方军阀的经济力量也都在非常动摇的情形之中，因为准备大战的缘故，广州市内政府军队日益减少。

同时被压迫民众之中的革命情绪也增高起来。广州的工人，在四月李济深反动之后，受着极大的牺牲，被杀的工人在四千以上，此外还有一千多被拘禁，此后屡次对于革命民众施行屠杀搜

捕的强暴政策。国民党政府的强暴政策，特别是对于赤色工会运动和共产党。但是在反动政府恐怖政策之下，广州的工会——工人代表会与广州的共产党部，都还能努力的工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有相当的程度。九月间，南昌暴动的革命军队到达广东的时候，共产党曾经准备广州的暴动。后因潮汕方面革命军的失败，使这一口号没有能直接实现。虽然那时反动政府加倍的压迫，虽然叶贺革命军队失败，但是工人运动的浪潮，却继续增高起来。政府或国民党所派的工会改组委员，到处被工人群众所驱逐。有组织的工人，到处自己选举工会的委员。十月十四日爆发海员的罢工（这时在上海有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在苏州有铁机工人罢工潮），各业工人都起来援助，同时即举行两万多工人的大示威运动。“两万革命的工人打着镰刀斧头的红色旗子，向反动的政府示威。他们对反动的军阀与资产阶级说：我们的军队虽然一时失败了，但是我们的基本队伍还是日益增长地存在着，并且存在在你们的心窝里；我们军队的枪把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击破你们的脑袋，但是我们工人的锤头将在你们的心胸中捣烂脏腑。”（太雷：《广州工人十月十四日的大示威》，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二期《布尔塞维克》）。极广大的工人群众不顾警察的禁止和拘捕，在群众大会之上公开的拥护赤色工会和共产党，公开的提出鲜明的口号：“青天白日已成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从此要打倒这白色恐怖的旗帜，高高竖起我们自己革命的旗帜——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当时工人群众有些便自动夺回工会会所，驱逐警察和白党的工贼走狗，当场打死海员工会会所中的工贼。此后，立刻便有印刷工人的罢工起来。十月十九日汪精卫所领导的反动政府对于这种工潮大施压

迫，逮捕大批的工人领袖，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被解散，海员工会被封闭，那时工人之中便有主张暴动的，但是共产党威信足以纠正这种过早暴动的倾向。共产党提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更加紧工人力量的组织，扩大政治经济日常斗争的要求，宣传暴动和苏维埃政权的必要。十一月初开始反对白色恐怖的示威。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广州工人开了极大的群众大会表示纪念，但被警察解散。黄琪翔、张发奎的政变之后，群众示威和部分的罢工继续不断的发展，省港罢工工人被张、黄解散之后，自动的放火烧毁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房屋，共产党的宣传品有极多量的分布，群众热烈的要求释放政治犯，……这些现象表明阶级斗争更加剧烈。十二月初群众的愤激更增高起来，海员罢了工，公共汽车工人宣布了怠工，许多小企业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邮务工人已经议决罢工。先进的工人武装起来，自己准备炸弹等等。

至于农民方面，则四月间李济深反动后，曾经有一时期的农民暴动，叶贺军队到达广东时，九月间又起了秋收抗租的暴动，十月以后，农民在各县又重新暴动起来——这是一九二七年广东农民的第三次暴动了。各县农民暴动之中，以海陆丰的胜利为最大。这次暴动的开始时，有叶贺残部很少的军力参加，这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师。这次暴动开始于十月底，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政权。这一农民暴动带着充分的革命性质，完全扫除了以前的机会主义余毒。一切乡村之中，随后便是

一切区镇之中，以至东江许多县的县城之中，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切田界（广东所称为田茔）——地主所有的界限，完全取消。一切地主私有的田地和剥削农民佃户的田契、租约、借券等等，完全当众销毁。一切田地都归乡村苏维埃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耕种。一切当铺的财物完全没收，无价发还典质的贫民。一切反革命派豪绅地主的财产充公，作为苏维埃工农兵政府的费用，用来救济贫民，从事公共建设，扩充工农兵政府的革命军队。一切反革命派豪绅都公开处以死刑，他们的巢穴都被焚毁，邻近的乡村县市，都激起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暴动，和工农革命军共同围攻地主豪绅的巢穴，而能战胜他们，扩大革命的地域。县城的苏维埃，如海丰、陆丰、碣石、紫金、汕尾，以及后来的普宁等处，都由手工工人农民苦力等共同组织。海丰十一月七日开苏维埃大会到工农代表三百人，宾客一万人，选举苏维埃政权，管理东江的各县。十一月中旬暴动已经扩大有五十万居民的区域。新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是由各村选出的志愿兵组成的。雇佣军队的方法取消，代以团体（各业工人，各村农民）的义务兵役。工农革命的武装，大半是由敌人处夺来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湃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派人向广州工人群众请求赞助，并发出告工人群众的宣言。同时海陆丰的农民将没收的地主财产之中，取出二万元来送给广州工人，作购买武装之用。海陆丰以外，其他的农民暴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也已经有许多处开始了：北江方面，海南岛，北海地方，沿广九铁路，潮汕附近……。

兵士群众的生活异常痛苦，并且受长官的压迫侮辱，专门使他们当军阀战争的炮灰。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及广州工人代

表会，在十月间所发宣言上，便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反动军队里的兵士起来反对军阀统治，起来反抗反革命的军纪，起来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起来力争自己的生活改良、政治权利和军纪待遇的改良，起来兵变而站到革命的工农方面来。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后，他们号召群众大会来庆祝他们所谓"护党"之成功，这一大会实际上只能算是阅兵，大多数到会的人，都是奉了上官命令而来的军警；这一大会之中，突然来了一群众革命工人，高举红旗，写着"打倒国民党"、"苏维埃广州万岁"、"工农兵政权万岁"、"兵士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等标语，当时还散发了许多传单给军警看，工人高呼口号，兵士都当场公开的表示对于工人的同情。尤其是广州的驻军（教导团等）的兵士，他们对于反革命的统治非常愤激，这些军队算是张发奎部队中最好的一部分，他们还保存着往年国民革命之热情的影响，而愤恨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军阀。十二月初在许多次秘密会议上，这些兵士整连整营的表示赞助共产党的政策和举行暴动。

城市的劳动小资产阶级，一般贫民及一部分知识界之中，也开始不满意反动政治的表现，厌恶政治上的混乱和不能容忍的经济困难，他们对于欺骗民众的国民党，不能实行自己所应许的政纲的国民党，开始失望和怨恨。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方面，虽然只在找不着出路的动摇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然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已经决定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

这就是十二月初广东阶级力量团结的具体情形。

（二）广州暴动的决定和准备

张发奎、黄琪翔政变之后，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广

东省委员会遵从中央委员会十一月十八日的决议案和指令，讨论暴动问题。当日便一致议决坚决进行暴动的政策，可是暂时还不能决定举行暴动的日期，而先开始组织赤卫军，最高限度的加紧兵士运动，并且开始组织苏维埃。到十二月初旬，形势更加严重。一方面，东、西、北三江及南路，几乎都卷入了战争漩涡，李济深、黄绍竑正在积极准备反攻，陈济棠则在东江独立，宣布反对张、黄。张黄在此情形之下，乃不得不派军开往西、北江御战。如此，广州非常空虚，只剩保安队千人、教导团一团、警卫团一团而已。“在这个困难中间，张发奎不知怎样办法，一方面向有钱的商人磕头，表示只要商人给他钱，他就去杀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叠次派代表秘密的来找我们共产党，要求同他们协商怎样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黄绍竑。”（见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号召暴动宣言）。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公开了张发奎的秘密并发表宣言，指出张发奎等逮捕工人、枪杀工人、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解散工人纠察队等反革命行动，完全和李济深、黄绍竑一样，“就是有人用显微镜来看，也不会看出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深、黄绍竑有什么差别”，共产党主张以革命暴动消灭军阀战争，打倒一切军阀。同时张发奎得着汪精卫密令，又正准备解决广州驻军中革命兵士的武装。另一方面，群众革命情绪确在活跃之中，于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为先发制人起见，乃正式决定十二月十一日即行发动。

至于暴动的直接准备与组织，则经过下列的六种准备：

（一）确定暴动之总政纲；

（二）暴动之军事上的准备；

（三）广州苏维埃的组织；

（四）经过赤色工会动员工人群众；

（五）兵士中急进的工作；

（六）农民中的准备与联络。

十一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就公开的号召群众暴动，同时就提出下列的口号：

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工农武装起来，劳动民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一切工会会所归还工人，杀尽一切工贼、走狗和改组委员，立刻恢复省港罢工工人权利，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增加一切工人的工资，工人监督生产，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住，没收大资产阶级的财产救济贫民，土地归农民，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改良兵士生活，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反对军阀战争，兵士委员会监督军费的开支，打倒国民党，打倒张发奎、黄琪翔、李济深、黄绍竑及一切军阀，枪毙一切白色恐怖的刽子手，工农兵联合万岁，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万岁，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民众和苏联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共产党而且联结这些要求，举出最主要的口号：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打倒军阀，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这些口号很可以对一般民众表示将要起来的暴动之明确的政纲。

对于军事的准备，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便决定了下列的办法：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做总指挥机关，组织参谋部做暴动时军事技术的指导机关。暴动之军事方面的准备情形是：定出明确的举行暴动的战术计划，全体党员动员，组织二千工人的赤卫队，这赤卫队是有严密纪律而按连组织的，又组织可靠而有训练的敢死队两连（省港罢工纠察队一连，海员及手车工

人一连）；准备运输工人汽车夫等，以及一切运输用具以备暴动时之用；秘密准备许多铁尺刀棍手榴弹炸药等，少数的手枪驳壳及许多冷器，如此武装了工人赤卫队及工人群众，吸收大多数的党外工人加入赤卫军，并担负军事指挥任务，建立广大的消息机关，差不多反动军队及政府机关参谋部等处都有共产党的消息报告员，每天侦察敌情报告党部，党部的工会的革命兵士及下级军官的会议，差不多每天召集，逐步讨论暴动的详细计划。

因为秘密状态异常严重，所以苏维埃只能在决定暴动日期时候才成立：工人代表会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十人，革命兵士的会议选出三人，市郊农民协会上选举苏维埃执行委员三人（可是三人中只有一人直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广州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便由这十六个委员组成，此外还有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之中，工人占三分之一。举行暴动的最终决定，便在这苏维埃会议上通过。

兵士中的工作首先在广州驻军之中发生影响。可是没有能够和驻在外县及市外的兵士，发生密切的关系。市内所驻各种军队之中都能有自己的党员。广州市内的教导团，则极大多数都在共产党影响之下，他们在暴动之中有很大的作用。这十二营的军队，其中极大部分是军官学校学生的知识分子，除少数高级军官是反动派外，其余一致赞成苏维埃革命。再则，广州的警备团的大多数兵士，炮兵营一部分，有些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及其他，也都赞成广州的苏维埃口号。暴动的一星期前，二百兵士的会议（其中有党外的普通兵士），一致决议誓死为工农革命奋斗。共产党所提出来的口号，尤其是“土地归农民和兵士”，在兵士群众中遇着热烈的拥护。

群众的宣传曾经有很大的工作，有秘密日报：《工农小报》、《红旗》及许多传单。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暴动的前一天，便会同印刷工会商定，印布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和传单，这些命令和传单及日报等计印出七百万份。

（三）十二月十一日的发动

十二月十一日到了。暴动即在这天早上开始。据杨殷同志（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与彭湃同志同时被蒋介石捕杀）在他《斗争中的回忆》（见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四日出版的《红旗》报第三期）中说，那天教导团先将营内的反动长官解决，便与工人所组织的赤卫队分途向敌人队伍军警机关袭击。炮兵团为敌人重要部队，当向它进攻时，我们人数不满百人，奋勇向前，该团兵士即表示服从与工人联合，将炮枪交出。警卫团于工人部队到达时，经某连长一呼，并无反抗，便即解决。此时各士兵与工人赤卫队会合，一路由沙河经东山过广九站而进攻八旗会馆，一路由惠爱东路向公安局及保安队进攻，其余则分向各警区进攻。当工人袭击八旗会馆时，士兵尚未到目的地，只由一个仅仅十八岁的青年工人同志，带领七十余人，武器则只有炸弹三颗，盒子炮一支，手枪一支，先将炸弹抛掷未炸，而反动的军队已群起反抗，故由正门无法攻进。于是工人分向各围墙爬进，徒手夺取军械一部分，觉悟士兵起而响应，始得解决。于是沿长堤收缴海军练营，新编二师等部，皆从梦中惊醒，绝无抵抗。转而向肇庆会馆二十五师部，该部顽抗，并用手提机关枪等利器向我们队伍射击，工友伤十余人，都奋不顾身，抵抗相持。

攻公安局系分两路前进的，当时保安队死力抵抗，总队长李某亲自指挥，卒因工友猛勇进攻，将队长李某枪毙。所驻的大队保安队，不敢抗，都被缴械。其时各路工友已分向城内各区将其攻下；其余制弹厂、电话局、电报局、政治分会、财政厅及市各机关，亦相继占领。西关七、九、十等区，亦于同日下午一时占领。所余者惟文德路四军军部，太平沙贮藏军械处，潮州会馆二十六师部数地。斗争最烈，亦为以上数处，而尤以四军部为烈。相持至十二日，大小数十次冲锋，炮声隆隆彻夜不绝，虽伤亡甚大，因工友亦死力相持，敌军卒不敢出衙门一步。至铁路工人将三路车站克复，广三工友更联合农民向沿路之敌追击。十二日午，市郊农民更派大队来会，共同作战。十二日午后一时，忽来敌军约一团，由观音山下沿第一公园马路，分两路向我们总指挥部猛攻。此时在省长公署（即赤卫总部）的工友有枪者约百余人，便即分两路迎战，并约车夫工人五十余人来助，公安局方面工友士兵亦汹涌杀来，敌始退去，我们复夺观音山。十二日午后九时，教导团全部因保全武装计，乃集中沙河向花县进击，黄埔一部武装战士亦于十三日早晨赶到，协同向沙河进发。此时广州只存三千余武装工友，然工友仍不稍却，誓死杀敌。

十三日早八时，敌人已四面包围。东由中流砥柱过河向东关广九车站等地进攻；石龙方面敌军约一团，沿广九路石牌站向东门进攻；北路约两团，一路由观音山向第一公园进攻，一路夺黄沙站向西关进攻；另由河南分队过海，一路由白鹅潭帝国主义兵舰掩护渡海，入黄沙与北路敌军会合，一路由反动海军掩护在石公祠登岸，一路由东关登岸与东路会合。当时闻报，工友即分途应战。东路由同志沈某负责，率同工友二百余人，与敌人一团对

抗，伤亡在一百以上，然犹死力支持。车夫工友某同志已伤足部，犹指挥前进，敌人卒不得不退去。西路工友在太平南路只剩一百余人，仍将敌军六百击退，追杀至大新公司堤，因石公祠敌人用机关枪向后扫射，工友已伤亡五六十人，仍死守太平南路。奈太平南路一带屋内反动分子，由窗口向下射击，工友又死去数十人，此时只存二十余人，犹在西瓜园死战。其余如维新路、观音山、广九车站、东堤等处均仍支持，争斗剧烈异常，敌人至一时仍不能进展。下午三时后，工人因子弹告尽，敌人又愈聚愈众，渐渐迫进，然在公安局前，犹作一很剧烈斗争，敌军亦死亡不少，工人虽已离公安局（苏维埃政府），而敌人四面用机关枪包围，至五时尚不敢进去。工人因受四面铁桶一般包围，且弹尽援绝，尽被屠杀。

当十一日早二时，工人喊杀连天勇敢作战时，反动的领袖张、陈、黄等惊惶失措，狼狈万状，张、陈均不及衣履，黄在十三日尚未穿外衣，沙面帝国主义者更骇怕异常，争相下舰去港。

十一日早夺得各地后，均严守其无产阶级态度，各机关抢出财物，均送苏维埃保存，各市民睹状，皆表同情，多悬红布，多送茶饭于就近作战工友。

十一日早夺得枪枝约五六千，将各赤卫队编练，而工人群众领枪去作战杀敌者不知凡几，在公安局前，省长公署前约有三万余人。另各工会及各占领地作战的亦共有二三万人。满马路都是工友，有枪的固去应战，即无枪者亦各做运输、侦探种种工作。群众的勇敢坚决，如汽车工友，除运输外，都能单独作战。三天内未得一饱。海员铁路工人都能担任指挥作战及组织群众等工作。罢工工友、人力车、菜栏、酒业、酒楼、茶室、打石棚厂及

其他各工友，均勇敢杀敌而牺牲甚多。

教导团兵士固忠实于革命，而被缴械的警卫炮兵团及保安队兵士，亦举派代表要求发枪，表示拥护工农，愿意参加战斗。即素来不过问政治的广东水兵，当在西瓜园开群众大会时，亦自动的派出代表参加，以示团结一致。

（四）苏维埃政权的成立

广州暴动是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行的，所以当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被暴动势力占领时，苏维埃政府也就出现。这一行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移转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立刻发生许多重要的任务：（一）组织苏维埃政权。（二）拥护苏维埃政权。（三）实行苏维埃的政策。（四）向反革命进攻。（五）打通与海陆丰联络的道路，使与农民暴动胜利区域相接，而建立革命基础。广州苏维埃存在期间很短促——尚不满三天，所以这些任务只实行了很少一部分。对于最后的两种任务，简直丝毫也没有实行。

至于前三个任务，则平民行政委员会发布宣言命令，宣布苏维埃政权的成立，组织革命的军队，以及消灭反革命势力的办法。平民行政委员会在暴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立刻开始实行政府的职权，它签字并公布广州苏维埃所决定的一切命令和宣言。它的第一件政府行为，便是发布告中国工农兵群众及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苏维埃政府的文件，都在广州最大的一家印刷局中印发二十五万份。平民行政委员会主席是苏兆征同志——他是一九

二五年粤港罢工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因工作过劳，在沪逝世）。苏维埃政府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一切革命军力，保卫苏维埃的广州，支配军械、军费及食粮等。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根据海陆丰的经验，建立正式的革命军队，从工人赤卫队，国民党军队中暴动出来的兵士，释放出来的政治犯，以及志愿投军的工人和农民中，组织成工农革命军。新成立的红军，其中一半以上是工人和农民。工农革命军的连排长和营长大多数是能够使用枪械的普通工人。反动的雇佣军队方法，完全取消，代以志愿兵的制度。军队的一切需要，完全用集体供给的方法（衣食住等）。苏维埃政府存在期间，从兵士到最高长官都没有支饷，而只领取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征发资本家的种种物品食粮。新组织的红军很快地便能有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纪律，因为党员和工会会员的组织的习性本来还好。广州的工人阶级，在革命军官同志的指导及兵士同志的帮助之下，开始学习军事，不但学着打枪，并且学着使用最近代的军事机械，如机关枪、铁甲汽车、迫击炮等。就是在最紧急的战事期间，赤军的每一部分之中，都进行极紧张的政治宣传工作，文字的口头的实验的都有，所以每一个赤军兵士都知道他为着什么而作战。甚至于在军事俘虏——解除武装的国民党军队之中，也相当的做了宣传鼓动工作。因此有几百兵士和几个军官，自愿的加入赤军，努力的为革命而作战，一直到最后，他们之中并没有听见背叛革命的事实。

苏维埃政府因为反动派顽强的抵抗，不得不极严厉的镇压白党（国民党民团等）。苏维埃政府设立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为歼灭反革命派工贼走狗奸细等的机关。工人表现真正布尔塞维克

的精神，努力歼灭并逮捕著名的剥削者反动派警察奸细走狗工贼官僚反革命派的军官。苏维埃政府尽它所有的力量去消灭资产阶级军阀的机关，毁灭警察，彻底扫除国民党在广州的军队。它围攻中央银行而占领了它——这是以前资本家的经济巢穴，但可惜因为打不开保险箱，许多金钱都未曾取得为革命使用。

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毁，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

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解除国民党在广州的一切党部，没收其财产，宣布通缉国民党领袖，并发布命令宣告通缉国民党政府人员。同时，苏维埃存在期间，实现了真正平民的完全民权主义，及革命的平民工农兵之完全的政治自由。

苏维埃的每一举动：它的发展，它的政策之实行，它的武装斗争，一直到它的失败，始终是受千百群众的拥护和一般贫苦民众的同情。女共产党员和女工也加入赤军作战。军队供给的工作，差不多完全是女工担任，他们帮助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传递消息机关，制造军用的材料旗帜，帮助运输工作，实行极广大的群众政治宣传，看护受伤的革命兵士和工人。苏维埃政府失败之后，有许多女工和普通妇女，因此而被白党（国民党）所残杀。

（五）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政策

当暴动胜利占领广州与释放政治犯的时候，一面组织武装力量，指挥作战；一面苏维埃政府平民行政委员会立刻便进行实现

工人阶级及农民的政治经济要求，反对剥削者的复辟。苏维埃政府就在新出版的《红旗日报》，公布许多命令，它的内容便在实现暴动的口号：

对于工人阶级，便是公布命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手工业小企业的工人也规定工作时间，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

对于农民便是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田界，各村各区即日成立苏维埃政权。同时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州苏维埃政府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暴动领袖彭湃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之农业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工农革命军。

对于一般劳动民众以及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则公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对于贫民取消一切税捐，取消一切债务，尤其是年关的债务，对于贫民则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归公有，没收一切当铺，将贫民的质物无价发还。

对于兵士，则宣布国有的土地分给兵士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各军部队之中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

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唯一工会组织，一切种种反动工会完全解散，它们的会员应当加入革命的赤色工会，资本家的走狗工贼组织（国民党工会等等）——白色工会的指导者和委员，应加通缉。广州苏维埃政府对于一般民众说明：白色工会中的真正工人会员也是被剥削者，我们应当

亲密的提携他们，团结全体无产阶级来拥护苏维埃政府。

这样工农兵都逐渐明瞭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城市的贫民，见着苏维埃政府的这些命令，也都公开的来赞助苏维埃政府，赤军和白军剧烈作战的时候，工人群众热烈的参加，但是不大会装置障碍物，有一个地方的救火队员，自动的开出救火汽车以为赤军的屏障。满街都挂红旗，好几千普通市民挂起红星标帜，赞助苏维埃政府的种种工作。一般积极的群众可说都站在苏维埃方面，广州在这三天之内，真正是赤色的苏维埃的广州。

（六）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虽然广州苏维埃政府实行直接的革命政策，得着广大群众的赞助，虽然极勇敢的保卫革命的胜利，然而在三天三夜英勇的斗争之后，广州苏维埃政府终究被敌人所摧残了，广州暴动终于失败了。简单的说来，广州暴动所以不免失败的客观原因约有底下几点：

一、反动军队的数量很多，他们立刻调动三师人，从北方、西方、南方三面进攻赤色的广州；开始炮击广州的是海军军舰，于是河南的反革命军队得以渡河，而且调动武装很整齐的民团加入攻战。

二、赤军的大多数是工农，他们在军事上没有经验。许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动之后才第一次开始练习放枪的。因为没有好的专门家训练，所以只有一部分机关枪能够使用。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炮兵，所以夺来的二十五尊炮，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则，工人没有知道巷战中架筑障碍物的必要。

三、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拚死命的用

一切方法来扑灭他们所痛恨的苏维埃政权。

四、帝国主义的列强帮助白色国民党的军阀，他们用尽了种种的方法。他们用许多军舰来反对赤色的广州。日本水兵在长堤登岸，开枪射击赤军，因此长堤的反革命军队更难肃清，使赤军费了一天的工夫，没有能把全力去抵御别方面进攻的白军。英国的军舰和商船救出许多的反动派和豪绅资本家，运他们到河南或香港，使他们能够从容集中力量来对付广州的革命。英国军舰“Moreon”号及美国军舰“Sacramento”号也派陆战队登岸。中国的反革命军舰，完全靠着英、美、日、法海军的掩护，而能运送白军，轰击广州。英国海军包围革命的海员加以逮捕。英国商船公开的运载白军。于是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在大英帝国的国旗之下得以渡河攻击赤军。

除了这些客观的原因之外，革命的指导机关主观上也有很大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广州暴动之社会基础还没有十分的广大。工农群众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群众的组织和团结的力量还没有十分的巩固，政治上发动群众的工作，以及暴动前党部与青年团自己各种准备的工作都太薄弱，暴动之前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同时对于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以致广州黄色工会（机器工会等）的领袖还能够骗取少数黄色工会的会员来攻击暴动。近郊农民运动也非常不够，所以暴动爆发后，广州附近的农民群众不能普遍起来援助工人。对于反动军队中的兵士工作也是如此，暴动方面虽然已经得到三四千兵士的赞助参加，但是李福林的兵士并未动摇，加以英、日帝国主义积极的组织反动势力，直接帮助他们反攻广州的暴动，于是广州暴动便失败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了。

第二，指导暴动错误之中的另一个主要点，便是暴动一开始的时候，不能一直取得进攻的形势。暴动主力军所攻击的地方，并非敌人的要枢，又未曾即刻占领军械局和兵工厂，以致不能扩大暴动者的武装。在军事的观点上看来，革命军事委员会费了太多的时间于肃清长堤反革命巢穴以及市内反动派的机关，而没有开始便举行对市外反革命军事中心的进攻，就是没有很快的进攻河南黄埔以及石龙，以便与农民暴动区域相联结（海陆丰离广州有五六天路程，经过石龙可以相联络），于是经过一些时候，李福林的军队由河南过江，暴动军便陷于反攻为守的形势。

第三，指挥上的不统一，工农行动联系的缺乏，暴动时又没有得着各地工人有力的应援。严格的说来，广州暴动中的指挥是有很大的缺陷的。暴动中未曾建立健全的集中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司令部设在公安局，赤卫队总指挥处则设在旧省长公署内）。赤卫队总指挥在赤卫队中并无普遍足够的威信，总参谋更是力不胜任，所以张太雷同志死后，红军与赤卫队便失去了统一的实际的领导和指挥。此时战争最烈者为观音山长堤及西关，虽然有些赤卫队从新编配，并派军事的人材当队长及指挥，但因工人对于军事知识的缺乏，同时因语言不通的关系，作战时亦各自为战。这种形势，也就使暴动失败后，不能有准备有计划的退却，以致遭受极大的牺牲。当时暴动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又很不充分，因此不但参加暴动的社会基础还不广泛，而且工农兵行动的联系亦很缺乏。再则当时武汉、上海无产阶级经过严重打击之后，还没有能恢复自己的气力，未能给广州暴动以有力的应援，甚至近在咫尺的汕头、香港的工人也没有鲜明的应援的表示，凡此一切都不能不使广州暴动的困难加增了。

这些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便是广州暴动不能胜利的主观原因，也就是广州暴动给予我们的重要的教训。

（七）广州暴动的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

广州公社的存在不过三天，英勇的广州工人不能开展它的革命事业。广州暴动之中，群众的热烈参加与英勇的斗争，都被反动势力所摧残了。虽然指导方面有很多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的伟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只有帝国主义的工具——社会民主党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才会说："广州暴动是纯纯粹粹的盲动主义，是绝对的军事冒险"。共产国际六次大会说："大会认为将广州暴动认做盲动的企图是绝对错误的。广州暴动虽是中国革命过去时期中中国无产阶级之英勇的退兵时的一战（Arriergard Fight)，虽然指导方面有很大的错误，但是仍旧是革命之新的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广州暴动之中，我们看见的是：变军阀的混战为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军阀的战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兵士群众推翻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反革命各派各种势力的联合，超过了革命的势力，战胜了革命势力。但是应当知道：广州暴动已经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受着三次巨大的失败之后，已经在许多次工农群众武装反抗，以求保持革命胜利，要使革命转入更高的阶段，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独裁而建立工农群众的革命独裁，而屡屡失败之后。广州暴动之前的这些斗争：广东四月间工农的武装反抗李济深叛变，湖南五月间的长沙扑城，湖南、湖北九月间的农民秋收暴动，八月一日南昌暴动与叶贺南征……等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保持革命而要

使它进于更高阶段的斗争，它们是有完全的权利来实行这种斗争的。这些斗争的最高的表演，树立新的阶段之旗帜的，便是广州的苏维埃暴动。广州暴动的失败，不能不使新的高潮，屡次要想抬头起来的新的高潮，受着最终的打击，而广州暴动的本身便成为过去革命高潮之退兵时的一战，同时，也使它成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的阶段——苏维埃阶段之旗帜。

不仅如此，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了，还有如下的政治结果及其历史意义是不能磨灭的：

第一，城市中的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出现于中国及整个殖民地的亚洲；被压迫及受列强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势力双层剥削的民众，用自己的力量把压迫者及剥削者的统治推翻了，建设起自己的政权，这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保持了三天，而列宁预言在殖民地国家内进行苏维埃革命的任务已经第一次见诸实行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不是纸上具文，而在事实上已经表现出东方民众的伟大的力量与何种政权真正能解放他们。广州工农兵用自己的力量所争得的政权，告诉全中国每个工人，每个苦力，每个饥寒交迫的农民与被压迫的兵士说：假使你们想胜利，你们必须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奋斗。

第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广州表现自己真正是革命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在一切困难争斗之中，勇往直前，俨然为一般争斗群众公认的先锋队。在上海暴动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还是与国民党共同行动的，但是在广州暴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表现出它是一个独立的阶级的力量，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为工农民主专政，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可以在百余万人口的城市之中，夺取政权而支持至两日之

久。它已经在全世界前面证明了中国革命往后的发展，一定要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

第三，广州暴动使无产阶级与农民结为亲密的革命联盟。成千成万的农民暴动，以前都仰望城市工人群众的帮助，现在已经成为工人暴动有力的响应者。在工人暴动的怒涛之中卷入了农民战争与兵士倒戈的巨波；在这一夺取政权的暴动之无产阶级确能领导起农民和兵士的力量。广州苏维埃的信用散布到全省最落后的地方去，传播到每个乡村，告诉每个农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得到土地。再则广州暴动之中，一部分广州反动军队的兵士宣布不再作军阀战争的工具去蹂躏民众，开始破坏了反动军队的纪律，倒戈向资产阶级军阀进攻，在灿烂光明的苏维埃旗帜之下，走向无产阶级方面来。

第四，八七会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使共产党的独立政治面目和独立政治主张，不能呈现在广大工农群众之前。广州暴动在事实上表现出共产党领导工农兵的伟大力量，提出为工农兵本身解放的政纲，建立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因此，不仅全中国工农兵士群众因广州暴动而认识了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即最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如《顺天时报》）和研究系的（如《晨报》）报纸，也不能不公开的说："共产党是有主义、有政纲、有群众的政党"，"共产党已经是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独立的力量"，而深深地为"无主义，无群众"的国民党和奉系军阀担忧着"赤祸之来，期或不远"！

第五，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特别是所谓"左派"的国民党，经过广州暴动之后，他们的丑态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汪精卫、陈公博等自称在广州暴动失败后三天之内，屠杀广州暴动工人至

五千七百余人。这些嗜血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暴动之中充分表现他们是工农群众革命的死敌。他们的丑态掩藏不住了。

第六，广州暴动不仅是中国革命中英勇的模范，而且它真正的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奋斗，自始至终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之一幕。指导暴动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工农兵群众之夺取政权，不独反对国内的剥削阶级，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广州暴动已决定领导革命民众直接反对国际财政资本在殖民地之统治，苏维埃政府的政纲之主要的一点，便是与苏联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广州苏维埃政府在第一次宣言之中已经向世界各国觉悟的工人阶级请求帮助。

帝国主义者对于广州苏维埃政权之出现极为仇视。列强的驻粤领事都公开的帮助中国反动派，派船替他们运兵，以便进攻广州。英国在华出版的报纸鼓吹扑灭苏维埃的广州。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残酷的白色恐怖之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指使者，仍旧在香港与沙面之内。国民党资产阶级不知羞的完全降伏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广州暴动之后不特成为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参谋部，而且是帝国主义强盗的直接争斗机关。帝国主义希望得国民党之帮助，把半殖民地的中国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国民党因为帝国主义者帮助它镇压下了苏维埃的广州，便向帝国主义者供献下列的报酬：无人道的枪决苏联在广州领事馆之馆员，逮捕所有在广州之苏联国民，宣布与苏联断绝国交，凡是在国民党地域之内的苏联驻华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概撤销承认，驱逐出境。这些行动完全与张作霖一样。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在工农革命第一次露面之时，便破坏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战线，而在广州暴动之后，更完全的投降了帝国主义。苏联是他们主要的仇敌，因为苏联帮助一

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到底。

广州暴动既然有这样伟大的世界的历史的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正式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则更在告中国工农书里高高估量广州暴动的历史地位，现在让我引它的话来做我这章书的结论罢。

> 广州暴动已经深入劳动群众的意识之中，这是中国工人之伟大的英勇的模范。将来广泛的工农群众暴动，组织在列宁主义的彻底坚决的策略之下的，得着国际无产阶级之赞助的——必定要成为中国之胜利的十月革命。
>
> 统一独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
> 受压迫民族的暴动胜利万岁！
>
>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第五章 中国大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

第一节 中国地主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

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结构，是其政治组织的基础。中国因为处在半殖民地的特殊地位，所以此种阶级结构，比别国更为复杂。封建制度在别的国家，差不多早被摧毁了；但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直到现在依然保存着。中国革命第一个开刀的，就是封建阶级，而第一个公开反攻革命的也就是封建阶级。这个阶级是最喜欢有人帮着它抢到大地盘以刮地皮（军阀），或者向外国借债而自己拿大回扣（买办），以及握着统治权，没有"暴民"造反，而"平平安安"过日子（地主）的。革命的刀锋指到帝国主义，等于指到它的祖宗，它立即起来与革命为敌了。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占有着大量的土地，对于农民的剥削非常残酷，而且地主越小，它的剥削方法越凶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要破坏中国封建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为便利于它的侵略，却又转而维持中国封建关系，结果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剥削竟发生利害与共的关系，而且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要组织操纵中国的经济，必须有一种“中介”——就是买办阶级。中国买办阶级的来源之第一种，便是旧时贵族地主阶级。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扶助，另一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支援。中国军阀代表一种社会政治的力量，统治了中国的大部分。中国军阀的国家组织之存在，乃建筑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帝国主义便和中国军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高利贷商业资本等勾结起来以共同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因此使中国广大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被逼得更不能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盘剥商人等的奴隶待遇，及为城市和军阀供给几百万苦力和兵士。所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变动，这些事都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之整个的责任。

中国买办地主阶级根本上是反革命的。但事实上中国革命之中，在它最初的一阶段，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也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参加”。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商业化的豪绅地主阶级，尤其是南方广东等处的，便“参加”革命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个缘故我在前面第二章中已经说到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要使中国豪绅地主商业化，同时帝国主义为着自己的利益，乃又保持这一阶级在封建剥削的阶段上，加强地方市场的发展，经过它来吸取中国农民的膏血。这些地方性的商业豪绅地主阶级，利用急遽破产失业的农民（土匪）之雇佣军队，扩张了自己的政权；那时它们看见北洋军阀正统治着中国大部分的地盘，外国帝国主义都承认北洋军阀是个总的政治买办——中央政府，帝国主义一切大的借款都只经过这个总买办，于是它们不得不起来反对北洋军阀。他们即使不能立刻取北京政府的卖国资格而代

之，至少亦要割据一方，要求帝国主义御赐的剥削中国民众膏血权利之一部分，要求分润帝国主义给与北洋军阀卖国赏金之一部分：例如列强帝国主义承认北京政府，所以将“关余”给它，那时广州政府便说，至少我也要一分，——“请把粤海关的给我罢”。直到一九二六年广东北伐，也仍然有一部分南方军阀买办地主（例如桂系军阀等）躲藏在“打倒军阀”旗帜之下“参加”了革命，自然客观上当时广州政府与一九二六年北伐都负着革命的任务，但是这些南方军阀地主的目的却并不是来革命，乃是为抢夺卖国的资格和权利，中国豪绅地主阶级是如此这般来“参加”革命的。

再则，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扶助，另一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支援。发生这种制度的原因便是因为中国农民群众破产失业急遽而广大，正式军队容纳不下，于是便弄得遍地皆匪，而匪的首领便是当地的大豪绅，豪绅可以替土匪买枪走衙门。这种豪绅率领下的土匪往往不抢本地而“向外发展”。国民党式的军阀，大部分便是这种性质。中国社会巨大的“游民化”——造成二十年来的兵匪现象，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反帝国主义革命巨大开展的原因之一。如此生长而向外发展的无量数的小军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居然也会在孙中山“领导”之下来“参加”革命。这是客观的事实，这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崩坏的结果：这些豪绅地主都和地方市场上的商业资本，尤其是货币资本（Nonetauy Capital——钱庄、当铺等）有密切的关系，全中国的这种商业货币资本有集中的积累的趋势，它内部的竞争倾轧非常之剧烈，破产而失业的数量也非常之巨大。这些斗争，大半是以地方同乡团体或其他宗法社会

关系（如同姓、亲戚、同学等）的团体之互斗来表现的。豪绅地主阶级所以成为一个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共同维持着半封建性的对于工农的剥削制度。过此以往，他们内部的斗争是复杂到万分的。二十年来中国各省小军阀的互争，就是这种表演——四川、福建是最明显的例子。国民党的“革命”，——表面上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来领导，但是事实上不能不是“尾大不掉”的领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能靠着收拾这些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来“革命”。所以国民党的军队之中，分着广东派、广西派、湖南派、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以及其他七系八派等等无数的派别，派别之内又有派别，就是蒋介石的黄埔军队也已逐渐同化于这些性质的军队。这些派别，各自都要伸张自己的军队，各自都要向外发展，扩充地盘。他们之间的冲突矛盾混战是不能解决的，除非兵士群众起来推翻他们，起来与工农联合自觉的参加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确使封建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动摇到封建势力的基础，可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叛变，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又相当恢复起来；农村中依然布满着封建关系之残余，阻碍着中国整个经济之发展。自然这种封建势力的暂时恢复，只是一种“回光反照”的表现。暴烈的土地革命斗争，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继续的爆发，工农的红军在农民斗争中一天天生长起来，苏维埃运动一天天扩大起来，它的前途，将要得到正在复兴的城市工人阶级斗争的领导而走向最后的胜利，以彻底扫除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

第二节　中国大革命中的民族资产阶级

“愈往东方，资产阶级愈卑鄙，愈往东方，资产阶级由革命跑到反革命的速度亦愈快”。中国资产阶级在前一时期革命阶段中，也曾参加过革命斗争，也曾参加过初期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可是它的革命性是很有限的。它不但不能赞同农民的土地革命，并且不能够彻底实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本来很短，直到五四之后，民族资产阶级才渐渐抬起头来。国民党改组是在五四之后，学生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的结果，是民众的革命势力之集合。那时资产阶级渐渐的觉到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五卅之后，民众革命行动大大爆发，共产党独立的组织与影响大大开展，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勇敢起来了，公开的参加革命。它同时感觉着两件“新玩意儿”，以前所没有的玩意儿：一是它可以利用民众力量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革命领导权了；二是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行动和组织对于它太危险了。这是矛盾的两件玩意儿，但是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八字”矛盾，说句笑话便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命中注定的矛盾。当民族资产阶级，只估计自己的力量，它是太弱了。同时它又不愿意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醒觉起来，然而等到它看见已经有组织好的革命力量，可以利用来反对帝国主义，那它就更加勇敢了。敢于提出比较坚决的要求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到五卅前后是怎样的勇敢起来呢？那时它与豪绅地主买办阶级分化已经比较明显了，它一开始便比较勇敢的赞成国民党改组。为

什么？因为它要取得国民党军队的领导权，它模糊的懂得可以利用党权来支配军权。黄埔军官学校的作用，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的，军队中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也是如此的。三月二十日以前国民党改组以后，汪蒋国民政府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若即若离的联合，其意义正是它为取得军队起见，要利用种种“赤化政策”与豪绅地主阶级争取军队的领导权；同时，也就是与工农小资产阶级争取国民党领导权之准备，民族资产阶级是如此这般的参加左派的。在这时期之中，若即若离的联合，最明显的表现于西山会议派的联蒋倒汪的政策。西山会议时期（孙中山死后至三月二十日）的形势是：民族资产阶级已经造成一部分兵力，在两次肃清东江之后，蒋介石的地位提高起来，当时在他面前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五卅后粤港罢工的极伟大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二是广东已经开始的农民运动——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对于反帝国主义是赞助的，是要利用的；对于土地革命是反对的。当时事实上土地革命方才开始，形势并不紧张，还只有农民运动，而没有直接提到土地问题，至多还是农民与豪绅开始争夺地方上的实际政权；那末，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这种农民运动是“中立”的，然而提到土地问题的本身，它便不能不坚决的反对了。“汪精卫于民国十四年六月沙基惨案后，在广东对鲍罗庭十二分奉承意旨的时候，鲍罗庭叫汪精卫起草一篇主张用土地革命政策的议案，托孙哲生先生带到上海和许多中央执行委员商量，后来幸被戴季陶先生等打消了。”（见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十三期刘芦隐的《革命与反革命》）。

总之，广州国民政府时期，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是民族资产阶级拿着自己的妥协政策如“单独对英”、

"希望日本人回东方来"等等口号，参加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它一开始便站在革命与反革命的交界点。它对于豪绅地主阶级已经渐渐开始变更策略：以前它曾经加入左派，藉以反对孙大元帅的旧部——黄埔以前的"革命军队"，现在自己有了军队，但是力量还不够，它可以并且必须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利用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以逐渐团结将来反革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它在当时固然还是动摇犹豫于两方势力之间：一方面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别方面是豪绅地主阶级反革命的开始。戴季陶出席西山会议，随又偷偷的逃席，这件事是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真。然而客观上说来，联蒋倒汪的策略，显然是豪绅地主阶级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薄弱，利用它不能独立克服它所愿意抑制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势力与左倾政策，而来勾结它，奉承它，拥护它做右派与左派争国民党领导权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以争军队的手段，争取豪绅地主阶级式的新军阀在孙大元帅政府之中的实际政权。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应当如此说明。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党权"将近完成这一斗争。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独没有独力反革命的力量，并且也没有独力革命的力量呵！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廖案以来革命左倾政策，都在无产阶级以至农民群众斗争大发展的背景之上。这时代民族资产阶级是借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打击豪绅地主阶级。革命的发展，使领导权日益落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联盟之中日益感觉到：自己所利用的群众力量及国民党的"党权"快来利用自己了。所以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事实上已经是汪精卫的领导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已经达到顶点了。这时候西山会议开过了，右派要求开除汪精

卫，同时已经对蒋介石说过：你被利用了！当然，那时帝国主义的劝告和警告也很厉害了。联蒋倒汪和"优秀华人"的赞赏是同时并进的。于是民族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阶级一度分化，一度争夺军权之后，急于转变而为联合豪绅地主阶级，洗刷自己身上的"赤化"，而与无产阶级争领导权。确言之，便是更进一步的争取小资产阶级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三月二十日政变便在这基础上发生了。它是如何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呢？它是否以"对小资产阶级让步以巩固联合战线为政策"呢？不是的！它在这种问题上，并没有犯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它是以打击小资产阶级的手段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三月二十日之后，甘乃光、陈公博等左派纷纷投降蒋介石和李济深，汪精卫是临阵脱逃，是被驱逐了。蒋介石虽然曾经抑制西山会议派，但是他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在政治上是得着西山会议派以及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孙科等的助力。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革命，是必须得着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力量，甚至于短期间听他们的领导，听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一九二五年底西山会议时期，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必须受第三国际的领导，并说"听鲍罗庭的话，就等于听总理的话"）。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反革命，也是不能缺乏豪绅地主阶级的助力以至于领导。

五卅之后，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得着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总动员。民族资产阶级大大的勇敢起来，它仅有的那一些些儿革命作用充其量的表演出来。它要踏在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头上，来取得政权。于是党政府便应运而生，——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可是，群众的头也不是好踏的！当群众挤进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等大唱其党权，由国民党中央委任国民政府的时

候，这一政府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确具有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作用，但是它对于豪绅地主以至于资本家，却是很脆弱的保障者，它不但没有权利压迫工农，它并且“放纵”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于是豪绅地主大大反动起来。于是资产阶级也动员了，它对豪绅地主说：汪精卫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我来保护你。从此三月二十日政变及五月十五日的党务整理案出来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党权”抑制豪绅地主阶级的“军权”之后——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之后，它进入建立自己的“军权”（三月二十日）和夺到自己的“党权”（五月十五日）的阶段了。

可是国民党的党权是什么呢？它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所能创造的，它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力量所创造的。五月十五日之后，客观上中国革命继续五卅运动急转直下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它开始“反革命作用”之后，却还没有完结。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力量正在发展膨胀。北伐从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宣言，七月底蒋介石出发，十月十日占领武汉，这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和左派与共产党结成联合战线，因为如果没有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之有力的赞助，便没有继续作战之可能”（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十一期，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社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之任务》）。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期间显然是抱着军事的进攻政策，企图在北伐过程之中，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军事力量。

中国革命对外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当中国革命在工农群众急剧的发动之中而进展的时候，帝国主义的特权受着了很危险的打击，最明显的例，便是汉口九江的租界由武汉九江的工人苦力收回了。当这种时候，帝国主义以全力来反攻，它派

大军镇压上海、汉口，以武力干涉相恫吓，以经济封锁来箝制，炮击南京，封锁长江，这正是四·一二惨变以前的事情。当时，工农运动的爆发，战争的扩大与延长，交通的阻隔之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再受着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威逼箝制，它唯一的出路，只有反革命，只有投降帝国主义，去做新走狗。帝国主义乘机反攻，在金融上商业上政治上的进逼，并不是逼着中国资产阶级更革命些，而是逼着它决然的反革命，逼着它向中国工农进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着封建阶级限制其经济发展，又遇着帝国主义，以更厉害的资本，排挤它的资本，并且帝国主义还与封建势力联合着维持旧的经济制度，维持不平等的束缚，给它大大的不利，所以它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开始时，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人阶级在向帝国主义争斗时，它曾加以赞助过，因为它很想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打击一下帝国主义的势力。但是它自己的工厂里也有工人，这些工人与外国厂的工人，一样要吃饭穿衣，一样要改善生活的，他们看见外国厂中的工人生活改善了，当然也会团结自己，并且要求改良生活；而且这种斗争，在同时可以更强大工人的力量，更积极工人反帝国主义争斗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看见自己也要吃亏，而且看见工人阶级力量的扩大于己不利，于是戴季陶主义与三月二十日事变相继出现。

加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多半都从买办、地主蜕化而来，与豪绅地主阶级有很密切的关系。那时革命的浪潮已经走到开始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在湖南、湖北、广东都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虽然铲除封建势力，是大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不能和农民联盟，以彻底肃清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相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却宁可和豪绅地主阶级联盟来

反对工农革命势力，以保存封建残余，维持帝国主义的统治。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剥削，而中国巨商资本家、银行家、工业家的主要赢利的大部分，都是与剥削农民有关的。豪绅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是勾连着，结了不解之缘。土地革命的浪潮一到，即使没有帝国主义反攻进逼的原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必然要完全走到反革命的道路。

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一方面使它参加民族革命，同时又时时选择机会以便掉转头来限制束缚以至于破坏工农运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薄弱，但在最近十几年来，特别是在欧战期间，终究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而且中国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民族工业独立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着外国资本的压迫，它是想关税自主，想取得帝国主义多少的让步。它当初想利用工农民众力量去吓吓帝国主义，它也会喊几声“世界革命万岁”。这时候它便想同时和帝国主义磋商，得些让步。帝国主义方面表面的让步是做的！但是它同时以威力压迫中国革命，威迫中国资产阶级替它镇压工农。工农民众力量的发展也正在根本扫荡着中国的封建式的剥削，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资产阶级想着：它如果镇压了工农，一则可以自救；二则可以在帝国主义之前邀宠，帝国主义可以因为他们已经反赤，而实行应许的让步。于是经过一些事变的过程，结果资产阶级便公开转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在帝国主义支配之下，建立了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这种变动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彻底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只能囿于自己狭隘的利益，然而结果还是投降帝国主义，这便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困难之一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革命的结

局，因此绝对不能像取消派陈独秀先生们所说："中国一九二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其实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只有封建势力得着暂时恢复和帝国主义得着对华侵略重新筑固的地位。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因此就完全放弃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政纲，但是这一政纲的本身只是一种经常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实际不能不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屈服于帝国主义之下。帝国主义指挥了、帮助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封建残余暂时打退了中国工农革命，但是却不能帮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去进行什么经济的建设与政权的稳定呢！取消派陈独秀先生们由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变成资产阶级的歌颂者，但是他们的论调完全经不起事实的一击！

第三节　中国大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

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缓慢的关系，所以小资产阶级便十分众多。这一阶级在中国大革命中也处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大革命的第一时期，即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中国小资产阶级自然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有些还曾被革命春潮拥到威权山顶上去过；到第二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反革命以后，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即武汉时期，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根性必然是动摇和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坚定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就

更容易跟着资产阶级走，武汉政府的反动，一方面亦就是这种表演。

中国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数量，其中下层群众如手工业工人、店员及一般城市贫民等，因为他们自己经济状况的关系都很需要革命,在过去大革命中他们有过很大的作用,以后也还是一种革命力量，无产阶级应该坚决的领导他们。青年学生群众大部分都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因为受着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政府压迫及对社会种种不满的关系，对于中国大革命曾尽过很大的责任，甚至有一部分先进分子还加入过工农暴动的队伍；但也正因为他们是动摇的小资产阶级，自己根本没有独立的立场，所以随着革命迅速发展和社会阶级的强烈分化，于是反动的反动，畏缩的畏缩，脱逃的脱逃，许多从前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便都从革命战线中脱走了。自然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失败的结果，一般贫苦青年学生群众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一个没有解决，所以仍旧须要继续革命,只要无产阶级政党及青年团能够用正确的策略领导他们。

至于店东、小厂主以及所谓中小商人等上层小资产阶级则有他们各种特性，他们在工商业发展的区域里，常常经过股份公司等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发生关系。而且工商幼稚的中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之中得很多赢利，别方面中国经济崩败而失业众多，逼着农民忍受极多极重的剥削，只能接受极苛刻的租田苛约，负担极重的债息；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拚命的安顿自己的资本到土地上，买田买地，放高利贷去剥削农民，所以中国小资产阶级有很多兼做小地主。同时，店东、小资产阶级对于店员、手工工人，也因为自己处于极困难的竞争挤轧之中，剥削的程度往往比大资本家工厂主，还要厉害；他们比大资本家更不

能容忍什么劳动运动。因此种种，无论小资产阶级、店东、厂主，如何受着帝国主义的压榨，受着大资本家豪绅地主的压迫，新旧军阀政府的的苛捐杂税，但是他们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他们一遇见工农的剧烈的斗争，一遇见真正彻底扫除中国的土地剥削制度的革命高潮，一遇见侵犯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他们便宁可去投降帝国主义，去受豪绅资产阶级的压榨，转过来替他们当走狗。这种店东、小资产阶级，在武汉政府反动时期，就明显的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拥护者。他们可以有时候反对这种统治，不满意这种统治，可以做动摇变换的各派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互相争夺时的某一方面的工具，但是他们更坚决的反对土地制度的变更，反对劳动运动。

土地革命之中，以及一般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希望与店东、小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这种小资产阶级成为一个革命的力量，——这都是使机会主义的发源的幻想。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点事实。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破裂联合战线的时候，那豪绅地主阶级内部各派各系之互斗，也在宁汉分裂战争的掩护之下，双力摇着新式的旗帜进行。因此，当时南京所形成的反革命中心，是以民族资产阶级做领导，结合东南的豪绅地主阶级，复以革命的口头禅及种种虚伪欺骗政策，对外抗争的激昂态度（仅仅态度而已！）等等，去争取上海暴动期间革命热情正冲动的小资产阶级，以进攻无产阶级及农民的革命斗争。同时，当时武汉所形成的革命中心，应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形成，应当在剧烈斗争的过程之中去提高并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去抑制以至排除武汉内部的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势力，而力争民权独裁之实现。宁汉的分裂，并没有划然分明的使武汉之

中立刻实现纯粹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时的武汉之中，不但有资产阶级的势力，并且豪绅、地主阶级还握有极大的权力。武汉内部的斗争，和武汉与南京的斗争，有同样的社会内容，就是工农的彻底的民权革命与豪绅、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相斗。武汉内部的分化，在武汉政府尚未完全成功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小资产阶级大言不惭，而在行动上却懦弱无能，且怯于冒险牺牲，他们的商业交易和他们的金钱出纳之小规模性质，特别容易影响到他们的精神，使其缺乏坚定性与进取心，当然类此的性质也反映在它的政治事业上。武汉领袖在当时，真是“所能见到的，只是责难太多了。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企业界的亲戚，以及据有土地的豪绅，都对他们警告，这使懦弱的他们发生恐惧。”（美国 NATION 周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号）。反对蒋介石、李济深的唐生智军队，湖南的豪绅、地主阶级的势力，同时对工农进攻，勾结湖北的资产阶级之孙科等等也向工农进攻，他们的背后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封锁政策督促着。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店东小资产阶级，是在豪绅资产阶级率领之下而恐惧动摇。当时就是共产党的中央以及地方指导机关，也跟着小资产阶级动摇，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其结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之广大的热烈的斗争，领导小资产阶级去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要领导无产阶级去抑制农民的斗争，去停滞革命，以至于出卖革命。这是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实现？当然不是的！这一联盟是受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以及共产党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的妥协而恶化了，而丧失其革命性了。武汉政府的反动，中国革命中心的消失，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而动摇，当然是革命暂时失败的又一表现。此时小资产阶级的店东，他们怕革命，比怕反革命还要来得厉害。他们梦想

着祈祷着“资本统一战线”的胜利，以反对手工工人、店员的进攻。小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威胁，日渐惶恐失措，最后终至屁滚尿流。夏斗寅五月十七日的叛乱，许克祥五月二十一日的长沙政变，更将他们吓得失去神智了。“夹攻中的奋斗”，是汪精卫反共后的名言，其实小资产阶级当时早已在夹攻之中了：一方面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握有经济的枢纽，小资产阶级处处受着他们的挟制；别方面工人、店员、农民的革命运动，客观上形成“第二政府”，又使店东、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受着很大的威胁。他们在这种夹攻之下暴露了他们懦弱无能之后，便滚入反革命营垒中去了。

再则，中国的社会阶级本来还有一种特性，便是破落户的小绅士也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在几百年来中国式的专制政体之下，同时又在非世袭的阀阅制度之下，他们在穿长衫体面绅士之中也可以列名，尽可以于中国式的地方政权中，享受些半贵族式的特权。因此他们在北方军阀大买办阶级统治之下，他们不反对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因为他们自已算是“正绅”，并且欢迎这种口号。等到平民群众真正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了，“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被几十万工农群众轻轻加上一句“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注解，那就不得了了，天翻而地覆了。工人、店员的要求本来并不过火，农村斗争本来还没有发展到应有的激烈程度，然而小资产阶级却有不少因此狗急跳墙的反叛革命了！

第四节　中国大革命中的农民

中国革命从无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之后，尤其是二七以后，

已经引导农民群众的斗争走向新的阶段。一九二四年以来，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的运动发动不到两年，便急转直下的到了政权的斗争，到了争土地的斗争。一九二七年一年，尤其可以说是全国普遍的农民暴动的一年；虽然他们还是互相隔离，还是此起彼落的发动，还不能集中联合起来，因此也没有能得着大范围的胜利。但是农民群众在斗争中已经不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这是从前中国以至西欧历史上许多农民暴动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已经有一个可以依靠及可以领导他们的坚固而忠实的同盟者（无产阶级），他们的倾向与要求也已日渐明显起来：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并且要求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之建立，要求彻底肃清中国封建制度的残余，改变旧的土地关系。农民之中不但一般佃农要求土地，贫苦不堪的自耕农也要求土地，尤其是失业的贫民苦力要求土地十分迫切。他们同时要求取消一切债务，铲除一切豪绅地主的权力。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重租重债等等），军阀的战祸，帝国主义、买办商贾的搜刮，使极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穷苦万分，即使是自己有几亩田地的，也都简直不能生活。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万分的紧迫。中国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搜刮原料，输入商品，制造军阀的战争，使极大多数的农民迅速破产；但是工厂之中却不能容纳这些“劳动后备军”，于是他们大都变成所谓“游民”、“土匪”以至于兵士。这些一切情形前面第二章第二节都已详细分析过。这种巨大数量的游民，要求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客观上也是要求土地和工作。二十年来，军阀豪绅一直用战争屠戮来延宕这一问题。但是广大农民群众既然得着无产阶级的赞助和领导，便不能不看见自己的真正出路：实行土地革命。一九二七年

四五月间农民运动公开的时候，吴稚晖、胡汉民、汪精卫、顾孟余等，就痛骂流氓地痞的农民运动，痛骂甚么“二十世纪的张献忠、李闯”，正是因为农民运动之中失地失业的贫民站在最积极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大革命之中，农民群众的革命力量是很伟大的，大革命中最有力量的，除了无产阶级，就是农民群众。一则中国农民群众有极广大的数量（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二则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促使他们不得不勇敢斗争。在一九二六年整个北伐战争的过程中，湘、鄂、赣等省的农民群众大都直接参加作战。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实际上是当时北伐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原素。农民协会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到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间，湖南一省农民协会的组织居然发展到一千万以上人数的广大范围，很多地方农民协会事实上都变成第二政权。革命向前发展，减租减税的口号都已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要求，一九二七年开始以来，农民的土地革命，尤其是在湖南，已经急剧的进行，有些地方农民都自己动手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则插标预备分配田地。武汉政府的迅速反动，便是土地革命深入的直接反映。

武汉政府反动之后，土地革命的斗争仍然是突飞猛进，马夜事变首先激起湖南几十百万农民群众直扑长沙的英勇奋斗，此次英勇的行动如果不被当时共产党机会主义的领导所断送，毫无疑义的要成为国民党新军阀许克祥、何键等反叛革命严重而且实际的答覆。其后整个国民党公开反叛革命，用极野蛮的手段屠杀农民群众，秋收暴动还是到处爆发；农民游击战争，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的行动还是如火如荼的进行，特别是十月间的广东海陆丰等处农民暴动获得胜利，真正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根本铲

除旧土地关系，推翻豪绅地主统治，第一次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总之，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广州暴动前后，中国许多省份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实在充分表明中国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如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消灭乡村统治的地主豪绅等。当时这种农民运动的范围不但展布到江浙等地，而且一直蔓延到中国北部与满洲（直隶京东玉田暴动与奉天“刀匪”暴动等）。当时特别显著的情形，是农民运动的带地方性与不平衡发展，这一方面有它的客观原因，如地方的辽阔，交通的不发达与各地经济情形的差异；另一方面实由于农民群众的散漫与缺乏组织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缺乏集中的指导与配合。

同时，当中国大革命中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要求亦显有差别。在中国南部与中部一带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处，无地的农民占乡村人口大多数，其斗争的主要的方向在于反对地主阶级，夺取土地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北部如河南、山东、直隶、满洲等处，则大半为小的自耕农，其斗争的方向，大都为反抗军阀、官僚与豪绅等的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拉夫、派款等的剥削和打倒军阀政权，这就是破坏封建土地关系的另一方式。当然，同时在北方亦有佃农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不过主要的还是自耕农保持实际的土地所有权的斗争，广大农民的组织，也多半还是停留在原始的半封建的红枪会、大刀会等形式之中，农村的阶级斗争还不激烈，斗争的领导还操在中小地主与富农的手里。

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一般的说不是纯粹的乡村资产阶级，而是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所以中国富

农与俄国富农有不同的社会实质。俄国富农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前，代表着农村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与地主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因为地主的经济势力完全建筑在封建剥削上。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削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中国富农之这种社会实质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在这里，外国资本的统治自然有不少的作用。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国家中，外国资本扶助与利用这种落后的半封建的关系，使这种东西服从它的统治。外国资本阻碍着中国农村经济之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阻碍作用使农村中因商品货币经济而发生的阶级分化，表现着各种奇怪的形式，就是由于保存着农村经济之半封建式的关系。在这里再加中国土地关系的特点（参看前面第二章第二节之（三）项），使中国富农应用雇佣劳动所得利益反不如对农民群众用半封建式的剥削。中国的富农，将土地出租兼放高利贷资本，在经营自己经济的时候，不愿将资本用在改良土壤及整顿水利上，它要使自己免除军阀战争及一切破坏的责任，不受饥荒的痛苦，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重担，一并放在佃农群众的肩背上。中国农村中之过剩的人口，大多数农民没有充分的土地，使富农以及一切地主，可以利用其资本与私有的土地以施行野蛮的佃租与高利贷的掠夺。因此，进行自己的经济租取土地，应用雇佣劳动而努力生产的富农，在中国确实非常薄弱。中国富农之另一种形式便是半地主。依据这种特质，所以中国富农分子在农民运动初起的时候，还可参加反军阀、反豪绅地主的斗争，但是它就极力想夺取这一斗争的领导权。到了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尤其是在斗争失败的时候，便很快的而且公开的站到反动势力方面去，反对农民群众斗争。

另一方面，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也已经日益激烈起来。由于不了解中国富农这种社会实质，因此发生联合富农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这实在是很严重的错误。其实在中国革命斗争条件之下，不仅对于半地主式的富农，应坚决的与之斗争，就是对于在中国比较少的这种自己进行生产的富农，也是要一样的应用。对于他们，党同样不能放松了雇农的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使自己活受富农态度的支配，我们在行动中不能对于富农有任何一些的让步。这才是正确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

第五节　中国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处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资本家数重压迫之下，它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先锋。从一九二一年工人运动发生以来，工会的组织运动，罢工运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实际上呢，这些运动紧跟着五四以来的排日民族运动而来，足见是当那商人、学生的斗争疲弱下去的时候，独有工人阶级继续着革命的斗争——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资本家。海员罢工，唐山罢工，京汉罢工，先后继起，的确给国内国外的反动势力以重大的打击。这一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民族运动之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猛进，国内的民族革命运动便渐渐有兴起的势头，于是资产阶级也跟着抬起头来。同时军阀和帝国主义也很知道：如果能够摧残了这一支生力军——职工运动，其余的什么商会，什么民意都不足惧了。因此，京汉总工会被封时的大罢工，受了二七屠杀的大

打击而失败之后，不但北部铁路工人的工会完全受摧残，不但全国的职工运动都受着镇压而趋于消沉，而且不过半年，直系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天天高压下来，曹党驱黎，贿选成功，全国各阶级都屈服在军阀淫威之下，而且接着便暗助陈炯明以全力图粤，以谋摧残当时民族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总之，这一时期，因为工人运动受军阀的镇压而消沉，其余一切进步的解放的争自由争民权的运动，都连带着而镇压下去。这是二七以后两年来的事实。

二七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职工运动虽然表面上有一时期的沉寂，然而实际上各地的工人运动仍旧不断的向前进行。客观上的状况稍稍松动，工人阶级便开始反守为攻的斗争。湖南水口山矿工工人的罢工，北方铁路工人的全国铁路总工会运动前仆后继的发展，江浙手工业工人，上海纱厂、纺织业、烟业的工人，也是屡起屡伏的和中外资本家奋斗。虽然结果大半失败，然而二七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却在增高，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力日益增进。加以陈炯明猛攻广州的时候，南方劳动阶级都积极的赞助革命势力反抗这一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失败之后，广东方面的工人运动便得着些公开的可能——工人代表会组织成功，工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日趋激昂，由民族意识而进于阶级意识的倾向日益鲜明（沙面罢工，反抗商团等）；海员工会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组合。南方民族革命运动因有工人阶级的这种积极参加，力量便一天天增长起来；南方的职工运动本身又在向前发展，这两方面的潮势自然也影响到北方来。于是在这中国民族的总斗争日渐兴起的时候，工人阶级自然力求奋起而领导它。一九二四年以后，北方职工运动虽然没有得着急进的机会，然而职工运动反

守为攻的趋势和民族运动的兴起，大致有同时并进的形势。到一九二五年二七纪念节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的举行，则已经是五卅运动的前夜了。

五卅反帝国主义怒潮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在二月间便已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厂内的经济斗争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敢的斗争一直支持一年半之久；一方面省港罢工与民族抵制竟使香港变成荒岛，另一方面广州国民政府便在罢工工人力量之上建立并相当巩固起来。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工人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天津方面，则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发动罢工，接着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加入；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后来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李景林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河南、南京、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一不是工人阶级做先锋队。总之，五卅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

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敢、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它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得最厉害的，它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斗争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它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它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而扩大这一运动的范围。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

吉了同志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日出版的第一百二十三期的《响导》周报上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工人及其工会在此次运动中的作用》，描写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非常深刻，现在我可以引它几段在这里：

> 几十万工人罢工，使外国工厂停止工作，使上海、香港这样的码头寂然无人起货，这个对全运动有何等重要的经济政治上的意义！帝国主义者所引以为忧愁恐怖和危险的，正是工人的罢工。伦敦、东京、纽约的政府，为着这个，以十分小心并异常惊怕来处理中国发生的事件；北京外交团，为着这个，引起了分裂；帝国主义者及其报纸，为着这个，坐卧不宁，惊惶失措，恐吓

也不好，甚至假意恭维也不好。

我们设想，假使工人罢工一旦停止了；那么，单是学生和商人运动的影响，必定及不到现在上海、香港工人对于帝国主义的打击千百分之一。

中国无产阶级，在近年民族运动史上，早已做过几桩光荣的事业。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的罢工及去年（一九二四年）夏天沙面罢工这两件事便可证明。可是，这一次罢工（指五卅罢工）中，中国工人表现出来的团结力、持久力，特别是组织力，自然不是前几次的运动所能望其项背。中国工人，特别是上海的工人，大大地向前进步。这是无论朋友或仇敌，谁都看见的，谁都感觉到的。因此，上海总工会便成了我们敌人暴力仇恨攻击的中心，同时也便得着中国民众中所有革命分子之拥护推戴了。

实在说来，上海总工会的作用确是很伟大的。在风潮当中，上海总工会正站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当万国商团在上海街上《猎人》，铁甲炮车横行全埠，陆战队不断登岸之际，总工会出来创立自己的组织，成立新的工会，扩大旧的工会，吸引广大工人群众于这些工会里头，——其中有许多群众乃是从未参加过工人运动并完全没有斗争经验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自然是有一番广大的宣传鼓动及教育工作。普通须要几年才能做到的工作，上海工人从自己的经验学习并受总工会指导，居然能几个星期之中便做完了。

确实不错，中国的历史不是步行而是飞跑的。这种历史运动

的速度，在工人运动中特别表演得明显。紧接五卅运动以后不久，中国无产阶级还表现出了它更大的作用，这些重要的事变便是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工人夺取英租界与上海三次暴动，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租界是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直接营垒，汉口、九江的工人与苦力完全用自己群众的力量夺回来。上海三次暴动中，八十万工人在上海总工会旗帜之下一致实行总同盟罢工，工人纠察队直接驱逐奉鲁军，使北伐军不费一弹一卒而抵上海。广州暴动中，工人首先宣布“青天白日旗已是白色恐怖旗帜，革命民众应一致打倒青天白日旗，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暴动工人奋勇作战，占领广州三天之久，在中国第一次建立大城市的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我们可以确定的说，在中国这种伟大的革命变革之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做领袖。这并不是所谓“无产阶级天生是中国革命领导者”，而是因为它的实际生活，决定它只有坚决的勇敢的斗争，才有出路。中国无产阶级数量虽然很少，年龄虽然很幼稚；然而它不比资产阶级，它是唯一能够领导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力量，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力量。五卅以来的事实，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上海三次暴动与广州暴动，每一件事都可以充分证明出来。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却是无产阶级。

第六章　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

研究中国大革命问题，绝对不能撇开与中国革命息息相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在极复杂的阶级关系之中，在极迅速发展的阶段之中，中国共产党显然都演着极重要的作用，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过去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也就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在记载大革命经过之后，更不能不用点篇幅来说明一番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不过，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我只能在几个中心问题上加以扼要的说明，至于要详细论列中国大革命中之各种争论问题，则应该另外的专书去完成它。

这一章中之劈头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因为在这一问题中包含了中国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与争夺革命领导权等重要问题。自然这里的任务并不是有系统地详细叙述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历史，而只能扼要说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发展之关系的历史。

国民党在辛亥革命之后，原已崩溃瓦解，经过一九二四年改组才复生的。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就从一九二四年改组时开始。共产国际为什么要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呢？因为

中国国民党自始就不是一阶级的政党，当它初发生的时候，就包含着中国各种复杂的社会阶级，自初生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华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至一部分的工人（如海员），破产的农民，失业的群众（如会党）等各种社会阶级都有，甚至在当时只反对满清的汉族封建地主军阀势力，也有很多加入国民党。辛亥革命之后，国民党孙中山与袁世凯妥协，一方面许多官僚、军阀、买办都加入了国民党，另一方面国民党原有党员，大部分腐化反动，投降袁世凯，投降种种军阀，于是国民党更加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垃圾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所以从孔子道统以至平均地权，甚至阶级斗争的思想都染着一点，成为一种夹七夹八的东西，固然是反映当时社会思想的复杂，同时也就是反映国民党内成份的复杂。这种复杂的政治集团，“如果它不牵制共产党的手足，不妨害共产党煽动和宣传工作的自由，不阻碍无产阶级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而又使共产党这方面便于作事实上领导革命运动的事”，那末共产党就可以加入进去，使它转变为真正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而且“共产党为得在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中去分离妥协的本国资产阶级，与其引导城市和乡村几十百万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随着自己走，它尽可以而且应该加入公开的联合，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合作”。自然这里所说“合作”的意思并不是“混合”，因为“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仅仅当这种真正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而且就在与革命派资产阶级暂时合作的过程中，也必须坚决保存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那怕这种运动尚在萌芽的时候；不仅如此，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当中，应极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以领导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之彻底完成，以争取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共产国际根据这一列宁主义的路线，所以当国民党孙中山表示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联合苏俄”等革命政纲的时候，便正式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亦因此得以改组成功。国民党经过一九二四年这一次改组，因为得到最急进、最革命的共产党员的加入，因为接受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联俄”等革命政纲（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便开始转变成为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组织，成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帜，于是在国民党的领域之内，工农组织及斗争的发展，也开始得着相当的自由；一九二四年勃兴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和冯玉祥政变以及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都在国民党的联合战线之中发展出来。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治组织。孙中山赤化和冯玉祥赤化的名声，也在这一时期喧腾于帝国主义者之口。而且国民党改组不久，就发生了反帝国主义的沙面大罢工（一九二四年九月），当时国民党左派对这罢工是予以积极帮助的。一九二五年五卅事变发生，接着广东爆发省港大罢工，这一罢工是极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当时国民党左派的确是在积极的支持这一罢工，在各方面来帮助罢工，对于反对罢工的都加以打击。同时广东农民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发展起来，许多地方与豪绅地主发生武装冲突。国民党左派当时主要的倾向也是站在农民方面，相当帮助农民去反对地主。农民的组织也可得相当的自由，可以有自己的武装，并且曾经收缴一些地主的武装来交给农民。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很正确的。

然而中国国民党既然不是一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之中，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并且还有地主、买办阶级的成分；这些地主、买办阶级的成分自然不愿意国民党革命化，所以一开始改组，国民党内便有冯自由等所代表的极右派起来反对，这种斗争事实上继续到消灭刘镇寰、杨希闵的战争。冯自由等被打击下去之后，接着便又发生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代表的阶级背景，实际上和冯自由等所代表的一样，亦是地主、买办阶级，不过西山会议派发生的时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些反动的端倪。五卅之前，孙中山死后的第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一九二五年五月），戴季陶、沈玄庐等已经起来提出所谓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反对工人阶级斗争，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戴季陶主义的发端。自此以后，国民党内反对改组的右派表面上消灭，而承认改组，同时要求控制共产党的新右派之斗争已经开始。五卅之后，戴季陶主义便公开的发动，孙文主义学会组织起来，黄埔军官学校的右派形成起来。于是国民党的右派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开会，以廖仲恺被刺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与省港罢工开始时之左倾政策为反对目标，中心的反革命政纲是在打击共产党。这一轰动一时的西山会议，实际是在戴季陶主义的旗帜之下，进行它们反共的斗争。不过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还只很小心谨慎的发动自己的斗争，觉得公开反动太早，于己不利，所以戴季陶本是发起西山会议之一人，结果竟不得不中途逃席，这一复杂的过程，我在前一章已经分析过了。

可是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共产党虽然执行了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但是对于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却并不了解。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一九

二二年），已经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赞助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民主的联合战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军阀'。在此大会后，共产国际派代表向中国党提议：中国同志们应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使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更进一步实现，使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加速的进行。当时党虽尊重国际的提议，而大多数同志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十分怀疑，因此，在实际上，国际的提议未曾实行。"（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之第四节"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政策之经过"）。到第三次大会（一九二三年六月）重新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的时候，又曾经发生争论。陈独秀领导的右倾的思想，赞成加入国民党，同时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应该有甚么独立的工作，甚至说："中国共产党早生了五年"，这是无疑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同时有一派左倾的思想则"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见同上）。他们起初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赞成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要保留产业工人不要加入，这是一样的不了解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

这两派主张的根本思想，都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前一派的主张认为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应该竭力帮助资产阶级，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等到将来再说，所以甚至党到共产党都可以取消。后一派的主张认为现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固然应该参加，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准备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产业工人决不应该加入国民党中去受资产阶级思

想的洗染。很明显的这两种思想都是把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有一座万里长城的隔离，而不知道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三次大会的结果，没有能够把这样的机会主义的思想驳斥下去，因此一方面固然实行了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另一方面机会主义的思想却充满了当时的指导机关。于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党不要有独立的工作”、“一切运动都是国民运动，工人运动只是国民运动的一种”，便成为当时指导机关的路线。甚至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中还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这是很明显的与列宁所指示的“不要与资产阶级混合，而要保存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完全相违反；这就是极可耻的以阶级利益去服从民族利益，以无产阶级去服从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这样自然不会在这联合战线中去力争革命的领导权，更不会有“对待同盟者要犹如对待敌人一样”的认识。所以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时候，就只认识了应当“加入”的一点，而完全没有注意加入以后在联合战线中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策略。他们遂这样的把列宁主义的路线，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

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既在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之下，于是加入国民党以后，对资产阶级采取极可耻的让步的政策。实际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不是积极去争革命领导权，反而去到国民党里送领导权给资产阶级。有时虽然也模糊的提起争领导权的问题，但是，“只要国民党能听从共产党的主张与政策，便可以说实际上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之手；因此说国民党的左派是有的，不过

不能对他们有过分的奢望，革命口号要是他们所能接受的才能提出去，如此可保领导之权；因此，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与职员，共产党不可多占，以免惹起左派反感而涉包办之嫌”。中国共产党既然学得这样一种“谦让之德”，自然便不会积极去争革命领导权。一九二五年冬发生西山会议派，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反动的端倪，已经开始反对工人阶级斗争，极力控制共产党，而共产党的路线乃是认代表半封建势力的西山会议派为右派，而以戴季陶思想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为中派，采取向中派让步以孤立右派的策略，实际上对右派也是一样的让步。当时广东的党一方面反映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广东的国际代表鲍罗廷同志在那时还能相当执行国际的指示，于是广东党与中央在许多问题上都发生过争论。当时广东党的路线，一方面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采取不断的向右派进攻的政策——一般人叫它剥笋政策。征服了商团事变之后，马上肃清东江，削平刘、杨，继续又驱逐胡汉民、许崇智等，左派与共产党的势力一天一天的发展起来。机会主义的中央却天天斥责广东太急进了，骂广东的党破坏了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最值得记忆的一次争论，就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以前，广东党坚决主张反对右派，把当时几个著名的右派领袖如戴季陶、孙科等都驱逐出广东，并且准备在这次会议上把国民党造成左派与共产党联合的中央。可是当时中央的主张却确实与广东相反，认为当时革命形势（郭松龄反奉失败后），在全国各处都受到了打击，因此必须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战线。于是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到了上海，中央却马上与他们实行“谈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并订立了极可耻的条件：①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

部指导机关中不得占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②由共产党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候这些右派领袖回到广东以后再开。于是这些被广东驱逐出来的右派领袖，在共产党中央自行让步的政策之下，又回到广东参加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了。

国民党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三月二十号事变。这一事变的意义，很明显的是当时资产阶级要先打击无产阶级的力量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然后再行北伐，使北伐的结果完全合于它一个阶级的利益。在这一事变中广东党与中央又有不同的意见：第一，讨论这一事变发生的原因，广东党认为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中央的主张又确实相反，认为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第二个争论，就是对于三月二十号事变的策略问题。广东党认为“退出国民党就等于放弃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放弃革命的国民党旗帜给资产阶级，这就是莫可补救的损失，在这个时候是应该采取暂时让步的政策，以保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积极的准备着新的进攻以继续夺取领导权的争斗”另外在上海有少数同志的意见，认为三月二十号是莫大的耻辱，应该毫不犹疑的退出国民党。当时中央的主张却是第三种意见：陈独秀在当时提出来的有名的一句话可以完全表现出当时中央的意见。就是“办而不包，退而不出”，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三月二十号的事变是共产党的急进政策，是想包办国民党的事逼出来的，所以以后只应“办而不包”；马上退出国民党是错误的，但是一定要向右派退让，所以只要“退而不出”。当时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固然是错误的；可是陈独秀的名言“办而不包，退而不出”却正十足的表现了专一奴服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精神。

三月二十号的事变，已经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动

摇与反革命的必然性，共产党经过这一事变的教训之后，应当更坚决的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积极争取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尤其是要积极争取农民与兵士群众，使之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并切实批评资产阶级的动摇，积极的领导群众的斗争准备自己的力量，以镇压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到来，以夺取这一革命联盟到自己的领导之下。广东省委当时对于与国民党关系的策略，虽然比中央的投降路线要正确些，但是对广大群众基础的工作也不十分坚决，北伐开始的时候，曾向中央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到底准备推翻蒋介石呢还是拥护蒋介石？"广东党的路线是主张在北伐过程中要同时积极准备推翻蒋介石的。可是当时共产党的中央答覆得异常奇妙："不是推翻蒋介石，也不是拥护蒋介石"。这无异于说："现在是北伐的时候，为什么想到推翻蒋介石呢"，这是帮助资产阶级的最妙的理论。可见当时共产党中央始终没有想到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这一重要策略。反之，"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这一机会主义策略的原则，倒是当时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中国大革命的最剧烈最复杂的斗争时期，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便站在那些主观与客观的条件之中，虽然前几年的革命发展时期，国民党改组后及五卅以来的革命时期，已经孕育着许多机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虽然共产党的组织在这期间已带着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自然也就带着许多宗法社会的习性，指导机关之中不能推出工人同志的领导者，甚至工会之中也都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职业家"。但是客观上劳动群众的斗争却依然急遽发展；赤色工会运动发展到将近三百万会员，吸收极

多的店员、手工工人参加；农民协会以湖鄂赣粤计算，发展到将近一千万会员；国民党左派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军队之中也有一部分的力量。虽然这些发展大半属于自发的。可是前一阶段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以及客观上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取得国民党、取得国民革命军、取得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事实上部分的实现，而形成部分的革命势力，共产党以工农团体中的领导权之取得而成革命的先锋与主干。当时的任务，就在一面认清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暂时还没有革命之领导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产国际杂志的社论），一面坚决的进一步而取得政权与军权的领导权。这是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央便放在这种形势之前。

那时，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便议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行动政纲，指出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的前途，须以无产阶级争得革命领导权来达到，须以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对付必然要背叛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社会内容是土地革命，必须勇敢的领导农民之自发的斗争，指出无产阶级及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之剧烈，须要勇敢的去领导，以成为争取整个革命领导权的力量，须要加入国民党以扩大并赞助工农的斗争，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且要“有系统的坚决的反对国民党右派及戴季陶思想，反对他们想把国民党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企图，彻底的批评在左右之间的一切动摇。使国民党成为真正平民的政党——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被压迫者之坚实的革命同盟”。

事实上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底，亦正是工农左

派联盟的“极盛时期”，如果将当时的客观形势与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的“中国革命问题议决案”相对比，大家都可看出国际决议案是非常正确的。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已陷于机会主义的泥坑，一切原则都在动摇之中，根本没有执行国际“争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指示。

此时客观上革命运动是突飞发展，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工人苦力等革命群众夺取租界的奋斗，二月间上海的总同盟罢工，一直发展到上海三次暴动，但是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领袖依旧一味退让，甚至当时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竟和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发出那种可耻的联合宣言（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汪陈宣言），因此有人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可以说是以一九二三年“越飞与孙中山的宣言”始，以“汪陈宣言”终。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一文中说，他的分共是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是由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国民党中央议决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组织特别委员会以“制裁违反本党（国民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是五月二十一日长沙政变至七月十五日的国民党分共会议，算是“和平分共”；第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议决退出政府，“对国民党厚诬丑诋”及叶贺举兵，便实行严厉反共。不论汪精卫的“供词”如何的矫揉造作，说得“仁至义尽”，但是，这几句话中有一个真理：就是武汉一面下令讨蒋，一方便已下令“讨共”；讨蒋和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动之特别委员会组织的决议，差不多是同日同时的（四月十九日下令讨蒋，四月下旬即组织特委）。这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开第五次大会的时候，正是共产党五次大会高唱“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合作到底万岁”的时候呵！

这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十八日，共产国际执委开第八次扩大会议，再议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这次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更有如下之进一步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要想把它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须划分清楚。

无论在何种条件之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它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它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弃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可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以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一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

在目前情形之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

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大旗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明瞭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它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快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厉行选举等。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使国民

党发展成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

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那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的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彻底把定向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者，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便加甚

了。(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

然而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与国际决议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国际决议再三指出，中国共产党要想把它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存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就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也须划分清楚。然而实际上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竟完全放弃自己独立的政治面目之任务，而且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例如在中央五月（一九二七年）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决议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的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㈠"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㈡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上，就是说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㈢民族革命运动与团结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再，此决议案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应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完全服从国民党之表示？！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到处可以表现出来，国民党内的其共产党党团作用（如任联席会议中），实际上已被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决议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回答，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当时共产党领袖也有这样

说的。一方面自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一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严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策略”，共产党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末，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与各种不彻底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对此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然经过国际之多次催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

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它的领袖。遇着重要的政治问题，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往往为要想使某某领袖中立而减低自己的口号，譬如为要使李济深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省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坚决的去取缔湖南的叛徒；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当他驱逐共产党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旬），亦不提出反对他的口号，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都由国民党“左派”领袖之愿望来确定，而所谓左派领袖之愿望，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又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决议，虽然中央以前很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北伐的建议。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是如此。

共产党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总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这一理论就是“既然要联合战线，就应当自己让步”。列宁说：“要帮助动摇的人，先要自己不动摇”，而事实上，那时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格言是：“要自己退后些，免得人家跟不上”。那时不是运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去革命，乃是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所束缚而阻碍革命。那时共产党中央不但自己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在共产党指导之下的革命群众也要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它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群众刚刚走上革命大道，并且群众自己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须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和领导，使革命发展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巩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者却说：“要退让，要退让”，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这样一个可耻的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号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所干的自动解除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一七二七年五六月间武汉时期共产党中央整个的退让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摘几条出来看看：

> ㈣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㈤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会议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㈥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㈦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㈧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国民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㈨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店东的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及戴高帽子等事。

㈩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在客观上已经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代替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监督，

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甚么呢？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法就是这样！这种方法已经完全丧失共产主义政策的精神。列宁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帮助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仅仅当这种运动真正是革命的，且运动的代表不阻碍我们组织农民和被压迫群众的时候。倘若没有这种条件，则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奋斗，坚决反对他们。”（列宁对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演说）。当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

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十一条国共关系政纲发布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紧急训令到了。这一紧急训令严厉斥责中国共产党所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训令中国共产党要立即示威式的宣言退出国民政府，要加倍发展工农运动，以制裁国民党领袖之叛变，对于国民党的策略则说：“不退出国民党，虽国民党的指导机关要大批的开除共产党员，但仍留在内，要密切的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联合，由下层群众提出坚决的反抗国民党中央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并且在此基础上就准备国民党的大会”。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三日），但是并不退出国民党，而且还在七月二十九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中央。此时武汉国民党中央七月十五日分共会议已经开过，正是南昌暴动发难期间，这对于国民党左派群众，号召他们反对宁汉反动中央在当时是有必要的。但是共产党对于这种行动政纲

过于伸张，于是八七紧急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我们以后还要说到——竟还通过复兴左派国民党的决议，甚至决定中国共产党还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认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当然是很大的错误。事实上武汉反动以后，整个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已经宣布死刑。假使那时在国民党中还有些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的成份发现，但是整个国民党以前在群众中的革命威信，已经因为资产阶级军阀及小资产阶级领袖之陆续反动，到处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实行流血屠杀、恐怖与压迫而消灭了。国民党主义在中国革命前一时期的发展上固然实现了相对的积极作用，但到此时新的发展阶段中已经完全变成反动的力量了。所以不久之后，广州革命工人群众即首先宣布：国民党已经是反革命的象征，已经是白色恐怖的旗帜”，于是中国共产党亦即取消“复兴左派国民党”之决定，正式提出苏维埃的口号。至十二月广州暴动，工农兵士群众高高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国民党左派汪精卫、陈公博等亦大大屠杀工人，于是整个国民党更成为反革命的旗帜，更成为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群众之死敌了。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估计

中国共产党八七紧急会议告同志书上说：“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

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因此我觉得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的估计这一问题上应该有专门的说明。自然关于中国大革命的性质本身问题的内容，上面第二章中已经有很详细的分析，这里我只说一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根本问题的估计。

为使问题更容易处理得清楚起见，我们可以先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估计介绍一点在这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之性质就已有明白之指示：

> 中国革命发展之现在阶段，从历史上说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握到革命的领导权，则革命的结果不一定造成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被剥削的阶级政权，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决定要用全力去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革命前途。否则资产阶级倘若胜过无产阶级，则中国实际统治又将落于帝国主义之手。
>
> 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基础，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因此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仅限于：（一）推翻帝国主义，（二）消灭封建势力，这是错误的。中国革命若不超出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范围之外，决不能推倒帝国主义的。

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这一根本问题是不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了解而且成为党的正式意见的实际上就是

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的理论。远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二次大会时候的意见就是如此。二次大会宣言中说：“我们无产阶级还有我们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根据这种孟什维克的观点，无产阶级对于民主主义革命便只好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用不着热烈去参加，更用不着积极去领导，使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实现工农专政，走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只须等待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的时候，无产阶级才可“因此”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所以无产阶级应该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交给国民党，使资产阶级“迅速发展”起来和无产阶级来“对抗”。机会主义者永远不会懂得下面的真理：资产阶级因其自身阶级的地位，必然产生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彻底性。无产阶级则因自身阶级的地位，逼使它不得不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头是往背后看去的，因为它害怕民主主义的进化，因为这个进化有使无产阶级强大起来的危险。无产阶级却除了失落套在颈上的锁链而外则别无所失，而得民主主义之助，反可得着全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其民主主义的改革方面愈彻底，则这个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有利的范围将愈缩小，而在另一方面却愈能保证无产阶级与农民在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利益。我们固然不能跳出目前革命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但我们能扩大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

之内，为无产阶级目前的直接需要及争取革命领导权使革命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奋斗。

由于不了解上述这一浅近的列宁主义的真理，所以到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还依然继续自己孟什维克的错误，而且扩大这种错误。在对中央政治报告决议案中说："中国民族运动的前途，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条道路：一是由工农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以革命的手段达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建设；一是由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拿住小资产阶级，并结合买办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扑灭革命运动，实现道威士的资本主义之侵略。我们(共产党——恕我加了这样一个失当的注释！)的责任，就在努力扩大工农群众的力量，拿住小资产阶级，推动资产阶级，始终能够巩固民族运动的联合战线，则中国民族运动便有由第一条道路之可能。"（见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会决议案》）。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民族革命的责任，是为"达到资本主义的建设"，这在现在看起来，好像过于荒谬，不知这正是过去中国共产党指导者的政治路线。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既然坠入了极庸俗的机会主义的泥坑，所以对于共产国际"现在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指示自然不会接受，而且把国际决议案加上一些机会主义的曲解，说什么："国际这个提案，不是说现在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国民革命，而立刻就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说现在的国民革命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

性；”（一九二六年底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越解释越糊涂，中央只在过着文章的快乐生活吧了！

自然，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并不一致，然而无论如何，这种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却是当时共产党指导机关中多数而且是正式的意见。共产国际七次扩大会决议案到达中国之后，形式上中国党虽然一致接受，甚至也能跟着高叫几声“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依然充满着机会主义的精神。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与前途这种根本问题都没有正确了解，自然在许多实际问题中都很容易发生错误，各种错误中之最严重的一点便是没有和资产阶级坚决争夺革命领导权；以为中国资产阶级等于零，革命领导权“天然”在无产阶级手里，根本用不着去争；或者以为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准备将来无产阶级革命，目前资产阶级革命应该达到资本主义的建设，所以革命领导权应该交给资产阶级，结果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紧急关头，完全对共产主义变节！

这就是一九二七年八七之前的情况。八七之后，经过极艰难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经过武装暴动之英勇的尝试，中国革命已进到较高的阶段——工农苏维埃革命阶段，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估计又发生不正确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间革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这种观点显然是陷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这一错误是当时国际代表罗米拿兹同志与瞿秋白同志所做出来的，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便公开批评纠正了。

关于中国革命之社会动力之估计，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指

导机关之间亦表现出显著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的指导者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既然没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也就不能懂得各种社会动力之作用及其根本趋势。依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会的估计，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又说：“在事实上，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特别在上海是如此”。决议案中虽然也曾指出过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到底”，但同时却肯定说中国资产阶级要得到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等，“方可与帝国主义妥协”，换过说，便是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得到这些东西，便不会与帝国主义妥协，这是何等机会主义的观点！其次又说：“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经济之压迫，苛捐杂税之剥削，只有感觉革命之必要，无反对革命之必要”。可见共产党指导机关根本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特性，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之表象，却不懂得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真正用意，而且没有同时“在事实上”指明资产阶级当时已经发端的妥协背叛的倾向，如五卅运动中及以后的各种事实。所以自然的结论便只能是：“因此我们（共产党）此时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应该一方面努力拉住小资产阶级，使之接近工农群众，而不完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所统治，以与资产阶级争此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以防其将来之妥协，一方面极力巩固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促进资产阶级之革命化。”（以上括弧内引文均见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第三次扩大会决议案）至于在联合战线中

对资产阶级之批评监督则根本没有必要。这种对于革命动力之错误估计，也就是前面第一节中所说共产党退让投降政策之张本。

反之，共产国际的估计却完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国际指出：中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发展，是在非常落后的中国经济背景里。其原因则为工业资本主义低度之发展，农业经济停留于原始技术，大多数中国人民生活程度异常的低微，以及许多半封建制度的残留等。现时中国经济情形的主要特点，就是中国经济的成份，可比杂色的荷包，从财政资本以至于宗法祠族制度的经济关系之余迹，都同时存在，其中占优势的乃是各种形式的商业资本及城市乡村的小手工业和小工业。这就使中国民众之阶级分化不明显，并使国民革命中之社会政治力量的组织程度不甚高。中国革命运动发展之连续的阶段，可以各种社会力量的改变结合以证之。在第一个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动力之一，他们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找助手。第二阶段，社会力量转变到另一方面的结合形势。斗争的方式，亦发展得更新而更革命，工人阶级在中国斗争场上出现，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原素。现在(一九二六年底)，革命运动已到第三阶段之门，正是阶级的新结合之前夜。在这个阶段里，发展运动的主动力，将是更有革命性的结合——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结合，而离开一大部分的大资产阶级。可是，在这阶段中，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将日益落在无产阶级身上。在此时期，是从民族解放运动过渡到新的革命局面，大资产阶级看见反帝国主义战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超过了它的控制，客观上不免危害它的阶级利益，于是大资产阶级拼命抢夺领导权，以达破坏革命之目的。反革命力量之形成与革命力量之结合是同时并

进的。这个反革命团结之进程与帝国主义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犹之乎中国革命势力之发展，是与世界革命（苏联与西方无产阶级）有密切关系并受其影响一样。帝国主义者见军阀不能作消灭革命运动的有效工具，于是用和平方法，在民族革命势力中找寻它的同盟者。帝国主义者企图叫醒民族资产阶级，使之脱离革命战线，并为使民族运动内增加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势力起见，于是那些迄今还站在民族革命斗争之外，或甚至军阀，开始转变到国民政府方面。这种举动的目的，是从革命的联合（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手中，夺取革命领导权，以阻碍革命的发展。这些反革命举动的主谋者，便是国际帝国主义，犹在此过渡时期，历史上必然的，大资产阶级必定日渐离开革命。当此时际，无产阶级应该从很广泛的利用现时在事实上还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各种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在策略上利用离开革命的各种资产阶级间的冲突，如利用帝国主义间的一切冲突一样。但是决不要忘记无产阶级的主要目的，而要在利用敌人的各种冲突之时，使战术上的应付和策略上的步骤，都能一贯的奔赴这些目的（七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

这一指示已可使我们了然于中国革命各阶级结合关系之变动，各种社会动力的作用及我们应有的战术和策略。但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总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这样明确的指示也竟惊醒不起中共机会主义的领导，故中共政治局竟以下列机会主义的解释表示“接受”以了之：“国际告诉我们：革命的主要成份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不是富裕的资产阶级；因此，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

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照这种“无产阶级是天然的领导者”的孟什维克的理论。自然要把与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依旧置诸度外，这种解释很可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国际指示之滑稽的典型。

对于革命动力的估计之错误，必然要产生在实际行动中机会主义之恶果。对此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当时中央直接指导下的上海三次暴动。

在第一次与第二次暴动的时候，党只发出“欢迎北伐军”的口号去号召群众。后来虽然提出了建立“市民政府”的政纲，在暴动开始的时候，已实际的建立各区市民政府。可是在这当中，仍然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抛开一般急进的小资产阶级，而极力与资产阶级妥协。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叛变，蒋介石已经从南昌开刀，经过九江、安庆、芜湖，一直杀来（杀工人）上海；武汉已经提出“打倒蒋介石”、“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中央的路线仍然是联合资产阶级，仍然提出“欢迎蒋总司令”的口号。结果市民政府因资产阶级的背叛，因蒋介石一纸禁止的命令，遂至无声无息的消灭了。到四一二的一天，上海工人阶级遂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革命的上海，一瞬间遂变成了反革命的上海。

当时客观的形势，革命正是空前的高涨，上海八十万工人都组织在上海总工会之下，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离开资产阶级而同情于工人阶级；就是在军事上，同情于革命的军队，仍然是优于反革命的军队，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军队都动摇起来。所以假如中央是一贯的坚决执行国际的路线，在进行北伐的过程中，已准备着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退一步说，就是在三次暴动的时

候，不采取专与资产阶级勾结的机会主义的路线，而是极力与资产阶级斗争，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很坚决的、有计划的预备第二步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叛，那么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不一定遭受这样可怕的失败，全国的革命也不一定受到这样可怕的打击。上海三次暴动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一页，是暴动的艺术上伟大的成功（参看本书第四章之第五节），可以垂为历史的教训，可是并不因此就掩盖了当时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重书一笔的。

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另一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看见了革命工农群众的要求与口号，必然要恐惧起来，而与帝国主义军阀相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它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离开了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跳到反革命的营垒中去，革命受到部分的失败，但是走进了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的联合破裂了，开始转变到无产阶级、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作用同时加大。此时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示之一，便是："资产阶级叛变以后，革命已发展到更高的阶段——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革命继续的前进与深入，国民党左派领袖与某些军官的继续叛变，很有可能——而且必然不可免。共产党必须极力调动广大的下层工农群众，严厉批评一切的动摇，应时的揭破一切勾结蒋介石与帝国主义的趋向，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制裁这些动摇的分子，然后才能防止或镇压那些国民党上层领袖不可免的叛变"。而当时中央执行的路线，却是一味惧怕上层领袖与将军们的动摇，

极力遏止群众的斗争，以让步妥协来企求这些领袖将军们的谅解，不离开革命。实际情形与共产党所估计的相差甚远，结果谅解不可得，共产党反而跟随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袖跑，实际上就是跟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跑。

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动力估计之错误，更莫过于把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相对立去看待这件事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它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斗争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农群众革命力量之发展，乃亟亟由参加革命而走入反革命营垒，因此反对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之完成，更必须实现于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彻底的民权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开展及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它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农民群众的社会阶级斗争，因为这是彻底完成国民革命的重要原素。然而过去（特别是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中国

共产党中央却完全是孟什维克派似的，居然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和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党部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示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C.P.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足见那时共产党中央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两者之间有不能相容的冲突存在着。这一信里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好一个"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我们若因此就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者的口吻！），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该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

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一指示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就是说要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者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八七紧急会议告同志书）。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更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

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与第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等），要我们力争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进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极力争取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说：

> 无产阶级要在革命中占领导的地位，必须坚强其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共产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使它能尽这个历史使命。中国无产阶级数量之少及其幼稚，须以有组织的力量及明确的思想补偿之。
>
> 共产党的基础，是现在代表几十万产业工人的全国总工会与铁路总工会及海员总工会。共产党最紧急的任务，是吸收广大的工人群众，以强固这些组织。在二年来之国民革命争斗中，工人阶级展开了很大的力量。在实际斗争中，它已获得革命运动的领导。在这些经验及成绩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组织，应当按照下列各项，以来更强固发展：
>
> （A）创造群众的产业工会，以产业为基础联合一切工会，强固全国总工会。
>
> （B）加紧群众的工作，巩固工会上级指导机关与下层工人群众的关系；职工联合会之中，要吸收手工业工人、小企业工人以及文化教育工人等。
>
> （C）更加注意工人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应当

变为政治斗争；规划罢工运动的策略，组织互助和罢工基金；帮助和创造协作社等。

（D）作反对改良主义的方法之斗争，以加紧工人群众中的教育工作。

（E）加紧中国职工运动与世界职工运动的关系，对于远东各国的职工运动，特别须密切联络。

为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到斗争阵地，并加强它在革命中的地位起见，中国共产党应当宣传下列的要求之实行。

（A）革命的工农组织的活动完全自由。工会公开。颁布最进步的工会法，承认罢工权。

（B）劳工法；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规定最低工资。

（C）社会法；卫生监督及劳动条件之检查，改良住房、疾病、衰老、残废、失业等的危险。保护女工童工。禁止女工作夜工，禁止雇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做工。

（D）创立监督工厂的机关。

（E）取消罚金及肉刑制度。

（F）撤退工厂里各种驻兵及警察等。

（G）救济失业；扩大工会在失业者中的影响；工会中设工人职业介绍所。在革命的现在阶段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后备队，未曾充分利用他们的革命力量，这就是被帝国主义破产的城市手工业工人群众，他们是反对外国资本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的共产党，必须组织并

吸引这些群众，使之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总潮流。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会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中对于工人运动亦有同样之指示，并且特别指出发展与巩固阶级工会，争取罢工权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之重要。国际认为这一政策是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适应的，和共产党各地党员、团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过去共产党指导机关，特别是武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走的却是别条路，它只在阻止或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一般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权属于政府。这种决定对于资产阶级很有利益，可是实在大大的阻碍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已有“不得政府同意，工人不能实行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须要遵守劳动纪律的决议，共产党中央并没有表示反对。中央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使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不使他们为自己阶级直接的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当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察是错误的。且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下，并且发生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及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

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如是不仅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共产党中央也跟着这种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说不应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关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武汉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工会只準处罚工人，违法者交政府处理。共产党中央对于这种命令，连一句抗议也没有提出，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他们根本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在工人的政治行动上有更坏的影响。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参看前面第四章第四节之（五）项），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种举动不对。又如在中央直接指导下的上海暴动中，中央竟使上海工人阶级的武装暴动，只是成了响应北伐军的军事行动，同时又使工人暴动胜利只成立了一个依赖大资产阶级的上海市民政府。当时中央又曾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秘密工会（四一二以后），而使工人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

同时却又没有注意在黄色工会中工作的任务。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当时共产党指导机关实在没有尽它无产阶级先锋的责任，而且还有压制工人阶级斗争之可耻的现象，我们必须根本扫除这种机会主义，以开辟工人运动之新的革命的道路。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因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转而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势力的扫除，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根本扫除中国的封建势力，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则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革命取得胜利愈有把握。所以土地革命实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枢。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已经不止一次了。

当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共产国际执委开第七次扩大会议的时候，就在中国革命问题决议中严重的指出了这一问题。

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中，土地问题开始紧张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

袖中国现在的环境，只有无产阶级是能够实行彻底的土地政策的唯一的阶级，彻底的土地政策之实行，乃是反帝国主义的胜利及革命往前发展的先决条件。

中国军阀的势力，一方面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另方面则靠本地地主阶级的奥援。军阀的统治，建筑在奴隶式的半封建制度之上——军阀官僚的政府机关，地主，劣绅，商业重利资本等的压迫和剥削几万万农民。发生这种制度的原因，因为那些无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他们不得不去受地主及重利盘剥商人等的奴隶待遇，及为城市和军阀，供给几百万苦力和兵士。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消灭一切封建社会关系之残余，解放中国民族，国内社会关系之革命的改革，这些事都相互联接着，成为中国革命的整个的责任。

要完全推倒军阀，人口大部分之农民的经济与政治斗争，必须使之发展，成为反帝主义斗争的一部分。以为加紧乡村间的阶级斗争，可以削弱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顾虑，是不对的。不去勇敢地接近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如果因为犹豫，且误给资本家一阶级单独协作，而怕把革命的土地问题放在民族解放运动政纲的主位上，那便是错误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共产党必须免去这个错误。

现在情况的特质，就是过渡性，此时无产阶级应当选择他自己的将来：或与大部分资产阶级联合，或与农民强固其同盟。倘使无产阶级不能提出农村政纲就不能

把农民拉进革命斗争，而失去他自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如此则直接或间接在帝国主义影响之下的资产阶级，必将重新起领导作用。假使这个可能性，在现在情形之下实现，就是加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地位。

如果不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和农村革命，合而为一，则广东国民政府将来不能保持政权，革命将来不能进展至完全战胜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乡村阶级分化的增长，加紧农民群众与剥削阶级间之争斗。共产党必须十分注意乡村间的阶级分化，及从此而起的剧烈斗争，共产党应为农民运动的指导者，并提出相当的政治经济口号，以助农民运动之发展。

中国共产党应当承认“土地国有”为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纲之基本要求，但在现时，必须按照中国各地的特殊经济政治情形而分别的应用农村策略。

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努力赞助推倒乡村间的土豪劣绅的官僚政权，以革命政府之下级机关代替旧的半封建的官僚政权。这种乡村间的革命政权，须是能执行革命政府命令，及拥护大多数农民利益的。农民应当参加县政权机关之创造。

在国民党政府管理下的境界内，农村革命的政纲，须有具体的方式。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下列办法，使农民到革命方面来：

A、减租至最低限度。

B、除去加在农民身上的各种名义的杂税，而代以划一的农业累进税。

C、对于大多数农民群众所负担的税额，须为之作最高度的整饬和减少。

D、没收属于反动军阀的寺院地产，及对国民政府作战的买办，地主，劣绅等之土地。

E、担保佃农永久租借给他所耕种的土地，并由农民协会与革命政权的代表决定最高限度的地租。

F、广东政府必须竭力拥护农民的利益，特别保障农民，使不受地主劣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与束缚。

G、解散民团和其他种种地主的武装队伍。

H、武装贫农与中农，使乡村间一切武装力量，服从革命政府。

I、政府给与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在内）以最高度的帮助。

J、组织国家低息借钱的机关，坚决的反对重利盘剥。并帮助这一类的农民组织及其他互助组织。

K、国家帮助协作社及互助机关。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使广东政府实行上列的办法，亦即是使农民革命，进到更发展的阶段的过渡办法。实行这个极重要的任务，必须建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委员会。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委员会必能获得实行上述各种要求所必需的威信和力量，并能加紧斗争，提出更彻底的要求。

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土地革命问题仍旧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案中说：

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

力的武装干涉或它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卖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行土地革命，在城市中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要坚决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要求必须在全国，首先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去发动群众，使之反对地主及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对北洋军阀。

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现时主要的就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几千百万农民群众起来自下而上的解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指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政治组织之中心，变成工农革命独裁的机关。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过去中央所指示发展的，乃是违背它的指示意旨而做出来的。事实上中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只有自下而上的农民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

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这一问题是最主要的问题，是机会主义最深的祸根。中国共产党当初对于农民问题差不多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之主要的同盟者是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革命，必须是取得对于农民群众的领导权，这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土地革命的纲领。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到五次大会。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之前，对于农民运动的意见有许多：①最早有说‘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难成功’的；②有说‘谁能真正打倒军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农民便跟着谁走’的；③有说‘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的。但是关于土地问题，谁也不会说起——认真的说起。后来农民运动事实上大大发展，农民政权与土地问题成了事实的问题，中央才一步步‘落后的’追着农民群众走。总之，当时有一个一般倾向，便是认农民运动是日益重要起来了，无论中央主观上如何的讲‘乡村联合战线’，也不能拉得住农民了；无论中央如何认为‘不应当空想出地主问题来讲土地问题’，也不能‘劝醒’农民或乡村中的‘共产主义的实行家’了；于是对于农民运动，不得不认为它是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于土地革命始终怀疑。中国革命只被认为反帝国主义革命——五卅式的革命，不认为土地革命。一切‘耕地农有’直到‘不宜由农会议决实行减租’之激进的或妥协的决定中，都没有坚决明显的对于革命内容之认识在内。所以对于以土地问题来决定国民党左派是否真正左派，始终是不赞成的”（见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当时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拿出自己对于土地问题的政策。直到一九二七年三月湖北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党大会时（一九二七年五月），土地问题决议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当时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后来都背叛无产阶级，已被中国共产党陆续开除出党）等，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

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处可以发现。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中央通告中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动，这种情形，必须纠正。"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不但跟着地主、军阀及小资产阶级极力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而且甚至于还有一种非常可耻的论调，居然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代表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种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做的，可恨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无耻的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

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故为左倾之宣传，而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指导者之一曾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战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须使之消灭。”实际上当时国民政府并没有做共产党的俘虏，倒是我们这位替反革命抱忧的共产党员却实实在在做了国民党的俘虏！

上述情形，足可说明，当时伟大的两湖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导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但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还处处阻碍农民运动的前进。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这不但不合实际生活，且大有害于革命，其实客观革命潮流已经将革命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农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的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说农村中一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自由逮捕豪绅的现象，都应使之消灭，而恢复地主豪绅之秩序。这还说得上甚么“巩固农民之胜利”呢？！

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一切实际政策都是取

消这一口号。五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各地农民群众自动没收土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末共产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方针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这种政策对于湖南政变中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马夜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的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浏阳的农军部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因此而有五月三十一日下午浏阳农军单独进扑长沙之壮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寡不敌众而退却。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月几年全省的大反动。共产党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要看看五月二十六日议决案就可知道："现在本党的责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

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责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助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对于土地革命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的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不仅如此，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农政部长）的行为，更是万分可耻！当时国民政府农政部极力反对土地革命，极力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在五月里出了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范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当时共产党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这种对于土地革命问题的机会主义的方针支持得很久，一直到八七紧急会议都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甚至还依然定出“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则减租”这样不正确的策略。在实际行动上则在八一南昌暴动与叶贺南征过程中，起初有

“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之规定，接着又改为“只没收五十亩以上地主的土地”，都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

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虽然纠正了这些错误，但是党内对于土地革命问题还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中央接着便又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这自然又犯了抹杀农村中阶级意义的错误，同时各地农民暴动及少数乡村苏维埃区域不能坚决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现象也还有不少存在。直到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得坚决确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口号，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定出土地纲领，于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才算得到了初步的认识。

第五节　中国共产党与参加革命政府问题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原则，在其参加国民政府委员的同志的行动上，与党对于参加国民政府的整个方针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与其他许多主要革命问题一样，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

本来在广东时期，共产国际就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坚决参加国民政府，领导广东国民政府走上工农民权独裁的道路，共产国际执委在其七次扩大会议对中国问题决议案中说：

> 为着加紧共产党在国民党里的活动，以推进革命运动往前发展起见，共产党应当加入广东政府，以帮助左派反对右派之懦弱而动摇的政策。广东政府辖地之广大的伸张，使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比任何时更成

为必要。

广东政府，虽然是资产阶级民权性的，但究其根基和客观上，则包含有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等革命联合的民权独裁制之萌芽。小资产阶级民权运动在中国之所以是革命的，因为它是反帝国主义的。广东政府之所以是革命的，第一亦应有此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为中国的革命及由革命而产生的革命政府。第二均是反帝国主义的，故必须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之根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尚不足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必须从经济上，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的基础。这个意思，就是革命政府，应当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如此才能即刻扩充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狭路，而走入到革命独裁的过渡阶段。

中国共产党虽然曾经参加广东政府，而且曾经指导广东国民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在中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中，广东国民政府所以能够形成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毫无疑义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很大的作用。然而严格的说来，共产国际这一明显的正确的指示，当时并没有被中国共产党所重视。中国共产党过去参加广东政府的根本政策与国际的指示是不符合的。

革命的进展使共产国际八次扩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政府问题，不能不更有深切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它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

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它已经走向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它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〇五年俄国少数派的错误：俄国少数派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

少数派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它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起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

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打条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了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像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

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政权等等）。共产党人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和工作。

这就是共产国际为参加武汉政府问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当时中国共产党固然也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参加武汉政府了，然而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的政策却恰恰与共产国际所指示的相反。当时共产党中央与国民政府中共产党员所担任的部长做了些什么？请看八七紧急会议告同志书中所举出来的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任令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当时的共产党员，后来公开背叛革命，组织反革命的第三党）就职典礼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以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状况”和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地主的“妄动”，违犯则“严罚”。

实在的说，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中共产党员所担任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的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就职后几个月内没有公布过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和乡村中剥削压迫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如劳动法案，土地法案等等）。有些并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指示应该坚决引导武汉政府走向群众的路线，用最大的努力赞助工农群众运动，造成革命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要坚决批评自己的同盟者所表现的一切动摇与妥协

性；然而实际上竟完全和这一革命政策相反，当时我们共产党中央与政府中农政、劳工两部长不曾有过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庇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而且农政、劳工两部亦竟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政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什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适合名称。土地问题应该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被他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的调查表，竟无一个对于土地关系问题的。不仅如此，当时农政部长谭平山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镇压"湖南的农民运动；中央对此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一次出征已经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次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平山所担任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结束他那不光荣的部长之地位时，还是藉口长期请假的退去。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正在酝酿不要共产党参加政府的趋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其他反革命军官妥协时，谭平山却很愿意去迎合反动军官与多情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的拿手的办法，是藉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现他的部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但中央不仅不反对他这种行动，反而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六月三十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国共关系十一条大纲中有说："参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参看前面"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一节）。在中央看来，同意于临阵脱逃，乃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未能纳农运于正轨"。一个当国民政府部长的共产党员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脱逃还不够，而且重新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个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句话里得到的是什么结论？即：㈠农民运动走上不正的道路；㈡只有武力能纠正它，因为共产党员的部长有了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屠杀农民）是对的，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的代表们进攻革命。共产党员的部长在政府内做了这些玩意，实在是共产党的最大耻辱！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这种反革命的行动，不仅没有处罚，并且没有发表一句话。本来中央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正是它自己的政策。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的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的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议，完全不了解。它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部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差不知有多远。当一九〇五年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自然中国的民权革命还有自己的特点），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而且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 我们还应当为临时革命政府，指出一个合于目前历史客观条件，且合于社会民主派目前责任之行动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政纲。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全部

的最低限度的政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的经济之关系的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亦即本党最近将来全能见诸实行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这是一方面根据目前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别方面就是为今后斗争起见，为实现社会主义起见，这都是不可少的要求。

无产阶级为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来威逼政府，就应该武装起来。武装威逼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这些胜利，应为本党全部最低限度党纲之实现。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且即时压倒反革命的斗争机关，而决不是求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且这种胜利定将成为一种专政，就是它必须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装的群众和暴动，而不是依靠什么别的机关——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机关。因为要实现为无产阶级及农民一些急不容缓的要求，必须要引起地主与大资产阶级以及专制政府之残酷的反抗，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压倒此种反抗与打破反革命之企图。

一九二七年七月之后，武汉政府亦变成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革命专政，而是地主军阀资本家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即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的实现的。

这里连带有一个问题必须加以简单的说明，这就是托洛茨基取消派主张在武汉时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

问题。托洛茨基这一主张，是从他整个路线之下得出来的结论。他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武汉的国民党政权就是反革命的政权，所以应当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来推翻国民党的政权。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认为国民党是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的叛变，是反映资产阶级的离开革命，武汉国民党便是代表着革命的新的阶级结合——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以当时武汉国民党是革命的组织，武汉政府（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是革命的政府，因为国民党是一种民族革命的各阶级联盟的特殊组织，所以它的阶级内容可以随着客观的阶级关系的转变而转变。因此在武汉时期，共产党的政策，应该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它成为一种群众的组织，同时极力扩大国民党的民主化，实行群众的民主选举，渐次推翻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以至把他开除出国民党，使国民党政府转变成为工农政权，使工农民权独裁在国民党这一特殊组织的形式之内表现出来。这就是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如果革命已经向更高的阶段发展，预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当然毫无疑义要建立苏维埃以代替国民党政权，所以应当极力扩大并巩固工会、农会的组织，以准备苏维埃的基础。在理论上，如果说托洛茨基主张在武汉时期（一九二七年五月）建立苏维埃是对的，那末便应首先退出国民党；若一方面留在国民党之内，同时又建立苏维埃去推翻国民党政权，便是不能解答的矛盾。在当时的事实上，连用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来建立工农政权比较用苏维埃政权来推翻武汉国民党政权的策略更便利得多，所以托洛茨基取消派的主张是错误的。

第六节　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武装问题

过去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亦是完全错误的。有一个俄国同志所写的一本《武装暴动》小册子上，曾经简单的确切的论到这个问题，现在节录如下：

说到共产国际支部对于军队中工作之缺点，在这里应该简单的论到中国共产党之错误。当与国民党合作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七月以前），中国共产党有非常顺利的条件，可以在国民革命军中进行政治工作，使兵士群众革命化。但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说，中共的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会议以前之党的指导机关），因为它对于中国革命中之最基本问题采取的是投降的双料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所以对于国民革命军中夺权兵士群众的革命工作也完全没有进行。试看一九二五年广东军事委员会关于在国民党军队中之工作大纲曾怎样说："我们在革命军中的工作，不在于破坏国民党的军队而在于巩固国民革命军而保持其统一。我们不应当在军队中进行我们的观点与国民党的观点不同的政治宣传而引起军队的破裂"。这一段对国民革命军之关系的论调，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时自始至终的政策的一览表，它完全与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前之一个著名的领袖陈独秀的观点相符合。陈独秀说："先要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就是说，在国民革命还没有打倒北方军阀（张作霖等）和占领北京以前，土地革命的发展，

与国民党政策不符的工人阶级之革命运动的发展，在军队中之革命的工作（为的是不破坏它的一致及不损害它的战斗力起见）也是不容许的。这些事情仅只有在北伐成功以后才可以实行。因此共产党仅有在军队中做了合法的工作，而拒绝在军队中组织秘密的党的支部。因此在国民党叛变的时候，它很容易将共产党员由军队中赶出去，而我们党在军队中表示出没有一点组织上巩固的影响，于是党便失了军队。

当北伐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甚至于完全没有提出夺取革命军中之军官地位的问题，虽然在当时对于实现这种任务的条件是非常顺利的。因此在国民革命军中之共产党员的军官是很难以遇见的，有之，则是几个下级军官班长、排长、连长，至于营长便非常之少了。一九二六年末命令叶挺当团长，与其说是共产党自觉的工作之结果，不如说是乃是李济深当时的策略。但是事实上即是在叶挺这一团中，虽然这里有很多的共产党员，而实质上仍然是与其他军阀的军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一团中既没有驱逐反动的军官，在兵士群众中也没有进行政治工作，军队中也没有政治机关。它的变动仅只是将这一团的领袖，用共产党员代替了军阀。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指导时期中，未曾有一次提出将叶挺这一团扩充为师，而在里面设立政治工作的问题。仅只是在南昌暴动不久以前，才将这一团扩充为师。缺乏政治工作，没有适当的政治口号，这是叶挺及贺龙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汕头失败之基本原因中的一个。

在北伐时期中，党员的数量是很快的增长了，但是在军队中之共产党员的数目仍然是很少的。如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初，国民革命军计有九万四千人，内中的共产党员仅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有九百个是在留守广东的军队里。在一九二七年中，军队中之共产党员的数目固然已经增加了不少，但是对于军队中工作之指导是一点也没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指导军队中共产党员的工作之中央机关。

在下层兵士群众中的政治工作几乎完全没有进行的（若在有些地方进行了的话，则完全是当地军队中之共产党员自动去做的），虽然党的领袖们有时也记得这一句漂亮话：必须巩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兵士群众们往往不知道共产党的存在，或是知道它的存在而不能看见它与国民党的区别。党的领袖们不注意军队中之真正的革命工作，尽量去与军阀将军们做上层拉拢的伎俩，目的在保持军队中的一致，高谈其左派国民党之真正原则。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八七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告同志书中还举出了下列的事实：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少数共产党员及党所号召他们加入军队的工农除外）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大多数都是由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暂时与革命相伴，不过是借此升官发财。共产党的领导者应该了解对这种军队的关系，共产党的路线应完全以兵士群

众为标准，而不是以反动将领为标准，共产党应当在兵士与下级军官中发展广大的工作，在军队中造成坚强的基础以资反对那些反动的将领。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与行动却完全与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群众中没有任何工作，也没有想到要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五月）竟没有讨论它。而中央军委讨论了三四个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也没有结果。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许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等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湖南政变及随之而至的对工农群众的大屠杀，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都正式和予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湘赣事件的宣传大纲之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成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六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此种口头上的宣传，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的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在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样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策略和他们

的阴谋，然而中央始终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变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领袖，而是我们的保镖，所以应当对他包涵些。党的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也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在是共产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散乱零碎的工农武装队伍，使以后成为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去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是次要的问题，甚至于以为武装工农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所以根本不积极去做，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已经由动摇而趋于反动，中央忽然‘积极’起来，然而可惜是相反的积极，是积极自动解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的武装（一根短棍子也被解除），“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对于革命中这样重要的问题，却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这便是它对于中国革命一切根本问题之机会主义路线的直接结果。

第七节 党的生活与对国际的关系问题

党在组织上的机会主义也非常厉害。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上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中占大多数的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不是产业工人同志。因此在阶级斗争的紧急关头，常常表现动摇以至于背叛革命利益。共产党中央完全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内完全被一种家长制度支配着，陈独秀便是施行这种家长制度的典型。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前，下级党员群众可说从来没有讨论过党的政策，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下级党部只有绝对服从，根本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且根本没有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

组织上另一个重要弱点，便是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支部生活，支部仅仅成了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很少健全的党的生活，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健全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

党对青年团的工作没有正确的指导，甚至不承认青年团工作有政治地位，当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青年团曾经表示反对中国党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政策而表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党的中央竟因此不许青年团说话，陈独秀则更拿出他那家长式的威风，随便将青年团的意见书撕毁，不肯提出讨论，因为恐怕让青年团一说话，不免要妨碍党中央自己机会主义的领导。同样青年团自己也犯了许多错误，如工作不青年化，团的工作始终没有

深入青年工人群众中去等，党也没有给团以足够的帮助和指导。

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党办工会农会的传统政策很深。自然在中国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广大工农运动起过极伟大的领导作用。但是在一般工作中，党总是命令群众，而不是说服群众。党在群众工作中，总是使群众依靠政治势力而不依靠群众自己的斗争力量，因此发生很坏的影响，革命斗争一失败，群众便与组织脱离关系。党内充满着委派制度、命令主义，却不知道如何取得群众、组织群众，甚至用党的组织去代替工会、农会的作用，结果便走到取消工会农会。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非常恶劣，陈独秀这班英雄常有一种奇怪的论调，就是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实际情形，于此便造成一种口实，去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只在口头上接受，而实际对共产国际的指示怠工。事实上八七会议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很少对共产国际做工作报告，甚至为要维护他们自己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惜破坏共产国际的纪律，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党员群众隐秘起来，实际上去做他们背叛革命利益的事业。

这种种非布尔什维克的现象，经过共产国际的批评斥责与六次大会的斗争，总算克服了一些，但是它的传统还很深固，有时仅在表面上受着一下打击，而实际的势力还在党内潜伏着，遇着有一点机会便又抬头起来，加之党内无产阶级基础的薄弱，政治水平线的低下，党内派别斗争的滋长，使党在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途程上常常受着严重的阻力，后来党内发生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与瞿秋白同志的政策，实际上都是这种历史错

误在一种新形势之下的爆发。所以公开揭发大革命中党内生活及对国际关系问题上这种非布尔什维克的实质，乃是帮助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一种重要工作。

第八节　反机会主义斗争与盲动主义

上面我已经在几个中心问题上指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过去这种机会主义，应当要说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究竟甚么是过去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的根源呢？是不是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初期可以有条件的和民族资产阶级暂时妥协和联盟这一路线根本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呢？再则，共产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以建立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是不是根本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呢？这种问题本来在上面几节中都已经有了事实的答复，现在可以总起来再说几句。

现在从托洛茨基反对派到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他们已经结合成为取消派，所以以下便简称他们为取消派）差不多一致都说：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乃是违反列宁主义的路线，而且说“这是机会主义的根本来源”。因此他们共同的口号便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显然是无耻的躲闪与卑劣的诬蔑。其实我们只要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教训，仔细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路线的正确与过去中国共产党

机会主义错误的内容。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完全是依据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中国资产阶级因为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曾积极的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很明显的有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作用，所以无产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暂时的协作，建立民族革命的联合战线，推进这一革命更有力的向前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在这一民族联合战线中要力争革命的领导权，使这一革命不致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而半途失败。中国国民党原来就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成分，所以很有可能使它成为民族革命的各阶级的联盟，所以共产党应当加入进去，并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加入进去，争取国民党的领导权，同时保存共产党的独立的活动，极力发展群众的组织与斗争，以监视资产阶级的妥协动摇。这样可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更快的发展，在客观上便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很好的助力；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与斗争的力量，在这一革命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可以很快的壮大起来，而渐次夺取并巩固在这一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认为资产阶级对革命是妥协的，无产阶级开始活动便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决不应与之合作。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共产党不应加入，而应该反对，就是根本不同意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这是完全不了解应当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的后备军中夺取过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这一重要的策略。中国革命历史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这一观点的错误了！托洛茨基表面上用列宁主义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中的策略来反对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策略，这已经是错误的了！实际上还是用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反对列宁主义的

路线，因为他始终没有注意到中国最严重的农民问题，同时还造出中国没有封建剥削关系的奇怪论调来说明他之不要农民的观点为正确。

中国机会主义的路线，执行了共产国际“与资产阶级暂时合作，加入国民党”的一点，但是根本不了解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整个的路线。不只是不知道加入国民党应当保存共产党的独立活动，并且主张一切工作都归国民党，甚至认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只是不知道无产阶级应当毫不放松的对同盟者的资产阶级的动摇给以严厉的批评，力争革命的领导权，而且公开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让步，牺牲阶级的利益去服从民族的利益，——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当时有一种所谓左倾的意见，认为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但应保留工人群众不加入。他们的理论基础一样的是二次革命论，一样的不了解争夺领导权的策略，所以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另一方面的表现。所以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是无疑的正确的，而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开始执行的时候，便把它修改成为孟什维克的路线了。

事实是不容假借的。共产国际的路线，认为在实行联合战线的开始，便应一点不放松对于资产阶级妥协动摇的批评，到了北伐的过程中，便应积极准备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是决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已成为帝国主义的新工具，更应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极力深入土地革命，使广大农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与无产阶级亲密的合作，并且要尽可能的武装工农群众以巩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同时对于小资产阶级，应以坚决斗争的精神去领导它，对于它的动摇犹豫，也是要毫不让步给以批评与监督。

因此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分子不断的排除出国民党去，引进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使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准备着进一步的排除动摇的上层的小资产阶级，而转变到工农民权独裁，继续着便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形式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实行革命政权内部转变的策略。所以共产国际在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扩大会议便提出了工农政权的口号，同时指示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参加武汉政府，极力武装工农等。可是当时中国党所执行的策略却恰恰与这一路线相反。

中国共产党过去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是一贯的孟什维克的路线，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怠工。在北伐的过程中固然没有准备反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在蒋介石叛迹已露，上海的三次暴动，还是采取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在武汉时期则不只是没有积极去领导土地革命的深入，而且跟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实际上也就是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咒骂工农运动“过火”。不只是没有积极去武装工农，而且自动的解散工人纠察队，禁止湖南农民以暴动来反抗马夜事变的屠杀和叛变革命的将军。对于引进广大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始终没有执行，对于参加武汉政府则把国际的革命政策变成部长主义，劳工和农政两部成立数月之久没有进行丝毫的革命工作，反而成为阻遏工农运动的官僚机关。中国共产党这一路线，很明显的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相反，所以中国大革命失败主观方面的错误，完全是中国党的机会主义违反了共产国际的路线，决不是共产国际根本路线的错误。

从以上各节所述，可知中国共产党陷落到机会主义的泥坑是很深远的。在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决议案的时候，中央内

部虽然发生了争论，瞿秋白同志不同意中央的解释，尤其不同意中央对上海暴动的策略，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批评彭述之主义，批评当时的机会主义。这本小册子，对于应时的机会主义，的确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攻击。但是一则因为瞿秋白同志自己当时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还没有弄清楚，例如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小册子中把中国革命性质解释成“可见中国现时的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对于土地革命问题虽然已经指出“中国革命的中枢是农民革命”，然而还没有很认真很实际的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深入的路线；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亦只说：“不仅反对买办阶级的压迫捣乱政策，而还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化”，并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不可免的叛变与我们积极准备群众力量以镇压资产阶级的叛变的路线。其实当时（秋白同志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在一九二七年二三月中）民族资产阶级叛迹已经表露。因此打击机会主义的力量还不很大。二则瞿秋白同志这本小册子在当时还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并没有挽救过来。

本来一九二七年五月党的五次大会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已经很深，特别是在北伐战争中与上海三次暴动及四月沪粤事变中，党的机会主义已经使革命受到很大的危害，然而五次大会上，虽然有反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对于国际整个的路线仍旧非常模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阵线既然这样的软弱，当然不能攻击机会主义的要害，发动全党同志的注意，无法使机会主义受严重的打击。同时，当时国际代表罗易（现在他完全是右

派的主张，共产国际已经将他开除党籍了），自然是站在共产国际的路线上，可是他只注意鲍罗庭的右倾，而忽视了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在他的演说中竟这样的说："中国共产党是从斗争中产生出来，决不会发生机会主义"。这不仅是当时调和倾向的思想，而且是极端错误的意见。于是软弱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在五次大会上的影响，几乎完全消灭了。自然在组织上更形成了一种调和派的结果。

五次大会后的新中央，集合了党内各种不同意见的代表，但是旧的机会主义派仍然是居于领导的地位，所谓反机会主义的分子，既然是十分软弱，且不久都跟着鲍罗庭的路线跑了，就是五次大会前号称反对机会主义的秋白同志也是如此。的确武汉时期整个的共产党中央都坠入机会主义的错误。时势是日益严重起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却日益深沉下去。当时动摇与犹豫是党的政治路线。于是党的指导，不只成了群众的尾巴，而且是替资产阶级服役，破坏革命的进展。

后来中国机会主义者陈独秀等竟无耻的说："共产国际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中国革命"。其实当时（一九二七年五月）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同时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扩大会议，不但根据七次扩大会一贯的路线，对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前途与策略都有更深刻的指出，不但对于当时一切严重的问题，都有极正确的解答（参看上列各节所引共产国际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和动摇，指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有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更加高了"。其实如果共产国际执委八次扩大会决议案在中国实际的斗争中发生了些微

的影响，武汉的危机，都不是不可以挽救。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的路线与国际的指示不仅不符，而且完全相反，于是革命的危险自然更加高！

岂但“更加高”而已，客观革命形势是迅雷闪电似的急转，而党还是动摇犹豫；结果，党的机会主义的领导，遂使革命受到严重的失败。尤其是党受到莫大的打击，政治上已经走到绝路，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几乎完全丧失；组织上已经走到分崩离析的状态，一般同志无所适从。许多动摇的分子如施存统之流，遂实行叛变，公开投降敌人。当时的形势，党真有暂时瓦解消灭的可能。共产国际为挽救中国共产党的灭亡，因此解散当时中央政治局，超过中国的组织，直接召集临时紧急会议——这就是在党的历史上有极重大意义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新纪元。虽然八七会议本身还有很大的缺点：例如因为对于土地革命问题认识的模糊，因此而有“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对小地主则减租”的错误决定，对于国民党左派关系问题也是如此（参看前面“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与“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各节）。可是，无论如何，八七会议始终有极重大的意义，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中，它将党救出来，它只是洗刷旧的机会主义，建立新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第一步；没有它，中国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八七会议改选五次大会的中央政治局，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将机会主义的错误都明显的无所隐藏的指摘批评出来，这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告同志书中指出当时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意义说：

现在的情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

运动，捣乱工农团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它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案，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导做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他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末，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

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这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之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做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斗争。'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既有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还有更加不革命的行为，这些情形，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

——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被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残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深，领导农民群众的武装暴动，能够在各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滴一点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里的一页，农民协会实际上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分配土地于乡村贫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层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努力的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

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得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信用。党的群众是我们力量之源泉，有它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没有坚决实行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为指导机关之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

八七会议，既然坚决批评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时在政治上指出武汉失败使革命又受了一次打击，但是革命因为阶级关系的新的变动，必然向着新的阶段——工农革命的阶段发展。因此坚决的决定了新的策略，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农民暴动计划，并且决定了对于农民土地革命及职工运动的新路线。在组织上提出了彻底改造党，引进工人同志参加指导机关，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所以虽然八七会议本身还有缺点，然而它始终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给了党以新的生命，全党同志在党的新的精神与策略之下，重新兴奋起来，把党在瓦解崩溃的前面挽救过来，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同时党的新的口号深入了群众之后，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使工农群众感觉到政治上找到了新的出路，而重新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坚决的斗争，把党因机会主义丧失了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相当的挽救过来。所以八七会议的确是党的历史的一大转机。只有这一历史转变的落伍者陈独秀们才会极力诋毁八七会议，一方面说它是盲动主义的

开始，另一方面又说并没有把机会主义根本纠正过来。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一历史转变的意义，所以便永远堕落在机会主义的泥坑，无可解脱。

固然不错，八七会议之后，各地党部与团部确实发生很多盲动主义的错误，首先便是江苏倒蒋时期的“暴动”问题。那时（一九二七年九月）宁汉妥协，蒋介石下野，上海政权在更迭反动人物之际。自然，反动统治因为内部纠纷而混战。江苏省委便决定武装夺取上海总工会旧会所（湖州会馆），而称之为“暴动”。这显然是不顾群众力量的冒险主义，当时国际代表便加以制止。其次便是顺直“大暴动”问题。那时（一九二七年十月）奉晋战争发生。当“战争开始之时，北方局即决定在三特区、南口、京津、唐山、京东六处准备暴动，现在奉军日溃，当时已迫，各级党部应迅速准备”，“暴动的军事计划——系以三特区和京东四县为目的地，及天津、唐山暴动不能持久时，则一直冲出三特区保持热河北部与外蒙联，如此则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各级党部于接此通告，便应火速进行暴动的组织和布置，山东、山西亦应于接此通告后准备动作，以资策应”（摘录十月六日所通过的《北方局暴动计划》。这显然是在玩弄暴动！而且北方局决定暴动的显明的目的，不是建立工农群众的政权，而是想造成第二个五卅似的，以“大暴动”来发展工会农会和党的组织，及“建立我们的军事势力和根据地”（见同上）。这更加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动观点了。何况当时主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于是北方局的“暴动计划”，便只好成为历史的讽刺料。第三，在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暴动起来，于是又引起了上海暴动问题，以上海响应无锡的倾向在省委中发现出来，省委

也认为“暴动实实在在已经到来”（省委第八号通告）。于是“发动”上海暴动的特别方法就来了：先用几个武装的红色恐怖队去一厂一厂的威赫工人罢工，以为等到如此弄成总罢工，暴动就可起来而成功！这更是玩弄暴动的倾向。第四便是湖北暴动问题。上海问题是在宁汉战争之中，湖北问题也是宁汉战争之中。当时有人专看军阀内部冲突，希冀他们内溃，不管群众如何，只想“趁火打劫”。主张武汉那时（一九二七年十月）立即暴动，“即使组织一两天苏维埃也是好的——就算暴动没有相当胜利的希望”。湖北省委为“避机会主义之嫌”起见，也就闭着眼睛下总同盟罢工令，下动员令。实际上群众的情形是还不能暴动。唐生智下野时，武汉许多党员、团员还在这“假暴动”之下露出临阵脱逃的也有，慌张失措的也有，这都是机会主义弱点的暴露。但是，并不因此而“暴动命令”就不是盲动主义的。其他可以举出的盲动主义错误还有很多，这里用不着一一举明，总之，八七会议之后，盲动主义的错误确实是有的，这是无可辩难的确凿的历史事实。

然而我们决不能因为有这些盲动主义的错误，就根本否认八七会议决定暴动政策的重大意义。当时（八七会议之后）提出“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不只在政治的意义上针对着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适合群众的要求；而且在政治的形势上，一般说来，武汉与南京政府都是在动摇崩溃的状态中，工农斗争虽然受到新的打击，却仍在不断的爆发，革命的浪潮高涨并未完全过去，所以提出号召群众武装暴动的口号，在总的路线上是很正确的。至于在每一个实际暴动当中而发生了策略上错误或时期估量的不正确及发生或多或少的盲动都是

事实，但并不能因此遂推翻这一总的路线。

因此在八七会议以后，党所组织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虽然在每一个暴动的具体的策略上，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错误，并且都不是胜利的暴动，但在总的路线上是毫无疑义的，是正确的。

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指斥这些暴动都是盲动，这是根据他们一贯的政治观点出发得出来的结论。他们认为武汉的失败，“已经是中国革命最后的失败，已经是历史的转变时期，就是武汉失败以后，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了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时期，党应当取消一切革命的口号而准备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合法运动”（托洛茨基）。“武汉反动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完全失败，各国革命史告诉我们，大革命失败之后，必须要经过一个反动时期，中国也没有例外，在这种时期，党只可采取防御战略，要求召集国民会议”（陈独秀）。自然要觉得这些暴动在总的路线上都是盲动，八七会议的路线根本就是盲动主义的路线了。这不过是证明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托洛茨基在这时候都已经开始走上取消主义的泥坑了。

广州暴动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企图挽救革命的一次英勇的斗争，开始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有它伟大的历史意义。暴动的爆发，使全世界帝国主义与全国反动势力，都震惊起来，马上互相妥协联合一致的来镇压暴动。同时在指导这次暴动的主观方面也犯了不少的错误，遂使暴动受到严重的失败（参看前面第四章第八节）。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反动统治阶级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尤其是共产党加以极残酷的压迫，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工会、农会都被解散，许多革命的干部与领袖尤其是共产党员，遭受空前的大屠杀，革命势力受到莫大的打击。因此第一次的革命高潮，随着广州暴动的失败而完全过去。所以广州暴动，的确划分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时期：一方面在革命的阶段上，开辟了中国工农苏维埃的革命；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形势上，结束了第一次的革命高潮。

革命的形势转变了，领导革命的党，应该很迅速的抓住这一转变，而提出新的策略，然后才能适合于领导革命的新的任务。如果不能极灵敏的注意客观的革命的转变，而死守着自己划出来的环圈，那末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便要不可避免的脱离群众。暴动是"玩"不得的，没有相当的前提就举行暴动，决不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广州暴动以后，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没有抓住革命形势的转变是最主要的原因。

广州暴动的失败，不可否认的革命势力是受到了极严重的打击。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固然革命的根本矛盾一点也没有解决，统治阶级决不可能稳定它的政权，革命具有新的高涨的必然趋势。可是革命的主观力量经过这样严重的挫败以后，决不是马上可以恢复，而且统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也还没有表现马上就崩溃破产，所以革命浪潮，决不能马上高涨，尤其不是一直高涨。因此当时党的策略的路线，应该转变到重新聚集力量，争取群众，组织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应该把"武装暴动"的口号从直接行动的口号转变为宣传的口号。当时指导机关，忽视这一革命形势的转变，只看到统治阶级无法稳定的一点，而忽视革命队伍在经过严重的压迫以后的溃

散疲困的状态。不知道自己的队伍在这样零乱的状态，就是敌人的力量异常的削弱，仍然是无法向敌人进攻，因此而误认革命的形势是“继续高涨”，“一直高涨”，并使主观的造出“在革命形势的方面，也是无间断性质”的理论。在这样的错误估量与忽视盲动主义危险的情形之下，自然在策略上无法转变过来，而仍然机械的守着在革命高潮时“直接暴动”的政策。用这样零乱薄弱的队伍而去与强大的敌人作拚命的尝试，甚至自己队伍完全溃散了，而以少数干部作毫无把握的孤注一掷的牺牲，这毫无问题的就是玩弄暴动的冒险主义了。

所以盲动主义发生的根本原因，主要是由于不认识革命的转变，不承认革命的失败而发生对革命形势的错误的估量，盲动主义的表现是脱离群众，不顾群众，而以少数的先锋队作拚命的牺牲。党在这样盲动策略之下，又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如果继续的是这样发展下去，将不可免的要使党走到灭亡的道路。所以盲动主义是与机会主义一样的可以损害党的生存的危险。幸而经过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的纠正与中国共产党六次大会坚决的斗争已经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遂又前进一步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六次大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新的斗争——反机会主义，反托洛茨基主义及反对取消派调和派的斗争，然而叙述这种斗争的历史已经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的任务应该从此结束了。

第七章　结　　论

留到结论里来说的话已经很少，因为在前面历史分析中对于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已经给了相当的结论。然而终究还有些话应该补说的。

中国大革命虽然已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可是终于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的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㈠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力量强大。外国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和分裂民族的联合战线，用贿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强大的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㈡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的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㈢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的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的军官都是豪绅地

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弱。事实上这种军队，还是豪绅封建地主及资产阶级驯服的工具。

㈣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运动及上海三次暴动时)。中国工人阶级本来组织很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的舞台，首先受着反动统治的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及中部的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豪绅地主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农民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豪绅的反动更加容易实现自己的任务。

㈤中国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半封建土地关系有密切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有相当关联（参看前面第五章中之第三节）。所以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中去。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也就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之一。

然而这些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大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我们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应当坦白的承认：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政策。当大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

劳动群众的利益。“机会主义是传播资产阶级影响于工人阶级，并传播社会民主党倾向于共产主义运动之一种间谍”。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违反共产国际列宁主义的指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自己的独立性，对于革命同盟者不能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争取兵士群众，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益；再则，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从一个政治和策略到另一政治和策略的转变，所以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不能事先准备反攻的力量，俾能在一个过渡的阶段上取得胜利，而反被敌人包围，常常受到敌人“出其不意”的攻击。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过去指导机关不但没有坚决的争取革命领导权，反而自己断送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指导机关这种机会主义政策，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以上便是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总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指出这些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在及往后的革命斗争都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这自然不是说我们现在和往后的革命斗争将走过去同样的道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时期已经很壮烈的同时又是很悲惨的过去，已经成为可歌可泣的历史年代了！中国无产阶级退兵一战——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已经闭幕，同时革命的历史车轮已经引导

我们走上了新的工农苏维埃革命的道路。

不仅如此，我们现在所经历着的国际形势也和过去不同了，一切事变指示我们：现在正是资本主义一般危机增长起来而帝国主义内外矛盾日加剧烈的时期，“此时期的矛盾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革命浪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总之是必不可免的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变将要到来。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它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反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剥削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劳苦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及压迫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进。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更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高丽、爪哇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北美合众国的金元帝国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的完成，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专政之胜利的序幕。所有这些新的时期与任务，都更要求我们要以比过去更多几倍以至几十倍的努力，和采用许多新的方法去实行斗争，然而无论如何，过去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目前及往后的革命斗争始终有极重要的实际意义。

首先，过去大革命失败主要的客观困难与原因，现在都还摆

在我们面前，我们绝对不应该有丝毫的忽视。因此，积极的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的领导权，引起极广泛的工人农民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群众来参加；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各种改良派的罪恶，极力揭破他们种种方式的反革命面具；联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巩固的发展工农红军，积极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积极的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及军阀战争的严厉斗争，实行变军阀战争为工农革命战争，成为我们当前最基本的任务。况且，中国革命的新时期中——苏维埃革命阶段，阶级关系已经与过去大大不同，因此，我们要战胜曾经遇到过的困难，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中，一定要发动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运动，才有可能。军阀军队的强大，他们能够得到帝国主义者帮助，又有最新技术的武装，因此无产阶级应该积极以革命的口号，加紧争取广大兵士群众加入革命战线，破坏军阀的军队。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对于革命非常不利，因此，努力配合并汇合各地及各种革命运动，使成为有组织的发展。也就是我们在研究过去大革命的经验时应有的结论。

将要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暴动，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统治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但要实现这一主要任务，对于过去大革命中许多经验必须认真的学习，其中特别是上海三次暴动与广州暴动的经验，更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教训。

对于力争并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则过去大革命给予

我们的教训，对于我们目前的斗争仍旧有很深切的意义，共产党如果不能加强革命的工人运动，不能树立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则不但不能彻底完成农民土地革命，而且不能保证往后革命的转变——由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重大问题，我们绝不应有丝毫的疏忽。

正确的政策，需要对于环境有正确的估计，这也是过去大革命教训中重要的一点，不能严格的冷静的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切实估计革命形势某一时期的特点，便不能提出切合实际生活的革命口号，定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正确策略与战术。

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斗争而得来的，现在不但要加紧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取消主义，而且要继续过去反机会主义斗争的精神，肃清一切尾巴主义调和思想及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在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武装。不然，共产党是没有可能执行并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的。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该认真的精密的学习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该从过去大革命的血泊中找出真正的革命道路，得出许多斗争的实际结论，这些经验与教训乃是我们往后取得胜利的起点。“没有一九〇五年的总演习，便没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大革命的胜利从来没有不经过失败的，谁怕失败，谁便没有胜利，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应该便是将来中国“十月”之预演。

一九三〇年三月底脱稿

编 后 说 明

为满足读者需要，我社根据上海春耕书店解放前的版本，重印了华岗同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除个别明显错句错字作了更正外，本书未作更动。

书名题字：杨尚昆

封面设计：丁　聪

责任编辑：石肖岩　黄国平

统一书号：11224·91

定　　价：1.40 元